

# 克格勃与政权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忆

菲·博布科夫著，王仲宣 译

東方出版社

# 克格勃与政权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忆

菲·博布科夫著，王仲宣译

東方出版社

© Ф. Д. БОБКОВ

КГБ и ВЛАСТЬ

本书中文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取得,由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6-3755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陈岩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格勃与政权——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忆/菲·博布科夫 著  
王仲宣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7-5060-3330-5

I. 克… II. ①博…②王… III. 克格勃-史料 IV. D75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619 号

## 克格勃与政权

KEGEBO YU ZHENGQUAN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忆

菲·博布科夫 著 王仲宣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5 插图:3 页

字数:29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330-5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

## 作者的话

俄罗斯又处于转折的关口。

这样的事情往往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交替的时刻。过去的、似乎是很稳固的理想被推翻了，人们沉浸在欢庆之中，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刚刚过去的一切。一种产生精神真空、精神混乱的危险，国家面临分裂、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预言威胁着这个国家。然而幸运的是，俄罗斯的社会已经开始逐渐克服这个显然是产生于政治的可怕病魔。人们已经开始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全面客观的诠释。现在已经不常听到那些否定一切或者肯定一切的极端的话语，人们正在尝试着对于苏联历史以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伟大的和悲剧性的矛盾进行深刻反思。

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几乎是一个最敏感和尖锐的问题，这一话题往往能引起对于苏维埃时期的激烈争论。人们经常会回忆起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对人民的残酷迫害。这与革命后的一些政治苦役们的回忆录不同，它不仅仅是留给后辈人的一种见证，这首先是一种社会的自我保护，以免在不远的将来重蹈过去的覆辙。我相信，对于人民的悲剧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应淡忘，而且有人认为对过去的悲剧不必旧账重提，这也是不正确的。

克格勃这个机构经历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

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直到克格勃这样的历史沿革。现在，除了记录下这一机构在历史上的黑暗篇章和它所犯下的桩桩罪行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理解、思索对人民进行镇压这个问题的形成机制。我认为，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罪于“克格勃这个恶魔”也是一种误解，因为这会导致犯罪现象的激增。因为克格勃本身只是实际上领导着整个国家的苏共中央的工具，它所实现的是苏共中央的意志。这个工具的确有着很大的权力，但是也并非“权力无限”、“法力无边”——这里的意思是：克格勃在苏联的不同历史时期，或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或者是服从党的最高领导。这也就难怪克格勃和它的前身历来就被称为“党的武装”了。

我在实际工作中有机会了解克格勃和党中央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我希望在本书中能够揭示“安德罗波夫时期”党对国家安全机关实施领导的某些特点。自然，对于所涉及题目，我不可能做到毫无隐讳，然而书中所列举的事例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希望，这些事实将改变人们对职业的国家安全保卫人员的看法，他们为了祖国安危在安全战线上诚实无畏地工作。

时间已经证明，由于对国家安全系统的破坏，把国家安全系统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过失的替罪羊，致使许多精通自己专业的国家安全人员离开克格勃，这对国家的战略安全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证明生活本身要求恢复忠于职守、精通业务的国家安全部门。至于这个部门是成为保护国家根本利益的系统，还是成为一个镇压的工具，这将取决于国家最高领导层为其设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取决于能否实现对安全部门的社会监督。我希望能够汲取昔日克格勃的

教训，因为这些教训对于今天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本书命名为《克格勃和政权》的初衷。

我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写这部书的必要性”。有一个问题令我不安：时机是否已经到来？因为书中谈到了一些事件的内幕，而人们对于这些事件还记忆犹新，事件的参与者们也还健在，甚至有的还在平步青云、身居高位。至于我，我将恪守一个原则：“决不撒谎！”有一些事实尽管已经不再是秘密，但是可能会给某些人带来精神上的伤害。职业道德不允许我散布这样的信息。我认为这是我写这部书的最大困难之一。但是出于对国家利益和公众福祉的思考，我强烈地感觉到，今天该是说明克格勃的真正作用的时候了——我再次重复，为了汲取过去的教训！这就是我构思这部书的主要想法。我希望能够讲述很多东西，但是不会背离“决不撒谎”的原则。

书中有些章节显然是很吸引人的。然而这不属于目前充斥媒体的、炒作社会舆论的爆炸性新闻。这里指的是涉及克格勃的一些实际存在或纯属杜撰的事件的深层内幕。本书中所揭示的某些事实是需要重新评价的。

同时我也料到，因为某些言而不尽之处，我会受到指责。为此我必须事先解释，若有不尽言之处，绝非有意藏头露尾，故意隐藏某些事实。这仅仅是因为有些人的命运、事件或现象不能作为一般论题的旁白和插图。它们是一些独立的重大题材，值得单独进行客观的分析。我希望将来继续我的谈话，把它们归结到诸如知识分子、政权和克格勃这样的题目。

最后。鉴于我多年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我在那里干了45年——我有幸与很多人交往。我在克格勃工作期间，领导人就更换了12次，他们是：梅尔库罗夫、阿巴库莫夫、伊格纳季耶

夫、贝利亚、克鲁格洛夫、谢罗夫、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安德罗波夫、费多尔丘克、切布里科夫、克留奇科夫。他们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以及个人品质都很不相同。当然我不可能直接观察到每一个克格勃的最高领导人的工作。但是我可以把他们在位时期单位里的气氛告诉你。当然其中几位领导是我熟知的。我觉得，把克格勃机关里每个阶段的工作进行比较，也有助于展示本书的主题和各个章节的内容。

1955年8月



作者戎装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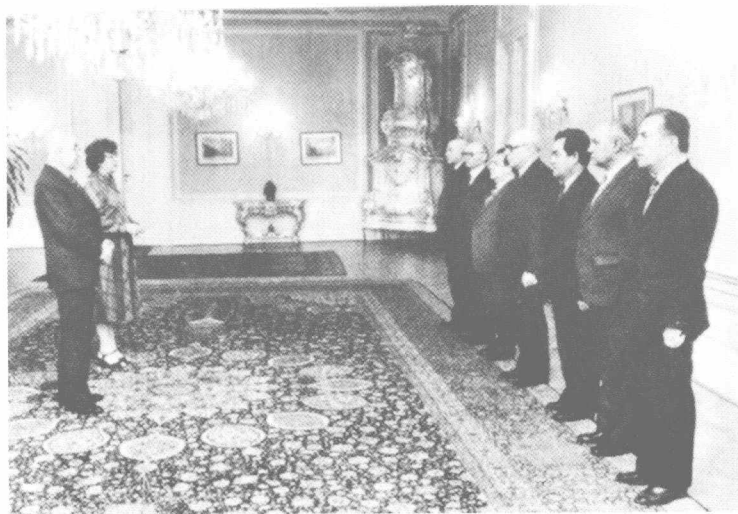
1990年,跟踪训练,从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到克格勃中央俱乐部



1990年与战友捷卢什金、伊什特科夫在一起



作者与伊利扎罗夫院士在一起



1983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接见



1987年,见证谢瓦尔德纳泽和切布里科夫亲切握手



作者与战友科洛巴什金多年后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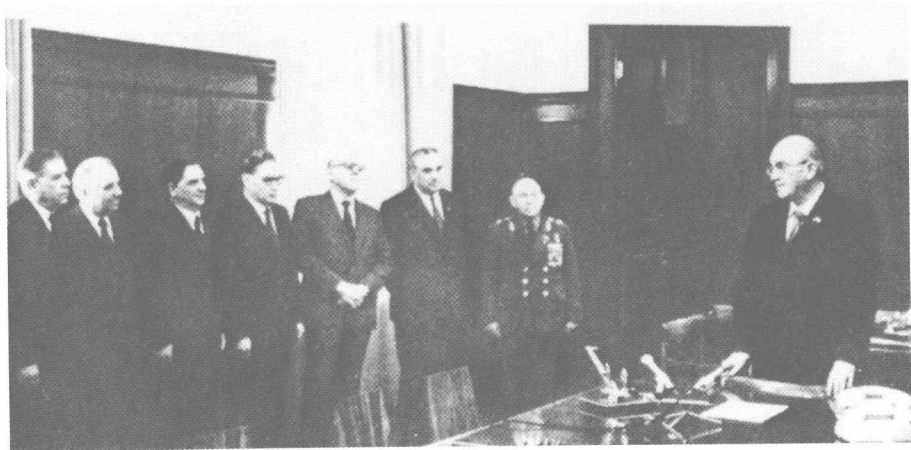
作者与画家瓦西里耶夫最后一次见面



70年代克格勃领导人右4为戈尔巴乔夫,右5为作者



苏共 19 大国家安全机构代表,在那次会议上有可能制止国家解体



1982 年,安德罗波夫告别克格勃

---

---

## 目 录

作者的话 .....	( 1 )
生活道路的起点 .....	( 1 )
“斯梅尔什”反间谍学校 .....	(13)
“冷战” .....	(21)
一所美国的特工学校 .....	(34)
在布鲁塞尔国际展览会上 .....	(48)
不设守门员的比赛 .....	(53)
怎样招募和使用特工 .....	(59)
可疑的集装箱 .....	(68)
美国间谍机关的一次失败 .....	(73)
50 年代 .....	(84)
谢尔盖·安东诺维奇案件 .....	(95)
一名奸细的本性 .....	(115)
苏共二十大 .....	(123)
亡党的反思 .....	(135)
领袖身边的人 .....	(142)
在政治局的会议上 .....	(156)
亚·尼·谢列平 .....	(160)
弗·谢米恰斯内 .....	(172)

安德罗波夫 .....	(177)
东欧各国 .....	(201)
保守秘密和怕担责任 .....	(212)
卢比扬卡的中情局特工 .....	(227)
识破假象 .....	(233)
知识分子和公开性 .....	(241)
民族问题 .....	(267)
难忘的 1986 年 12 月 .....	(309)
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腾飞和跌落 .....	(320)
移民问题 .....	(329)
宗教问题 .....	(334)
苏联是怎样解体的 .....	(340)
与总统的最后一面 .....	(351)
展望未来 .....	(354)

---

---

## 生活道路的起点

我已经说过，我不准备写自传，然而我想，关于我本人和我的家庭的一些情况，还是应该告诉大家。目的是让诸位了解我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国家安全机关，以及在进入安全机关之前的情形。

1925年12月1日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土地丈量员的家庭。那是一个农村全面破产的时期，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到处漂泊。

1932年乌克兰发生大饥荒。当时我们全家住在马克耶夫卡城。我还记得和伙伴们一起到水塘边去捞水藻和河蚌，让母亲做熟来吃。但是当时主要的食品，是不知父亲从哪里弄来的干西瓜皮。

你说怪与不怪，使我终生受益的一个教训却是一件小事。一次午饭前，父亲从工厂的食堂带回来一块类似于血饼的东西。祖母自然就给了我。但是父亲很快地把盘子推到我叔叔面前。叔叔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大病初愈。自然，叔叔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这盘食物。但是父亲坚决要求叔叔把它吃下去。

“别不高兴，菲利浦，”父亲对我说，“你叔叔得了很重的伤寒，生命垂危。你看，他现在还很虚弱，我们不能眼看着他饿死。”

在战争时期，时常会发生食品短缺的情形，父亲的话就会回



荡在我的耳旁,于是我便会把最后一片面包留给身体最虚弱的同志。

每当回忆起童年时代,我总是感到很温暖:夜晚的篝火、运动会、远足。在一次少先队的集会上,我给一位当时很有名的高炉工长伊万·科罗博夫敬献红领巾,为此我感到非常骄傲。

学校的老师以及工厂里聪明善良的师傅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最不能忘怀的有:惨死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中的中学校长克尔热敏斯基、数学教师萨姆博尔斯卡娅、毕业于别斯图热夫女子学院的俄文教师帕斯欣和布什特德、乌克兰文教师帕夫洛夫斯卡娅和布德利斯卡娅。那个年代里,令我倍感珍贵的是学校里的友谊和善意的气氛。

30年代的特点就是全民都处于热火朝天的建设中。工人处于这个伟大国家的生活的中心。在顿巴斯这个斯达汉诺夫运动和劳动突击队的发源地,最让中学生感到骄傲的就是那些同乡的名字:矿工伊佐托夫和斯达汉诺夫、操作工人克里沃诺斯,还有拖拉机手安格利娜。帕帕宁北极科考队的队员切卡托夫、格里佐杜博夫实现了跨越北极的飞行,他们的卓越功勋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但是毕竟很多男孩子玩的还是夏伯阳打仗的游戏,心里挂记着西班牙的共和国战士,为哈桑湖<sup>①</sup>畔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兴趣盎然的年代,尽管1937年发生了一场席卷全国、几乎波及每一个家庭的“大清洗”浪潮。我们家属于工程技术人员家庭。父亲在基洛夫冶金厂工作。有一

---

<sup>①</sup> 哈桑湖位于俄罗斯东部边区,1938年7月底苏军曾在这里粉碎了日军的入侵。

天晚饭后，趁妈妈洗碗的时候，父亲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平静但很坚定地对我说道：“菲利浦，你已经 12 岁了，可以说是一个男子汉了。我想让你知道：我可能会被捕。但是你应该明白，我的良心是纯洁的，无论对人民，还是对自己的同志，我都问心无愧。”

我感到很震惊。为什么要逮捕父亲，他可是一个令人尊敬、绝对诚实的人呀！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闪过：在我们居住的这栋房子里一共有 32 家，除了所剩下的五六个男人之外，其余的所有男人都被捕了，可能他们都是无辜的？以前我可从没有这样的怀疑。我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的人一样，都坚信：人民的敌人——就是敌人。但是听了父亲的话之后，我的看法变了。父亲很快被工厂开除，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没有工作。地方报纸时而会刊载一些谩骂他的文章。妈妈在夜里只要听到一点响动，就会跑到门口。我们一家人生活在恐怖不安之中。不久以后，我们家已经无以为生，只好变卖心爱的图书和其他东西。所幸的是，惊险只是擦肩而过。但是这一年的经历我已经铭记在心，在这段时间内我思考过很多的问题。甚至在很多年后，当我所领导的部门中出现涉及对某些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我总是尽量避免，而且往往也能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

1941 年 6 月 22 日，卫国战争开始了。到了 10 月德国人已经接近顿巴斯。我们的部队迅速后撤，城市领导机关也撤出了。马凯耶夫卡陷入无政府状态，市内出现了一批土匪，他们趁战乱抢掠仓库和商店。居民们被吓得躲在自己家里不敢出来。暴乱的场景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记。

其中有这样两件事情。

在政府撤离后的一天，我和同学们在城里到处找面包。我

们正走在一条主要的大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吼声和口哨声。这是一群流氓呼啸着朝我们这边奔来。躲藏已经来不及了——只能闪身靠墙站在一座房子的台阶上。这栋房子里有一家名叫“因德珀什瓦”的裁缝店。原来这帮土匪就是朝这里来的。我们也被他们拥进了裁缝店。霎时间所有的财物被洗劫一空：没有缝好的衣服、布料、窗帘，连沙发套和椅套也没能幸免。最后一名土匪闯进来的时候，室内已经空空如也，他抄走了唯一留下来的一把裁缝的皮尺。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同学家里过夜。他家的窗子正好朝着隔壁一家公共食堂的院子。院子里有几间猪圈。夜里我们被一阵猪的尖叫声和人群的呐喊声惊醒。眼前出现了一个抢劫猪栏的可怕场面。土匪们把几头猪活着就砍成几段：有人分到了猪腿，有人分到了猪头，就看当时手里抓住了什么部位。

后来我亲历了战争，遭遇到了无数的大规模的动乱。当然，死人的事情不可避免。但是，发生在马凯耶夫卡街猪栏的抢劫场面，直至今日还令我惊心动魄。这种现象源于无人管理的无政府状态。每当我想到犯罪现象泛滥、权力机关被削弱、各种武装力量得到纵容、民族间的分裂主义冲突的加剧等种种混乱的现象可能导致的后果，发生在马凯耶夫卡的抢劫场景都会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父亲正在第聂伯河边修建一家军工厂。他回来的时候，自己的单位已经后撤了。在家庭会议上决定：我和父亲去追赶自己人，母亲、祖母、小弟弟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留在当地，搬到一起居住，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赶在德寇到来之前离开了顿巴斯。我们徒步走了很久很久，有时会乘坐一段有棚的货车或者搭乘向后方撤退设备的

平板车。

我们在11月7日辗转来到斯大林格勒。城里到处挤满了难民，我们的目的地是彼尔姆。我们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艘驳船，船上已经挤满了人，可是难民还是不断地拥上来，很多人掉进冰水里。没有一个人伸手搭救。

在离卡梅申还有7公里的地方，驳船被冰卡住了，既没有食物，也没有饮水了。三昼夜后来了一艘破冰船，所有的乘客都被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它的名字是“季米里亚泽夫号”。我们乘这艘船来到卡梅申。接下来我和父亲沿着铁路线走下去，经过了巴拉绍夫、奔萨、鲁扎耶夫卡，一路上多半是徒步。

最后我们到达了彼尔姆。父亲被安排在一家工厂担任工会工作，我也进了这家工厂。很快我被选为厂里的共青团团委书记，后来被调到市团委担任处长。稍后一些，我被选为市团委第二书记。现在很难设想，一个年方16岁的孩子，如何能够承担市团委第二书记的担子，但是那是战争时期，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

当开始组建西伯利亚志愿兵师的时候，父亲作为一名普通的装甲兵参加了军，开上前线。几个月后，我也到了父亲当兵的那个师。就这样，在1942年的秋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尽管我在战争中走过了漫长的路，但是我现在并不打算描写战争——那是另一个更长的话题。在这里我只回忆几个片段。

1943年8月，那次战斗打得很惨烈。我们的任务是进攻斯帕斯-杰姆斯科城下的戈涅兹季洛甫斯基高地。德国人那里修筑了大纵深的梯次防线。高地前挖了深7米、宽20米的防坦克壕，后面分布着链形永久火力点。稍后在纵深处是火炮和迫

击炮阵地。除此之外，在高地的山脚下还有三条战壕，战壕前方是铁丝网和伪装的地雷区。这个防御体系一旦被攻破，就为苏军打开了通向斯摩棱斯克和明斯克的大门，打开了向波兰进军的通道。

我们师的任务是攻占帕夫林诺沃区域内的 233.3 高地。

8月7日拂晓，进攻打响了。数千门各种口径的火炮一齐朝德军阵地射击。一排排的炮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就好像每一处灌木丛和每一块洼地都在喷射火焰。炮声刚刚结束，空中又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我们的强击机正在收拾敌人残存的阵地。此后才是我们的战场主角——步兵发起冲锋。这场战斗打了整整一天，黄昏以前，我们团接替友军的前沿阵地。友军依托一条战壕击退了德军的多次反攻，此刻战壕已经被尸体填平——主要是德国士兵。我们也没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立即对第二条防线发起进攻，并迅速占领了第二条防线。在进攻中我跳进了一个很深的、坚固的德军掩体。我突然感到自己很累，好像已经走了几百公里，经过了整整的一个世纪。稍后我渐渐地清醒过来，我迅速地环视周围，发现这里堆满了手榴弹。我太高兴了，在战场上不可能有多余的武器。

突然，敌军方面传来坦克的马达声，还响起了冲锋枪的射击声。德军发起了反冲锋。巨大的钢铁怪物缓缓地接近，直接压向我们的阵地，一路散布着恐怖：我们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武器。我平生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惧，是因为感到力量的不足！

一辆德寇的“菲迪南”自行火炮朝着我所在的战壕驶来，后面依稀可辨绿色的德国军大衣。

已经没有思考的时间，我把十来颗德军的手榴弹捆成一束，还加上一颗我们的手雷——小柠檬作为引爆装置。于是我开始

等待。

一桩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我身前身后的土地开始震颤，周围干燥的野草燃烧起来，林间空地上腾起浓烟。火炮的射击撕裂了漆黑的夜空。

“菲迪南”火炮冒烟了，开始慢慢地后退，接着便燃起大火。我们明白了，这是我们的卡秋莎在射击。我们是如何活过来的，只有上帝才知道……

德国鬼子后退了，我们开始巩固新占领的阵地。接下来的四个昼夜，我们的阵地变成了真正的地狱。我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我们自己也一次次地冲锋，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牺牲了不少同志。

有一次我们的进攻受挫，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太阳照耀着，我们突然觉得，尽管正在进行着可怕的战争，但是生活依然在继续。真的不愿意想到，我们离战争的终点还有很远……

和我相邻的掩体中是我的朋友瓦夏·阿甫杰耶诺克，他来自阿钦斯克。我们默默地坐着，找不到话题。突然从林地那边传来几声枪响。好像那里隐藏着德国的狙击手。这时我们发现有一个身影朝我们这边走过来，那是我们师里的一位连长。我高声喊道：

“趴下，树林里有狙击手！”

但是连长好像并没有听见，还是不慌不忙地走着，他用手指着树林的方向说，那里是我们师的集合点。他又迈了一步，正准备跳进瓦夏的掩体，突然从树林那边又传来一声枪响，连长倒下了，狙击手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在战斗中牺牲是常见的事情，可是连长的死发生在阳光明媚的白天，在令人愉悦的大自然

中,这对我的心灵产生了深深的震撼……就在说话之间,一条生命完结了。

我们开始仔细观察那些高高的树木,似乎射击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我很快就发现,一棵高大茂密的云杉树的树枝在摇动,于是抓起步枪,瞄了一下。敌人的狙击手被干掉了。就在此时,三颗子弹贴着我的头皮飞过,打在我的掩体边上。原来另一棵树上还有第二个狙击手。瓦夏把他收拾了。奇怪的是并没有看到德国人从树上跌落。两天后我们占领了高地以后才明白,原来那些狙击手是受惩罚的士兵,希特勒分子把他们是用锁链捆在树上。

第 22 和 65 近卫步兵师的全体西伯利亚人终生都会铭记着这个高地,1252 名官兵的生命换来了这次战斗的胜利,他们安息在这里的战友合坟墓中。这次战役使我终生忘怀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获得了平生第一个奖赏——一枚“勇敢奖章”。

不久以后,在争夺帕夫林诺沃车站的战斗中,一颗子弹伤了我的胳膊。第二颗子弹射穿了钢盔,幸运的是没有伤着头骨,只是受到了一点儿擦伤。我被送到营卫生队接受治疗。

有一天来了两名骑马的人。第一位我马上就认了出来,那是我们的营长扎哈尔琴科,当我看清了第二个人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原来他在相邻的一个师里担任团副参谋长。他是听说我负伤后到处打听才找到我的。伤愈之后,我请求调到父亲所在的部队去。这件事情原来也并不复杂,此后我和父亲在一个团里并肩战斗,我被任命为营里的共青团书记。

在白俄罗斯的列宁村的一次战斗中,我获得了第二枚“勇敢奖章”。和我们一起参加这次战斗的还有来自波兰的“科斯久什

科”师。他们受到了德军的特别空袭，我们营的阵地和他们相邻，因此稍带遭受了轰炸。从此列宁村成了参与苏军作战的波兰士兵们的圣地。

过了不久，在奥尔沙城下的战斗中，我获得了刚刚为士兵设立的三级“光荣勋章”。在战争中获得这枚勋章并非易事——这次我是第二次负伤，而且伤得很重：身上中了四十余块弹片，洞穿了胸膜。

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火车站，我乘坐的卫生队的列车遇到了著名的外科医生布赖采夫院士领导的医疗队，医疗队从我们的车厢里选择了部分伤势较重的伤员送往医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8个月之后我痊愈出院了。

我一生中都对谢马什科铁路中心医院和那里优秀的医生们心存感激。

我没有在莫斯科耽搁，便去寻找自己的西伯利亚志愿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我又见到了父亲，我们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那是1944年4月。我们团在新勒热夫市城外布防——那是曾经被普希金歌颂过的普斯科夫地区。一直到7月份之前，战场上都是一片寂静。我们常常出去抓“舌头”，演习新的进攻战术：随着炮兵徐进弹幕射击前进。这可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需要使用实弹，有时也免不了发生不幸，但是在未来的真正战斗中就会减少牺牲！

德国人也没有睡觉，他们准备用化学武器来对付我们。为此我们的阵地总是在烟幕弹的笼罩之中。我们根据头顶的轻轻的沙沙声和几乎听不到的断裂声来判断。弹坑上方的淡绿色的烟柱久久不散。这就是德军企图在使用真正的化学武器之前来



麻痹我们。不过他们还没有敢冒险。

我们团是一个十分友好的集体。直到今天和我一直保持通信的有团参谋长伊施德科夫、我的直接上司侦察参谋什里亚耶夫、营长多尔古申，还有勇敢的女通讯排长日丹诺娃。

7月13日我们团离开防地，以行军的队形开往进攻的第二梯队的位罝。和德军的短间接触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扰。

不过在战争中，每一天都可能是关键的时刻。对我来说，这一天来到了……

清晨5点，我在大格里夫纳村附近遇到了父亲所在的部队。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小村建在山上，从村庄到河边是山坡。山坡上生长着茂密的橡树林。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不到6点钟，周围已经是金光灿烂。父亲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他说：

“让战争快快结束吧，我们就搬到这里来住！”

不过我发现父亲的心情并不十分好。他告诉我他做了噩梦，这是个很不好的预兆。我则尽量用玩笑话岔开，想让父亲高兴起来。后来我回到自己的位置——纵队的先头位置。

两小时后，部队遭遇到了德军的埋伏，双方开始交火。部队停止了前进。我利用侦察的喘息时间来到父亲那里。我们一起吃了早饭之后，然后赶回自己的部队。

但是刚离开父亲不到200米，从树林后面窜出一架德军的飞机。我回头望见参谋部的马车，父亲正站在旁边。他朝我挥手喊道：

“小心，马上就要轰炸我们！”

让父亲猜中了。飞机转过身来向参谋部的驻地投下了一颗

炸弹。黑色的泥土飞起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弹片呼啸着飞向半空。我朝父亲的位置跑去，我只看见一个被烟尘笼罩的弹坑、受伤的马匹和被炸身亡的战士。我在一个水沟边找到了父亲，他侧身躺着，还有知觉。

“你看看我的腿怎么了……”父亲的声音很微弱。

我把他翻过身来。发现了腿上的伤口，很大的一块弹片嵌在那里，还有一段露在外面。

“腿没有断……”我含混不清地说。

“红旗在哪里？”父亲忍着伤口的剧痛问道。

父亲的职责是看管团队的战旗。我环顾了一下，看到了不远处的红旗。旗子被爆炸的气浪掀出去，头朝下倒插在地上。

一群卫生员跑了过来，给父亲进行了急救包扎。我们把父亲送到卫生站，便告别了。

“快去追部队！”父亲在告别时说。

清晨时父亲走了，他死于坏疽。

我的战争生活又继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又经历了很多的艰难险阻。关于这一段生活，我会在另外的书中记述。我只是要说，一直在期待的胜利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当时我十九岁，是近卫军上士。

留在记忆中的不仅是军旅生涯的往事，还有战后的回声。

1961年，莫斯科，因为工作上的联系，我和一位德国记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很规矩的人，一直对苏联的情况很感兴趣。从而我也很敬重他。尽管在战争时期他曾在德军中服役，据他自己所说，打仗也很卖力。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谈论起莫斯科的新闻，还谈到德国的命运，我们不禁回忆起战争年代。我们各自回忆起参加战斗

的地点，原来在 1943 年 10 月，我们都参加了莫斯科近郊利亚德茨沃附近的一次战斗，只不过是在敌对的阵营中。您能猜到我此刻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当时完全可能相互对射，其中一个人可能死于对方的子弹。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今天的会面了。

我们双方都感到有些尴尬和内疚。最后我们又恢复了常态，相对苦笑，回到谈话的主题。

如此的战争……对这次见面我并不后悔。因为这次会面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的回忆是否合适？我想既然已经写了，那就是恰到好处。我只是希望其他的人不要有这样的相逢和回忆，不要相互射出自己的枪弹！

---

## “斯梅尔什”反间谍学校

胜利的礼炮响过了，欢庆的酒宴已经成为过去。抗击法西斯的胜利已经变成了人们日后纪念的节日，这场胜利已经成为现实。我们昨日的士兵们将走进和平的生活，选择自己的职业。然而对于我来说，却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经验丰富的”战士，为了适应未来安全部门的工作，被派到“斯梅尔什”学校学习。选择是有的：莫斯科的学校，还是列宁格勒的学校。

我选择了列宁格勒。莫斯科我已经去过了，在那里住过医院。尽管是走马观花，也总归是看过了莫斯科市。关于列宁格勒，我虽然在书本里读过很多，在撤退时期，在列宁斯克的铁匠城也听到过列宁格勒的朋友们的介绍，但是毕竟耳听为虚。

于是，我在1945年7月9日迈进了列宁格勒“斯梅尔什”反间谍学校的大门。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我迈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正赶上一次日全食。周围是一片黑暗。后来我也曾想过：“这是一个好的预兆吗？”

我在学校里第一个遇见的是康斯坦丁·奥布霍夫，后来他成了我的好朋友。不久前他作为一名退休少将离开了人世。当时他是年级长，军衔是大尉。他发给我褥子，给我分配了宿舍和床位。当我们稍稍熟了一些，我问他：

“科斯佳，可以出去玩玩吗？”

“你看那边，有一个玻璃已经破损的大门。你朝左右看看，如果没有哨兵，你跳上经过的电车，就可以随便逛了。三天后才轮到你检查身体。到时候你去检查身体就行了，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只是把你的饭卡留下来，以免集合时我再点你的名。”

我按照他的指点溜到了城里。好在这里熟人很多。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好多一直想看的的地方，晚上在朋友家里过夜。三天后我来到检查身体的地方。我本来觉得自己的身体可能有问题，可是检查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健康合格，学校录取。

当然，对于安全系统工作，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而且往往是从文学作品中得到的浪漫的向往。学校开课之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我们明白了：等待着我们的是烦琐的日常事务，这并不轻松，需要付出全部力量，最主要的是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技能。

此时大多数人已经了解到这个奇怪的校名——“斯梅尔什”的由来。翻译出来，“斯梅尔什”就是“间谍之死”。这个校名是斯大林亲自想出来的。我们都感觉到这个校名里包含着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可以理解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很多学员都是因为战争而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因此大家都努力攻读每一门课程，简直是陶醉于学习之中了。

应该说我从小就喜欢读书。阅读谢尔盖耶夫—青斯基的小说《塞瓦斯托波尔的苦难》，是一段很值得怀念的经历。我们离开顿巴斯的时候，父亲把小说的前两卷放进箱子里。在后撤的途中我和父亲一起读，不论是乘坐运送装备的平板车，还是在不眠的夜晚。父亲每读完一页，就把这页书撕下来卷烟，因为找不到别的纸张。最后书读完了，书页也都卷了烟了。1943年秋

天，我们进入了一个被德国人占领过的村庄，我在一户人家的书架上发现了《塞瓦斯托波尔的苦难》的第三卷，于是我便利用行军途中的休息时间读完了它。1944年我第二次负伤，在康复阶段，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读完这本书的最后一卷。1943年夏天，我们师转移到在格扎茨克城下，被授予近卫师的称号。军官们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弄到了一本谢尔盖耶夫—青斯基的小说《布鲁希洛夫的突破》，这本书在战士们的手中传来传去，最后落到我们的手里。我利用训练休息时间和行军途中的休息时间为战士们朗读。最后我在向格涅茨基洛夫高地发起冲锋之前，在掩体里读完了这本书，把书放在掩体的前墙上，我跨过这本书，投入了战斗。

到了列宁格勒之后，我们的很多同志都在谢德林图书馆里度过了自己的业余时间，星期天就会到大学里去听公开课，那里的西方史课是由塔尔列院士讲授的。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当我们刚刚跨进学校，接受入学资格审查的时候，我们一群新生接受了一件任务：战争期间，许多私人图书馆和被破坏的储藏室里的图书都被运到了彼得帕夫洛夫堡。必须把它们整理出来并送回图书馆去。我的小组负责对彼得和帕维尔教堂的图书进行分类。在那里我见到了非常珍贵的图书！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奥加列夫、高尔基等作家的作品，书上还附有作者传记。还有“警钟”杂志的合订本……简直是什么都有！

我们爬上教堂的合唱席，读起来就舍不得离开。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教堂的拱形屋顶下，直到想起来还有工作要做才离开那里。事情很多，但是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

节假日我们去剧场，有一次，在一天之内竟然赶了早晚两场——把战争时期没看过的都弥补过来。

在列宁格勒度过的岁月无法忘怀。我们很多学员都来自部队，有的曾经是飞行员、有的是坦克兵、步兵，他们身穿各自部队的军装，直到穿得稀烂。在列宁格勒经常能见到这样有趣的场景：“斯梅尔什”学员的队伍从街上走过，后面跟着一群当地的小孩子，他们踏着学员们的步伐，扯起嗓门齐声喊着：“间谍来了！间谍来了！”什么事情都瞒不过这些孩子。

列宁格勒当然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城市。这座城市笼罩着一种特殊的、列宁格勒独有的文化氛围，这种说法没有人会反对。很显然，彼得堡的老知识阶层在这里起着主要的作用。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进程，彼得堡与其他城市的这种区别渐渐地被磨灭了，大概这主要是因为城市的基本居民构成变了。战后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列宁格勒，别斯卡列夫和其他基地的安静也被打破了。

学校对学员的要求是很高的，不过我们每一个学员都很勤奋，我们学习的范围并不局限于课本。我们充分利用军事上反侦察的案例和文件，进行各种实践和理论的训练。当然，也借鉴了刚刚结束的战争的经验。

我们的学习生活并不枯燥。我们研究那些揭穿法西斯谍报机关在我们后方活动的文件，研究德国特工机关投放间谍的方法。认真分析侦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活动，分析德国在占领区设立的特工学校的活动。除此之外，当然要仔细研究我方的侦察和反侦察机构对德国特工机关、特工学校和部队指挥机关的渗透。要掌握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要熟练掌握从事反间谍工作所要求的专业知识。

在联共党史提纲中出现了托洛茨基和其他政治集团的活动之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学校里所有的课程都尽量避开

1937—1938年这个阶段。

那一时期曾经发生了残酷的“大清洗”，我的亲属也曾受到迫害。而在列宁格勒学习期间，我们学员对这些只能佯装不知。在学校里也只能悄声议论此事。那一时期的列宁格勒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谢尔盖·基洛夫遇害多年之后，城里依然有很多人会提到他。尽管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卡普斯金等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英雄的名字被人们广为传颂，然而基洛夫的名字对于列宁格勒的居民仍然是特别神圣的。1941年冬天，列宁格勒遭到德军的围困，苏联诗人吉洪诺夫的著名诗句回响在列宁格勒人的心中：基洛夫走在城市的街上。

为什么在学校的教程中没有提到那些年侦察机关的活动情况，尽管每一个人都心存疑虑，但是没有人对此公开提出疑问。不过人们的心中也都有自己的答案。应该说，“斯梅尔什”的大部分学员都没有想到过那次大清洗的非法性。更何况我们的老师们总是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在工作中要严格遵守法律，要客观地评价活动材料，不能使用逼供信的方法。

战后和平建设的年代自然地淡化了一些问题，当时都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医治战争创伤，重建被战争破坏的一切。在那些岁月中，甚至在索洛维耶夫的《伟大的国王》剧中扮演伊凡雷帝的尼·切尔卡索夫也说：“当你身边爬满了毒蛇的时候，就算是错打死一条被冤屈的无毒小蛇，也不算是罪过！”

遗憾的是，一些民间谚语也为“大清洗”这样的罪过开脱：“只要砍树木，就会飞溅起一些木屑。”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希望好好地生活，他们回忆起来的都是战前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也确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



西——我们不是在浴血的战斗中战胜了法西斯吗！

不过，这些年来我们还是忘记了一个影响战争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最常听到和读到的就是希特勒企图消灭共产党人的计划，只是忘记了希特勒集团的头头们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灭绝斯拉夫民族。很多民族正是在这种威胁面前团结起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存亡而战斗。在那些年里，前线的很多共产党人和战士都把自己称为斯拉夫兄弟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为德国法西斯执行了种族灭绝的政策，他们才成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这一代人都清楚记得法西斯德国的头头们是如何威胁我们的。我们不妨回忆几段他们公开的言论：“我希望能够完全铲除‘犹太’这个概念，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把犹太人集体赶到非洲或其他什么殖民地国家去。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让乌克兰人、戈拉克人和列姆克人都从我们的国土上消失。上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波兰人……至于一些少数民族，我们并不支持他们团结和扩大，尤其不能让他们培育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独立意识……东部的非德意志民族地区不应设立高等学校……最多教他们学会 500 以内的数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最理想的就是只让他们懂得符号语言……广播里只播送他们能接受的东西，音乐可以不受限制。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从事脑力劳动……如果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吉尔吉斯人都学会了读写，这只能损害我们的利益……除了识别交通标志之外，什么都不要学……所有的出发点就是让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只为我们的经济服务。”

我在斯梅尔什学校第一次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我们大家都迷恋《列宁格勒》杂志上发表的亚·哈津的长诗。每个人随口

就能说出著名作家米·左琴科的警句和阿赫玛托娃的诗句。突然，在1946年8月，党中央作出了一个决定，对发表这些作家作品的杂志《星》和《列宁格勒》进行极其严厉的批判。我们很多人都明白这是不公正的，但是内中的缘由是什么，谁也搞不清楚。我和同学们抓紧时间到剧场去看左琴科的话剧《帆布公文包》，有的人是第一次看，也有人看第二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禁演。

我的处境有些麻烦。在这以前，我和大撤退时结交的朋友们来往很密切，经常到一些作家、诗人家里做客。他们接待我，很可能是因为我年轻、有在前线打仗的经历——列宁格勒人对这些是很看重的。

市里的各级党组织都对党中央的决定进行了讨论。我们学校也不例外。自然，学校里也有一些在领导面前献殷勤的积极分子，但是大多数人茫然不知所措。在和列宁格勒的朋友们见面时我感到很尴尬：他们会不会从此失去对我——一个克格勃学校的学员的信任呢？所幸的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列宁格勒的朋友们明白得很。

对于我来说，大概这是第一次因为无法理解而对党的决定真正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也第一次明白，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一些事情，在十分复杂的形势下辨别出自己应有的立场是多么重要。当然我并没有怀疑党的路线的正确性——我只是意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自己的观点。

学校里的课程、与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们的接触、对历史文化财富的了解，这一切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列宁格勒成了我青年时代无法忘怀的城市。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莫斯科。其实这也很偶然的。由于我肺

部负过伤，北方的潮湿气候对我很不合适，因此我不能留在“北方的首都”；我每跑一次百米都会咯血。根据分配预案，我应该分到乌克兰西部地区。

1945年秋天开始和日本人打仗，学员们都获得了探亲假。假期的长短与路途的长短有关。如果到马凯耶夫卡我可以得到25天假期。但是书记员一马虎，把马凯耶夫卡写成了莫斯科。因此我只得到了10天的假期。马凯耶夫卡是回不成了，只好留在列宁格勒。几天后莫斯科来了文件，要求把大部分原籍是莫斯科的学员分到莫斯科去。由于书记员的笔误，我就进入了派往莫斯科的名单里。我打了一份报告，声明我不是莫斯科人。但是没有人理睬，都认为我是在耍心眼，隐瞒自己有住房。我就这样来到了莫斯科。

1946年10月我被授予少尉军衔，迈进了卢比扬卡<sup>①</sup>的大门。我命中注定要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岁月，直到1991年以大将军衔退休。我刚毕业的时候只是一个最初级的助理刑侦员。契卡人员的一生，注定要走过崎岖漫长的道路，途中充满了精神上的紧张、费神的沉思和磨难、对唯一正确的问题答案的探索，不允许出现丝毫的差错，这一生的主要目标就是服务祖国。

---

<sup>①</sup> 卢比扬卡，指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上的克格勃大楼。

---

## “冷战”

我参加克格勃工作的初期，在分析国内形势的时候，不禁回忆起遥远的十月革命的年代。那时资本主义世界对苏维埃国家的诞生是怀着敌意的。

为此我举出日本报纸的一段文章。尽管这段文字并不是非常权威的，但是却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对俄国革命的态度：

1919年2月10日的报纸是这样写的：

各个盟国应该承担起控制俄罗斯的责任，以便维持其国内的秩序，暂时把政权掌握在盟国各自成立的政府手中，其中包括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如果能接受这个建议，日本将取得对西伯利亚的控制权，美国控制俄罗斯，美国就应该履行总体的责任……至于日本对西伯利亚的控制，考虑到日本与西伯利亚的相邻关系，我们相信没有任何大国会表示反对。

当然，控制俄罗斯只是暂时的措施。而对于不发达的殖民地进行控制是长期性的——可能达到数十年，乃至数百年。

于是，各国决定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们把俄罗斯分割成数块，各自控制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区。反正俄罗斯的国土很大，谁也用不着抱怨。

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国内的各个民族站

起来反对外国的侵略。

事情的结局是：除了在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唯一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诞生并确立了另一个暂时还比较弱的体系——社会主义的体系。

在我们新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年，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很多人都具有吸引力。尽管这个制度暂时还并不强大，但是受到了全世界很多著名的文化活动家的热烈欢迎：爱因斯坦、德莱塞、泰戈尔、卓别林、罗曼·罗兰、巴比赛、法兰士、亨利希·曼、辛克莱、尼克索、布莱希、福伊希特万格等都在其中。不难理解，这就惹得资本主义世界无比恼怒！当全世界各民族开始响应英国工人提出的“不要干涉俄国！”的口号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便怒不可遏了。当然社会主义的敌人不可能容忍这一切，于是对我们的国家采取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封锁。他们不向我们提供贷款，用现金也不卖东西给我们；他们决定等待我们被扼杀。

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却发展、强大起来了。英国作家萧伯纳在1932年写道：“把俄国排除于国际贸易之外，是资本主义列强失去理智的盲目行为。他们以对付共产主义的疯狂的恐怖手段对付俄国，迫使俄罗斯使用自己的资源，靠发展自己的物质和文化实力来拯救自己。现在绝望的沙皇俄国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清醒纯洁、具有现代文化的、独立的、繁荣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年以后，他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说道：“俄国人把自己的国家从泥潭中拖出来了，原因就是大家齐心协力……我要向那些胸怀叵测、目光短浅的傻瓜先生们提个问题，他们在美国报纸上造谣攻击俄国，硬说俄国的共产主义破产了……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想干什么？想恢复俄国的沙皇制度？还好，没有亏待过美国的老天，对俄国也不薄，他把俄国变成了一

个共产主义国家。迄今为止那里还保存在这一社会制度——而且我们也不必为之感到害怕。”

英国作家奥尔德里奇 1965 年的讲话又提供了一个证据：“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每个无产者的内心深处，当他和他们的劳动同志为了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一定要杀掉资本家……而是要迫使资本家和工人讲和。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便使得全世界工人的立场更加强硬。”

这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暂时停止下来——此时法西斯的屠刀挥向了西方民主，而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以抵挡住这把屠刀。此时需要一个反希特勒的同盟：他们想要我们参加进来，想依靠我们的力量来制服法西斯主义。然而当西方见到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影响下，首先遭到破坏的是殖民主义的阵营，于是反共力量便联合起来，开始了一场抑制战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影响的残酷斗争，至少不要从社会主义已经立足的几个国家蔓延开来。

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写过文章，但是我还是想补充几句。当战争尚未结束，而战争的结局已经明朗之时，西方列强就已经开始了反对苏联的活动。

众所周知，1946 年 3 月 5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顿发表讲话。这是一次公开的挑衅，也意味着反苏“冷战”的开始。丘吉尔号召建立一个……“讲英语民族的兄弟联盟”，简单地说，就是建立起一个军事同盟来对付苏联及其战后盟国。英国首相号召使用武力来反对苏联，而且要趁苏联还没有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之前尽快行动。当时出现了“铁幕”这个术语——这是戈贝尔在 1945 年 2 月首先使用的——“反共铁幕”。丘吉尔的功勋在于把这道铁幕放了

下来。

他们的算计很简单。苏联已经极度虚弱了，战争使他筋疲力尽，数以千计的工厂、城市遭到破坏，主要是苏联还没有原子武器，但是美国已经有了，因此摧毁我们的国家并不十分困难。于是机器就转动起来了。

斯大林在接受《真理报》记者的采访时坚决驳斥了丘吉尔的讲话：“……实质是，丘吉尔站在发动战争的立场上。而且丘吉尔先生并不是孤立的——他的盟友不仅在英国，也在美国。”斯大林指出，丘吉尔的讲话与希特勒如出一辙：“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原因在于：只有说德语的人才是优等民族的代表。而丘吉二要发动战争，也从种族理论开始。他说只有说英语的民族才是优等的民族，才能主宰世界的命运……实质上丘吉尔等于对非英语的民族发出最后通牒：自愿承认我们的统治，那就一切都好，否则就避免不了战争……无疑这就是丘吉尔的战争宣言，就是号召进行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

美国总统杜鲁门出席了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讲，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英美两国的领导人在行动上协调一致的。根据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指示，他的特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提交了一份《美国对苏联关系的政策》，并于1946年9月起草了一份《美国对苏联政策》的总体报告，报告中陈述了备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强力政策的信徒相信的是强力的语言。美国应该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应该向苏联指出，我们拥有的力量不仅可以对苏联发动进攻，而且可以在战争中把苏联摧毁。美国应该准备进行一场核战争和细菌战。需要一支可以从海上和空中投放的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能够占领并控制苏联的战略要地，可以对这些地区进行海上和空中支援。对苏战争

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将会是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可怕的战争。”

1947年我们成功地制造出了原子弹，这引起了那些已经计划分割并控制苏联的领土和居民的人们的休克。然而我们的敌人很快就缓过气来，他们似乎确信，苏联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昔日战争中的盟友美国会对他发动进攻。于是他们开始准备可以毁灭一切的核打击。他们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摧毁我们国家的计划。美国的领导层给这些计划赋予各种各样的编码和代号。

这些文件的字里行间所标出的那些数字令人震惊：“第一次打击20个城市……向70个苏联城市投放133颗原子弹，其中8颗投在莫斯科，7颗投放在列宁格勒……在100个城市投放200颗原子弹和25万吨普通炸弹……投放300颗原子弹……”

同时还提出一些精确的数字：打击后摧毁85%的工业，还计算出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打击后将有多少百万的居民死亡……西方的政治家们还仔细计算过双方的武装力量可能遭受的损失。

此外还逐条逐款地列出在美国战胜我们之后应该建立的“秩序”：

在任何一块被我们解放的苏联领土上，都将出现一个原有苏联政权机构人员问题。如果苏军有秩序地撤出，地方政权可能转入地下，就像不久前德国人的占领区一样。然后会以游击匪帮的形式宣布自己的存在。

如何对待他们，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觉得，控制该区域的任何非共产党的政权，只要他们决定以俄罗斯内战的传统方法与共匪战斗到底，我们就在军



事上支持他们,供给他们足够的武器。而普通的共产党员或苏联政权的工作人员造成的问题要困难得多。发现并逮捕他们,或者向我军或任何俄罗斯政权投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承担制裁他们的责任,也不应直接命令地方政权处置他们……这是任何取代共产党政权的俄罗斯政权自己的事情。我们确信,这些政权会比我们更清楚地判断过去的共产党人的危险,能够很好地处置他们,防止他们日后再给我们带来麻烦……

对付苏联的核战争计划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一再易稿,然而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战争不能进行。美国的历史学家阿·布劳恩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美国领导人的计划解密之后进行了分析。

- 1) 美国完全可能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
- 2) 苏联有可能在 20 天内占领西欧;
- 3) 美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司令部认为,俄罗斯能够在 60 天内摧毁美国的盟友英国及其全部军事基地,而这对于实施核打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 4) 俄罗斯的核轰炸和美国国内共产党的游击队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美国继续这场战争的能力和信心;
- 5) 美国人无法保护自己的城市……

1950 年美国政治家们开始明白,用军事行动摧毁苏联是不可能的,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破坏苏联的长期计划,计划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进行大规模的高强度的“冷战”,以和平的方式破坏其制度。这一部分是由原先存在的和重建的科学中心制定的。

计划特别分为三个方向:

——败坏作为国家领导机构的共产党的声誉，以期使之分裂和被消灭；

——播种民族间的敌对情绪；

——利用教会的威望。

第二部分。大力研制最新武器，在军备竞赛中消耗苏联的经济能力，最后把苏联拖垮。

还制定了一套所谓的“民主方案”，规定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反对派组织进行大力支持——为他们提供货币、武器、印刷设备，在这些国家的居民中组织破坏活动，实施秘密行动直至从肉体上铲除不需要的人物。

他们所制定的宣传性的活动——从意识形态上进行破坏（西方的术语是心理战）分为两条阵线。

第一，公开的形式。广播宣传、印刷品、电视，巧妙地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失误，配上自己的谣言和诽谤加以说明，号召人们对现存制度公开进行斗争；

第二，隐蔽形式：找寻同谋者，结成团伙，给予物质援助，以期他们在国内组织起抵抗运动中心，伺机而发，支持那些敢于公开反对现行政权的人们。

在 USA SNB 20/1 号指令中指出：

心理战是一件特别重要的武器，其作用是支持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背叛国家的行为。心理战可以从精神上进行破坏，挑起动乱，制造国内的解体。

广泛的心理战是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其主要目标在于消除苏联及其卫星国的人民对于本国政权的支持，让他们意识到推翻政治当局是切实可行的。

我们是否了解这一切呢？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美国对

苏联进行核进攻的每一个计划、美国情报机构及其他间谍机关的每一项有关推翻苏联制度的指令条例，苏联的国家安全部门都了如指掌，当然也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所了解。

应该指出，在军备竞赛中，苏联政府是一点儿也不落后的，甚至某些军事技术还领先于西方。西方不断广泛深入开展的意识形态上和心理上的进攻的危险性，丝毫不亚于军事上的危险性，但是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未给与必要的关注。

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抵御，也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说的我们的意识形态站不住脚。社会公正的原则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很久以来就为各国人民所向往。人民永远也不会接受那些鼓吹靠牺牲别人来使自己富足的“思想家”。

我们的悲剧并不在此。

斯大林死后的数十年中，在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除了安德罗波夫只坐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外，其余的那些人经常把政治当做一句空话。他们不能依据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资料对政治进程进行预测。

很多领导人经常套用列宁的一些言语，其次是马克思的话，而他们本人对经典著作知之甚少。

当我阅读过去的领导人的回忆录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所写的东西各不相同，但是都在写同一个东西：那就是他们如何与党阀作风作斗争。似乎他们都清楚党内存在的问题的根源所在：党的领导被置于国家政权之上，还要管理经济。他们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却在向人民说这样做是必须的。而与此同时也只限于蛊惑性地号召按照列宁的方式生活，回到列宁的原则上来。改革的初期也是这样，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遵照列宁的遗嘱生活，清除斯大林时期的毒瘤，然后就

重新提起十月革命之前的情形。无法理解，这些人何时说过实话呢！不知道这些政治家的笔下还会有什么新花样。比方说，谢瓦尔德纳泽就谈到过俄罗斯占领格鲁吉亚的血腥的历史。可是就在昨天他还含着眼泪回忆起格奥尔基耶夫斯克条约<sup>①</sup>，根据这项条约格鲁吉亚自愿接受俄国的保护。

苏联解体之后，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指责：你们在克格勃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那里等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要知道应该采取措施的不是克格勃，也不是军队。

实际上生活已经把国家引导到了该换马的时候了，只不过不是采取政变的形式。具体地说，如果看清了二战之后的形势，你就能够得出结论，西方列强从未中断对我们的进攻，而我们的防御是软弱无力的，根本没有取得政治上反攻的成果。对于这样严肃的政治斗争，往往采取的唯一对抗方式就是对敌台广播进行干扰。

说起来可能很可笑，但是我确信：近年来我们党从没有认真地进行过这样的政治斗争——尽管关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很多，甚至是太多了。我们所做的只是对敌人进行一些表面上的揭露，并没有在对抗之中取得成果——但是敌人无疑是有成果的。

例如：美国发动了针对苏联破坏人权的宣传运动。我们的媒体仿佛按照统一的口令，一再强调，破坏人权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然而对美国媒体所列举出来的我们破坏人权的事实却不声不响，没有予以有力的驳斥。

我并不是在分析到底是谁破坏人权更多，问题也不在这里。

---

<sup>①</sup> 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1783年8月4日签订条约，格鲁吉亚变成俄国的保护国。俄国保证格鲁吉亚的自治，发生战争时对格鲁吉亚予以保护。

如果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事实，只需采取相应的措施，或者揭穿敌人宣传的阴谋，把这件武器从对方的手中夺过来。但是党的领导指示，要“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而采取的方法往往就是说他们的人民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批判美国对黑人的压迫，以及失业、犯罪和无家可归等等，不一而足。

例如，美国的间谍机关按照自己的计划对于苏联的反犹太问题大肆宣扬。而我们也调动宣传机器来证明真正的反犹不在苏联，而是在西方。这样的辩护无助于证明苏联生活方式的无比优越，反而让人们产生一种对国家政策的不信任感。

我们的同胞们，其中更多的是国家干部，通过到国外的出差已经了解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在那里看到了豪华的宾馆、商店、充足的商品等等。数以千计的旅游者要留出2—3个小时逛逛商店，然后就会向亲友们描述国外天堂般的生活。数以千计的俄罗斯建筑工人在国外参加阿斯旺水坝和比莱的冶金工厂的建设，从那里带回了私人小轿车。可以设想，那些具有相同水平而没有机会出国的建筑工人，比如说参加布拉茨克水电站建设的工人，会如何地羡慕这些“幸运儿”呢！于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的神话就诞生了。我们的任何“干扰”也就不起作用了。

为了与西方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需要的是其他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用不着发明创造的，只需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可以了。众所周知，任何政治的基础都是经济。人为造成的物质供应上的困难也会导致政治上的困难。然而出现了很多理论家，他们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学说来解释各种政治事件——特别是人民不满意的事件，为这些事件进行辩解。这样一来就更加剧了人民对当局的宣传的不满。

国家安全机构是否了解这些情况呢？当然了解。安全部门也曾多次针对敌人的行动提出具体的对应措施，这些措施不是镇压，而是党所直接采取的政治上的措施。但是党的领导对这些建议拒之千里：不要多管闲事。

只有安德罗波夫在当年曾经真正打算根本改变我们的内部政策。

国家安全机构的领导得到情报，得知美国已经制定出长期的战略计划，准备采取针对苏联、破坏苏联的行动。于是就建议我们制定出一份经过科学论证的应对计划，并建议吸收各个领域的专家参与此项工作，其中包括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军事专家等。

计划规定彻底改变宣传工作的方法，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来对待宗教问题和异己思想，与腐败现象和民族主义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当然把解决已经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放在首位。这项计划不是什么烫金封面的鸿篇巨制，而是经过国家安全部五局深思熟虑、仔细斟酌，为安德罗波夫准备的在政治局上的报告提纲。实现这一计划能够使我们党和社会生活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安德罗波夫作了上述报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马祖罗夫、谢列平、谢尔比茨基等人都支持这个建议。支持这一建议的还有苏斯洛夫，他和在斯大林时期一样，仍然是党内的主要思想家。计划规定的措施不仅要遏制住日益高涨的冷战浪潮，而且要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行动。

我不好说，政治局是否真正认真地对待安德罗波夫的建议，是否真心实意地支持这个建议。不过从各方面看，这些建议并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效果。“冷战”没有停止，仍然和以前一样

无休止地谈论着冷战的危险，不过也仅仅停留在空谈之上。而这份要求必须立即执行的计划，虽然并没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见，但却只是在政治局委员的手上传来传去。

我们的整个防线被撕开，然后在“冷战”那一段全面崩溃。而在这一段防线内我们比对手的武器精良得多，所以战线崩溃是因为没有发挥出高效的武器的作用，要么就是掌握这些武器的人自己把武器损坏，以致不能使用。

我想在此介绍一次苏美记者座谈会，关于这次座谈曾经在20年前的《新世界》杂志上介绍过。

一位美国人说，彻底裁军是不可能的，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他说：“如果可以达成协议，那么裁军的一方一定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苏联。”

我们的记者想反驳说，裁军即将在监督下进行，而美国人接过话茬说：“我说的不是这个。当然可以建立起可靠的监督。假设你们把所有的武器都销毁了，但是你们的思想意识还存在。资本主义世界在你们面前还是赤手空拳。”

看来，他是单纯地把我们的发展道路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实现，这些思想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部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年复一年地，经过数十年之后，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从方法学上被歪曲了。

由于领导人的立场，我们的党已经把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冷战”完全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党把这份光荣赋予了克格勃，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在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归入了我们这个特别部门的业务范围。而且克格勃的很多领导人觉得，我们克格勃的做法是正确的，那就是尽力猜破把“冷战”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敌人的阴谋并将其粉碎。

现在当你在阅读国家安全机构“名人”的回忆录或者聆听他们的讲话的时候，你就会不禁得出结论，似乎国家安全部门在当时的的工作只是搜捕一些人罢了。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顶住国外间谍机构的压力。我们的敌人针对我们国家所展开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的范围非常广。在此只需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中的一段话：“需要更具有进攻性的思想战，以便把反苏的宣传推向更广的方向。在我们的进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便是大力扩大我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同盟军，寻找更多的‘腐败的力量’，以便引起苏联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严重感染。”



---

---

## 一所美国的特工学校

我在“斯梅尔什”学校学习期间，已经十分关注国外间谍机关在我们国家领土上的活动。我们专门学习研究间谍活动的方法和手段、专用器材、监视和监控系统。后来我在实际工作中也接触到了这些。

我讲一个具体的案例。

在西方向谍机关派往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和其他间谍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是按照规范的方式进行活动的。

他们成为被敌人利用的特工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是由于生活贫困，为了一大笔钱而从事这项工作的；其他的则是受蒙骗的。

一般来说，被破获的特务分子的表现各异：第一类拼命地否认自己的罪行；第二类是立即认罪伏法；第三类迫于压力供述出一些已经被侦查机关掌握、已经无法否认的事实。

一名叫鲍勃的间谍分子在第一次审讯中不仅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而且似乎还为自己能有机会详细地供出所有的罪行感到高兴。他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他不仅说出了所参与的事件、活动，还讲述了令他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的原因。

同他的谈话根本就不像审讯，而简直是在听一份忏悔。我们对他表示相信，因为我们对他本人的情况已经基本掌握。我们对他的犯罪心理和动机很感兴趣。有一点很重要，到底是谁，

用什么手段招募了一个诚实的人，以及他是如何走上了对自己祖国犯罪的道路？此外，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了解培养训练鲍勃的那所特工学校的情况。我们不怀疑这个人的诚实，他坦诚地招认了一切，并不期望能减轻对他的惩罚——后来他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有必要较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间谍的历史。

50年代，在离慕尼黑50公里的一个称为塔格尔兹的地方，有一座两层的独立楼房，美国的特工学校就设立在那里。据说此前这所楼房属于一位中国驻德国的领事。楼内的一切陈设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中国地毯、家具、瓷瓶和一些雕像。大楼的公开身份是一家教授汉语的私立学校。学校自然是闲人免进的。即使有人偶尔进入了学校，他也不会怀疑这里是一所中文学校。

学校的领导和教员都是搞间谍工作的专家。他们中间有美国人和俄国人。

1955年夏天，8名该校的毕业生被分成两人一组，分批派到苏联的不同地区从事间谍活动，目标是破坏工业设施。这些间谍受到了良好的训练。为了不被破获，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都事先作了周密的考虑。不过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的学校里有我们安插的反间谍人员——而且不是普通的学员。于是我们了解到了一切：哪个间谍被派到哪个地方。等他们到达指定地点，找到藏匿的特工器材，然后把他们擒获。

这个学校的7名毕业生是战争时期被俘的苏军士兵。这些年他们在西德过得并不太好，而且又不敢回家——他们相信，只要一进入苏联边境就会被枪毙。我们从几次审讯中得知，其中4人根本不是什么敌人。经教育后被释放，安排了工作，得到了

住房。

那个化名鲍勃的第四名间谍原名彼得·库德林，他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在小的时候随着撤退的德军离开故乡。流落异乡他无法度日：既没有房子，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只靠偶尔打短工过活。最后在绝望中同意进入特工学校。

他认真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作了极为详尽的交代，描绘了学员的生活、作息时间、课程安排和教员的外貌。

学员住在二楼的两个房间。同一层还住着俄罗斯的教官，美国教员和学校领导都有自己的住宅，有的住在宾馆。

第一组特工鲍勃和杰克在临出发的一个星期前被安排在一个房间居住，可是他们并不明白这样做的目的。

1955年4月9日早晨6:30，全体学员被叫起来。7分钟后在操场列队完毕。7点到7点半整理内务、洗漱。7:38到一楼的餐厅吃早饭。8:00开始上课。

第一节课是密写。这节课上讲解的是一种新的方法。如果手头没有果汁或者其他可以代用的密写剂，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他告诉大家可以在水中滴入几滴血液搅匀，用这种液体把情报写在任意一张报纸或书页的字里行间，然后把这张写上情报的纸在蒸汽上蒸。用一种特殊的显影剂可以显示这份情报。

“你看，这是最简便的密写方法，”他说，“其方便之处就在于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使用，除了水之外就只要几滴血，此外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因为通过对血液的分析可以找到书写情报的人。下次我会讲解这种信件的解密方法。”

不过鲍勃的功课已经学完了：早饭后他被叫到校长鲍里

斯·马尔丁诺的办公室。鲍勃早在摩洛哥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又瘸又秃的校长，后来又在巴特洪堡的预备学校见过面。那个学校只做预选性工作。他们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考察学员：考察他们的情绪、思维方式，进行身体检查。和鲍勃一同进入该校的11个人当中，只有三个人被选进塔格尔兹。

鲍勃来到马尔丁诺办公室时，杰克已经在那里了。校长祝贺他们两个有幸第一批接受任务，祝贺他们开始工作。然后打发他们到一名教官那里领受任务并得到最后的指示。

鲍勃非常详细地讲述了临行前的最后一个星期，还回忆起一些细节。他虽然知道在这里接受9个月的培训的目的，但是对于自己的前途却很迷茫。他一直在等着这决定性的一天，但是很少想到自己的命运。

在这9个月当中，鲍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周五天不间断地接受机械式的训练。只有一个教官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教他们跳伞、射击、进攻和防守，他驱赶着学员进行训练，到一天结束的时候，学员们已经抬不起腿来。夜间跳伞训练开始以后就更紧张了。除了无线电理论实践课之外，还有一大堆其他的课程：苏联历史、交通路网、内务部和克格勃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法、苏军条例、密码和密写、情报处理、文件和标语的制作以及视觉记忆训练。

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是学员们对他的称呼，同事们称他为霍利德、比尔或者凯普。实际上这个人确实是霍利德上尉，他是美国很有经验的情报人员之一。

鲍勃对霍利德无限信任。开始的时候上尉并不给学员们讲很多的道理，他总是以亲身示范来教学。他在教学员们跳伞的时候，总是首先进行示范。他命令学员们拉起手来围成一个圈

站在那里，不要移动。霍利德自己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不知道他在空中搞了什么名堂，最后总是正好落在圆圈的中央。

“我就是教你们这样准确地跳伞！”他许诺道。

在训练当中，上尉有时会不经意地随口赞扬几句美国的强大，他说只有美国才能帮助俄罗斯从苏维埃政权下解放出来。

在苏联历史课上他们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训导学员。教员列夫·利沃维奇举出很多例证来证明，在对德作战的胜利中，苏军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他要大家回忆自己被俘和苏军在德军面前望风而逃的情景。最后苏联的盟国，主要是美国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苏联既没有现代化的武器，也没有能够作战的军队。而诸如符拉索夫那样一些最有天分的统帅也明白了这一点，最后投降了德军。

对于苏军撤退的情形，鲍勃的确记忆犹新，几乎到战争结束，他一直听的是德国的广播，听的是德军如何英勇作战，如何无情地粉碎苏军。但是他也记得德国人是如何丢下武器和战车逃跑的。有一次他向教师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俄国人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他们是怎样打到柏林的呢？”

“他们依靠的是美国人的坚决行动和给予他们的援助，”列夫·利沃维奇斩钉截铁地给予回答，不过显然他不喜欢这样的问题。

教官马科斯具有惊人的创造才能。他讲授的课程是如何制造假文件。他极其小心，会注意到每一个细节。例如，西方的文件一般用不锈钢丝装订，而俄国在不久前才制造出不锈钢，他们使用普通的铁丝装订，而且过一段时间后，铁丝在弯曲的部分会生出黄色的锈斑。他还表演了几种喝酒精饮料不醉的办法。

但是在学员们的眼中，只有霍利德上尉才是真正的高手。鲍勃相信他的每一句话，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在临出发之前的几天他甚至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

上午 10 点霍利德来到他的房间，他和往日一样着装整齐精神饱满。

“好了，走吧。”

他们默默地站起来，跟教官走出宿舍。

上尉仔细地研究过学员的档案，对他们每个人都了如指掌。根据他的指示，教官告诉鲍勃和杰克要使用新的俄文姓名，而且一定要牢记，然后将他们在本次任务中使用的证件发给他们。要求他们熟记证件上的信息，并且把证件在口袋里磨得旧一些，以免证件看上去太新。

鲍勃证件上的名字是安德烈·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在劳动手册和地方监狱的证明上写着大赦释放。他另外拥有一个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证件，那是用另一种笔体填写的，姓名是瓦西里耶夫。这些证件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例如被警察拘禁时，就要十分肯定地说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特殊的秘密任务。

第二天鲍勃和杰克换上苏联的旧衣服，准备乘飞机前往慕尼黑。

他们在夜间来到机场。汽车一直开到一架四引擎轰炸机的舷梯旁边。飞机上涂有美军的标志。霍利德第一个登机，接着就是鲍勃和杰克，后面是负责无线电器材的托尼中尉。

这是最后一次演习。飞机爬上高空，他们再一次检查了装备，背上伞包，胸前挂一个 50 公斤重的帆布袋，里面的四个橡胶口袋里装着所有必需的物品：无线电器材、苏联钱币、金币、武

器、钳子等等。他们在慕尼黑的训练场地曾多次带着这样的装备跳过伞了。降落伞自动打开，着陆前应该按动腰上的一个按钮，用尼龙绳固定的帆布包会自动脱开，落到地上，然后就是降落伞。部分地解除负重之后，人就可以自由地落到地面。练习进行得很顺利。

第二天他们乘上飞机，来到希腊——这是事后才得知的。他们即将出发去执行任务，就是从萨洛尼卡的这个机场起飞。

三个昼夜过去，他们最终又来到机场，一架没有标志的美国四引擎轰炸机在等待着他们。机上有一个德国人，机组人员全部是便装。

当他们在机舱内坐好，霍利德把一个小扁瓶塞进鲍勃德领子内侧的一个开口。

“我知道并不需要，”他说道，“但是这样会更踏实一些。如果你做错了或者胆怯了，你自己知道一定得不到好死的。用不着把小瓶拿出来，只需用牙在外面一咬，毒剂刹那间就起作用。你甚至不会有任何感觉：就像睡着了一样，就完了……”

鲍勃默默地听着。这一切他都早就知道，他只是在想：“很有意思，为什么霍利德给我这个小瓶子，而在杰克的表带上点上了一个褐色的“痣”……”

飞机离地面已经有 300 米高，漆黑的夜里下着倾盆大雨。我明白了为什么在萨洛尼卡等三天了——这是在等“夏天的天气”，等到空降地点下雨的天气。

载着两名间谍学校学员的轰炸机刚刚越过苏联的边界，便被苏联边防战士发现。他们已经得到将有飞机出现的消息。地面的几处防空雷达已经捕捉到了轰炸机，就等待命令。

飞机掉转方向，往回飞去，接下来并没有其他的命令。防空

雷达一直跟踪飞机，直到敌机离开苏联的边境。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指挥部从中心得到的命令就是跟踪飞机，并且准确地记录下敌机掉头的位置。显然是要在这一地区搜寻敌人的跳伞人员。至于那些把敌特派进来的人们，他们以为飞机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苏联，空投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

寻找跳伞员并不困难。他们被捕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藏好装备。其他三组人员也同样被捕，没有费任何周折。

我们相信鲍勃的供述，并提出要他协助我们，他立刻就答应了。

根据上级的指令他应该在莫斯科附近安置下来。因此我们把他安置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小城克林的一家热工仪表厂，工厂附近有一个军用机场。鲍勃在约定的时间与国外的特工中心联系并发出了第一份情报。他报告顺利到达，安顿在克林，以后将继续报告。

鲍勃向我们提供了 26 种预定的信号，国外的中心根据这些信号可以判断自己的间谍是否受到监控。例如，如果中心提出：“你们是否收听美国之音？”情报员应该回答：“我收听吉特之声。”其他方式的回答都表示通信受到监控。

我们相信彼得并没有欺骗我们，但是我们怀疑他的主人是否完全相信他。如果他们突然猜测到他在耍花样呢。于是决定做一些冒险。

在间谍进行通信联系的那棵树上为他装备起一个工作点，从那里可以俯瞰军用机场。鲍勃进行了几天的观察，作了记录，而且每天都与上司联络。上司根据这些情报可以判断这是一个什么机场，有多少架飞机，什么型号。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反间谍人员在柏林向美国情报机构



“出售”了有关克林军用机场的情报以及其他的一些秘密情报。这与鲍勃的情报完全吻合。我们了解到两份情报落入一个人的手中,也就是说,不必怀疑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的正确性。

报务员的游戏进行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这个游戏使我们受益匪浅。从中心提出的问题可以判定敌人对什么感兴趣,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彼得·库德林现在还活着。他结了婚,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年。他现在住在另外一个城市,已经退休,似乎还在工作。这一组里的另外三名间谍的命运也不赖,反间谍机构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那么另外四个人呢?他们表现得不那么明朗。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细致的工作,他们的案件已经移交给重案组。在他们四个人中一个名叫拉赫诺的人。他属于死心塌地为法西斯卖命的那一种,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欠下了很多苏联被俘军人的血债。

不久之前通过无线电广播听到了人民劳动联盟成员的演讲,其中有拉赫诺的女儿。他们说潜入苏联的八个人都已经被处决。照他们的说法,这些人都是思想的勇士、真正的爱国者和在克格勃高墙之内英勇献身的英雄。

他们算得什么思想的勇士?苏军的叛徒拉赫诺,甚至在慕尼黑,在他被派往苏联之前,他还提出要求给他一支自动枪。他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坚持这个要求,我们将取消你参加这次行动的资格。”

落入敌人间谍系统中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他们的信仰和心理素质都不一样。

我们的一些同胞在各种客观环境的影响下,往往不情愿地

流落国外，他们当中很多都是有才干的、诚实的好人。所幸的是现在已经能够公正地评价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勇敢行为得到应有的报偿。但是也有像拉赫诺这样的人。遗憾的是，往往对他们不加区分、一概而论。战争时期，一个人沦为战俘，或者落入希特勒的沦陷区，往往就被认为是犯罪，对这种人要处以很重的刑罚。至于他为什么，如何成为俘虏，并没有认真调查。对于那些战后被迫为敌人的间谍机构工作的人，更不会认真考虑他们沦入这种状况的背景。而且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显然在这里值得谈一谈人民劳动联盟的事情。

一直到战后，这个组织的活动都很积极。它的主要成分是沦落在国外的苏联公民。这个组织也接收因公出国、旅游、探亲出国不归的苏联公民。

1932年曾经成立过一个“新一代人民劳动联盟”的组织，它就是人民劳动联盟的前身。这个组织是国内战争以后由侨居国外的白军军官组织起来的白军军事组织的青年派。他们自称为俄国普通军人联盟。

“新人民劳动联盟”以及后来的“人民劳动联盟”从成立开始就与苏维埃政权势不两立。但是在国外有不少俄罗斯侨民的组织，虽然他们不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但是他们在战争时期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人民劳动联盟与他们不同，其成员紧跟德军之后进入沦陷区，他们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设立了两个移动广播电台，他们从西伯利亚地区用“起义的居民”的名义广播。人民劳动联盟在沦陷区建立起自己的支部。

战后人民劳动联盟开始不断地向我们派来特务。前面说到的那8个人就全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些人并不搞特别的破坏活动。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他们的成员

会轻易地把情报“卖”给我们。对于那些受蒙蔽被拉进人民劳动联盟的间谍，苏联情报机构很快就放掉。下面就是一件很典型的案例。

革命时期索科洛夫一家逃到了国外。索科洛夫本人是一名白军军官，他在德国住了下来，他姐姐到了哥伦比亚。姐姐的儿子布罗斯—索科洛夫 16 岁那年正在法国上学，他在那里被拉进了人民劳动联盟。正在莫斯科的一个监狱服刑的叔叔被允许和侄子见了几次面，在案件调查结束之后，他们在法庭上详细地叙述了这个年轻人被蒙蔽的经过。

年轻人仅仅是想回到祖国住上几天，因为他从没有见到过祖国是什么样子。现在突然有机会免费回国——只是承担一件小小的任务，那就是贴身扎一条宽皮带，皮带上夹着一些在邮局不便邮递的信件和家庭的贵重物品。要求他到达莫斯科之后打一个电话，然后到那个间谍的家里把皮带交给他。唯一的条件就是在交给指定人员之前，不得把皮带解下来。此后他可以在莫斯科玩五天。

派他来莫斯科的人对此次行动的成功毫不怀疑。在莫斯科的间谍是一个少言寡语的工程师，没有受到怀疑。而工程师也知道如何处理这条皮带。

住进宾馆之后，布罗斯—索科洛夫立即拨通了电话。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

“可以请 XX 工程师接电话吗？”

“您是哪位？”

“我是从波罗的海来的。”

这是暗号。

“请稍候。”

青年当然不会想到接电话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位置在克格勃办公大楼。

另一位克格勃工作人员接过话筒。他提出在街上某地点见面。

“不行，不能在街上。我们约个时间，我到你家去。”

“不行，房子在装修，工人要到深夜才离开。”

“要不然，您到我住的宾馆来？”

他说出了自己所住的宾馆和房间号。

“对不起，今天不成。我们明天见面吧？”

我们设置了对青年的监控，一连三天都以各种理由推托见面。必须确定他没有和任何人见面，也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最后约定在索科利斯科公园门口见面。一开始他并没有答应。

“我有东西交给您。”

“这没有问题。那地方人很少。”

这个不幸的青年实在坚持不住了，这条倒霉的皮带，昼夜都不能解下来。最后他只好答应见面。

我们的工作人员和青年相互通报了自己的特征，我们的两名工作人员出发了。另一名工作人员悄悄地跟随，他要用摄像机拍下整个会面和到会地点的全过程——主要是不能放过皮带。

皮带里面是微型胶卷和字条，人民劳动联盟小组的组建章程。还有不少卢布和美元。

坦白地说，本不想把索科洛夫的案子移交给法院。法院根据处理规定进行处置。索科洛夫很快就被逐出境外。

临行之前他说：

“我要给妈妈带一捧祖国的泥土，她一定非常高兴！”

我们没费多大力气便随同物证一起抓到了人民劳动联盟的间谍——英国人布鲁克。

有一个时期，一些英国和美国特工机构的人员加入了人民劳动联盟，他们就把这个组织称为什拉普涅尔(Shrapnel)。但是后来英国人改变了主意。

人民劳动联盟的总部设在法兰克福。英国驻德国间谍机构的头头给他在法兰克福的同事写信说：

我们不支持，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支持什拉普涅尔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我们对这个组织感兴趣纯属职业性的：利用这个组织进行侦察和反侦察的能力，为的是得到更多的出国不归人员。在最近的6个月，不算美国的投入，我们每个月向什拉普涅尔至少投入1.3万德国马克，但是并没有得到一份情报。

什拉普涅尔要求我们不要把这个组织的成员当做普通的间谍来看待。不能因为他们自吹自擂，我们就付给他们这么多的钱。他们要想得到钱，就只能给我们实际的情报。仅此而已。

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只要有反苏的行动，就该给间谍付钱，无论他们进行什么样的活动：是宣传，还是挑拨、还是特务活动，或者是其他，只要反对苏联就行。

关于这个组织有不少人写过文章。但是最可信的是该组织原来的成员迪福尼奇、布伦斯特、切列佐夫、多尔达等人写的一些材料。

他们在文中引用英国和美国间谍机构开会的秘密记录，文中显示出英国人从某一时期开始停止资助该组织，他们的费用

由美国人单独负担。于是这个组织就像一个工具，由一个间谍机构转卖给另一个间谍机构，人民劳动联盟的领导只是宣布更换主子。

现在，在俄罗斯国内的人民劳动联盟成员已经以思想斗士自诩，他们说自己是不仅是反对苏联的思想斗士，而且还是反对法西斯勇士。

---

---

## 在布鲁塞尔国际展览会上

前面曾经提到过一封英国间谍的信件，证明了西方特工机构对我们的出国不归人员予以很大的关注。为此我想起了发生在 1958 年的一个案例。

当时西方的间谍机关不断地猎取我们的出国人员。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制定了一个专门的计划，介绍拉拢我们的出国人员，使他们滞留国外的方法。他们对这一行动非常重视：特工机构和心理战中心知道，我们对出国的苏联公民滞留国外不归的现象十分担心。他们的这种打击是准确的：只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克格勃人员和他们的领导就会倒霉，他们会被指责对出国人员管理不善。为了任何一个在国外迷路的海员或小卖部的服务员滞留在国外海港，我们都会遭到严厉的责问。负责出国的部门很害怕，此后便采取十分谨慎的措施：毫无理由地禁止出境、对本国公民不信任。苏共中央负责出境的工作人员也曾为此遭到责罚。

可以确信，这样的措施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只能是恶化局势的催化剂，只能使我们同胞滞留国外的形势更加严峻。而西方的特务机关则不失时机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变成某种政治人物。

为了使自己不受牵连，负责批准因私出国的单位（在克格勃系统中有这样的部门）作出声明：如果公民滞留国外不归，批准

单位不负任何责任。

我一直认为，任何一级的领导干部都应直接参与具体的工作。对于领导干部本人来说，可以了解下属的工作情况，而下级对你也会更加尊敬。只有在他们感觉到你的业务水平的确很高的时候，才会真正听从你的意见。因此我从来都不逃避那些“粗活”，经常会挤出时间到下面去。与其在办公室坐等报告送上来，不如下去亲自直接了解情况。另外，坐在那里等报告并不比参加具体工作更轻松。但是坐等情况报告的干部还是太多了。

我很想亲自体验一下，西方特工机构采取什么方法来策动我们出国的公民滞留不归。

我以一个旅游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乘坐“格鲁吉亚号”轮船去参加布鲁塞尔的一个国际展览会。我的任务不仅是要防止我们的公民被策反，我还会采取一些反间谍的行动。

轮船到了安特卫普，游客们按照计划开始了自己的旅游活动。我和几名同事也有自己的计划。当天克格勃驻比利时代表就通知我们，说人民劳动联盟准备行动。他们的计划指向了我们的一名游客，认为有可能策动此人离开比利时，出走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消息会带来多少忧虑。尽管我们已经要求游客要结伴出游，不要单独活动，仍然有确切消息证明，已经有人在劝说某个苏联游客留在比利时。

我们得知此事后，决定在第二天派几个人分别到展览会上去行动。我也决定到展厅去逛逛，希望体验一下他们的策反活动。然而整整一天没有任何人走近我。晚上我们开会总结，原来已经有人来做我们的两名同志的工作。我们的同志也没有让他们失望，答应第二天再见面。但是只有一个人如期去赴约：让他们感到其中一个人不敢来了。此外又派了几个人分别到展览



上去转悠。

下雨了。我站在一个展厅的天棚底下避雨，突然听到有人在说俄语。一位穿戴时尚的中年先生来到我的身边：

“您是苏联人么？很好。我是巴黎的记者，和同事们一起来看展览。”他朝着旁边站着的一个年轻人点点头。

于是我们攀谈起来。开始说一些无关疼痒的话：展览情况如何，有什么印象。后来，“记者”很巧妙地扭转了话题。“苏联展厅当然很不错，但是你我都清楚，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会专门为参展制造出一些商品和展品，实际上这些东西在国内是没有出售的。”我没有答话。随后对方开始感叹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在苏联。

雨停了，我们从天棚下面走出来，在展览会上又转了接近两个小时。“记者”突然话锋一转，直插主旨，谈起了我们国家的制度。对于我提出的反对意见他并没有驳斥，大概是担心惊扰了我这个“猎物”。

最后我们说该回去了，开始与他告别，我装作不经意地提示，假如有人发现我和他在一起，事情就麻烦了。“记者”点头表示理解，他说和我交谈很有意思，并提出明天 17 点在喷泉附近再见面。他说要带我去看看“快乐比利时”，我答应了。最后一班接送游客的班车 17 点出发，这样一来我可以不去见他。他的计划也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清晨，旅游公司的经理建议我乘接待苏联旅游者的旅游公司的汽车到外地看看。我们一行三人：经理卡希西诺夫、副经理和我。司机是比利时人。

这次出游非常棒。布吕赫、根特、奥斯坦德等都是古老的城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吸引力和城市氛围——比利时，迷

人的中世纪建筑艺术。我朝四处张望，可是脑子里没有忘记 17 点的喷泉之约。

我们已经踏上归程，离开布鲁塞尔还有 40 公里的时候车子出了故障。15 点。我们旁边车子来来往往，没有任何一辆停下来。最后来了一辆警车。警察向司机询问了情况，答应派车子来救援。但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救援车没有踪影。我的同行者开始不安起来，担心我们赶不上班轮。

我安慰他们说：“放心，一切都会好的。五点之前我必须到达展览馆，而且我一定会准时到达。剩下的车程不到 20 分钟。我想，最迟在 4 点 35 之前我们一定会上路的。”

我确信，昨日的谈话让那个策反者感觉到了一定的希望，他认为我会留在比利时，他们是不会放弃这样的“猎物”的。

我的估算很准确；差 25 分 5 点，一辆汽车停在我们跟前，司机走过来说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回展览馆的。技术救援车要晚一些才能到达。

难道说人民劳动联盟和接待我们的公司真的是一起的么？此事暂时还不甚清楚，但是我们在预定时间之前的确到达了展览馆。我请同行者们等我几分钟，便径直朝喷泉走去。“记者”和他的同伴高兴地迎了过来。

“涅夫斯基先生，”我说道（这个人 是人民劳动联盟的一位骨干，这是我们克格勃驻比利时办事处根据照片辨认出来的），“我已经不想去什么‘快乐比利时’了，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好意。”

涅夫斯基瞬时呆若木鸡——他可是没有通报过自己的姓名呀！他的年轻同伴也同样不知所措。

当然，策动苏联公民在国外滞留只不过是人民劳动联盟的

目标之一。他们的主要活动内容是进入苏联境内，直接在苏联的境内寻找同谋者。这就首先使克格勃的反间谍部门，其中包括我们五局，注意到了人民劳动联盟的动向。我们在与对外侦察机构共同活动的时候，很注意弄清与人民劳动联盟合作的人物的面貌以及他们参与破坏活动的情形。

应该说这样做是有一定收获的。例如，在70年代我们几乎了解到了所有的接受密码无线电的人物，随时准备接待国外所派遣的密使。

现在，人民劳动联盟已经获准在俄罗斯国内拥有自己的组织，我相信我们所做的监视和所得到的结论正确无误。实际上所有承认自己曾经与人民劳动联盟有过联系的人，我们全都了解并被置于我们的监视之下。其中也有一部分并没有受到刑事处理，其原因是他们虽然参加了这个组织，但是只限于承认其“利益一致论”的纲领，而没有其他的具体行动。

---

## 不设守门员的比赛

西方有不少形形色色的中心、组织和基金会，专门从事针对苏联的破坏活动，他们的目标就是制造混乱、损坏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声誉。控制这一类活动的间谍机关被称为“心理战分部”。

例如，北约总部下面就有一个专门的分支机构负责进行“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进行破坏性宣传活动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在海外的俄罗斯人中存在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反苏团体，其中包括“反共同盟”（现称人民劳动联盟），都团结在“自由电台委员会”和“自由欧洲”周围，在这个系统中还有按照地域和民族组织起来的各种出版社（乌克兰、乌兹别克、白俄罗斯等）。他们的经费由美国特务机关支付，活动也受他们的控制，美国的间谍在这些组织和机构中担当正式的职务。

“心理战”的专家们利用各种机会在苏联的领土上制造冲突，他们支持各种可能使局势恶化的力量。各种谣言和严重歪曲事实的消息，都是他们用以挑拨人民对苏联的现实不满的工具。

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往往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担任。当他们躲在边幕后面来指挥各类反苏勇士们的表演，或者努力制造所谓的“反抗之源”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被揭穿。

我在这里所说的搞思想煽动和鼓吹冷战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收集情报的间谍人员。

我在下面讲述的案例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却很典型。因为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敌人正在尽力抓住一切哪怕是很小的机会来挑起冲突。

1960年莫斯科开办了一所卢蒙巴民族友谊大学。从开办的第一天起，这里便成了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政治处的注意对象。使馆工作人员加尔涅特被派来专门做大学生的工作，他的任务很具体：挑拨各民族大学生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引起他们对教师的不满，在外国留学生问题上，败坏苏联的声誉。

加尔涅特尤其关注非洲的学生。在他的调唆下，发生了几起非洲留学生与校方的冲突，冲突明显是有人煽动的。有人劝一些学生转到西方的大学去就读，目的国往往是德国。加尔涅特企图组织起大批非洲学生离开苏联转学到欧洲。我们取得了这位美国外交官触犯苏联法律的充分证据，决定由克格勃工作人员直接面对非洲学生，揭穿这位美国人的险恶用心。正如事先所料定的那样，加尔涅特的行为激起了众怒。此后学校的局势渐渐平静了，而加尔涅特也只好打道回国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1987年，一群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来到莫斯科上访，要求返回到克里米亚的原居住地。这个问题很复杂，要想在几天之内解决是不可能的——几个妥协方案都被鞑靼人的领导人驳回了。很快我们就发现，在背后挑动他们的，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政治处的外交官，他们一贯支持鞑靼人的极端主义情绪。所以这些鞑靼人对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愿听取。美国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挑拨他们和政府对立。我们得到证据之

后,就把这件事公布出来。这样一来事情很快就发生转机——鞑靼人也不愿意见外国人来干涉他们的命运。

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一些国外组织的“心理战”中心把赌注放在所谓的“维权运动”上。1976年欧洲安全与裁军大会之后,这件事开始浮出水面。

欧洲安全与裁军大会是由苏联和华沙条约的一些盟国倡议召开的。开始时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支持这个大会。持反对意见的国家之中就有英国。然而召开这次大会显然是一件好事,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欧洲的政治家以及他们的威信,最终大会还是召开了。

大会在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都达成了协议,首当其冲的就是裁减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这件事的意义和保持欧洲边界不变的协议同样重大。但是西方国家首脑参加大会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所谓的“第三个篮子”的条件。他们要求在协议中加入人权(言论、出版和迁居的自由)这项内容。

苏联方面不愿意把这一项内容加进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想隐瞒破坏人权的现象,因为他们这样做的居心是在苏联境内制造进行“心理战”的条件。若提不出过硬的理由来拒绝这一建议,可能会导致整个协议的落空。为了寻找解决办法,苏联领导人不得不作出让步。

今天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国在立场上投降的开端。对于西方来说,显然是寻找到了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苏联的可能。

“心理战”中心利用“第三个篮子”造就的局势,获得了在苏联国土上的行动自由,于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活动也得到了不断加强。

根据他们的建议,在莫斯科、基辅、第比利斯等城市出现了

监督赫尔辛基决议执行的非官方机构。他们的目标就是寻找苏联破坏人权的口实,并把这些信息提交给赫尔辛基会议参加国的大使馆。为此他们还印制了专门的表格。

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是件好事,可惜的是在这件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阴谋,那就是把一些反苏的势力联合起来。而其中一些组织就是近年来出现的破坏活动的策划者,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实际上,这就是以反对我们的国家制度为宗旨的一些反动组织,他们唆使一些苏联公民从事违法的活动。

时过境迁,今天这件事就更难下笔了。今天“维权运动”被加冕上了英雄主义的光环,成了为民主而斗争的标志。昔日的维权运动者们已经公开宣称他们曾经反对过苏联政权,而当年他们只承认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

实际情况是:美国使馆政治处通过该处的官员理查德·科尔姆斯与莫斯科的一些所谓的“赫尔辛基小组”的代表们保持了经常的联系。这些小组正是通过这位外交官获得了秘密的,而不是经常不断的支持。

心理战的组织者们确信这些组织属于破坏现政权的威信的势力。其中活动最积极的获得了西方的鼓励,而且不仅是精神上的鼓励。

应该指出,维权运动的成分是很复杂的。其中大部分人是诚心诚意地盼望民主改革。他们反对国家领导采用陈腐的领导方法、反对官吏们的特权,反对他们压制普通公民。很多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工作人员、著名的学者和普通老百姓都相信改革的必要性。这些人属于并不反对国家宪法的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在于一小撮心怀叵测的人利用他们做掩护,听命于国

外的特务机关,反对自己的国家制度。他们怀有完全不同的计划和政治目标。当一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会有不少迷途的人不辨是非,起来保卫他们。于是不满意的人的范围就越来越大。

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位乌克兰的赫尔辛基小组成员的话。如果我有记错的地方,我预先请求原谅。我记得他的名字是鲁季亚年科,是乌克兰共和党领导人,现任乌克兰驻加拿大大使。他说:“这些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我们并不十分重要。但是他们会帮助我们解决民族问题,并最终摆脱莫斯科。”(乌克兰共和党成立于1990年4月29日。是乌克兰最大的民族主义政党。党的主席为鲁季亚年科,党报为《乌克兰通讯》)

美国的高层领导人在鼓动“维权运动”方面的作用也很大。从前参加过赫尔辛基小组的奥尔洛夫在他的著作《危险的思想》一书中证明了这一点。

在美国总统里根出访莫斯科之前,奥尔洛夫曾与国务卿舒尔茨见了一面,他在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我先是向舒尔茨,然后又向总统请求,希望他们在莫斯科不仅要会见那些被拒绝出国的人,还要会见——要单独会见那些希望改变苏维埃制度的持不同政见者,因为这也是里根和舒尔茨想要的。”

我再援引美国间谍机构条令中的一段话:

……你们要利用一切正在发生的变化中的政治力量:扩大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和保证人权而进行的更加严格地监督等等。斗争的总的方针是采取进攻性的行动,为此要更加广泛地动员各界群众,采取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斗争形式。对任何一个社会动乱和不满都要立即赋予民族主义的



性质。要把所有的民族政治目的都作为最主要的动机——尽管它们在起初的时候并非如此。

这些文件并不是摘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克格勃的档案，这是摘自公开发表的文章。遗憾的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危险性并没有引起我们党和国家高级领导的注意。

这样的情况好像是在进行一场“不设守门员的比赛”。守门员不仅离开了球门，而且因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而引起了防守队员们的愤怒。政权完全瘫痪了。

---

---

## 怎样招募和使用特工

渗透到秘密中心并招募特工是每一个国家的间谍机关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这一任务并不简单。承担这样工作的人不仅要具有极强的忍耐力、毅力和勇敢精神(除了专门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之外),还要有很好的直觉和足够高的智商。

在敌方的环境中活动,侦察员必须能够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迅速辨明方向,判断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审时度势,设计出自己的对策。

侦察员必须认真研究所在国家的历史和生活习俗,要尽可能详尽地研究。

众所周知,在很多国家都会对初到那里的多数人进行跟踪监视。会检查他们会见什么人,对什么事物感兴趣,了解他们的习惯、嗜好、电话和通信的内容,以及他是否爱财如命——简单地说,研究他的一举一动。

特工人员应该有很好的记忆力,应该轻易地记住文字、电话号码和人的面孔。若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能够割舍开自己的亲情,放弃自己的习惯和爱好。侦察员有时需要长时间地与家庭和亲友断绝联系,必须能够忍受充满不安,而又无暇放松的生活。

甚至仅仅具有上述的品质还是很不够的,主要的是:一个人为之献身的到底是什么目标。究其原因,无非是深信自己事业

的正义性,或者希望赚取巨额的钞票。

对于爱财如命的人,我们历来都是不信任的,因为只要给他更多的钱,他就会掉转枪口。

即使我有权利揭示如何选择和使用侦察员,如何招募情报人员,我还是无法说明这一切,因为这里没有现成的配方。在很长的时间内,从很多类似的事件中,也未必能够找到两件完全一样的案例。

我讲一个已经不是秘密的案例。这是“冷战”时期招募一名间谍——如果能够使用这样的词汇的话。

很久以来,西方已经不向苏联提供诸如粮食之类的“战略”物资。但是在我们许以相当的经济利益之后,与加拿大进行了顺利的谈判。于是美国支持的加拿大间谍机关开始行动了。

加拿大的媒体开始进行一轮疯狂的反苏宣传,已经接近完成的谈判搁浅了。我们寄予很大希望的粮食采购计划面临很严重的威胁。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制止这场宣传运动。政府和安全部门的首脑们都立即投入了这项工作。

阿·马丁诺夫是“全苏国外供货公司”的职员,他在蒙特利尔的“出口—67 展览会上工作”。他经常与加拿大的巴涅特有限公司的代表杰弗里·威廉斯来往,那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加拿大商人。两人的关系很不错。威廉斯是一位有经验的商人,很了解当地的情况,他对马丁诺夫很关心,也经常给他出谋划策。为此马丁诺夫也很想报答他。

马丁诺夫在绘画方面颇有才能,在开会的时候他经常会亲手画一些女人的头像和人物素写。有一次他画了一幅风景画。坐在他身边的威廉斯见了后兴奋异常,他认为利用马丁诺夫的

绘画可以做很好的生意。他建议马丁诺夫画一张圣诞贺卡，他可以付 2500 美元。

“就为一张贺卡付这么多钱？”马丁诺夫吃惊了。“任何一个专业画家都比我画得好得多，不过只需要几十美金……你要这张贺卡做什么？”

威廉斯吃惊了。

“做什么？我要大量印刷，同时注明这是一位俄罗斯商人的作品。谁会拒绝买这样的杰作呢？”

“我们都不能以个人名义做买卖，而且这样的广告可能会让我倒霉。”

威廉斯明白了：马丁诺夫并不反对挣钱，只是不要大张旗鼓地挣钱。不久之后，为了马丁诺夫提供的一点儿商务上的服务，威廉斯付了一大笔钱。马丁诺夫接受了，但是这是他在加拿大的最后一天，他没有来得及做任何事情。但是他认为并非丧失了一切机会。他回莫斯科之后，还要带着家属来加拿大生活三年。

回到蒙特利尔之后他和威廉斯又见面了。接下来威廉斯又提出新的建议，马丁诺夫又获得了一笔巨款。

事情从此便开始了。后来马丁诺夫在蒙特利尔到渥太华列车的一节半空的车厢里见到了加拿大间谍与反间谍机构的领导人丹特列蒙。丹特列蒙的责任是监视在蒙特利尔的苏联人员。他们见面后没有几句客套，丹特列蒙便开门见山地说：

“好吧，你有货，我有钱。”

“你指的是什么？”

“难道还不清楚吗？情报。请不要激动，既不是军事的，也不是经济的。你只需谈谈你在加拿大和莫斯科的同志，他们的

习惯和爱好，他们的优点和缺点，经济状况等一些小事。”

略作沉寂之后，马丁诺夫开口了：

“我需要想一想。我还要了解为此可以得到多少钱。此外假如我答应你们，我必须得到安全保证。”

“这不是问题。我给您一份加拿大一位高官的书面的保证，你可以在四个人中任选其一：外交部长夏普、魁北克省省长布拉斯还有佩莱特和沙尔伯诺两位部长。”

许诺的钱数也不少，可是马丁诺夫还是犹豫不决。列车已经驶近渥太华，苏联同事就在那里等候迎接他，谈话没有取得结果。

但是马丁诺夫没能彻底摆脱。再次与他见面是丹特列蒙的副手，同一个间谍部门的负责人比尔·克里夫，见面地点是“波特港”水上餐厅。克里夫是一个憨厚、幽默、很有魅力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与马丁诺夫一见如故。起先是寒暄，相互询问了对方的健康，又谈起加拿大的气候，最后言归正传：

“我听说您不放心自己的安全。我们单位是绝对严格保密的，但是我们对于您的担心表示理解。”随后他把一张印有米哈依尔·久巴的名片放在桌子上——这是“丹加尔文公司”的雇员。“这是您的名片和护照。而这个，”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张纸说，“您自己读一读。”

这是一份带有加拿大国徽章的表格，有加拿大司法部长奥尔蒙德的签字：

根据加拿大移民法第8条第1款，这封信保证米哈依尔·久巴为加拿大公民，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加拿大政府同时保证在他方便的任何时间为米哈

依尔·久巴提供避难。

“这是您在银行的账户，”克里夫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我在此省略掉十几年来马丁诺夫作为加拿大间谍的活动情况。由于他在外贸部门工作，他经常有机会到各国出差，在外边不仅会遇到加拿大的，也会遇到美国的间谍机关的代表，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任务，同时也得到了巨额的经费。

有一次，克里夫告诉马丁诺夫说将有一个名叫诺尔曼的先生与他见面，和这个人的谈话应该十分坦诚。四天后诺尔曼打来电话，约定在某饭店见面。

马丁诺夫是这样描述的：

我到得比较早，坐在一张不被人注意的小桌子旁。很快来了一个高个子的人，和我打个招呼后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我听您的吩咐，”他说道。

我很生气地问他是谁，有什么事情。对方很快地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我的面前。名片上写着：斯塔德尼克，渥太华哈斯卡公司的商务代表。

“斯塔德尼克——这是您！”他打断我的问话。“这是您的名片。米哈依尔·久巴已经死了。久巴将不再存在。比尔·克里夫也不存在了，他退休了。我是加拿大间谍机关的第四位领导人。今后你将和我一起工作。您拨打名片上的电话与我联系。”

我十分吃惊：为什么我要改变名字？银行账户和很多证件上都用的是原来的名字。

“必须更换，”他带几分命令的口气说道，“比尔告诉我说，久巴这个名字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知道。

至于您的证件和账户都没有问题。”

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沓文件，又拿出一本加拿大护照，上面贴有我的照片，名字是雅罗斯拉夫·斯塔德尼克。

特务机关不断为马丁诺夫改变姓名、职务，每一次都为他重新配备一套相应的证件，同时要求他提供新的情报。今年的间谍机关的特工克维利甚至交给他一份所需要的情报目录：

1)“苏联国外供货公司”的机构设置和公司简介，您在该公司的职务。

2)“苏联国外供货公司”在加拿大的业务方向和兴趣所在。

3)加拿大在“苏联国外供货公司”这条线上工作的具体人员，他们的兴趣何在。

4)哪些苏联的国防性质的企业是“苏联国外供货公司”的客户。它们的地位和邮政编码。

5)这些企业领导人的姓名和个人特点。

6)“苏联国外供货公司”具体为哪些部委采购航天方面的设备。

7)从事军工生产的苏联部委向“苏联国外供货公司”订货的性质及产品的种类。

还向马丁诺夫提出过其他的情报目录，同时交给他装有美元的信封。克维利警告他说：“下次见面时还要给你一份目录，这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因此在每一个问题后面都标有美元价格。从一百美元到数千美元。”

和以前一样，这一次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是马丁诺夫给出的，他行为的底线并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这都是克格勃侦

查员们作出的。他们获得了加拿大间谍和反间谍机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很多工作人员的照片,了解了他们的品质、习性。搞清了西方间谍机关对什么问题更感兴趣。

负责这一方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答案来迷惑敌人。必须让对方信任马丁诺夫,为此设想出很多的方法。例如,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加拿大的间谍机关对我们的哪些外贸公司的地点进行监听,于是我们在那里进行的谈话之中故意泄露一些“较小秘密”,然后马丁诺夫就把这些内容提供给他的主人。

还使用其他一些可信的手段来排除对方对马丁诺夫可能产生的怀疑。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员名单我现在还不能解密。

数年之后,加拿大开始疯狂地反苏,他们的活动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家安全部决定“牺牲”马丁诺夫——停止派他到国外去工作。“文学报”刊登了这一段侦探故事——准确地说,就是马丁诺夫本人的经历,并且刊印出真实的证件。文中被公布姓名的不仅有加拿大间谍机构一些人员,还有一些官居高位的国家领导人,其中有两名积极鼓吹反苏的国会议员:汤姆·科希特和奥托·埃莱尼科。

文章结尾处指向了蒙特利尔银行行长:

请关闭下列账户:渥太华分行,米哈伊尔·久巴,账号 N-5003-49;雅罗斯拉夫·斯塔德尼克,账号 N1054-795;因为这些人是不存在的,同时请解释一下,为什么银行向神话中的人物斯塔德尼克发放了账号为 N51918 190 466 827 的信用卡?

由于同样的原因,请苏黎世的瑞士合作银行行长关闭账号 NPC-326-826。

然后文章又指向了加拿大的记者:



请核查一下马丁诺夫所讲述的一切。当然银行的证明就不一定能够得到了。请你们到保险公司查一查,在米哈伊尔·久巴和雅罗斯拉夫·斯塔德尼克名下的 NN612006692 号和 472146067 号社会保险是何人申请,又向何人发放。

不难核实下面的情况:1975 年 4 月 1 日发放的编号为 N AG-287302 的护照,姓名是米哈伊尔·久巴,还有一份出生证明,编号为 N G-63641,1930 年 10 月 10 日出生于加拿大萨斯喀切温省。另外,1977 年 5 月 3 日于渥太华发放一本护照,编号为 N DH-406638(文摘号 G-396067),姓名雅罗斯拉夫·斯塔德尼克,1930 年 4 月 26 日出生于渥太华。尽管两本护照上的照片是同一个人。

请访问一下“哈斯基”公司。可以求见一下该公司驻渥太华的商务代表,这位不存在的斯塔德尼克先生。可以请他们按照米哈伊尔·久巴的名片拨打他的电话 613-234-8602,找一找这位丹加尔文公司的代表。

电话的那一端答话的不是什么公司,而是加拿大间谍机关。

如果你们照这个样子进行一番核查,你们就会清楚加拿大和美国的情报机关为了组织针对苏联的特务活动所采取的造假行为。

文章在附录中说明,关于加拿大间谍机关的活动,报社拥有的其他同样确实可靠的资料可能会随时公布。

但是第二份这样的材料并没有公布。马丁诺夫的材料出来之后,那家公司也关闭了,同时与加拿大的谈判也结束了。

可以想象,马丁诺夫具备了何等的才干、勇气、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能多年来在刀锋上行走。

我本人没有直接进行侦查工作,我不想隐瞒,曾经有过这样的愿望,甚至几乎实现。我是有意识地讲述马丁诺夫的故事。反对苏联的“冷战”也曾经在国外进行。自然,参加与之对抗的行动的不仅仅是反间谍人员,我们的侦察人员也参与在内。冒着危险在国外进行这项工作的就是他们。他们获取西方间谍机关在苏联国土上进行活动的具体计划。他们为反间谍机构提供了最重要的情报,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封锁或者打破心理战中心针对苏联所进行的行动。

我很珍视与苏联侦查人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共同的事业永志不忘,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至今仍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

## 可疑的集装箱

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时需要处理一些令人头疼的问题。应该说，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离开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帮助，要想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简直是不可能的。

例如，安全机关在鄂霍次克海海底发现了一种窃听舰船上的通信并对电话进行录音的装置。但是要寻找到这个秘密装置却非常困难。在安全部门和一些专家共同努力下，西方间谍机构的这一行动终于被揭穿了。

在本章所叙述的集装箱故事中，专家们也给予了极其宝贵的帮助。

根据情报得知，正在铁路上运输的数以十万计的集装箱中，有一个集装箱危及国家安全。如何寻找这个集装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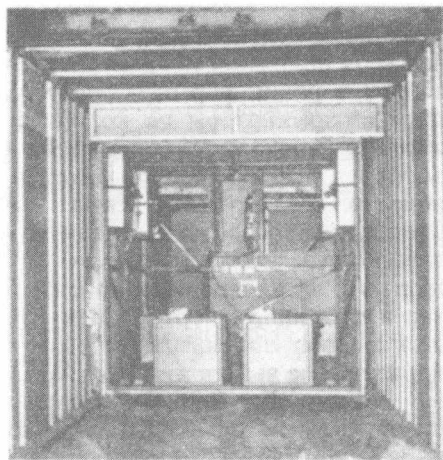
反间谍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这只集装箱被找到了。这支集装箱上特有的几个类似于舰船舷窗的小门泄露了天机——普通集装箱上是没有这样的窗口的。这种差别本该被发现。一句话：耐心执著地寻找。运单上注明集装箱内运的是日本产的陶瓷器皿。这个集装箱应该从日本起运，经过西伯利亚干线铁路到莫斯科最终到达列宁格勒，再从列宁格勒经水路到达德国汉堡。日本人把集装箱送到纳霍德卡，在那里装上铁路集装箱车。铁路运单一切正常，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在伊尔库茨克发现了这件集装箱。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打开

铅封,我们知道这样做的风险和我们要承担的责任。这是拿国家的威信作赌注——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外国的民用商品在发货人和收货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被检查。如果在集装箱中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呢?

铅封被剪断,箱门被打开。整个集装箱内整齐地码放着包装箱。打开了第一个、第二个……包装箱内全是漂亮的瓷瓶。难道错了吗?不可能!我们很清楚情报的来源是可靠的。犯这样大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继续检查,很快在包装箱后面有一层隔板,里面有很大的空间,装满了可疑的装置。

请来了专家。经过检查确定,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系统,里面有伽马射线记录仪和射线源,还有信息存储、信息处理和系统控制部件。这台设备有自备电源,配备有热荧光辐射剂量记录和光记录装置。



集装箱内部 间谍实验室



用以伪装的瓷罐

专家们经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集装箱内是一个专门的实验室,用来收集从纳霍德卡到列宁格勒沿途的信息。这一套独特的侦察装置能记录下核生产的原料、核生产设备以及其他信息。借助这套设备能确定核原料加工地点,甚至是已经废弃不用的核原料加工地点,“标记”出运输核设施的交通工具,判定车辆运行的方向。在核辐射最强的地方集装箱中的通风设备的阀门会自动开启,对铁路两侧数公里远的纵深进行摄影。辐射指标、影像记录和测距器可以精确地判定被测设施的位置,获取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用这种方法几乎可以触摸到全苏联的情况。

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托运这一集装箱的日本公司很尴尬。

他们承认,实际上这项针对苏联的侦察行动是帮助美国的情报机关做的。我们的手里掌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从各方面判断,这一间实验室是美国制造的。然后运到日本,很可能是通过海运,只要工作一结束,设备就会通过另一条路线运回美国。

日本商人无法抵赖,另外他们也不愿意断绝与苏联的关系,不愿意在全世界面前名声扫地。于是这家公司提出赔偿 50 万美金,以避免引起国际争端,从而损害自己的声誉。

我们本来也不打算宣扬这件事:1980 年到来了,国际形势开始转暖,我们的反间谍部门也不得不逐渐缓和与美国间谍机关的对抗。在此以前,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取代了葛罗米柯的外交部长的位置,在新思维的影响下,他极力避免揭露美国的这种行径。

美国的车载实验室是高技术的产物,价值达到数十亿美元。此外,问题还不在于值多少钱——大规模间谍行动的失败使得这一台装置失效了——本来这台装置应该向美国的情报机关提供苏联核武器生产的重要情报。

美国的科学家们能够把这样杰出的技术思想付诸实现,这项技术本来可以取得神奇的结果,不过我们的敌人在实践中没有能够很好地应用。

然而必须承认,远非每一次与西方间谍机关的斗争都能取得如此满意的结果。我们也曾失败过,而且有时简直是一败涂地。

80 年代末,在我们保密电话线路和高保密电话线路中多次发现美国的窃听装置。美国的间谍并不是把窃听装置安装在莫斯科的某座楼房中,而是安装在远离莫斯科的一个地下电话线

路接线井里——那里是苏联政府和克格勃中心机构与国外侦察机构的电话线路的连接点。与特洛伊茨克市的光缆中心相连接的通信线路也从此经过。

美国间谍就是在这个井里安装了能记录电话的磁带录音机。尽管从井里取出磁带是很麻烦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驻外人员还是做到了。这无疑是美国间谍机关的成功，也证明他们在莫斯科工作的间谍的专业水平。

这台装置是如何安装到井里去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很可能是在铺设电话线路的队伍中安插了间谍，甚至可能是几名间谍，然而不是一般的泥水匠或者瓦匠，而是具有很高知识水平的技术人员。

美国间谍得以在这里安装设备并从电话井里取走录音磁带——这无疑是我们反间谍机关的重大失误。要想一个人打开这个非常沉重的井盖也是很难的。可是他们竟然成功了！

有一天，一名生活在莫斯科的美国间谍扮做旅游者的模样来到郊外。由于对方采取了措施，我们负责监视使馆的部门没有发现。“旅游者”在离开那眼井很远的地方下了车，装做旅游者，背着背囊，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接近电话井。他借助一个专用工具打开井盖，艰难地下到井内取出磁带，并换上新的录音带。然后回到莫斯科。

后来，我们了解到美国情报机关的某些行动细节，并据此制定了就地抓捕间谍的方案。我们准备了几套备用的方案，似乎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甚至连保密电话都没有中断。不过，这一次我们还是失算了：间谍再也没有出现在电话井边。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总结美国间谍机关给我们的教训，同时修改了一些长期计划和措施。

---

---

## 美国间谍机关的一次失败

1980年正值“冷战”高潮之中，那一年举办的莫斯科奥运会对于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来说是一次严重的考验。紧张局势加剧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慕尼黑奥运会上阿拉伯的极端主义分子杀害了以色列运动员，这一事件造成的阴云还没有散尽。德国外交部长根舍在悲剧发生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你们将要自食其果。你们是不是希望这样呢？”他这话是针对德国的媒体记者说的，因为记者们批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保护措施过于严厉。慕尼黑市警察局局长施赖贝尔悲痛地回忆起这一幕惨剧。他迫于媒体的压力降低了奥运村的安保措施的水平。

莫斯科奥运会召开的那一年局势并不轻松。据了解，在美国的倡议下一系列西方国家抵制这次奥运会。

莫斯科也有不少人批评安全机关过于谨慎，还有人直接表示应该削减安保制度。如果连生命安全和国家的荣誉都无法保证，还有什么民主的体现可言呢！

此时国外的媒体不断地呼唤恐怖和挑衅。离1980年的奥运会开幕还有很长的时间，此时几乎同时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英国的间谍机关负责人罗伯特·巴契写的，另一本的作者是美国人詹姆斯·帕特森。两个人所写的是他们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的恐怖经历——当然是自己构思出来的。这两个庸俗的家伙用凶杀和爆炸的恐怖进行恐吓。这两本书实际上是恐怖



主义分子的行动指南。帕特森在自己的书中直接指出,用什么方式可以把什么武器带进莫斯科,把武器藏于何处,直到拿出来使用。书中详尽地描写了适于实施爆炸的地方,适于进行暗杀的射击点。为什么?为了不时之需。万一有人愿意爆炸或射击呢?慕尼黑的事件没有报仇,或许有人希望在莫斯科重复血腥的事件。

那些希望在奥运会上引起暴力事件的人不仅写书,而且在寻找恐怖事件的执行者,进行着实施类似行动的准备。

1980年春天,有两名英国的旅游者来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中的一位自报家门,称自己是议员阿特金森。由于他们在列宁格勒会见了一位被当地安全机关监视的人员,他们本人也引起了安全机关的注意。他们与一位先前招募的恐怖分子秘密接头——这一切都在安全部门的掌控之中。

自然,我们准备在莫斯科迎接他们。阿特金森和他的同伙住进了民族饭店。一天,他们来到街上。这两名外国游客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旧牛仔裤、肮脏的套头衫、沉重的挎包。阿特金森和他的朋友在街上走着,一面留意后面是否有人盯梢,最后他们来到了莫斯科市郊的佩罗沃,一位“莫斯科的朋友”在一条漆黑的胡同里等着他们。跟踪的同志惊奇地发现,这位“朋友”竟是一个牧师。我不必说出他的名字——现在这样的人都已经成为政治活动家了。“朋友”把他们引进自己的家中。两个小时以后,“旅游者”走出来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了挎包,他们踏上归途。他们计划在奥运会开幕当天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准备了几种在观众拥挤的看台上制造混乱的。例如燃放爆竹、模拟炸弹或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简而言之,就是准备搞一些特殊事件为运动会制造麻烦,甚至导致开幕式中断,至少也要造成开

幕式上的混乱。

他们也准备唆使奥运会的参加者们搞一些非法活动。比如说准备在奥运会发奖的时候起哄，他们计划中的人物是一名法国运动员。我只好与法国代表团团长正式会晤。我以安全机关的名义请他们不要搞过分的举动，我们的谈话起到了作用。

西方各国使馆中的间谍机关代表，也积极参与了破坏莫斯科奥运会的活动。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体育场几乎是从美国人手里夺下了一名阿富汗的勇士。他们企图把他带到美国大使馆，在那里演出一场闹剧：一名阿富汗人请求政治避难。

一天晚上，在奥运村。在迪斯科舞会上发生了一场冲突，感情冲动的非洲运动员被卷入。

事情是这样的：已经通知舞会在午夜结束，这样的规定并没有人反对。而这一次发生了相互谩骂，进而动起手来的事件。客人们捣碎了聚光灯，砸毁了桌椅，很多人抄起手边的东西向对方仍去。赛场内的冲突对于奥运村的另一些居民就像是发出了信号——从窗户里飞出了装满水的垃圾袋，落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工作人员制止了冲突；好在我们没有因为压力而放松安保工作。莫斯科的奥运会总体上还是秩序井然的。

1985年7月27日到8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世界青年联欢节。离开幕还有很长的时间，西方间谍机关已经开始积极准备破坏这次活动了，目的就是要让苏联在全世界面前丢脸。

他们物色了一批阿富汗的战士，许以重奖，于是这些阿富汗人准备任人驱使、赴汤蹈火。计划看来是万无一失的。这些人在巴基斯坦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专家的严格训练，在联欢节开幕的一年之前，他们就来到莫斯科，被安置在居民的家里。经

费和设施都非常充足。

应该说,在那些年,国内对待阿富汗人还是很友好的,因此他们在莫斯科生活得很自由。对他们十分宽容,政府在对待他们的护照和签证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愿意安置他们就业。总之他们在莫斯科隐蔽得很好,他们之中有两个人还与俄罗斯姑娘结了婚。

在联欢节开始之前,应该往他们的住所运送一批爆炸器材、塑性炸弹和枪支。预定在人流集中的几个广场进行爆炸。阿富汗人也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他们就像普通的旅游爱好者那样到处游荡,欣赏外面的世界。而且他们在这起事件中也不是什么主角,西方间谍机关并没有把赌注压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住进单独的寓所,到时候提供可靠的避难所。到联欢节临开始之时,活动的主角要住进这些公寓——那是六名爆炸专家。

他们得到的是过境签证和进入莫斯科的许可。其中两个人的机票是从喀布尔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其他四个人机票的终点是其他的国家和城市。联欢节开幕的那一天,这一伙人将利用事先准备好的器材进行恐怖活动,然后马上离开。

离联欢节还有三个月,我们就已经了解到他们的计划——看来国外的军事间谍机关真是煞费苦心。

我们在莫斯科的任务也不轻:首先要寻找那几个阿富汗人居住的房子。找到了。然而在别的地方可能还会有备用的房间用于储备爆炸器材。他们必须把这些器材从机场或者车站运过来。

我们组建起一个行动小组,马上开始行动。阿富汗和波兰的同事们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他们加强了边境上的检查。很

快就获得了消息；爆炸器材将从美国的基地运往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有经验的反间谍人员也加入了我们的工作。

离联欢节开幕还剩下几天的时间，我们已经掌握了六名破坏分子的特征，然而抓捕他们还有很大的困难——要在人流如潮的机场和车站找到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令人不安：假如我们不能全部找到他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的爆炸物已经准备就绪。

联欢节开幕的前一天，我们的行动小组非常紧张。最后得到通知说六名破坏分子已经从喀布尔起飞。于是我们来到机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自然，恐怖分子落网了，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武器和爆炸物。后来才得知，我们的国外同事们已经及时了通知了边防和海关，制止他们把器材运入国境。其中一名特务得知我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已经逃到了布达佩斯，但是在那里还是落入了我们的阿富汗同事的手里。

苏联内务部的行动小组获得了成功。

然而并非每次行动都能如此顺利。应该承认，美国的间谍机关在心理战方面不止一次地战胜了我们。

当年反间谍机关制定出的揭穿西方宣传活动的计划，从行动的角度看来是很有意思的。这种反间谍行动不仅要揭穿由西方间谍机关唆使的行动，而且要分裂他们的队伍，使他们的行动转而按照我们的安排进行。遗憾的是这一点没有实现。西方间谍机关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他们制定出了一个名为“民主运动”的庞大计划，其宗旨就是为违反宪法的活动找到一个“发扬民主”这样冠冕堂皇的口号，为“反抗活动”提供理论武装。

应该承认，这一平台的作用是使反对国家政策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后来出现的“民主运动的战术基础”又提示了行动的

形式和方法。自发性的行动变成了有组织的行动。美国间谍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经常与我们见面的那位拉利斯上校,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这一点。

遗憾的是,成功的不是我们。

现在我要向你们讲述一次特殊的行动。

有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西方进行活动,他们的宗旨是“乌克兰脱离苏联”。现在他们已经在庆祝胜利,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乌克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

有一名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卧底的侦察员一连几年给我们提供重要情报。乌克兰的契卡人员了解到了以破坏活动为宗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纲领。该组织寄送物资和其他物品的地址我们事先就掌握了。一句话,我们得到了关于该组织整个计划的情报。

由于这名侦查员极其巧妙的活动,我们才得以粉碎了该组织所计划的一些可能导致非常严重后果的行动。我们的工作人员如履薄冰般的活动是如此聪明、巧妙、小心谨慎,以致没有引起他的“主人”的丝毫怀疑:为什么他们会遭受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他赢得了该组织的完全信任,甚至得到了班杰罗夫中心的金质奖章。

苏多普拉托夫将军在给我的一封亲笔信中,谈到了该组织在反对苏维埃制度中的作用,谈到了我们的侦查工作在该组织各个中心中的活动以及整个国家安全机构的工作:

鉴于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的会见,请允许我提醒您注意在与美国进行重要谈判过程中发生的几个不引人注意的事件。这几桩事件直至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1. 1933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准备暗杀到美国与罗斯福就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李特维诺夫<sup>①</sup>同志。德国的间谍机关了解这一行动。该组织的创始者和领导者柯诺瓦列茨(1938年5月在鹿特丹被消灭)亲自对以米舒加为首的执行暗杀任务的五人小组发出指示。我们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小组中卧底的82号情报员(1985年10月25日死于基辅)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提供了这次行动的信息。我们派驻西欧的侦察组织领导人“严寒”(1942年在乌克兰与讨伐队的战斗中牺牲)向中心传递了这一情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美国的特派员(当时是苏美贸易公司的工作人员)通知了美国方面。罗斯福下令,在李特维诺夫访美期间由一个武装支队对这一支暗杀队伍实施监控。

2. 1945年,雅尔塔。雅尔塔会议。经过检查我发现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会谈的翻译是反革命俄侨组织“里加奥贝尔”的成员,该组织曾经在苏联和西欧实施过一系列的恐怖活动,其中包括在洛桑对沃龙斯基同志的暗杀。我们口头把这一消息通知了美国总统卫队队长,于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之前,这位翻译被押解出境。

3. 英迪拉·甘地、瑞典首相帕尔梅被杀,不久前拉吉夫·甘地遇刺等事件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广泛利用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破坏国际局势的稳定,以此

<sup>①</sup> 当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达到反对苏联的目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头头雅罗斯拉夫·斯杰茨科出现在里根的助手的行列之中也并非偶然。里根和副总统布什亲自接见并安抚以斯杰茨科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现任领导。

里根和布什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在所有的反苏组织中，只有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针对苏联的个人恐怖活动中是最有经验的。1936年柯诺瓦列茨在维也纳对我讲述的一件事（我和他曾经在维也纳、柏林、巴黎和鹿特丹见过面）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当时对恐怖活动问题进行辩论。我反对恐怖活动，他却持赞成态度。柯诺瓦列茨讲到，（当时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班杰拉并没有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层的同意——甚至是违背了他们的意见，组织了对波兰内务部长佩拉茨基的暗杀行动。实施这次行动的恐怖分子马采伊科成功地从华沙逃往阿根廷。帮助他逃脱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分子安娜·切梅林斯卡娅和叶卡捷琳娜·扎里茨卡娅<sup>①</sup>。安娜·切梅林斯卡娅亲自带领马采伊科穿过喀尔巴阡山到达捷克，偷偷地住进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波兰的秘密据点。

从柯诺瓦列茨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一些极端分子完全可能摆脱“领袖”的控制，在地方领导人的支持下采取行动。班杰拉就属于这种情况。还应该补充一点，柯诺瓦列茨死后，班杰拉取得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权，此后他消灭了与柯诺瓦列茨最接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央领导层中所有成员：格

<sup>①</sup> 1936年，作者通过柯诺瓦列茨的介绍与安娜在维也纳见过面。扎里茨卡娅现居住在加里西亚。

里比夫斯基、苏什科、巴拉诺夫斯基、斯茨波尔斯基等人。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契卡”的命运都像这位获得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褒奖的侦察员一样顺利。有多少从事侦查工作的人员一生之中都在生死线上进行斗争。我们总是怀着沉痛的心情缅怀那些牺牲的战友，尤其是那些并非死在敌人手中的战友。

我们的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侦察员安东诺夫长期工作在国外。由于内奸的叛变他当场被捕，被判处枪决。这样有着非凡勇气的人对于我们的国家是非常珍贵的。为了这样的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我们愿意用两名被我们发现的西方间谍来交换。

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要列举这些“冷战”时期国家安全部门取得胜利的事例呢？如果我们在这场战斗中遭遇失败，又会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呢？为什么要怀念我们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呢？

我认为这里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家安全机关的行动永远是极其秘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作的性质决定的。在我们的特工人员当中，有谁是人民知道的呢：佐尔格、伦斯捷尔、阿贝尔、费尔比，或许还有一两个。而这样的英雄还有多少呢！人们对于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又了解多少呢？人们所知道的就是镇压，残酷的镇压！关于这件事情的实情不可能隐瞒，而且政府也并不想隐瞒。其结果是在很多人的意识中形成的一个看法，那就是克格勃的人员所干的事情就只是逮捕和枪杀。从而对国家安全人员形成了不好的印象。但是在数十年中，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大家是一样的。在那可怕的年代中被逮捕和枪毙的国家安全人员就有两万六千多。

他们是谁？那些设计并制造残酷镇压的人只是极少数。另外，为了消灭罪证，他们也被消灭了。“契卡”人员的主体，绝大



多数都是诚实勇敢的人，无论他们在什么位置，干的是什工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们随时都准备完成祖国交付的任务。他们之中不论是哪一个，只要稍不小心，流露出对那种镇压的不满，他便注定要死亡。

我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了45年，这45年的经历使我有权作出这样的判定，应该承担这种非法行为的罪责的，是那一时期安全部门的领导，还有极少数的直接执行人员。

近年来对于国家安全机关的攻击谩骂以及对安全部门所有工作人员的指责太过分了。无数的无端指责、侮辱、诽谤落在他们的头上！加上媒体总是把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大肆宣扬，这也加剧了这样的一种现象：似乎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成了一种耻辱。

那些至今仍然在从事着这一充满了危险，有时是生命危险的工作，从事着这一异常紧张、备受折磨的工作的人们，或许当年他们也曾判断上出现过错误，然而他们一直是夜以继日地、诚实自觉地工作，当我们的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们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会何等委屈和痛心！甚至不久前还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巴卡金，在接受《消息报》记者采访时，他在谈到“契卡”的时候，也使用了一种嘲讽的口吻。但是在以前，“契卡”这一称呼对于大多数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光荣的称号。

请读者不要以为我在为自己的同事们——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寻找一种开脱。我曾经在那个部门工作。这个机关曾有过不少骇人听闻的恶行，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不能是非不分，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的罪行就玷污了整个部队。

布什在离开白宫之前所作的最后演说中曾经提到，“尽管冷

战已经结束,裁军的过程已经开始,但是间谍机关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加强”。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应该扩大,但是从原则上说,美国的前任总统是对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国家安全机关。假如对安全机关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继续下去,那么那些真正的人就不一定情愿地留在这一机关工作了。

---

---

## 50年代

我进入国家安全部门之后一年左右，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sup>①</sup>被任命为安全部部长，代替了弗·尼·梅尔库洛夫<sup>②</sup>。我从未见到过梅尔库洛夫，关于他的事情我一无所知。后来由于介入反间谍部门的的活动，才逐渐对他产生了一些印象。

在贝利亚主持内政人民委员部的时候，梅尔库洛夫曾担任他的副手。后来内政人民委员部分成了克格勃和内政部，梅尔库洛夫成了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人。

虽然贝利亚已经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工作了11年之久的“自己的”部门。由于他与克格勃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他的影响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更何况梅尔库洛夫并不是那种强有力的领导人，不能决定国家安全机关的政策和策略。梅尔库洛夫的文学创作热情让很多人

---

<sup>①</sup> 阿巴库莫夫·维克多·谢苗诺维奇 (А. В. Семенович 1908—1954) 苏联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中将军衔。1946—1951年担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

<sup>②</sup> 梅尔库洛夫·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 (В. Н. Меркулов 1895—1953)，苏联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之一，大将军衔，1943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1946年5月4日被解职，因贝利亚案件牵连，1953年被捕，与贝利亚同时被判死刑。

感到吃惊：他以弗·罗斯为笔名发表了几个剧本，其中一部《工程师谢尔盖耶夫》曾经在莫斯科小剧院上演。

梅尔库洛夫俯首听命于贝利亚，简直就是他的影子。显然，后来他作为贝利亚的同谋被卷进贝利亚案件并非偶然。

1953年的一天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尽管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但是已经是一个处长了。我的副手日加列夫是一位老契卡——一位有经验的肃反工作者。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实人，我们之间很快就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工作关系。

3月10日我们一起收听新闻广播。公布了斯大林逝世后的新的政府领导班子，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同时兼任内政部长，内政部又重新担负起被取消的安全部的职能。

听到这个消息，日加列夫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倒霉的时候来了，我担心会有灾难，”他说完就离开了办公室。

我陷入沉思。情况很复杂，我首先想到的是：日加列夫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话？他的这些话是随便说一说，还是想试探我？这种事过去也曾经有过。

不久之后我和另外一些人就被撤职了，被编入后备人员队伍。在此后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主要是应付高级函授党校的考试。有一天我来到单位，听到了贝利亚被捕的消息。很快我见到了我的前任副手。

“还好你没有出卖我，”他说道，“假若你把我们的对话说出去，你可能想不到，他们会怎样处理我。”

“其实我挺感谢你的，”我回答说，“你透露的消息使我幸免于难。”

贝利亚重新回来的时候，机关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在他主

持工作的三个月内,很多 30 年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过的人员都回到了机关,而他们这些人最熟悉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清洗方法。他们甚至打算恢复当年的机构……

在这段时间内,贝利亚的一些行动起到了挑动民族之间仇恨的作用。贝利亚把在加盟共和国里任职的俄罗斯干部赶出去,换成当地的民族干部。假如这种变动能够平静地进行,不出现什么动荡,还是能够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的。然而在干部的任免中大造声势,这显然是对俄罗斯民族的一种挑战。那些被解职的干部无论工作干得怎样,都遭到了深深的侮辱。事实上这就是一场排除“异己”的运动,是一场将俄罗斯人赶出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运动,这样一来势必引起并加剧民族之间的仇视。

解放那些在历次运动中遭迫害的医生,似乎是人道主义的行动,而这只是贝利亚的虚晃一招。从各方面看来,在这个背景下,正在酝酿着一次新的政治运动,其打击目标是伊格纳季耶夫<sup>①</sup>及其支持者。很多人都可能遭到这柄屠刀的宰割。

为了获得舆论上的支持,贝利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护法的斗士,他采取了惯用的手法,处心积虑地损害伊格纳季耶夫的声誉。早在 1939 年(应该是 1938 年——译者)他就曾经采用过这种狡猾的手段,取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叶若夫<sup>②</sup>的职位。当时也是中止了很多刑事案件,数十名无辜的人们从监禁中被解放出来——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干部被逮捕,罪名是破坏法律和大规模的镇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贝利

<sup>①</sup> 伊格纳季耶夫(Игнатъев С. В.) 1951—1953 年担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

<sup>②</sup> 叶若夫(Ежов) 1936—1938 年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

亚不搞政治迫害。我要重申：50年代初的一场政治运动在酝酿之中。

我不知道这个阴谋涉及的范围有多么大，不过，相应的工作确实在内务部中进行，我们很多人即便不清楚，也一定能够猜测到。当时已经很明显：我们躲不过即将降临的一场残酷的迫害。空气中能够嗅到1937年的味道。

1953年贝利亚被捕了，这就使得我们的国家避免了许多新的可怕的灾难。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

阿巴库莫夫来到国家安全机关，接替了梅尔库洛夫的职位，在30年代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记不清这是在1937年之前，还是在1937年之后。在那个时代时兴的是选派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到领导岗位做一些外围的工作。阿巴库莫夫就是其中之一。1939年他被派到罗斯托夫担任局长。从此他便平步青云，一路高升。在战争时期阿巴库莫夫成了军事反间谍总局的局长，同时还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其实也是斯大林本人的助手。接下来他进入了国家安全部，担任部长。这也反映了斯大林的一种想法——不单单依靠贝利亚一个人来对安全部门施加影响。

我当时能够感觉到，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很欢迎新来的部长。他熟悉专业，又是从基层上来的，更何况曾经担任过斯大林的助手！因此新部长从一开始便在下属中享有一定的威信。人们都在传言，说他和斯大林的关系非同一般，说他曾经缝过一件运动服，是和斯大林用的同一块料子。尽管这是人们的杜撰，不过这样的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阿巴库莫夫到任后采取了一些措施，巩固了他的威信。他

坚决地改变了干部政策。1946年的时候，部里的大多数人员都是1939—1940年进入安全机关的，而他们的前任已经与被自己迫害的牺牲者们踏上同一条路。

阿巴库莫夫把自己昔日的战友吸收到地方安全机关，有的被安排到领导岗位，有些人也只是普通工作人员。与此同时他把一些经历了战争考验的年轻力量提拔到中央机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里的气候。

在新任部长的领导下，部里的工作保持着一种紧张的节奏。不管他是否在场，人们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大家都知道：部长一定就在他们的身边，随时都在注视着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的工作。阿巴库莫夫可能突然来到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身边，看看他是如何工作的，询问一些工作的细节，会检查各方面的情况，甚至会查看卷宗装订得是否整齐。尽管在这样的民主作风中能感觉到某种作秀的成分，但总之还是赢得了对部长的尊敬。

阿巴库莫夫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他的演讲富于鼓动性，经常会带有很高的热情，与此同时，他总是尽量给听众造成一种非常随和、民主和谦逊的印象——尽管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我在党的会议上听过他两次演讲，应该承认，他的演讲是很成功的。部长要求在案件的审理中做到公正客观，避免偏激，他在所有的指示中都会强调，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地遵纪守法。

这就是我对于作为部长的阿巴库莫夫的印象。而实际上，他绝对地、盲目地顺从斯大林的意志，执行党组织所倡导的镇压路线的一切指示。或许是表现自己的顺从，或许是出于个人的品质，他本人对于残酷镇压也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当时很多军官遭到非法逮捕，我们这些年轻的肃反工作人

员对此并没有什么疑问,但是阿巴库莫夫作出的逮捕决定只是根据一些没有根据的告密。在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的最初几年,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大逮捕。

在军队中进行逮捕可以表现反间谍人员在尽职尽责。一些高级军官的命运今天已经揭晓,例如海军上将盖列尔、炮兵元帅雅科夫列夫、空军元帅诺维科夫。甚至曾任苏军副统帅、战功赫赫的朱可夫元帅也险遭到阿巴库莫夫的毒手。

在安全部的中央机关工作的最初阶段,第一件令我吃惊的事情就是重案调查人员与安全部的其他下属单位完全隔绝。然而业务机构的调查员则与业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业务机构所办的案件涉及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特务活动或地下活动,他们就要认真研究所搜集到的材料,而重案调查人员的工作往往只是根据个别人员所提供的证据,仅根据这一点就做出最终处理——这一切与恐怖的 30 年代的做法别无二致。一个人供出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供出第三个人,于是第四个人就定了案。口头供词就作为定罪的证据,于是大逮捕的浪潮席卷了全国。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们这里会产生冤假错案:对人们进行逼供信,而调查案卷并不是建立在实际调查的资料的基础上。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这一切。

这种事情也的确发生过。

1947 年俄联邦最高苏维埃进行选举。莫斯科斯大林区的选举委员会提前宣布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一致通过。但是突然接到一位汽车工厂的工人来信,信中写道:“不对,不是一致通过。我本人投的就是反对票。”

于是机器转动起来了。怎么? 反对斯大林。还好,还有点头脑,没有逮捕这位诚实的人。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解释:



“我知道 1946 年并没有取消面包票，斯大林也知道。那么为什么他在 1946 年 2 月说面包供应票取消了？实际上并没有取消。没有必要许诺那些做不到的事情。于是我就没有选。”

在一次调查中我接触到一个人的口供，他是在 1937 年被判刑的。一位比我年长的同事很有经验，他得知此事后告诫我说：“菲利浦，你最好不要去查那些 1937 年的材料，那里面有很多诽谤和不实之词被作为事实定下来。”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平静，就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听到这样的话是什么样的心情——当时我才 20 岁，绝对相信每一名肩负神圣使命的契卡工作人员都水晶般的洁净。这样的事情令我陷入沉思。国家安全部的政府文件、党的文件和部门文件中不断地指示我们要严格地遵纪守法——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

斯大林在战后的一次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希望。他为俄罗斯人民举杯祝酒，他说：“我们的政府曾经犯过很多的错误……人民可能对政府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待，你们滚开吧……”很多人把斯大林的话理解成了对非法的“大清洗”的错误的承认，既然斯大林都这样说了，30 年代的事情就永远不会重演了。

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在国家安全部党的积极分子会上的讲话之后，人们对于“大清洗”运动重演的担心烟消云散了。库兹涅佐夫在战争年代担任过列宁格勒州的州委书记，当年他在群众中就享有很高的威望。现在他主管一些中央部委，其中包括国家安全部。

他立场鲜明的报告令我记忆犹新。库兹涅佐夫热情号召大家遵守法律，应该牢记：国家安全部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待人民

和他们的权力应该水晶般的清澈。我想,即使在今天,他的讲话只要稍作修改,听起来还一样有说服力。可谁知道,库兹涅佐夫的这一番讲话,却成了他受到迫害的理由,把这样一个聪明、干练而且诚实的人投到迫害的屠刀之下,从那里注定是无法逃生的。

我每天都紧张地工作,在这方面还保持了战争年代的积习:我的主要工作是整理曾经在敌占区当过法西斯帮凶的那些刽子手们的案卷。

其中一些档案中涉及某些有反苏言论的苏联公民,他们曾经批评领袖或政府的政策。回顾那个时代,对很多事情都会以完全不同的立场来看待,这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现象受到了舆论的批判,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些事情所带来的苦难。不过那是另一个时代。我们都曾经为祖国诚实地服务,对于选举出来的政府没有丝毫的怀疑。

“冷战”这个概念开始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冷战必然会要求我们提高警惕,但是由此产生了一个愚蠢之极的问题——开始在敌人并不存在的地方寻找敌人。无论是当时,还是在以后的数年之内,尽管我苦苦思索,也找不出重新镇压托洛茨基分子的理由。而且这个问题是突然提出的:1947年党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把那些在托洛茨基年代中已经受过惩处的人们重新流放到边远地区。命令是党中央发出的,而执行者是国家安全机关!

怎么——要不加区别地放逐所有的人?但是既然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肯定是有充分根据的。另外,很少有谁会对此感到特别的怀疑,人民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党派的代

表的想法是一致的,是在战前的30年代已经盖棺论定的事情。我们国家的公民(还不仅是国家安全机关的代表)已经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苏维埃制度的敌人。引起质疑的只是个别的事实,而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这件事,基本上是肯定的。

托洛茨基主义无疑是属于反对派的运动,主要是针对布尔什维克以及斯大林本人。其主要内容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当时所处理的大量的托洛茨基案件,大部分都没有确凿的事实,甚至大部分契卡工作人员对这一点并不怀疑。这就是最主要危险。

40年代产生了新的镇压浪潮。1948年对犹太的反法西斯委员会进行了打击。该委员会被宣布为反苏宣传的中心,并被指控进行反对国家的破坏活动。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之后,又出现了杀人医生的冤假错案,陷入冤狱的大部分是犹太人,而这一案件又成了反对世界主义运动的基础。这次运动标志着全国反犹太主义的升温。

当时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列宁格勒案件”。我曾经说过,列宁格勒州的州委书记阿·库兹涅佐夫,还有波普科夫和卡普斯金等人,滥用了列宁格勒人对他们的信任。

西方国家的间谍机关的间谍案件由克格勃的反间谍部门负责,如果有重要人物被牵扯进这类的案子,就要报告党中央,由党中央另行决定。无论是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还是列宁格勒反间谍机关的人员都无权过问。此外,一些刚刚从列宁格勒围城中恢复元气的同志也受到了怀疑。因涉及列宁格勒案件被逮捕的还有国家安全部列宁格勒安全局的局长库巴特金。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解真相的只有个别人——他们知道“列宁格勒案件”是在高层党组织中发生的,而

且马上就进入了特别重案的侦查部门，对克格勃的基层组织也封锁了消息。

至于我们是否会经常对抗“上级的不正确的指示”，我本不愿意在这里提起。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说。当大清洗浪潮席卷列宁格勒的时候，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基层单位里不仅仅是不理解，可以说是受到了工作人员的抵制，他们拖延执行大规模的非法镇压措施。如果真的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往往会把送上级报批的最终文件压下来不办。这样做肯定会起到一定的好作用。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涉及列宁格勒群众大规模迁出的案例，由于我们的拖延，最终避免了这一悲剧的发生，而在30年代发生过的同样的悲剧却未能幸免——那个事件发生在基洛夫被杀之后。在这件事情中贡献最大的是勇敢的兹韦列夫上校，他当时是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处长。

多年以后，当我在1989年查看劳动农民党案件的时候，我感到此案与列宁格勒的案件极其类似。

十月革命后劳动农民党只在国外活动，它的主要联合对象是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在国内战争中被取缔的党派。流亡国外的劳动农民党人坚持敌视社会主义祖国的立场，进行针对国家的破坏活动。

该党在国内并没有设立支部，但是有很多所谓的“土地问题专家”自认为是该党的同情者。该党的骨干力量是一些科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农业领域的专家，其中有恰雅科夫、康德拉季耶夫和达雅连科等人。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同意党在农村发展问题上的政策（主要是反对农业合作化），于是成立了新的反对派。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大约是康德拉季耶夫）在向加里宁提交的意见书中阐述了

自己的观点。他的问题最终如何处理——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过不了多久，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登出党的理论家季诺维也夫（1938年作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首领被处决）的一篇文章。文章无情地抨击了康德拉季耶夫的主要观点，首次把“土地理论家”归入劳动农民党的范畴。

因此“劳动农民党问题”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系统专门立案处理。应该指出，康德拉季耶夫及其同伙们的一些行动，可以使人们联想到他们与在国外活动的劳动农民党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们立即利用了这一切，而且对于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的办案人来说，调查证据显然是确凿无疑的。某些涉案人员在调查和审判中都承认自己有罪，然而对于该案件的实质，他们并不清楚，显然，他们想从这桩假案中脱身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相信这是事实更容易一些。很难说这位给战友们发出了“战斗的信号”的季诺维也夫本人是如何看待此事的。

我在这里介绍当时的大气候，就是为了说明一件事：这种大的气候影响到了人们的立场、观点的形成，影响到了人们对职业乃至我们整个现实的关系。多少年来，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党的正确性坚信不疑，我们确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被敌人包围，而敌人的目的就是消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媒体不断地向人们的意识中灌输残酷斗争的必要性，不断地鞭策“可耻的叛徒”、“敌人”和“凶手”。无数次的群众大会激发起群众的热情，号召人们对把祖国出卖给国外资本的叛徒予以无情打击。这一切并不只发生在30年代。50年代初期，《真理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医生案件”的文章。文中指责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工作粗枝大叶、不负责任。这样的局面不可能不影响到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

---

---

## 谢尔盖·安东诺维奇案件

我们要处理的案件是形形色色的，每一个案件的规模、作案动机，以及敌人的行动方式方法都不尽相同。所以有时办案人员自认为自己的行为出自对职业的责任感，而实际上他们的做法已经超越了被允许的界限，实际上已经在不道德地犯罪。他们需要根据一些细微的特点来区别善与恶、对与错。职业要求我们毫无杂念地把心理分析作为明辨是非的工具。当然，经验在年复一年地积累，但是在处理一个案件的时候，却需要仔细地找到那把独一无二的钥匙。而且每一次都要寻找一把新的钥匙，无疑这就要求我们有足够的韧性，而且非常细心。

谈到这里我要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权且称为“谢尔盖·安东诺维奇”吧。谢尔盖本来在某个部属的工厂里工作，后来国家安全机关选派他出国执行任务。

我在这里援引他自述的速记记录，有些地方我按照自己的记忆讲述。为了简练起见，我使用第一人称的方式。

我在科诺托普车辆维修厂做钳工，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一天我接到共青团中央的通知，让我去莫斯科，这件事令我非常吃惊。没有任何人向我解释这件事情的原委，于是我就糊里糊涂地来到首都。

在老广场的共青团中央大楼内，我见到了一个来自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年轻工人鲍里斯·鲁勃奇

克。原来他也和我一样，是应召到这里来的。我们两人都得到一份表格，大概有12页，需要回答的问题范围很广，其中不仅涉及我们本人，还牵扯到一些远亲的情况。我和鲍里斯被安置在宿舍，要求我们第二天带着填好的表格来谈话。几乎所有的问题都问遍了！甚至还问到业余时间是如何打发的，都读什么书，对读过的书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女朋友，等等。真不明白他们想要干什么，而我们最后听到的结果，更加使我们震惊。

应该指出，在那个年代里，莫斯科外贸学院只招收党员，还有百分之五的团员——都是团中央推荐。我和鲍里斯恰恰就是这百分之五中间一分子，后来我们才知道，候选的共青团员一共有六人，最后只挑选了我们两个。我们先来到预科班，然后未经考试就被学院录取了。

鲍里斯的姓氏有些滑稽（鲁勃奇克，俄文的意思是“伤疤”——译者注），常常招来同班同学的嘲笑，从而发生了很多不愉快，所以在毕业之后，他把自己的姓改了——使用了他所喜欢的一位中学老师的姓——皮沃瓦罗夫。

鲍里斯一开始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才能，尤其是在语言方面。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三门外语。此外他很有分析天才，记忆力超群，而且精通有关国际金融市场的极其复杂的问题。

有一次我回到宿舍，看到鲍里斯留下的一张字条，他告诉我说，家里有点事情，要马上回列宁格勒去

三天。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是另一个时代，我想时至今日，已经可以说明他家里发生的一切。

我们学院开设一门“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体系”课程，由弗烈伊教授主讲。他是一位水平很高的专家，经常被派往西方国家去——以个人身份参与炒汇。他经验丰富，十分关注外汇牌价的波动，他能预料外汇牌价的走势，适当地选购美元、法郎或英镑，然后再把它们卖掉，这给外贸部门带来不小的收益。

鲍里斯告诉我说是去列宁格勒，其实他是跟随弗烈伊出国执行任务。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尽管我们很要好，可是他没有权利把出国的消息透露出去。

毕业后我和鲍里斯一起被分配到同一个外贸机关，我们两人都很高兴：而且我们俩都在外汇管理局。我是一个普通职员，而鲍里斯担任处长。一年之后，他已经提升为局长的助理，而他原来的处长岗位由我担任——显然是他的推荐。

我们的交情越来越深，最后我们甚至攀上了亲戚：我们的老婆是一对好朋友。现在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平时，我们总是在一起。1938年的新年，我们也是一起度过的。

然而这个晚上我们过得并不愉快：我们谈到一个话题：我们的人民中间有太多的敌人……

我们单位经常会突然召开党的会议，每次都是会有“祖国的叛徒”被开除。几乎每天都会有人遭到逮捕，为此大家都在私下议论。如果有这么多的人走上



了背叛之路，敌人张开的网会有多么大呀！

我已经说过，我和鲍里斯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在那个新年之夜，我们之间出现了不幸的预兆。

那一天都来到我们家：有鲍里斯和妻子柳芭、我和妻子奥莉雅，还有一位是鲍里斯的助手——局长秘书舒普金。我们局里的人都不大喜欢他。他人很聪明，还是个大专家，但是他常常会耍小聪明欺负别人。不过鲍里斯似乎没发现，他和舒普金之间有很好的工作关系。坦白地说，若不是看在鲍里斯的面子上，我是不会请舒普金来我家里过年的。

新年晚上，一开始都挺好，但是后来，当大家已经开始按照传统相互祝酒的时候，话题转到了卡尔采夫，就是鲍里斯的前任局长——后来被逮捕了。我认为卡尔采夫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专家，在群众眼里他也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待人处事都很小心，不可能有什么问题。鲍里斯开始和我争辩，他说敌人都很狡猾、凶残，他们往往装扮成一个爱国者和诚实的公民。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两个人都很激动。要不是柳芭从中劝解，我们会一直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然而节日的气氛已经被彻底地破坏了，聚会很早就结束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和解。在争论中我感觉到舒普金支持我的观点，尽管他一直没有插嘴。

自从鲍里斯在会议上激烈地抨击人民的敌人之后，我们之间又发生过几次争执。当他被任命为局长接替卡尔采夫的时候，没有人感到吃惊，但是也没有人表示祝贺。

几天之后，我被半夜的电话铃声惊醒。我和奥莉雅同时跳了起来。

“别接！”她抓住我的手臂，“这是找你的！”

电话铃还是拼命地响个不停。我推开妻子，抓起话筒，听到了柳芭疯狂地哭声。我听出了柳芭的声音，突然明白了，我匆匆地说几句安慰的话，我说，我马上就到。

“这很危险，谢廖沙”，奥莉雅说。“大门关着。两个电梯工会被警醒，他们会告密的！”

“我从上边走。”

我和鲍里斯住在同一栋楼的不同单元。第九层有一条消防走廊，连接着每一个单元，所以我用不着出门，只需通过九楼的消防走廊就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单元。

我悄悄地走出房门，爬上九楼，最后来到鲍里斯的家，他住在七楼。房间里已经被翻得底朝天：书籍、衣服满地都是，所有柜子的门敞开着，书桌的抽屉也翻了过来。不知为什么满面泪痕的柳芭坐在一只手提箱上，一看见我就扑到我的身上。

在我们部里，无论是哪一个被逮捕，都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去向。只需党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宣布一下：某某人是人民的敌人，已经被揭穿，已经被逮捕——事情就这样结束。这就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任何人也不敢表示一丝的怀疑。的确，当宣布开除卡尔采夫党籍的时候，大厅里不知道是谁小声地说：“简直不敢相信……”但是这很小的声音也被主席台上听到

了。于是，开始了对他的批判——说他在为祖国的叛徒辩护。

我在内心深处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鲍里斯就是人民的敌人，从大学阶段开始，我了解他生活中的每一天和每一个小时，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会议上激烈地抨击祖国的叛徒的发言。难道说他的一切都是在做戏？不可能！更何况鲍里斯对金钱视如粪土。因此很难相信他被收买。一句话，在开除鲍里斯党籍的会议开始之前，我的脑海里很乱。应该发言为他辩护，但是我又有什么证据呢……

共产党员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台去发言，都在悔恨自己没有更早地认清叛徒的嘴脸，号召大家提高警惕性。

舒普金上台了。

“同志们，”他说，“这个混蛋的嘴脸终于被揭穿了，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尽管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姓，不过显然是借用了自己的前辈的。”

“但是他自己的祖先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姓！”舒普金大声地喊道，“其实这样更加糟糕。也就是说，他有什么必要利用别人的姓氏来遮掩。我很想知道，谢尔盖·安东诺维奇，您为什么不发言呢！您和皮沃瓦洛夫很早就是朋友，显然您是想保持沉默来逃避责任？我想我们在这里应该提出一个丧失警惕性的问题。至于皮沃瓦洛夫，我建议开除他的党籍。”

舒普金在一片沉默中走下了讲台。我感觉到有数十个目光在盯住我，我站起来，走向讲台。

“同志们，我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白，”我说道，“我的确曾经是皮沃瓦洛夫的朋友，我们从大学时期就在一起，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我并不打算为皮沃瓦洛夫辩解，我只能承认，我没有看见，也没有揭穿敌人……”

我说这些话是多么困难呀！在那一时刻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混蛋！我之所以没有打算进行辩解，只是因为明白，此刻任何的辩解对于鲍里斯都是徒劳无益的。不过事实上我这样做就是一种背叛。我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其实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会是叛徒。

“是的，我没有能够看出他的背叛活动，”我接着说了下去，“舒普金同志却能够在一俄里之外就感觉到他的本质，而且也保持了沉默。为什么呢？原来他是在掩护敌人！”

会场里响起一片支持我的叫声，我建议追究舒普金的责任。开除皮沃瓦洛夫的决定被一致通过。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但是还是举起了手。会议结束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小组对我进行审查，舒普金也是小组成员。

奥莉雅在一般情况下都了解我的情况。她听见电梯响，就跑出来迎接我。我只好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她。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不相信自己的朋友是叛徒。突然我的脑海中闪了一闪，莫非是和弗烈伊教授出国的事情有关系？教授已经在两年之前被捕了。

这几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接到了父亲从科诺托普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诉我说，我的舅舅鲍久里亚被

捕了，他曾经是我们机车厂的先进生产者。

奥莉雅做的是同声传译的工作，一天下来就很累了。我也是一样。晚上回到家里，一场折磨开始了：害怕听到每一个电话铃声和其他响声。假若有人按响门铃，就会惊恐万分。所幸的是，现在电话很少，人们很少相互走动，尽量避免说多余的话。

有一天，新来的局长派我去外交人民委员部讨论一个条约。一个衣着鲜亮、颇有魅力的年轻人来接我。当我们坐进汽车的时候，他回过身来对我说：

“请您不要吃惊，是我们的领导想见您。”他给我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证。

“应该和我妻子说一声，取一点东西……”

我的同伴笑了。

“什么东西？我不是说了吗：只是半个小时的暂短谈话。”

车开到了。年轻人先下了车。我随后下来。这是莫斯科有名的地方——卢比扬卡。一座大楼拔地而起，比周围的建筑高出一截；高楼的一边是捷尔任斯基广场，其他三面都临街。

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入口，大门上是黄铜的把手，几个镀金的字闪闪发光：四号楼门。我们乘电梯上了楼，沿着很宽的走廊进入接待室，桌子后面坐着一位上尉军官。

“请进。”

我们从侧门进入办公室。一位笑容可掬的中校军官从桌子后面站立起来。

“我和您的父亲同名，我叫安东·安德烈耶维奇。”

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让我坐在值班员的桌子旁边，他本人坐在我对面。他询问我的身体如何，工作情况，随后又提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最后他问我对揭穿人民敌人有什么看法。我自然地回答说，我相信契卡工作人员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坚决地捍卫祖国的利益，他们是我们可靠的盾牌。

看来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已经不再继续谈这个话题，他说道：

“我很想进一步了解您。请您谈谈自己的情况。”

他还想从我这里了解什么呢？我确信，此人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

“我们只对一个问题感兴趣……”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文件夹，从中取出几张纸，我的头都晕了：在我面前放着鲍里斯提供的证词，说明他是如何把我拖进一个由弗烈伊教授领导的英国的特务组织的。最后是一行我所熟悉的字：“口供记录无误”——签字。

“这是真的吗？”安东·安德烈耶维奇问我。

我没有说话，只是摇摇头。

“请放心，我们知道这是诬陷。我这样问你只是一种程序，为的是结束您的案件……我们不会惩治无罪之人。”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几分钟，谁也不说话，然后他说：

“看得出，您已经累了。我们明天3点钟见。”

看来他们今天还不会抓我。不过也可能在回家的路上抓我。和我谈话的人笑着向我伸出手来。

“明天见。”

我决定不把这件事告诉妻子——我们的房间很可能被窃听。我向妻子建议出去散散步，此时我才对她说，我可能会在最近几天被逮捕。

“你应该消失！”她坚决地说。

“怎样消失？”

“很简单。你今天就走，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可以到一个建筑工地或森林采伐场。到处都需要会计，你在大学的时候，会计课不是五分吗？你在外面呆一段时间，不会永远这样的……我听说很多人都是这样藏起来的。”

可怜的女人，她不晓得这种建议是多么荒唐！我们一整夜没有合眼，甚至也没有说话，早晨起来疲惫不堪地上班了。

“你如果在6点之前不打电话来，”奥莉雅说，“那就是说……”她匆忙地赶公共汽车去了。

差10分3点我来到四号楼门。昨天那个人把我接了进去，陪我来到那间熟悉的办公室。我们彼此问候之后，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立刻看了看表：

“请跟我来。”

我们走过那条很宽的走廊，然后转了几个弯，最后来到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一个很大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身穿便服的人，桌子上没有任何纸片。

当我听说要我转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机关工作的时

候，我十分惊异。

“这很突然……我可是什么也不会，我完全是另一个专业。”

“别着急。您还接着干自己的专业：您将要到外贸部机关工作，还和从前一样。至于我们工作的特点，我们会教您的。”

“总之这很意外……请给我几天考虑一下。”

“几天？”从他的声音中听出钢铁般的坚强。“还要考虑什么？接受或不接受这样的荣誉——进入契卡的队伍？”

“不，当然……这是很大的信任，荣誉……我明白，”我含混不清地嘟囔着。

假如我立刻拒绝，他们是不会把我从这里放出去的！不过既然把我吸收进来工作，我是鲍里斯的朋友，也就是说鲍里斯也不是敌人，说明他也没有招募我。这说明当他们叫我来的时候，已经了解到一切。那么为什么还要问我那些问题呢？这是真的吗？说明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的回答，重要的是向我展示那张纸，让我明白我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是他们终生的人质。现在他们可以把我任意处置。

于是我同意了。

为了保护奥莉雅，我决定先不告诉她。

“好吧。外贸部那边的人会知道您被叫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去做一个系列鉴定。必要时也这样对妻子和熟人说。”

我被派到学校进修两年，毕业时我获得了高级军



衔——有高校学历和专长。很快我被委任为外汇局的处长，被派往美国，在驻美国商务处工作。

我一个人来到纽约，没有带奥莉雅。在那里应该先立住脚，然后再让妻子去。

出发之前没向我交代任何任务，也没有作任何说明。

“您到那里会得知一切的。不要找任何人。根据原子能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您是那里的财务顾问。我们的人会去找您的，您必须完成交给您的任务。您只听从他一个人的，就算是美苏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也无权支配您。”

我就这样去了美国。我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章，这一章不能对任何人公开，包括自己最亲近的人。

1924年，在俄美建交之前的十年，组建了上述这家苏美股份公司——AMTORG。

当年斯大林的助手，后来担任政治局书记的巴扎诺夫，1928年从苏联叛逃，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年的苏美股份公司所起到的就是大使馆和商务参赞处的作用，但是主要是共产国际和政治局地下工作的基地。

苏美股份公司董事长在纽约市麦迪逊林荫大道的办公室内接待了我。说了几句套话之后递给我两个文件夹。

“这里是我们的近两年来的工作。暂时你没有任务，好好看看这两份文件。别着急，好好思考，这样更容易了解自己的工作。”

有人把我领到我的办公桌旁。这是一间美国式的大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总共有二十来个人。满屋子的打字机敲击声和计算器的咔咔声，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一切似乎对谁都没有影响。我们的处长科斯特列夫坐在隔壁的房间里，隔着一块橱窗式的大玻璃可以随时观察我们。

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认真研究文件。次日清晨苏美公司的一位领导阿列克谢·伊里奇把我叫了去。

“我们将在一起工作。”他亲切地回应我的问候。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们在当地的头儿，我的直接上司。第一印象令人愉快。卷曲的头发中有几根白发，一张善良的脸，口音纯正，善于谈吐。开始的谈话只涉及一般的问题，很快就谈到正事。我应该利用30%的时间做财会工作，要让客户看到我是一位专家。其余的时间用来完成头儿交代的任务。我会应邀参加各种会谈、招待会和酒会。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扩大自己的交际范围，以后我要遵照他的指示与一些人进行非业务性的接头。与此同时必须牢记，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也会注意我，他们会认真研究每一个新来的人。

“他们发现您的身份也不容易，”我的新领导解释说，“他们很容易就能审查您的历史，我们会帮助他们。应该让他们建立一种印象，觉得您是一个性格内向一个一心干好自己的财会工作的人。这一类的人不适合干契卡。此外您历史上的‘污点’会使他们产生误解：您的舅舅和好朋友是被镇压的。中央情报局甚至还知道：我们的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无论他是何等的忠诚和

能干,如果他的亲朋好友被逮捕,他就会立即被清除出安全机关。尽管如此,您也不要丧失自己的警惕性。”

我在半年之内积极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结识了很多外国人,而且遵照领导的指示,着重密切了与其中的一些人的关系。我尽可能完整地汇报所有的谈话内容,领导会发出指示,告诉我如何应对各种情况。我觉得我的情报中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但是领导对这些都很感兴趣,有时候还会对我进行表扬。

我很想念妻子,她在每一封信中都恳求我带她出来。但是我暂时还没有自己的住所,我在苏美公司内有一间斗室。有一次接到妻子来信之后我找到领导,想谈谈住房的事情。他脸色阴沉,在房间内踱步。漫不经心地回答我的问候,还继续踱步,好像没看见我似的。突然他说道:“希特勒进攻苏联了。”

和德国的战争开始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可能只是我的职责范围更大了一些。我接到的指示是研究一些服务性公司的特点:他们的习惯、缺点和弱点。简单地说,我要想方设法挑选受雇佣的对象。

我面临的机会很多,我可以请客,赠送贵重的生日贺礼,请人去垂钓,每次垂钓都要野餐。对于我新结识的人,我可以找机会让他们挣到很多的钱。

没有必要更详细地讲述我的雇佣工作。我只是讲一件事: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一次领导把我叫了去,干巴巴地问我:

“为什么不进行汇报?”

我没有回答，只是考虑该如何应答。

“难道您不觉得费奥德罗夫的行为有些奇怪吗？”

费奥德罗夫是一位出色的专家，经济学副博士，和我一道工作。最近我也发现他的行为有些诡秘：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双手抱着头，呆呆地坐着，有时会漫不经心地在他办公桌之间踱步，不时地把目光投向同事们手中的文件，不然就会突然停在办公室的中央，陷入沉思。我并没有考虑到应该向领导汇报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对领导说：

“我没有想到应该注意自己同事的表现。”

“应该想到！”他打断了我的话，在桌子后面坐下来，两眼盯住文件。

我悄悄地出来。他从来没用这样的腔调对我说过话！这次谈话以后，我开始注意费奥德罗夫。他的举止越来越奇怪。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我下班后到街上去，在费奥德罗夫的宿舍里看见了两个商人，记得这两个人到我们这里来过几次。我并没有发现他们的会面有什么特别之处。费奥德罗夫是一个业务素质很高的经济学家，大家都与他合得来，他也经常参加会谈。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出去，大概是费奥德罗夫出去送客人。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跟了出去。

很快我看见他们走下一间地下室。那是一个廉价的小酒馆，店主人是一个怀有激烈的反苏情绪的俄罗斯侨民。到这里来的主要都是具有相同思想倾向的人。我们的人严格禁止到那里去。

我也跟着来到酒馆，老远地看着这三个人：他们一

边热情地谈话，一边饮酒，突然他们相对击掌。费奥德洛夫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纸，交给了那两个人，付了账，便离开了酒馆。我也随后离开了那里。我怎么办？是去汇报说我的同事违反禁令去了酒馆？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犯罪。但是他们一起签字的是什么纸呢？为什么在酒馆，而不在办事处？也许此事纯属偶然。

我感觉，领导对我的信息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表面现象。十天之后他把我叫了去。

“近期有一艘租赁的英国船开往伦敦，船上装有英国公司的重要货物，然后该船将开赴苏联。有两个不大的货包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而其他的货物运往黑海的一个港口。我们有一名同事将押运这批货物，而发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货物由您来押运，跟您住在同一个舱里的是费奥德罗夫，他将在莫斯科接受新的任务。您要用自己的脑袋为他负责，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会有人来接您，您要把他亲手交给他们。事情办完之后，您要赶快回来，这边在等着您，有人送您上飞机……有问题吗？”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没有马上回答。我问道：

“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货物交给谁呢？”

“不交给谁。所有的货物都发往同一地点，这只是您的掩护，以免费奥德罗夫产生怀疑。”

旅途的第一天，我感到无法忍受的沉重，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费奥德罗夫在发神经，一刻也不肯安静。我也没办法使他摆脱这种痛苦不安的思绪。显然他已

经明白自己被发现了。

“您不是很好吗，您这是回家呀，”我说道，“设想一下，妻子会如何迎接您。”

“设想一下？有意思……您若在我的地位上，我，无法想象自己。”他的思绪好像是被打断了：“我们才结婚两年，可是我追了她三年。开始的时候很幸福，尽管我们挤在一个很小的单间里。我不愿意离开她独自来美国，但是就像每一个个人主义者，当我看到她因为与我离别而难过得死去活来的情景，我就很高兴。苏美公司一直没有给我房子，因此没有办法接妻子来这里。最后当我得到房子的时候，我却得知她在莫斯科已经和一个军官姘居了。请您相信，我已经陷入绝境的边缘，完全无法工作。在短时间内受到两次批评，一份很好的合同没有签下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而我却写了报告揭发他……不过我写第一份报告并不情愿，但是第二份报告却是自愿写的。显然。费奥德罗夫就是处在这样激动的情绪中，闹出了什么乱子。

他下面的叙述使我不寒而栗。

“战争一开始，”他说道，“我们国家就缺乏战略物资，尤其是镍。苏美公司奉命尽快大批量采购。科斯特列夫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他没有找到一家愿意签合同的公司。镍是极端稀缺的物资，所有的公司都以各种借口不卖给我们。莫斯科来了指示，无论是什么价钱，只要能够保证供货就可以——国内的三个飞机制造厂面临停工。我开始做这项工作，科斯特列夫又

派了三名同事来帮助我。还是没有结果。

“我们推断，一定是美国政府封锁了向我们供应重要战略物资的渠道。看来，如果德国人占据空中优势，对美国领导人是有好处的，至于在陆地上，美国领导人也清楚，德国人并不那么容易战胜我们。

“考虑到我们无法采购到所需要的镍，我的脑海中便产生了一个应付战时紧急情况的新计划，而且也考虑到美国等盟国的行动。我们找到了一些供货商，前几天我接待的就是其中的两个人。这两个商人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提出了很具诱惑力的贸易条件。科斯特列夫并没有反对，他也出面接待了他们。于是我决定和他们见面，不过不是在办事处，而是在酒馆，为的是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一句话，我们在那儿坐了一晚上，我对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们说有一个朋友是一家英国公司的代表，可以做这一单生意，而且可以采取最佳的方式。

“简单地说，生意做成了。当我向科斯特列夫进行汇报，他也很高兴：因为这倒霉的镍与他命运攸关。显然他把一切功劳据为己有，给我找一件新的任务，打发我回家。”

费奥德罗夫还继续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已经听不下去了。看看我所告的是什么人呀。而现在我正在把他送进监狱……到了莫斯科，就再也没谁也会相信他的话了，也不会讲什么客气：强迫他承认“罪行”，承认背叛祖国。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紧急援助他的计划，但是一个比一个更差。最后我决定：他不应该

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就让他留在伦敦。这绝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一旦得知他已经跑了,就会诬陷他背叛祖国。而如果我没有目不转睛地盯住费奥德罗夫,让他跑掉,那就意味着我们两个是同谋,都是敌人。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辩解。突然想到另一个救助他的计划:我们两人都留在伦敦。

船只抵达了英国海岸,而我还没有最后决定。我正打算把这一切告诉费奥德罗夫,此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德国潜水艇上发射的两枚鱼雷击中了我们的船只,我们的船只被击沉了。危难中我借助几块木板游到了海岸。结果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

出院后我被苏联代表送回了莫斯科。关于费奥德罗夫,我连忙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他已经死亡,权且作为我打小报告的补偿吧。

后来我得知费奥德罗夫也获救了,他搭乘顺路的船只抵达了摩尔曼斯克,在那里参加了红军,一直战斗到胜利的那一天。他作为红军军官转业,曾获得两枚红星勋章和一枚勇敢奖章,最后回到了莫斯科。妻子和她的新丈夫迎接了他。她很不好意思,赶忙寻找丈夫的死亡通知书。他没有吭声,离开了家门。

费奥德罗夫明白,迟早会被发现,于是决定离开莫斯科。但是没来得及,他在街上因为急性感染被急救车收走了。一名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亲人的有经验的女医生救了他。他们结婚了。两名单身的战士:他是被她救活的。

这是我的最早独立处理的案件。



在编写费奥德罗夫的简历的时候，找到了谢尔盖·安东诺维奇的报告。

把他叫到了莫斯科，开始审讯。很难相信谢尔盖·安东诺维奇书写这份报告的真正的原因。审查这艘船是否真的沉没了，审查他们返回祖国的情况。确定了采购镍的生意细节和其他很多情况。最后国家安全机关得出结论：他们两人所做的事情都不是出于个人私利，他们之中没有人叛国。不过审查工作进行了很久。可以想象他们所经受的磨难。

为什么我要讲述这一切？只不过用具体的事例更容易说明，一些忠于祖国的人们曾经遭遇什么样的状况，在那些年代中，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

---

---

## 一名奸细的本性

1950年7月,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来到单位的时候比平时晚了很多。我刚刚迈进门就发现很多同事都聚集在走廊里。他们脸上的表情紧张而肃穆。

我走进昨天晚上工作的办公室,一位同事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问我:

“你现在还说什么?”

今天早晨很顺利地完成了一件接待工作,心情很好,对于同事的问题,我并没有认真回答,只是在随便搭讪了几句。

他吃惊地看着我,对我不满地摇摇头。

“你没听说?阿巴库莫夫被捕了!”

“不可能!”我脱口而出。

“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先不要耍贫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谁也不清楚。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好像是在‘列宁格勒案件’中揭露出了严重的违法行为,这个案件中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医生和领导人……”

没等他说完,我就走进了我的领导的办公室,想了解这些传言是否可信。

“传言,传言……”我们的领导叹了口气,“我们永远摆脱不了传言。晚上会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到时候就明白了。”

我几乎毫不怀疑,将要传达的决议很可能是对“大清洗”的批判。实际上呢?中央文件中批评肃反人员的工作做得不好,他们丧失了警惕性,没有发现恐怖分子的巢穴,是“戴着白手套”工作的,云云……

我们还得知了这份决定的炮制经过。特别重案组的一名老侦查员柳敏向斯大林汇报说,据一名被捕的医生埃廷格尔交代,我们有一批著名的医生故意伤害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的身体,而阿巴库莫夫却禁止对此事进行调查。

我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心情很沉重。柳敏是一个二线的工作人员,一些了解他的同事都知道他是个卑鄙下流的家伙,他官迷心窍,善于阿谀奉承。这种人相信不得!他被任命为副部长简直无法理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这一天开始,一场针对清白坦诚的国家安全人员的大清洗开始了。我们每天上班,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命运。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某个领导人被逮捕的消息:要么是局长或副局长,要么是处长或副处长。安全机关的各级领导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关进了牢房。

叶若夫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地宣布,已经逮捕了很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尽管在调查中并没有获得足够的犯罪事实。我们只能根据被审查的人员的口供来定罪。30年代是这样做的,20年后的柳敏也是这样做的。

国家安全机关人员所处的状态就可想而知了。很多人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这柄无情的利剑就掌握在柳敏手下的那些毫无原则的刽子手的手中。在那些日子里,每个人在下班的时候都会开玩笑说:“如果我没有回来,请追认我为共产党员。”这是黑色的幽默,但是也是对局势的真实写照。与此同

时，媒体为这种以告密和诽谤为基础的大清洗运动擂鼓助阵，这就使得局面更加严重。

我们无法想象的是，我们走向何处。

新任命伊格纳季耶夫为我们的部长。他以前主管党中央机关的工作，是个好人，但是工作之初，难免会犯一些错误。从上任的第一天起，伊格纳季耶夫就对安全部工作人员的工作很不满意，其中也包括那些一贯勤恳工作的同志。伊格纳季耶夫并不掩饰对同事们的看法，这种公开的表态无疑对他在部里的威信没有好处。但是我在此之前一直对他是很尊敬的，因为他对大清洗持反对的态度。

自然，伊格纳季耶夫也意识到，他不能不执行党中央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的决定。他在执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只能自己来背负这个十字架。使新任部长焦虑的是他处于大清洗的风口浪尖上。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使他非常痛苦，然而又没有解决的办法。伊格纳季耶夫以及安全部门其他人员的悲剧就在于，上级要求我们尽快搞清这些恐怖分子，而催办这件事情的就是副部长柳敏。他利用斯大林对他的庇护和支持，特别重案部门在柳敏的领导下无法无天，无论是伊格纳季耶夫本人，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对此都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新任命的副部长周围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台柱子”。阿巴库莫夫被逮捕之后，叶皮谢夫被任命为主管干部的副部长。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选举党委的会议。党委的候选人名单已经确定，就要开始表决了，叶皮谢夫突然从主席台的位子上站了起来，他宣称，代表们犯了严重的错误，竟然连副部长柳敏这样的同志都没有被提名。当然，错误立即就改正了，柳敏被提名，并且被选进党委。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一名穷凶极

恶、恬不知耻地一心向上爬的家伙让整个部机关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

伊格纳季耶夫也曾考虑对国家安全机关的组织结构进行彻底改组,以便消除违法乱纪的现象。但是在斯大林死后,他被选为党中央书记,贝利亚又回到了安全机关,所有的改组计划被丢进垃圾筐。

为了说明当时形势的严重,我在此叙述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

国家安全部得到一名国家安全特工人员的报告,说有一伙人想要谋害斯大林。报告中列出了这个犯罪集团的阴谋动机和行动计划。部里让我来审查这个报告。我注意到那份报告的几页纸是被揉过了的。我立即把提交报告的人找来,和他进行了谈话,我指出,诸如暗杀这类严重问题决不容半点马虎。

那名特工胡乱地进行辩解。对他的陈述作了记录。我要求他把事情再说一遍。我发现他的两次陈述有很多地方相互矛盾。显然这种混淆不是偶然的。我的一再追问让那名特工发慌了。他要求退还他的那份报告,还随口说了一句:“很遗憾,你们对恐怖分子的事情不感兴趣。”事情发生了逆转。这更坚定了我的判断:那名特工人员是在撒谎。但是怎样才能阻止他进一步耍滑头呢?他明目张胆地威胁说,他清楚当前的形势。他不想做一名不愿意与恐怖分子进行斗争的人。所以他决定坚持到底。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这对于我们两人都是一种折磨。突然他请我给他一支红蓝铅笔,要求重新看一看自己的那份报告。他在纸上勾来画去,搞了很长时间。当他把报告还给我的时候。我读到这样的内容:“蓝色铅笔标注的都是假的,而红铅笔标注的——是真的。”其中只有四行是真的,内容是与三位朋友在一

家咖啡馆里聚会。而所谓的谋杀斯大林，都是纯粹的杜撰。

“现在你大概要写一份报告，说我逼迫你改变口供！”我说道，而我暗想：“这份报告会落到柳敏手里！”

“如果这样，您就会被控告作伪证，”我告诫他说。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我去见领导，提出自己的建议：判处此人做伪证，并把他释放。我的那些领导都不愿意往自己身上揽责任，都是以各种借口逃避直接解决问题。有一位名叫贝佐夫的局长是老党员，是一位有经验的契卡，见多识广，他直接对我说：

“这份报告会给你惹来不少麻烦。不能说他作伪证，因为这样一来，这个人会诬告你放纵恐怖分子。你放过他，他还要一而再地写这样的报告，那时候你就要倒霉了。没有其他的办法，你把这份案卷先收起来，等等看会有什么结果。”

我自己也很清楚，一旦被卷入这样的事件将是很麻烦的。我决定释放那个写报告的人，希望他不会再次编造这样的谎言，尽管我对此并没有什么信心。

可以想见，这段日子我是怎样熬过来的，每天都做最坏的准备。我很难承担这一切，因为我不能把这样的事情告诉同事，也不能告知家人。幸运的是，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有重提此事，而前面的两份报告也就石沉大海了。

不过我的内心并没有因此而轻松。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尽管他不是编内的，怎么能够干这样的事情呢！显然因为他看透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加以利用，他肯定知道政治局决定的方针：与恐怖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假若不能找到恐怖活动，就可以假想出一个，这也没有任何危险——这是永远都不会输的赌局。

通过对这名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的询问我才得知，原来他很了解内情，他甚至还向我提出了逮捕他的问题，似乎我一直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不是犯罪分子怕我，倒是我惧怕他的下流无耻。

柳敏肯定会支持这样的人，接受他们的举报，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揭露出更多的“敌人”，就显出自己工作的成绩。尤其是当时的形势下，没有人会怀疑情报的来源——提供情报的人是安全机关的老资格的工作人员，而且举报的问题十分严重：敌人向斯大林伸手了。

一名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怎么会变成骗子呢？很明显，他并不是想当官。如果对这样的无中生有、搬弄是非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这就是当时笼罩社会的氛围的产物。

像这样的案例我在工作中仅仅遇到这一次。但是在类似的情形下，往往会使无辜者受到诬陷。面对这样的情况，即使是最诚实的调查人员，也会感到无能为力，就不要说还有一些巴结上级、官迷心窍的家伙，甚至还有一些人本来就心怀叵测。

这次的经历告诉我，一个人可能会堕落到何等地步。不过，如果有人把这样的现象看做克格勃工作中的主流，那也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现象的确是很危险的。这使我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终生的法则：一个肃反工作者不应该随便相信任何的指控和辩白。

我还想起另一件事情。国家安全部阿尔泰分局报告说，地方的一名安全人员向莫斯科提交一份重要的报告。上级委派我接待这个人。

这位阿尔泰的福尔摩斯给我的印象很奇怪：他留着一部红胡子，衣冠不整、肮脏不堪。他对我说，他的一个熟人准备进行

犯罪活动，这是那个人亲自告诉他的。于是我们开始进行调查。在他前往与恐怖分子接头之前，我们悄悄给他身上安装了录音设备。第二天，这位红胡子带来了比上一次更加恐怖的消息，而录音记录告诉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纯属醉汉的胡言乱语。没有给他治罪。只是给他一个麦克风，让他把下一次的谈话公开录下来。结果还和第一次一样。

这些人专门干一些挑拨离间、无中生有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动机何在呢？他们并不是为了荣誉，也不是贪财。他们就是无缘无故地糟蹋好人。

应该说，很多国家的特务机构都把这种挑拨离间作为一种手段。而苏联的克格勃认为，采取这样的方法有损契卡人员的荣誉。

到了80年代，当人们以为一切都应该随时代而进步的时候，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显得尤其可悲。

不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名国外情报机关的特工结识了我们的一名在外高加索军区服役的士兵，于是便开始做他的工作。

他的活动十分谨慎小心，最后士兵同意与那名外国间谍合作，为他搜集所需要的情报。士兵被当场抓获，抵赖已经毫无意义，只好交代一切。

外高加索军分区特务处提起了刑事诉讼。经过调查，事实确凿，法庭作出了判决。

那时候我已经进入了克格勃的领导班子。我不想赘述我们是如何对这件事发生兴趣，又是如何开始进行侦察的。我只想指出一点：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这件事所引出的结果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愕。



从事特务活动事实清楚，犯罪分子被当场擒获，也已经低头认罪。而令所有的调查人员感到震惊的是，这名“外国间谍机构的特工”不是别人，而是当地国家安全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更令人费解的是：他与外国情报机关毫无关系。他唆使我们的士兵犯罪，并许诺给这位士兵奖金，而自己只是随手把“秘密情报”丢弃。最后他又制造出假象，似乎是他抓住了一名“特务”。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为什么会想出这样的一幕，把一个不幸的傻瓜推上犯罪的道路？更令人吃惊的是，军事法庭竟然也不辨是非，上了这个人的当。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决定审查所有的涉及军人从事特务活动的案件。发现其中竟有三例属于上述情况：还有三个无罪之人竟然被送进了集中营。三个悲惨的命运。

在此不禁想起，有一名警察竟然祈祷上帝给他降临一桩大案，这样他就能破案，升官晋级。当然，我相信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形势完全失控的情况下。而领导人只关心形式上的工作指标，他们根本不关心群众的命运。

---

---

## 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的历史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公开批判，开拓了一条通向广泛的变革、通向国家进行民主改革之路。当时是否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土壤呢？严格来说没有，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对贯彻改革政策的动摇，而且这大概就是产生唯意志论的首要原因。不过这一切能够事先预料吗？

可以设想，赫鲁晓夫在决定迈出这一步之前，经受了怎样的内部斗争，他能够走上二十大的主席台，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还记得，当年斯大林逝世，棺木安放在圆柱大厅。我作为极少数的几名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中的一员，出席了那里的仪式。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是否都在现场，但是对于悲痛欲绝的赫鲁晓夫我还记忆犹新，很多人都哭了，而赫鲁晓夫简直就是在号啕痛哭。

我能够相信他的眼泪是真实的，正如我相信，他把斯大林的罪行公布于众的愿望也是真实的，他希望解脱过去压在党的身上的重负，开创一个新的生活。

当时并非一切顺利。二十大的思想很难贯彻，一些人支持，而另一些人则坚决反对——尽管这种反对是隐蔽的。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有不少领导人不能接受对斯大林的批判，其中也包括苏共中央和克格勃的一些领导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我

们大多数人,甚至对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斯大林曾经是苏联国家的伟大的象征。

在理解乃至拥护赫鲁晓夫的行为的同时,我认为接下来的行动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要避免造成人民思想上的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分歧。

首先这份报告不应该对苏联人民保密。尽管这份报告在西方已经被多次公布,但是在苏联并没有对人民公开。只是列举出了个人崇拜的种种现象,而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并没有进行真分析。这就很难从中吸取教训,很难制定出具体的措施,以防止新的个人崇拜的出现。

早在二十大之前机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1954年3月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此前出任内务部副部长的谢罗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谢罗夫为人坚定,工作大刀阔斧、敢于负责。这也并不是偶然的:当赫鲁晓夫还是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谢罗夫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他和赫鲁晓夫的私交从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另外,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谢罗夫,在当时都不曾反对乌克兰的“大清洗”,恰恰相反,他们干得很卖力。赫鲁晓夫一到基辅,就撤了巴利茨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的职位,这位老契卡、俄共十七大代表对“大清洗”并不积极。谢罗夫登上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的宝座,一改巴利茨基对“大清洗”的消极态度。乌克兰的“大清洗”从此迅猛地开展起来。

1954年,苏联克格勃成立,此后不久,赫鲁晓夫便来到克格勃机关,在部领导班子会议上发表了纲领性的讲话。

会议在捷尔任斯基中央俱乐部礼堂举行——这栋大楼是30年代苏联建筑艺术的杰作。大楼由著名的建筑师福明设计,

现今还保持着这栋建筑的宏伟而现代的风貌——建筑艺术家出色地把结构主义和古俄罗斯建筑艺术的风格结合在一起。

赫鲁晓夫的讲话持续了约两个小时，他阐述了对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看法。他讲话时情绪激昂、生动形象。他强调指出，国家安全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巩固社会主义法制，铲除领导层中的不良作风。赫鲁晓夫顺口就列举出很多事实，点出一些领导人的姓名，其中很多人就在礼堂里听报告。一些人受到表扬，另一些人受到严厉的批评——显然他不仅熟悉乌克兰的情况，对全国的情况也很熟悉。赫鲁晓夫详细地说明了他在二十大上的报告的炮制过程，讲到了政治局的气氛——一些政治局委员千方百计地阻止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及罪行进行批判，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等。

与会的全体人员对报告的反应都很强烈，都希望从此告别贝利亚及其走卒们的遗风，告别过去的一切，把国家安全系统中的污泥浊水清除干净。

开始进行干部审查：参与过非法活动、搞冤假错案以及大搞逼供信的那些干部被清除出国家安全系统。这件任务也不是很容易完成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能无限地扩大打击对象，要分清哪些是无辜的工作人员，哪些是被迫参与到“大清洗”中的人员，哪些是追逐私利、陷害好人、搞冤假错案的人。

战后搞的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涉及参与逮捕的人有很多。从现在起，没有州、市党委书记的同意，不能随意逮捕任何一名共产党员，没有部长的同意，不能逮捕部里的工作人员。逮捕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员必须经过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同意。其实这往往也带有一定的形式主义的性质，

不过煤炭工业部的部长奥尼卡好像真的没有批准过对本部工作人员的逮捕。

过去的流毒之所以很难彻底根除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所有的契卡人员(包括普通工作人员和干部)都是从过去过来的。一些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过去的一套很熟悉，而另一些人对揭露出来的事实感到震惊，对自己一贯信仰的理想发生动摇。例如，党内一个案件的解密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一位国家安全机关的将军竟然会制造虚假的文件。

1954年我被选为克格勃一个局的党委书记。此后不久我审阅了朱可夫中将的个人案件。在贝利亚担任内务部部长的一段不长的时期内，朱可夫被从西伯利亚调到莫斯科，被任命为局长助理。

朱可夫在30年代曾经在西部铁路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铁路运输处处长，他进入了“三驾马车”(当时有政治处处长、检察长和铁路运输处处长)案件，受到了处理。在处理这宗案卷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停留于伪造文件这个问题。这类的案件应该由党委进行审查。问题的关键在于，1937年或1938年在奥尔沙煤炭仓库曾经破获了一起“为波兰服务的特务组织案件”。涉案者中有百余人被捕(一个煤炭仓库竟有一百名特务)，其中很多人曾经改过自己的姓名——在姓氏中加入波兰姓氏中特有的辅音。而这一点成了他们作为波兰特务的证据。

看上去似乎一切都很清楚，但是在一次党委会议上，局长在发言中突然宣布，克格勃主席谢罗夫要求我们在审查案卷的时候，要注意朱可夫被任命为某加盟共和国克格勃副主席的决定。为此局长建议：给予朱可夫严厉的处分，但不开除党籍。

局长的发言使党委全体委员感到震惊。谁也没表态。这种

情况令我感到很为难。大家开始发言。一部分人坚持开除朱可夫,其中包括普罗科宾科。这个人后来担任过摩尔达维亚克格勃主席,此后又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在战争年代中普罗科宾科曾经在乌克兰坚持游击战斗,不止一次地穿越过战线,这个勇敢的人直到最后都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一直坚持同样立场的还有西纽申,还有党委的另一名委员,遗憾的是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

然而另外三名党委委员支持局长的建议,最后还有一名委员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而且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样一来,加上局长形成了5:3的局面。我最后一个发言。我明白,我的一票已经无能为力,不过还是坚持开除朱可夫的观点。最后以5:4的票数决定给予他严重警告。

可以认同这样的决议吗?不。问题被提交到苏共中央。朱可夫被开除党籍,剥夺了将军军衔。

这次会议在我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我最终确信——决定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任何见风使舵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我还记得另一个事件,那是完全不同的。那件事情发生在悲剧性的1937年。

大概是1989年,一位音乐家找到了我。我们虽然不是朋友,但是也相当熟悉。他在全国的知名度都很大,我也很敬重他。那时全国都唱他的歌曲,人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都在唱他的歌。

他向我提出的要求是:他想看一看对他叔叔的调查案卷,他的叔叔是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中牺牲的。我答应尽可能满足他的愿望。根据当时的规定,亲属并没有了解案情的权利。后来才

开放了阅览室,让人们去了解自己涉案亲人的是非曲直。

我阅读了他叔叔的案卷。他的叔叔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在36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相当于副部长),在被逮捕的前几个星期刚刚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即使在那个年代,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在这个案卷中看到了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信。这位副人民委员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部里存在着一个反动组织,他在信中揭发自己的一些同事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并说出了他们从事的阴谋活动和活动计划。共有打字文稿十余页。

对信件的反应是很自然的。这封信被转往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里立即开始对案件进行调查。被揭发的人员被逮捕了。难道说一名副部长的信件还不能作为证据吗?审问证实,该组织的确是存在的(共审讯了二十余人)。这些无辜的人对一切“供认不讳”,他们尽量回忆同谋者,当然其中也包括这位副部长叔叔。那些处理此案的调查人员没有“遗忘”给斯大林写信的人,就是那位决定告密的人。30年代就是这样的气氛。叔叔也被逮捕了。他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和其他人一起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读完之后我陷入沉思。我的那位熟人需要了解这样的实情吗?最好还是在记忆中保留原来的关于叔叔的形象。

数个月过去。我迟迟不作答,拖延与他的会见,不过这位侄子却很执著,他怀疑我在故意隐瞒什么。

有一天我们在卢比扬卡的克格勃新大楼见面了。我们面对面地坐下,都非常谨慎。他自然是很紧张的(阅读叔叔的案卷),我也同样很紧张。我明白这意味着的怎样的打击。我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我可能要讲述本案的关键之处,归还那些保存的照片

和文件，给他看法庭的材料。他能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并不十分满意。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一切和盘托出。他默默地阅读案卷，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办公室。我的助手把他送了出去，他们说，这个人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已经完全认不出了。

两周过去了。铃声响了。这位很有教养的熟人请我原谅他在那一天的不辞而别，原谅他没有对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由于了解了往事，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沉吟片刻，又补充说道：“您是对的。我不应该读这份文件。”我对他表示同情，安慰了他，希望他坚强地承受打击。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后来我们曾经多次见面，但是再也没有谈到这个话题——尽管我们两人对发生的往事都颇多感慨。

对待过去的事情应该谨慎，应该和今天的事情一样对待，应该清楚，今天的事情最终也会成为过去。

从那时候起，很长的时间已经过去，我经手办理或我参与办理的案件，并非全都无可挑剔。如果是在今天，很多事情我都不会那样处理了。不过这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待这些问题。但是在过去的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没有违背过国家的法律。

苏共二十大之后，克格勃的情况变得很复杂，不过在安全机构中还是有健康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国家安全系统的活动才能够得以改造，法制才得到恢复。

但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付诸行动也并非易事。谢罗夫继续坚持他一贯的立场——惩治机关就应该惩治。预防犯罪的工作只是装点门面的话语。



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公开发表讲话，似乎国内已经没有政治犯，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不能够说所有的人都很尊敬谢罗夫。缺乏柔性、硬性的思维方式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他的讲话与以前的各任领导人迥然不同。

例如，1956年3月，也就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发生了第比利斯风潮，人们对谢罗夫在这次风潮中的表现并没有感到吃惊。

以克格勃的副主席别利琴科为首的一个小组前往事发地点，我也在那个小组之内。坐镇莫斯科的谢罗夫要求查清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组织者，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

格鲁吉亚人民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讲话非常不满。这个加盟共和国和斯大林有特别的关系：对于大多数格鲁吉亚人来说，斯大林是一位民族英雄，每逢斯大林逝世的纪念日，他们都奉献花圈，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在活动中高唱他们喜爱的歌曲，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群众不了解赫鲁晓夫二十大讲话的内容，很多流言歪曲了报告的内容。很多人在讲述报告的内容之时，援引了贝利亚案件结论中的事实，而这些结论在此之前就已在各个单位传达过了。这无疑是在火上加油。而党中央没有考虑到向人们提供准确可信的消息，没有考虑到往加盟共和国派出有经验的宣传人员，把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的内容，传达给格鲁吉亚的老百姓。甚至我们这些被派往格鲁吉亚处理问题的人员，也不知道苏共二十大决议的内容。

不过还真有自作聪明的官员，他们无中生有，以上级的名义下达了指示，禁止花店出售纪念斯大林的花圈和缎带。于是格

鲁吉亚的风潮越演越烈，尤其在大学中更是如此。为了购买花圈，他们胡乱编造出了一些亡者的姓名，然后再改为斯大林的名字。大学生们带头走上街头，打起保卫斯大林的标语。一个上午在斯大林纪念碑前就聚集起了数万之众。

在库勒河滨河街竖立着一尊巨大的斯大林塑像，前来进行悼念和抗议活动的人越来越多，街道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

一连数日在第比利斯、哥里、苏呼米、巴统、库塔伊西等城市不断举行群众大会。地方政权束手无策：一方面他们要执行二十大的决议，另一方面，还要安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情绪。除了做说服工作之外，他们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群众只要求一件事，那就是了解苏共二十大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凭什么批判斯大林。

我还记得，有一位地方报纸的编辑参加了哥里市群众大会的组织工作，他说：“你们要求我拒绝斯大林，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我出生在哥里，就在斯大林故居的对面的房子里。我在斯大林中学毕业，然后是斯大林大学，我享受的是斯大林助学金。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斯大林。现在我编辑的报纸就是《斯大林的部落》。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很多人找到在第比利斯访问的以朱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打听情况——他们刚刚参加完二十大。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群众大会，收下很多要求保卫斯大林的请愿书。

3月9日，数万群众从库勒河滨河街上的斯大林纪念碑出发，沿着亚历山大斜坡涌向鲁斯塔维利大街的电报大楼。有一个名叫基比阿尼的人，发表挑拨性的讲话，号召人们占领大楼。不知是谁还开了枪，人群一下子就骚动起来了。

保卫电报大楼的只有极少数士兵，他们很快就被人群挤进

了楼里面。士兵遭到了殴打。一名士兵的喉咙里被插进了一个吃饭用的叉子。有一个士兵朝天开枪示警，枪弹被水泥顶棚弹了下来。在慌乱中也有士兵朝人群开了几枪。当天第比利斯死了21个人。

电报大楼发生的群众骚动显然是自发的，并不像某些人在莫斯科设想的那样。这里并没有什么事先的预谋。

冲进大楼的群众聚集在大厅，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他们寻找无线电台，想向全世界公布发生在第比利斯的事情。一些人给莫斯科发了电报，要求不要反对斯大林。还有人向莫洛托夫祝贺生日。电报大楼的事件导致军队的介入。宣布城市戒严。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夜。

那些天在第比利斯的街道上抓了数百人。那么克格勃在做什么呢？他们作壁上观？不。格鲁吉亚的克格勃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协助下很快地弄清了形势，抓了几个真正的闹事者，把其他的人释放了。他们写出了一份报告，分析了导致严重后果的原因。报告列举出确凿的事实作为证据，同时也没有放过肇事者。遗憾的是这份文件并没有被批准执行。

应该说，像这样未经中央批准便随机作出决定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主要的任务是释放那些受人调唆、代人受过的无辜群众，而这件事情做起来也是不简单的。中央的很多领导人想从我们这里听到的消息是，第比利斯有一个反对苏共二十大的司令部。有人威胁取消我们的党证，因为我们不分青红皂白释放了所有闹事的人。但是格鲁吉亚和莫斯科的国家安全人员在第比利斯顶住了压力，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难道说莫斯科就没有人想到，揭穿斯大林的暴政在格鲁吉亚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应该往格鲁吉亚派出有经验的宣传人

员，向群众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难道说这不是很清楚吗？我相信很多第比利斯的居民都能够理解二十大的决议，这种震动了整个加盟共和国的风潮和不必要的牺牲都是可以避免的。党的领导必须关注这样的事情。

国外对于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中国的人民日报强烈反对批判斯大林，对我们国内的某些共产党人表示支持。这篇文章引起了苏共中央的不满和不安。苏联领导人并不愿意使苏中关系复杂化，但是对中共中央的这样的文章又不能不予回应。于是赫鲁晓夫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讲话，对斯大林作出了正面的评价。他说没有人想整斯大林。谁也无法明白：一方面说斯大林是一个恶魔，而另一方面呢又说：没有人想整斯大林。而说这话的是同一个人，是党的领导人。这样的两面派做法引起了人们对领导的怀疑和不满。

在我们国家，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总体上还是受欢迎的，人们所不满意的是对群众隐瞒实情，甚至对一些公认的现象进行歪曲，而最主要的是，一方面在消除个人迷信，另一方面又在建立新的个人迷信。诸如斯大林时期的罪恶现象还在继续，同时如果你要求彻底与过去割裂，要求采取坚决的措施，你还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发生在第比利斯的事件对于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成了严重的教训。

1956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匈牙利事件。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对我国出兵干涉表示反对。我们国内开始酝酿一场学潮。

在那些日子里，我多次与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见面，与他们交谈。他们之中很多人对赫鲁晓夫不满，同情匈牙利人，反对苏联政府的做法。在群众大会上出现了不少反苏的标语口号。知

道发生学生动乱的不止我一个人。需要迅速采取某种措施。什么措施？逮捕大学生中的活动分子？但是经过和他们的接触我明白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一些不了解事实真相而迷失方向的人，于是我决定不能抓人。当时谢罗夫在匈牙利。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伊瓦舒金把一些局领导人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

“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他严厉地问道。

我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说，我相信这些大学生中的活动分子根本不是敌人。他们并没有触犯法律，逮捕他们是错误的。最后伊瓦舒金同意了我的意见。然而镇压的威胁还是存在的：苏共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要求这样做，他们责备克格勃无所作为。尤其是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波斯佩洛夫非常愤怒——国家安全机关中的某些工作人员也支持他。不过我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做法：避免了这次镇压。

---

---

## 亡党的反思

赫鲁晓夫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功不可没，还可以列举出他做的其他好事。至于一些人拿赫鲁晓夫时期建造的五层简易楼来调侃，我却是不赞成的。尽管这些快速建成的居民楼谈不上舒适，然而这是在住房严重紧缺的情况下建造的：成千上万户的居民老少几代居住在破旧不堪的房子里，还有的住在昏暗的地下室和筒子楼里。而一下子修建很多高标准住房，不仅建筑材料有困难，也没有那么多熟练的建筑工人。于是赫鲁晓夫决定修建一些简单的五层楼房，作为解决住房困难的临时性措施。这种楼房在全国范围内雨后春笋般地建起来。房子的确不是很好，但是多少户居民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居所呀！

此外赫鲁晓夫所主张的农业改革实验，即使在今天，经济界也是给予肯定的。无法理解的是，在战后重建的年代里，为什么要取缔农户个人饲养的牲畜，为什么要取消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的自留地。为什么把俄罗斯中部地区的数百万人迁往哈萨克斯坦去垦荒？

我认为，战后存活下来的中部俄罗斯的居民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重建自己的家园。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必花费力气学习哈萨克的文化，还可以踏踏实实地养活自己的俄罗斯了。

从赫鲁晓夫时代起，在民族问题上开始出现问题。由于赫鲁晓夫曾经长时间在乌克兰工作，和他一起在乌克兰工作的同

事对他很支持,从而他开始和他们玩起捉迷藏。他不断强调自己对乌克兰很热爱,一开始就穿上乌克兰的花衬衫,希望把玉米推广到北方,最后便是说上几句乌克兰的俗语或俏皮话。

赫鲁晓夫在干部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极其错误的做法。乌克兰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他们背着莫斯科更换干部,于是大批的各级干部便从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乌克兰的其他城市来到莫斯科和俄联邦工作。但是乌克兰几乎不接受俄罗斯的干部,即便是派往那里工作的克格勃干部,往往也被他们退回来。

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学校中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的制度被取消了。1957年之前,各加盟共和国的中学都开设两种语言:俄语和当地语言,这本来是很好的。赫鲁晓夫提出一套新的学习俄语的制度:俄语课变成了选修,而且并非各处都有。这就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在各民族文化之间产生了不必要的对立,其后果是使得各民族之间相互提防。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俄罗斯大民族沙文主义”或者说是把俄语强加于其他民族;每个国家都要有各民族的通用语言,而在苏联,这种情况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这就是不同民族的军人、政府官员和文化活动家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交际,这就是俄语。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也不存在例外。例如英联邦中的英语,德国的德语,都是本国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言,而且在这些国家里也生活着使用其他语言的民族。在苏联,赫鲁晓夫关于各加盟共和国学习俄语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有一次,赫鲁晓夫参加乌克兰的党中央全会。会开得很好,到会的有好几千人。赫鲁晓夫喜欢这样的群众会议,在这里不是进行具体的工作,而是发表空洞的讲话。不记得是谁在会议上用俄语发言。赫鲁晓夫打断

了他的话：

“难道说你不会说乌克兰语吗？你是在乌克兰工作呀！”

不难想象，参加全会的那些怀有民族情绪的人，特别是那些一直鼓吹“独立的乌克兰”的人们的内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赫鲁晓夫的这种片面性的代价是沉重的……

还有一次，在索尔莫沃召开了一个带有明显的挑拨性质的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冻结归还国债的决议。结果人民用他们的血汗钱购买的国债的归还期延长到 20 年。而 20 年以后，当决定归还这笔钱的时候，国家财政却已经不堪重负。

赫鲁晓夫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针对一些名人说侮辱性的笑话，与会者们往往热烈欢迎，他们喜欢国家元首当众责骂一些部委或地方的领导者。而赫鲁晓夫却以为这就是发扬民主。

谈到“冷战”，也不能不说到我们的失误。某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是正义的胜利，中止了十月革命的进程，恢复并继续了俄罗斯发展的历史，于是葬送了布尔什维克的实验。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无疑，30 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动摇了很多人对国家政策的信任。似乎 1938 年的 2—3 月由斯大林主持的中央全会曾经对“大清洗”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果斯大林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决议，国内的情势会完全不同。但是据我所知，全会的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斯大林忽略了另一次可以减轻他的罪责的机会。那就战胜了法西斯之后。如果他能宣布政治大赦，就可部分地减轻他对于 30 年代发生的一切所应承担的罪责。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今天已经很难解释这个问题。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斯大林本人的性格所致，不过很难想象，难道说一个人会故意把自己变成历史上的一个



刽子手？

在卡冈诺维奇临死之前，一名记者曾经采访过他。我这里引用他们的一段谈话。

卡冈诺维奇在回答记者问话的时候说：

“您自己判断一下，当时交通运输事故频繁，匪特横行。他们颠覆列车。难道说我们能听之任之吗？在这方面我们镇压了一批罪犯。当然其中也有冤假错案，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砍树的时候，总会有木屑飞溅出来。”

“就算是在运输线上消灭了车匪路霸。那么，图哈切夫斯基又怎么说？这是一位天才的将领，文化品位很高、意志坚强、颇具威望、有教养……”

“对呀，这位图哈切夫斯基自诩为拿破仑。一旦发生军事政变，军队肯定会跟着他……”

“他说过要政变吗？”

“我亲爱的，要想领导一个国家，就需要有远见卓识。把自己想象成拿破仑，他完全可能搞政变。”

这就是斯大林的主要原则。至少卡冈诺维奇是这样来推动他的：只要对谁产生怀疑，就把他干掉，甚至不必有确凿的具体事实作为证据。只要一个人很有力量、个性鲜明、很有威望，有能力号召人们，这就足够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斯大林的行为，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

不，斯大林所搞的“大清洗”并不在于受了某人的唆使。很多科学家、文化活动家、军官、党政领导人在“大清洗”中受到迫害，他也没有制止。而且他很清楚，这些人都是清白的，是有才华的，有的甚至是无限忠于党和祖国，忠于他斯大林本人的杰出人物。在战争年代，当国家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他把很多人从

监狱中放出来，委以重任。显然这些人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很难回答：为什么一个领袖人物能够信任一些人，而同时还要镇压他们——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兼容的？不过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通过我所从事的事业来观察国内发生的一切，我陷入沉思：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过程把我们的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暂且不谈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不想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试验到底有没有完成——这可以做专门的研究，我想说的是：假若国家的领导人对专家提出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建议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本来可以避免一系列的动荡。这里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党。冷战时期在美国人的计划中，对破坏苏联共产党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这是有道理的。

共产党并不是任何一纸总统令就可以“禁止”的。在更早的时候，当我们的党被迫搞经济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一个经济工具，而不是一个政治工具，从那时候起，党就已经开始丧失自己的真正意义。当时不仅发生了党与国家的融合，建立所谓的全民党，事实上党离开了自己真正的角色——放弃了领导国家并实施对国家的监督的责任，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卫国战争之前，党组织内没有管理经济的部门。尽管党参与了国家的活动，但主要还是从事党务和政治活动，所以把宣传机构作为党的最主要的机构并非偶然。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从属于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领导着工业、农业和文化部门。所有的苏维埃机构和国家机构，直到人民委员部长会议都服从党中央，党中央在实际上掌握着所有的执行权。在战争的条件下这是必然的。但是战争已经结束，党的十九大为国家展现了全新的前景。党代会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在国

家内的职能。现在,当你思考这一切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党逐渐地摆脱对经济管理。大会提出了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取消政治局,成立党中央主席团,主席团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名字,而最主要的是其中出现了很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如我们在当时说的——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党中央主席团共选举了 25 名委员和 11 名候补委员。

所有的一切似乎是走向一个方向:党即将回归到自己主要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上来,而经济工作将由政府来掌管。遗憾的是,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转变。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所有的事情还是按照原来的轨道运行。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了,第二天就成立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有 9 个人进入——都是十九大以前政治局的成员。候补委员也和以前一样变成了 4 人。后来党中央主席团又恢复了政治局的名字,但是党并没有从管理经济的角色中摆脱出来。全党的领导干部,从农村党委到中央政治局,都全力应付经济的领导工作。党很快就彻底地变成了一个经济管理的工具。党的干部在全社会的面前逐渐威信扫地。尤其是其中很多人对经济工作本来就是外行,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有权获得专家的称号,他们要求下级去完成一些明显不现实的计划,而对于失误和过错则要严厉地追究责任,直到开除党籍和追究刑事责任。而在这方面掌握基调的是赫鲁晓夫本人。

党的领导者不去完成作为政治活动家和群众发动者的工作,完全变成了经济管理人员。所有的人一下子就变成了玉米栽培方面的专家和宣传员,而这只能引起真正的玉米专家的嘲笑。党的领导干部带上农具,亲自下到田里,为推广“先进的耕作方法”作示范。与此同时军工企业几乎是强迫全国所有的知

识分子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过只是从国民经济中捞钱。

因此，在冷战时期，真正搞意识形态问题的只是少数的党的宣传干部，而这个责任往往又推给国家安全机构。

党的十九大的决议为全国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但是赫鲁晓夫所引领的道路却是死路一条。斯大林两次错过了恢复党的威信的机会。尽管十九大之后又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机会。赫鲁晓夫也没有利用，他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此。他的接班人也同样不是挽狂澜于即倒的角色，这便是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说我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不，我认为斯大林在历史上留下永恒的血迹——这是我的立场。但是既然要说实话，那就该是完完全全的实话，他在巩固国家方面作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历史不容篡改。

---

---

## 领袖身边的人

很多人都认为，领袖身边的亲信会对他施加很大的影响，往往很难辨别到底是谁在领导国家。我不想评论这个说法的是非，但是，无可争议的是，任何一个领袖身边的圈子，在国家的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很大的。

即使是斯大林，周围的亲信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怎么会这样呢？在斯大林周围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遗余力地设法实现他的意图。这支队伍也在为祸国殃民的个人崇拜问题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如何发生的，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呢？

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只有上帝才能给出答案。尽管也有不少人想过要解决这个问题。

克格勃在1968年提出一项建议，成立一个有权威的小组来研究个人崇拜及其产生原因和后果。建议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其中也包括政治评论家梅德维杰夫，他撰写的这个题材的书籍的手稿已经在莫斯科广为流传。

这个小组应该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工作。

专家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调查斯大林的罪行，这个问题早已说得够多的了，他们任务应该是对个人崇拜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大清洗”的根源进行分析。

当然原因有很多，我只想谈谈其中之一。众所周知，老革命

家秋鲁帕<sup>①</sup>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人。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流传甚广,那就是当他担任粮食人民委员的时候,几乎全国的粮食都掌握在他的手里,而他自己却往往因为饥饿寒冷而昏倒在地。但是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有趣的文件,文件的复印件是后来在消息报工作的秋鲁帕的儿子拿给我看的。这份文件实际上就是秋鲁帕交给政治局的一份最后通牒。那时候秋鲁帕身兼几个重要职位:其中有一个是贸易部部长——当时称为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我们所做的贸易是垄断性贸易,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真正确并不重要),但是总书记斯大林经常干涉我的工作。因此我要求他不要再干涉我的工作,否则我将辞去所有的职务。

文件上注明的日期是1925年,当时斯大林已经大权在握。秋鲁帕死于1928年,他并没有辞去任何一个职务,因此可以说,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也可能是秋鲁帕的这一举动帮助斯大林产生了外贸垄断的思想。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宣布这一点的时候,正是在接到了秋鲁帕的信件之后。

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斯大林周围的人都像秋鲁帕一样有坚定的原则性,那又会怎么样呢?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波斯特舍夫曾坚决地反对“大清洗”和逮捕老布尔什维克。但是斯大林身边的亲信并不支持这一点。还有些人怂恿斯大林对波斯特舍夫进行报复。

---

<sup>①</sup> 秋鲁帕(Цюруп 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70—1928)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曾与加米涅夫和李可夫一起作为列宁的三名副手之一。1928年死后葬于红场的克里姆林宫墙下。

在领袖的身边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一点特别重要。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这一因素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斯大林就是一系列的罪恶行径的创意者，其中包括“大清洗”、把已经受过惩罚的人重新流放、把大批的居民从故乡赶出去等等——尽管这些暴行不是由他亲手实施的。

斯大林把很多亲信派出去，让他们在边疆区党委、州党委的全体会上，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代会上“帮助”人们分析复杂的问题，并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

此外，这些特派员还领受其他的特殊任务。例如某些计划在伊万诺沃州是如何落实的。为什么一定是伊万诺沃州？其实作为例子，我可以举别的什么地方，因为在各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的脚本都是一个，只不过伊万诺沃州是一个位于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工业大州，我对这里的情况更了解一些。我本人是来自伊万诺沃州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80年代后期我经常到那里去，对当地很多党的基层组织非常了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大林把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sup>①</sup>两个人派到那里——而别的州派的都是一个人。我在伊万诺沃看了一些地方党组织的材料，下面的情况就是我通过这些材料读到的。

1937年，卡冈诺维奇在伊万诺沃州党委八月全会上作了开幕报告，会后报告的速记稿立即被毁掉了。但是从三天的讨论记录中，仍然可以得到对该报告的完整的印象。简单地说，他的报告内容是这样的：“人民的敌人混进了所有的地方，他们企图杀害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你们是政治上的瞎子，不能与他们

---

<sup>①</sup> 什基里亚托夫(Шкирятов М. Ф. 1883—1954) 苏联的党政领导人，曾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最高苏维埃代表。

进行斗争，没有戳穿他们，而从各方面看来，他们就在你们的身边。”

早在全会开幕以前，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已经准备好了讨论会上的发言。什基里亚托夫事先动员巴拉绍夫工厂的党委书记季莫米罗娃，让她作典型发言。她非常感谢卡冈诺维奇对她的信任，同时对揭露出州委书记叶帕涅奇尼科夫同志这个人民的敌人感到欣慰。

主席团里有人打断了她的发言：

“现在已经不是同志了！”

季莫米罗娃很害怕，她立即请求原谅并改了口，表示支持卡冈诺维奇。

“我们现在不是听到了吗，”她说，“人们已经变得如此敏锐……过去的这些人，可以说，现在已经不能认为他们是人……如果这些害人虫想要杀害我们的领袖，那么我们将要说不。拉扎里·莫伊谢耶维奇<sup>①</sup>，我们不能允许他们糟蹋我们的生命。我从来都没有杀过鸡，但是如果让我朝他们开枪，我可以连打五枪。我们不能允许有人伤害我们的领袖！”

接下来是尤里耶夫区的党委书记达尼洛夫讲话。他说城里的党组织已经不贯彻党的路线，他号召大家揭发人民的敌人。

“区党委的书记们，”他说道，“工作做得也不好，他们没有揭发出很多的敌人。”

达尼洛夫在发言的最后许诺，他一定会认真地工作，与敌人作无情的斗争。

---

<sup>①</sup> 拉扎里·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的名字和父称，卡冈诺维奇是他的姓。在俄语中，称呼人的名字加父称表示尊敬。



接下来是州警察局局长施莱德尔发言。

“卡冈诺维奇同志是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派来的！”他庄严地说道。

施莱德尔随后便高度称赞了莫斯科派来的特使的讲话，并对市委书记瓦西里耶夫进行了批判。他抨击市委书记瓦西里耶夫和人民的敌人来往，但是现在却和党中央的书记并排坐在主席团席上。

“我没有任何证据说瓦西里耶夫是人民的敌人，”他说道，“但是我愿意对他表示不信任。”

然后施莱德尔又指责原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局长斯特尔涅，说他抵制“大清洗”，似乎是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原来的一名成员科尔尼洛夫有联系，而科尔尼洛夫曾于1936年被指控与托洛茨基合作。科尔尼洛夫是一名老肃反队员，曾经参加过卫国战争，后来被开除公职，最后被逮捕处决。

在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的支持下，施莱德尔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又对其他一些重要的领导干部表示不信任。

马林科夫区的区委书记苏沃罗夫声称，州执委会的副主席谢马金于1928—1929年曾在全苏工会理事会工作过（几十年前的事情都想起来了），当时工会理事会的副主席是托姆斯基，而这位托姆斯基曾经反对党中央，反对斯大林。另外谢马金在全苏工会理事会内不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他当时是理事会党委的成员，甚至还是副书记，但是好像并没有听说他反对这位托姆斯基。苏沃罗夫建议开除谢马金的公职，开除出州党委。这个建议立即被通过了。

会议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其他人接着发言。领导干部在全会上是不能不发言的，因为沉默就表示不支持党关于揭发敌

人的政策。只要有人稍稍偏离这个主题，就会遭到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的粗暴呵斥，要求不要“说空话”，而要进行揭发，并且一定要指名道姓。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两个人不时地打断发言人的讲话。当州党委副书记亚历山大罗夫刚刚要为一位被指责工作不力的同志辩解的时候，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两个人马上就暴跳如雷。“你最好还是说说自己吧！”卡冈诺维奇说道。而什基里亚托夫怪腔怪调地说：“那么你都做了什么呢？”接着两个人一下子给发言人提出一大堆问题，最后终于把他给弄糊涂了。全会之后，亚历山大罗夫立即被撤职，罪名是“辜负党的信任，不能揭发人民的敌人”。

在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严格的控制下，所有的发言都依照他们的计划进行，那些在发言中揭发出“嫌疑”人的姓名的人受到鼓励，而那些企图把会议引向其他议题发言则被粗暴地打断。州警察局局长对伊万诺沃州委副书记瓦西里耶夫提出不信任，在这种气氛中瓦西里耶夫要求发言。

“同志们，”他说道，“当卡冈诺维奇同志作报告的时候，很难说我的感受，很难相信和我们并肩工作的那些人，尤其是像叶帕涅奇尼科夫一样的、和我们在同一机关工作的人竟是人民的敌人。我应该坦诚地说明真相：我作为一名副处长，和叶帕涅奇尼科夫、斯图平关系很好。如果说与反党路线有什么政治联系、有什么反革命性质的谈话和行动，我可以确信，这是不存在的，我不能想象，这不仅是想象，就是确信，这样的事实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卡冈诺维奇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他插话道：

“你们是政工干部，做自己的工作，因此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谈到世界革命的领袖、朋友和敌人，谈论到集体农庄、苏联的

经济、苏联的权利、法制和斯大林宪法，一句话，谈到的全是政治。奇怪的是，您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竟然会在全会上作这样的发言。您说和他们没有进行过政治性的谈话！好像你是一名修鞋匠，但是这位修鞋匠声称：同志们，我来到自己的修鞋铺，拿上锤子和钉子干活，干完活我就走。难道说您就是用这样的空话来应付党的会议吗？同时，奇怪的是，您甚至在自己的发言中没有政治内容。您说：“我为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发言担忧，担心这样的人会沦为敌人”。您怎么会在会上说这样的话呢——“很难相信”，您怎么会说“令我们震惊”……而在这一切之后竟然会说出这样的名言“很难相信”……”

卡冈诺维奇不再说话，显然是在等待着瓦西里耶夫的忏悔，但是当对方刚一开口，他又马上打断对方：

“您转移了话题。这是第一个问题。我重复了您一开始说的……您说，您‘听卡冈诺维奇报告的时候很紧张，因为很难相信这些人成了敌人’。您已经听完了卡冈诺维奇的报告，听完了。您已经听完了大会的辩论，就在这一切之后，您还声称‘很难相信’。我可以这样来解释您的讲话，虽然卡冈诺维奇说了很多，但是还是很难相信。我可以这样理解您的话。”

瓦西里耶夫完全被压制住了，他不再说话，然而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从主席团那边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先是什基里亚托夫，然后是卡冈诺维奇第四次询问。简直就是把人给打晕了——群起而攻之。

8月3日的会议就此告一段落，为了第二天接着进行：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需要培养新的发言人。当大会重新开始的时候，列别捷夫（速记稿上没有注明他的职务）发言。他的发言完全指向了瓦西里耶夫：

“昨天我们听了州委副书记瓦西里耶夫的发言。实质上瓦西里耶夫是不相信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他怀疑，他不相信州委书记叶帕涅奇尼科夫的罪行……我认为，瓦西里耶夫的发言是反党的，我提出一个他是否能继续留在党内的。”

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两名发言者的响应，接着又有几个人发言批判瓦西里耶夫。

从速记稿判断，这一切并没有使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满意。再次逼迫瓦西里耶夫上台。他的发言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受审判的人。瓦西里耶夫当即被撤去市党委的任职并被开除出党，大会结束时他被捕了。直到二十年后的1961年他才得到平反。

整完了瓦西里耶夫之后，再回过头来处理谢马金，最后定调的是卡冈诺维奇：

“我对你有一个印象，”他说，“当你在全总工会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应该挨打的人。我有这样的印象。”

这几句话就足够了。谢马金被撤职。这次全体会议总共撤掉了18个人，而这些人未来的命运已经决定。例如，州执委会副主席柯瓦列夫被开除党籍，撤职，会后被逮捕。

其他人也受到了同样的镇压。会上对瓦西里耶夫的发言继续讨论，又有几个人受到他的牵连。

当莫斯科的使者感到会议稍有偏离他们的意图的时候，什基里亚托夫便会亲自主持大会。由他来确定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发言，最后由他亲自发言。

什基里亚托夫的发言一开始便谈到他同意卡冈诺维奇对伊万诺沃州党组织形势的看法，号召党员与内部的敌人进行斗争。然后他又说，解除一些党的领导人的职务，其中包括伊万诺沃州

党委第一书记诺索夫,是非常及时的。

“诺索夫同志,”他说道,“作为党中央委员参加了上一次全会的工作。会上卡冈诺维奇同志作了关于铁路运输遭受破坏的报告。由于奥尔忠尼启则死去,由莫洛托夫同志代替他作了关于重工业部门遭受破坏的报告。斯大林同志也讲了话,苏共中央就此问题作出了决议……所有的报告,诺索夫同志从头到尾都听到了。中央决议中还具体地提到,敌人是如何悄悄地接近,不声不响地坐在你的身边……在斯大林同志在讲话中和大会的决议中都谈到如何发现敌人。诺索夫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会议结束后,党的组织在揭露敌人方面都做了些什么呢?本来这些敌人是可以找到的……周围都是敌人。”

斯大林的特使激烈地抨击州的党的领导和该州的党组织。他们号召认真地查找尚未暴露的敌人。然后卡冈诺维奇宣读了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建议由西莫契金接任伊万诺沃州党委书记的职务。什基里亚托夫建议由西莫契金担任第一书记,当时违反了党章关于要进行无记名投票的规定,只是进行了举手表决,此后西莫契金发表了颂扬斯大林的讲话:

“亲爱的领袖、可爱的朋友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你领导着我们的党和国家走向新的胜利!你敏锐的目光……”

接着还是卡冈诺维奇的讲话:

“现在我们的局(州党委)似乎是被取消了。只剩下了两个委员——柯瓦列夫和季里亚诺娃。有一个建议:补选州党委。我想,讨论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没有必要选很多人,应该物色人选。可以提出一系列的新人。因此有一个建议:现在已经有两个人,再补选三个人,总共五个人。这是一个特别的州党委,当前的情况也是特别的。在这里不得不稍稍地违反规定,用不

经选举的方法增补几个人进入州党委。尽管是违反了章程,但是制定章程的时候并没有预见到多数党委委员沦为敌人而被逮捕,因此这个例外是成立的。尽管有一定的缺陷,但是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可以批准。”

我想对于这样没有水平的发言(从速记稿中显而易见)根本就不值一驳。这证明了他们肆无忌惮地愚弄被吓坏了的群众,肆无忌惮地迫害干部。

他们粗暴地违反党章,践踏党的准则,不过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的目的达到了,那就是在他们离开之后,伊万诺沃州党委的主要任务还是揭露隐藏的敌人。新任命的党领导明白了,他们的政绩将由被揭露的敌人的数量来衡量。

全会新推出的州内务人民委员拉吉维洛夫斯基于1939年被捕,1940年因为制造假案被枪毙。

根据速记记录判定,还有很多的城市和区、州党委的会议都是这样进行的。

领袖周围的人的所作所为——这是制造个人崇拜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对个人崇拜的根源进行进一步分析,那么领袖身边的人起的作用更为恶劣,他们有时甚至会超越权限,代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处理国家大事。

斯大林死后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是对赫鲁晓夫本人也出现了个人迷信。那么这是谁制造出来的呢?那就是赫鲁晓夫身边的一批人,把赫鲁晓夫的亲信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最后形成了忠于总书记个人的一个小圈子。“光荣的十年”成为大凯旋。请回忆一下电影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吧!

与此同时,国内的黄金大量外流,用来换取粮食,肉价上涨,

一个经济萧条时代的基础正在形成。

当时贯彻的是一套地方干部原地不动的政策。也许在加盟共和国、州、区确实需要保存自己的干部，如果能够有一套避免出现问题的机制，这个思想也未必不是好事。地区党委、州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领导人数十年一贯制地留在本地，千方百计地巩固权势，结党营私。他们从自己人中挑选地方克格勃机构的领导人。尽管我们尽力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但是很少会有地方的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反对本地的领导人，甚至很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地方安全机关的领导人是地方官提拔起来的，于是尽管地方上出了大事，他们也不会很快地上报中央。

遗憾的是，战友几乎变成了围绕领导人的亲信这个概念的同义词。这也不是偶然的。战友——战争中权力平等的成员，具有发言权，但是他的意见可能与领导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战友是领导人很亲近的人，他们是帮助领导人正确决策避免误入歧途的人。他们的关系建立在保持独立观点的同志关系的基础上。

我们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范例。可惜的是，当领导人走上权力宝座之后，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意义上的战友关系若不是死亡，也会自动结束。当他获得重要的岗位，战友就变成了他的亲信。我相信这样的关系不只发生在我国历史的苏维埃阶段。

我相信，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他身边的人几乎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一些从年轻时代就认识勃列日涅夫的人证实，勃列日涅夫具有非凡的原则性，他公正、精明能干，据说他也很爱虚荣。

传说过这样一件事。当他还是州委书记的时候，有人来和

他商量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否应该逮捕一个散布反苏笑话的人。勃列日涅夫问他是什么样的笑话，那位“反苏人员”是如何散布的。原来有一个笑话是在排队买牛奶时说的，而另一个是在因为买了不新鲜的面包而发生争执的时候说的。

“没有理由逮捕这样的人，”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应该管的不是那些说笑话的人，而是那些供应不新鲜面包和制造排队现象的人。”

勃列日涅夫曾经主管过军队的政治处，有一次他对机关的人们说：“我们是政工人员，我们的武器就是言语。不过现在正在打仗，那么每一个人都应很好地掌握战斗的武器。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记住，没有机会补考。”

一个月之后进行了考核，政治处处长第一个通过，那就是勃列日涅夫。他五发子弹都打中了进十环和九环，还用反坦克武器射中靶子。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政治处的同志们证明了，他不仅具有组织上的权利，同时也具有精神上的权利来严格要求部下。

在他担任党的领导人的最初几年，并没有丧失一个领导干部的亲合力。但是后来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呢？当然，首先就是出现了虚荣心，正是这种虚荣心毁了勃列日涅夫。而总书记身边的亲信则是利用总书记的虚荣心来获取个人的私利。

记得有这样的一件事。那是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里。有一次，波德戈尔内、切尔年科和基里连科来到总书记的办公室，他们议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项建议：在勃列日涅夫生日的时候，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其中有一个表示不同意：

“换了我就不这样做。这个日子不合适，这不是某个大战役的纪念日或者是战争的纪念日。没有这样的先例。”



他话音没落就被打断了：

“那么难道说列昂尼德·伊里奇为和平所进行的斗争有先例吗？再者说，还有他为我们的军队发展所作的贡献……”

勃列日涅夫坐在那里，皱着眉一声不响，双眼看着办公桌。当三位马屁精都说完了，勃列日涅夫抬起头来，郑重地说：

“我一生只听从党中央的决定，这一次我也会这样做。就按照政治局的决定办。”

身边的亲信们争先恐后为勃列日涅夫的个人迷信作贡献，有时候竟会提出一些极其可笑的建议。

安德罗波夫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勃列日涅夫照例召见自己的“亲信”，当他从这些人的口中得到“确凿”的消息的时候，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是谁，只要他不能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讲话，那就要斩断他的行动。不过应该指出，勃列日涅夫本人并不是那种很残酷的人。但是他的亲信们会采取一定的办法唆使他，他与安德罗波夫的关系，很可能就受到了这样的影响。

有一次，鉴于勃列日涅夫一再地要求对几个人采取严厉措施，安德罗波夫回答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镇压很容易，但是这会影响您的声誉。还有别的办法——深刻地分析形势并排除那些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因素。”

假如当时只是对个人崇拜进行批判，而不是对斯大林的罪行穷追不舍；假如能够及时地制定出一系列保证集体领导的措施，避免个人独断专行，那么勃列日涅夫完全可以获得重生。

我只谈到了产生个人崇拜的一个方面。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新的领导人没有汲取个人崇拜的前车之鉴，它反而重蹈

了前任们的覆辙？

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大胆的想法：这里可能根本不是什么“重蹈覆辙”的问题，此时新的领导为了迎接新的时候和大变革的来临，需要拉帮结党，在身边组建起自己的亲信队伍？

这样一来，党仍然只是作为经济生活的组织者，而且越来越局限于一些经济领域，即便如此，也往往缺乏精通业务的干部。尽管必须承认，在个别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也能够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白俄罗斯党中央的第一书记马舍罗夫。他在战争期间（而不是战后）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在和平时期也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尽管我与马舍罗夫从未谋面，但是回忆起这位领导人来，我还是非常感动。

在他当政时期，白俄罗斯没有发生过任何动乱和动荡，更没有流血事件，这也不是偶然的結果。从波罗的海到远东，全苏联都知道他，尊敬他。而且我也记得，这样一个足以成为很多人的精神楷模、一位卓越的、无可争议的天才人物，并没有得到媒体应有的关注。

---

---

## 在政治局的会议上

我不经常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只发过三次言。那是当克格勃的主席（开始是切布里科夫，后来是克留奇科夫）不在的时候，我临时代替他们出席会议。克格勃还有其他两位副主席，所以也并不是每次都由我参加。

第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情形，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在1985年的1月或2月。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厅。很多人都从电影或电视中看到过这个大厅，并且已经相当熟悉。当时局势很紧张。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坐在会议桌旁。这都是名人——我和其中的一些人有过交往，另外一些人也在各种会议的主席台上见到过。

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说着常人说的话，不过他们说的是金口玉言，决定我们的全部生活。

我还记得，在那次会议上我支持亚美尼亚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杰米尔强的建议：邀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俄联邦的代表参加亚美尼亚民族遭遇大屠杀60周年的纪念活动。杰米尔强主张把4月24日定为共和国的哀悼日。在这个会议之前，这个问题已经在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了。

我认为这样的决议是必需的，哪怕是为了削弱一下此前在

亚美尼亚出现的反伊斯兰情绪。由于切尔年科生病，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对杰米尔强的提案表示反对的有吉洪诺夫、葛罗米柯等人，提议没有通过。

有两个情况令我吃惊：首先，问题并不在于提案没被通过，这种事情从前也发生过，但是在会议上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没有任何重要的结论，没有通过——就是没有通过。

其次，戈尔巴乔夫已经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示同意，而在这一次会议上他却一直沉默，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在昨天也曾经同意过这项决定，并把这项决定提交政治局会议。

我第一次感觉到，在最高权力机构中，等级是何等的森严。每个人都要熟知自己的位置。如果有政治局委员发言，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不能表示反对。我的这个结论不止一次地得到了印证。尽管也有政治局的某些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宣布保留自己的原则意见。例如，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马舍罗夫就是这样。多尔吉赫、齐米亚宁、卢基扬诺夫等人在多次会议上也有这样的表现。

我也曾听人说过，在戈尔巴乔夫临政之前，党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由苏斯洛夫主持。那时候任何问题的讨论都不超过5—10分钟，最多是20分钟。

据说安德罗波夫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要进行2—3小时。而且我也相信，因为他主持克格勃会议也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局会议完全不同：一般会议都从上午11时开到晚上8时，有时候还会晚一些。邀请很多人参加，每个人都想发言。当然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要求认真地讨论，但是诸如建立儿童基金这样的问题也要争论2—3小时，简直是不

可思议。

在接待室里永无休止地等待也是常事。那些部长、元帅、院士应召来到这里，他们往往要等上3—4个小时，但是等轮到他们进入会议大厅，他们的问题只讨论3—5分钟。

政治局逐渐失去了权威，主要是那里讨论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问题。政治局所作的决议多得不计其数，但是这都是一些非全局性的与群众生活关系不大的决定。

政治局的会议更像是基层党组织的会议，只是要吸收更多的人参加，要更多的人发言，至于那些发言本身，并没有人感兴趣，而且这些发言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没有丝毫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讨论问题的过程。遗憾的是，政治局的这种会风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越演越烈。

我还记得，从政治局的会场出来，走到伊万诺夫广场等汽车，此刻看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心头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丝沉重……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我们的政权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瘫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越来越清晰。党的领导机构正在丧失领导的功能，可是这种功能又没有移交给政府。

最高权力机关逐渐失掉自己的权威，而政治局的行为却越来越让人吃惊。当时我的头脑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而最多的是苦涩的念头。

使我聊以自慰的是：我自己所走的每一步都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也就是说，我走到这一步，纯属命运的安排。我一直是清醒的，我犯过各种错误，有些问题放在今天，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但是我可以坦诚地说，我从未做过昧良心的事情。

这些年工作并不轻松，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追求升官

的,有心怀妒忌的,也有的人只看到了正面的东西,却感受不到责任在自己肩头的重负。

---

---

## 亚·尼·谢列平<sup>①</sup>

1958年,谢罗夫·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突然被解职,改任为苏军情报总局局长,后来改任其他职务——普里伏尔加军分区司令员助理。他的军阶被降到少将,两年前还是大将。

很多人对这件事是这样看的:谢罗夫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赫鲁晓夫已经不再需要他了。不过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都是平调到其他单位,如果年事已高,就让他退休了事。为什么还要给予降级处理呢?这里好像有点问题……

确实,后来的确发现了其中的小伎俩,这是赫尔松·米龙诺夫少将一手制造的。这位米龙诺夫战争期间在部队服役,战后来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勃列日涅夫手下任职。

阿巴库莫夫被逮捕之后,伊格纳季耶夫主管克格勃,一大批党的干部被调进国家安全机关,其中也包括米龙诺夫。他当时的军衔是上校,职务是军队反间谍局副局长。人们很快发现米龙诺夫十分注意自己的外表,而且很想得到将军的军衔,显然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收集谢罗夫的材料——设法把他搞下来。米龙诺夫在莫斯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被调到列宁格勒担任局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位,而且工作也相当自由。不久他

---

<sup>①</sup> 谢列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958—1961担任克格勃领导。

又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现在整个克格勃都在他的股掌之间。米龙诺夫自诩为安全机关预防部门之父。依我看来，他走的路线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只不过他的目的是依此来实现自己的升官梦。

他曾经在克格勃总部和列宁格勒工作，后来又在党中央工作，在这一阶段我与他的工作接触很多。我们经常会谈起预警问题和其他的话题。不过，总的感觉是，他最为关注的还是自己的仕途，而且这一点引起了上级的不信任。米龙诺夫揭发批判谢罗夫在“大清洗”中的问题，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能感觉到：这里面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在米龙诺夫担任办公厅主任的时候，我和祖博夫同志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参加一次庆典。突然，米龙诺夫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

“我向你们祝贺，”他说，“谢罗夫的情报总局局长被撤了，被发到古比雪夫去了。”

他无法抑制自己，兴奋之情已经溢于言表。我和祖博夫很尴尬。艺术剧院的那个美好夜晚完全被这位官迷心窍的小子给搅了。

若不是他过早地死去（1964年10月米龙诺夫死于南斯拉夫的一场空难），他一定能够升到很高的位置——还不只是在克格勃系统中，在党内也是如此。米龙诺夫是勃列日涅夫线上的人，这条线上主要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共过事的党的干部。

谢罗夫下台之后，谢列平接替了他的克格勃主席的职务。当谢列平还是共青团员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在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的时候与他共过事，那时候他是总负责人。



谢列平是一个不错的团干部。有一点令我不解的是：他在莫斯科共青团委负责军事体育，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却一直留在团中央工作，从来没有上过前线。我认为，作为一名共青团的领袖人物，在这样的时期，一定要上前线。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在其他方面，谢列平作为候选人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他聪明、能干、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是著名的文史哲学院的毕业生）。他旗帜鲜明，办事利落，对人严格，坚忍不拔。在我看来，他完全可以胜任克格勃的主席这一职务。根据苏共二十大的要求，克格勃就是要由这样的人来领导。

我个人认为，谢列平最严重的失误，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对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且不只是对犯过错误的人，他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这一点使整个机关的人都感到不安。谢列平一下子把许多久经考验的、有经验的契卡开除，又从共青团组织调来年轻人填补空缺。而这些年轻人既没有生活的阅历，也没受过严格的职业培训，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是抱着个人升官的目的。一些人后来成长为真正的职业反特人员，其中就有列宁格勒分局局长舒米洛夫、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苏舒利任科，还有基辅市分局局长什拉姆科。

遗憾的是，被新任的克格勃主席调进来的人，多数是任人唯亲的结果，完全没有考虑他们的业务能力。

谢列平的第二个失误是，他从一开始就坚决地、竭尽全力地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机构设置。他无视科学的权威、无视有经验的职业人员，他相信自己了解一切。谢列平大刀阔斧地调任干部，改变克格勃的组织机构。

我并不想说克格勃的机构是完美无瑕的。不过谢列平所进行的改革的确实有欠妥之处。

比如说,他推崇 1953 年末伊格纳季耶夫推行的改革(斯大林死后终止了)。当时伊格纳季耶夫组建了苏联克格勃侦察总局,下设两个分局:侦察局和反间谍局。

有一件有趣的事:当时在 1952 年,刚刚被释放一周的皮托弗拉诺夫将军被任命为侦察局局长。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足为奇。罗科索夫斯基和其他曾经身陷“人民敌人”冤狱的一些军官,获得平反之后都曾在军队中出任要职。从监狱出来后能够不丧失自己的理想的人,必将效忠自己的祖国——这是斯大林所遵循的一条真理。

谢列平在 50 年代末到了克格勃,他决定创建一个新的克格勃机构。因此他取消了克格勃按经济、思想、运输等条块分工的局,组建起统一的反间谍总局。他的这个改革思想我认为是正确的,只是在操作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准备,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

谢列平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担任了克格勃主席的职务之后,对“上级的”指示一律照办——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的。换句话说,他对待下级很有原则性,很严格,而当问题涉及“当权者”的时候,那就全然不同了。

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有一次谢列平把我叫了去,他说:

“有一个物理学家要和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分享一份荣誉。他们好像是在一起搞一项研究。要想办法让这位物理学家退出去,因为谢尔盖·赫鲁晓夫一个人是可以完成的。”

谢列平要我约见这位物理学家。“这件事不怎么光彩!”我这样想,也就直接说了出来。

“我对您的意见不感兴趣!”谢列平打断了我。

我出来了。决定好好想想,先不要着急。毫无疑问,插手这

样的纠葛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我又没有权利拒绝执行命令。没有办法，只好服从，不过要好好想一想。

那位物理学家身体有病，我没有立刻去打搅他。两天之后，谢列平打来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不报告命令执行的情况。他对我的解释显然很不满意。

我了解到物理学家病得并不严重，征得到他的同意之后我来到他家。在饭桌上，我们谈起了他和赫鲁晓夫的儿子共同进行的工作。学者详细地说给我听。我明白在这件工作中，学者的贡献远比谢尔盖大得多。看来主人已经猜到了我此行的目的，他说，这件工作对于他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还正忙于另外一件更有意思的工作。而这件工作对于谢尔盖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愿意放弃这件工作。我们很友好地分手了。上午我打电话给谢列平，报告任务完成的情况。

“请进来！”

我走进办公室：他很紧张，显然是期待着我的说明。

“怎么样？”

“您的指示完成了。”

“他不是病了么？”

“我还是去了。您不是要求这样做吗？”

“您做了自我介绍？”

“当然。给他看了我的工作证，我作了解释。”

“具体地说？”

“我说，我想了解谢尔盖·赫鲁晓夫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他们共同的项目。告别的时候他没有不高兴，他答应不再争这项发明权，把它让给赫鲁晓夫的儿子。我坦率地对您说，谢尔盖·赫鲁晓夫肯定不会接受。”

谢列平笑了，我感觉到他的心放下来了。看来他一直在担心我的会谈结果。我相信这并不是他自己独出心裁，肯定是小赫鲁晓夫提出的要求，甚至可能是老赫鲁晓夫本人提出来的。

在我面前坐着一个准备执行上级交给的任何指示的领导，与此同时还要显得很有原则性。应该承认，他让我很失望。

一个领导人的威信是从何而来的，这威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人们都知道人无完人的道理，但显然，我们每每都会在无意中衡量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而谢列平需要经受检验的是复杂而矛盾的人性。

当时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刊登过的一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文章披露敖德萨捕鲸船队队长索梁尼克无法无天的行为。文章引起了政治局委员们的不满，其中有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敖德萨州党委书记西尼察，还有渔业部部长伊什科夫等人。准备对进行了客观报道的共青团真理报进行制裁。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谢列平一人持反对意见。斗争了几个月，最后要由党中央书记处作出决议。会议由勃列日涅夫主持，他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中间的立场上。尽管有人替索梁尼克辩护，最后他还是受到撤职处分。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无法否认。

要反对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需要具备很高的原则性和很大的勇气，而谢列平做到了。

还可以举出不少谢列平坚持原则立场的事例。其实他并不是那种唯命是从的人，尽管当他刚刚接手克格勃领导的时候确有这样的表现。不过在那次书记处会议上，无论是谢列平和其他人如何努力，也没能保住这位谦逊而严谨的共青团真理报的主编尤里·沃罗诺夫。此后他被派到民主德国担任该报的记

者。说好半年轮换,但是他在那里一住就是 14 年。

谢列平担任克格勃主席时期曾发生过几次群众骚动。居民使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国家安全部门没有思想准备,领导层一下子不知所措。第一次事件发生在弗拉基米尔州的穆罗姆和亚历山大罗沃。不记得那次事件的具体起因了。但是人们反对警察和党组织,指责他们贪污受贿、欺压百姓。愤怒的人群冲击了区党委和警察局,不过并没有波及克格勃分部和检察院。相反,极度失望的人群向克格勃和检察院寻求帮助。

还记得一件事,那是 60 年代初。在格鲁吉亚的城市祖格迪迪,一群年轻人组建了一个秘密团体,目的是反对一个无视群众疾苦、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的当地的企业领导人。克格勃接到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在祖格迪迪组建了一个反苏的地下组织。难怪这件事情引起有关部门的不安:如果这些年轻人的活动是正大光明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成立秘密社团,并号召与权力机关进行斗争呢?

于是产生了一个追究“犯罪”的责任问题。当时我和同事们对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首先考虑到的是,这些年轻人组建秘密社团的动因应该是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格鲁吉亚克格勃主席阿·伊瑙里,特别是他的副手卡其塔泽支持我们的想法。最后不仅没有处罚这些人,还让他们参加了共青团的监督工作。追究了当地企业领导人的责任。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全倚仗着二十大之后在克格勃乃至全国形成的大好形势。

克格勃经历了谢列平的改组之后,我出任了反间谍总局的一个处长。这里的工作很紧张,总是处于各种事件的漩涡之中,总是关注着政治生活,总能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乃至全世界的脉搏。

我们经常会见外国的记者，帮助他们了解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另外也从他们那里得到国外的信息。

很快我就感觉到，有很多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信息，上层领导并不重视。但是如果赫鲁晓夫一发表讲话，我们就忙得脚后跟朝前了，要了解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对他的讲话的反应。这是天字第一号的任务。同时并非所有的反应都需要——需要的是那些赞扬国家元首的反应。

\* \* \*

60年代末，在西方掀起了一个否定波茨坦协定的浪潮，报纸上出现了许多文章，主张重新审定波兰与德国之间的奥得—尼斯边界问题。外交部门料到这次浪潮肯定会导致的严重后果，于是开始动用间谍和反间谍系统的力量进行反击。

为这次浪潮推波助澜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媒体。于是我们想到了要对国外媒体施加影响。

我参与了这项工作。因此我们不断与各国驻苏记者接触。必须让他们认识到，重新划定战后欧洲国家边界，会给全世界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记者们为了获得信息也很愿意与我们接触，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向他们提供独家信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小心，要让他们明白我们相信国外的朋友，而且希望这样做是互利互惠的。中心话题就是绝不能允许重新划定欧洲国家边界：无论我们在何处会见外国记者，都要提到这个问题。

这样一来，很快在西方媒体上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坚决反对重新划定已经商定的边界。与此同时，外国记者中也有不少人不仅同意我们的观点，而且加上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原原本本地向读者介绍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样一来就为1970年

历史性的谈判准备了条件。

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有一座罗马 22 世教皇的纪念碑。这是为了感谢天主教牧首赞同波兰西部边界条约而建造的。有一次我站在纪念碑旁边，心里却在想着：这座大理石的建筑物也是对我的同事们的功勋的赞颂。为了坚持波茨坦协议确定的波兰西部边境线，我们在 60 年代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有了这样的想法也不为过。

我还想介绍一个当年的事例。实际上这件事与我们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在时间上与我所叙述的事情吻合，不过在我看来，这件事情还是很有趣的。

1960 年 4 月 12 日，是加加林上天的日子。全世界都在为他欢呼。莫斯科的青年们自然地集合起来举行游行。年长的人在家里也坐不住。这是玩笑吗，人类飞上了太空，还环绕地球飞行。

人们都想了解加加林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外国记者们把苏联的机关都围住了。外交部的出版部门没有什么可提供的——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的材料和其他机关一样，是塔斯社播出的干巴巴的生平介绍。显然对外宣传的事情全然没有准备。

我提心吊胆地来找军事反间谍部门的首长古西科夫将军。我说明了来意。不等我说完，他就已经明白了。他给了我一张佩带上尉肩章的加加林的二寸小照片。

“您可以使用，但是如果首长见怪，可别说是我给的。加加林被提升为少校，根据接到的命令——只能使用穿新军装的照片。”

几个小时之后，加加林上尉的照片已经传遍了世界，而外国

记者从哪里获得了这张照片——至今还是一个谜。谁也不知道,为外国记者提供照片的原来就是我。

我和加加林并不很熟,不过我有一件他送给我的礼物——一把小刀,我为此感到骄傲,那是他从印度洋上的某个岛屿上获得的,在赫尔辛基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赠给了我。

在这次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我有机会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的时间。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进行了16场演讲,有时是面对学者,还有一场是在推选联欢节小姐的舞会之前。每一次讲话他都能够找到恰当的话题。这不仅是才能,正如谢·科罗廖夫<sup>①</sup>所说的:加加林的说话才能乃至他本人,都是天生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离开一个见面会的会场,前往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我和代表团的团长谢尔盖·帕夫洛夫坐在前面的警车里,后面一辆车里坐着加加林。谢尔盖突然想到要去一趟新闻中心。时间还早。加加林被请进大厅。大厅里挤满了人。此刻加加林还不知道在他面前的不是外国记者,而是临时聚集起来的本市居民。他按照原来准备的开始讲话,就像面前坐的都是外国记者。

我递给他一张纸条,说明了会场的情况。他读过条子之后,便从容地改变了话题,就像是专门为这次会见而准备的。真的令人惊异。事后他请求我们,再也不要让他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了。

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在塔什干接待印度总统巴哈杜尔和巴基斯坦的总统阿尤布汗。柯西金作为中间人讲话。当时

<sup>①</sup>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оролев)生于1907年。苏联著名火箭制造与航天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曾获列宁奖。



印巴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一触即发。

负责接待记者的一个组和外交部的人员前往迎接地。负责新闻报道的是聪明的扎米亚京。

第一天过得很紧张，甚至这种紧张气氛还有所升温。无疑，印巴记者之间的不和也使扎米亚京很为难。他突然想到一个办法，组织一次友好的宴会，彼此进行友好的交谈，以此来冲淡这种紧张的冲突气氛。好客的乌兹别克人帮了大忙。他们准备了手抓饭。这是很棒的手抓饭！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美味。

坚冰融化了，气氛扭转了。新闻界的报道变得缓和了。这对整个会谈的结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贯很少夸奖人的柯西金也对我的同事们表示了感谢。

\* \* \*

1961年谢列平推荐我担任反间谍总局的副局长。当时的局长是戈里巴诺夫——这是一位坚强的职业反间谍人员，人很勤快，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懒惰。

在反间谍总局领导的岗位上，我有很多的收获。在这期间曾经逮捕了几名外国的间谍，他们以旅游之名，受到外国大使馆的庇护。佩尼科夫斯基案件轰动一时。这是首次揭穿英国和美国间谍机关派出的如此高级别的特务。佩尼科夫斯基上校在苏军侦察总局任职，与此同时他在苏联国家科委担任相应的工作。他与军队和国家机关的高层干部都有着很好的关系。英国人利用他对高官厚禄的追求，雇佣了他。佩尼科夫斯基自视甚高，他也不掩饰对自己职务的不满。一般的平庸之辈都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天才。佩尼科夫斯基用叛国活动来填补不能满足的自尊。一些细节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在反间谍机构的工作极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而与外国驻苏联各类代表人物的

接触,使我更深刻地了解外国的政策,因此工作起来就能更加准确和有效。

1961年10月谢列平调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很快就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于是他手中的权力大了起来。

这就引起了勃列日涅夫周围亲信们的不安。有传言说某人某人支持勃列日涅夫,而另一些人支持谢列平。我想,尽管谢列平有很多缺点,但是他的博学和勤奋还是会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好处,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实现。

---

---

## 弗·谢米恰斯内

谢米恰斯内·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sup>①</sup>取代了谢列平，当上了克格勃主席。我们从战争时期就相识，当时我们两人都从顿巴斯向西伯利亚撤退。我住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直到上前线之前，我一直在担任共青团市委第二书记，而谢米恰斯内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安热罗—苏真斯克担任团市委第一书记。后来我上了前线。

战后谢米恰斯内回到顿巴斯，担任共青团斯大林州委书记。后来他被调到利沃夫担任第一书记，再后来被选为乌克兰团中央书记，接着便是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

一般来说，团的干部到一定时候就会转成党的干部。谢米恰斯内也是如此。他担任了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二书记，从这个岗位调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谈起过在西伯利亚共同生活的经历。当时我担任反间谍总局副局长。当有人把我介绍给新来的克格勃主席的时候，他只是询问了我到克格勃之前的经历。接着我们就谈起了工作。我认为，谢米恰斯内根本没有看过我的档案材料，或者不想回忆起很早以前在西伯利亚的那一段生活。我

---

<sup>①</sup> 谢米恰斯内·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1961—1967年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

觉得没有必要和他重提从前的那一段经历：这样可能会遭到误解。因此只是多年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我们才重提此事。

谢米恰斯内具有丰富的政治领导工作的经验。有人说他的工作方法单调，但是我并不这样理解。他能很快地了解到你的想法，提出合理的建议，很容易就和你谈到一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应该说，他对待专家们是很认真的。尽管他对机构也作过一些变动，然而没有动过大的手术。谢米恰斯内虚心听取同事们的意见，如果大家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不会坚持自己的决定。当然也有一些人利用他的信任，把自己并不十分恰当的想法塞进去。尽管谢米恰斯内是一个讲求原则的人，但是我认为，他有时候过于轻信。

记得当时晓洛科夫担任内务部部长，而谢米恰斯内在和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谈话的时候，毫不掩饰对晓洛科夫出任这个职务的强烈不满，他说晓洛科夫是一个不称职的人，他所以平步青云，全仗着勃列日涅夫的庇护。

在担任克格勃主席期间，他时常会向党中央提出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建议。他与谢列平不同，他对西方国家特工机构的威胁更敏感，因此他要求更加注意情报背后的阴谋和实施计划。遗憾的是，他往往并不能获得党中央的支持。

应该说，他的命运并不是十分好。显然，他比较年轻，这给他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干部年龄都比较大，而突然来了一个共青团员，毛头小子。他处于各种阴谋的包围之中。勃列日涅夫的支持者们相信谢列平觊觎总书记的位置，于是便把这种猜测灌进领导人的脑海里。谢米恰斯内被认为是谢列平的人，因此他一定来自敌对的阵营，于是这个人便是不受欢迎的。克格勃的分支机构中有不少来自乌克兰的党的系

统的干部，他们觊觎更高的领导职位，于是在他们中间有一种对谢米恰斯内不信任的情绪。他们依仗着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成功地施展着各种手腕。

而实际上他也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1967年，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去了印度。并没有人怀疑她去印度的原因：她把丈夫的骨灰送回祖国。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谢米恰斯内也是一样。但是对斯维特兰娜此行必须进行协商，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同意批准斯维特兰娜出国。

众所周知，斯维特兰娜再也没有回到苏联。关于这件事情至今还有不少传言，我不想引用那些无稽之谈，我在这里只写出我所了解的事实。斯维特兰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已经写出了事情的原委。我想，她所以作这样的决定，是受到了情绪上的压力，更主要的是她所受的侮辱。1967年3月5日她来到苏联驻印度大使馆，她手里拿着3月6日飞往莫斯科的机票。她见到了苏联驻印度大使韦涅季克托夫，甚至还和他一起吃了饭。3月5日是他父亲的祭日，但是没有任何人对她作任何表示。无论斯大林是怎样的人，但毕竟是她的父亲。斯维特兰娜孤身一人，心绪苦闷，当天夜里她就到了美国大使馆。

那些本来就对谢米恰斯内心怀不满的人们赶忙利用这一事件，指责他丧失警惕——似乎他本不该放斯维特兰娜出国。于是谢米恰斯内被免职了。

谢米恰斯内能够不放斯维特兰娜去安葬自己的丈夫吗？如果他这样做，那就势必引起人们的义愤——而且不只是国内。可以设想，那样一来，会有多少人指责我们没有人性，指责我们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更何况事前谢米恰斯内还与立法机关

和执行机关的领导人进行了协商。那么为什他还要遭遇这样的惩罚呢？

假如这样的事情只是一个特例，我也不会把它写出来。有多少有才干的聪明人代人受过、遭到惩罚而被置于死地？

1967年谢米恰斯内被调任乌克兰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并没有因此而心灰意懒，他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努力工作，为自己赢得了威望。

谢米恰斯内返回莫斯科以后，我们在会议上见过了几次（他担任知识协会副主席），也一起参加过一些代表大会。

最近几年我们经常通电话。说实话，我并不喜欢他对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回忆。这些回忆并不是很客观的。不过我想，此中包含着他很久以来承受的委屈，不过对他的一些说法也是无法接受的。尤其是他曾经写道，似乎勃列日涅夫曾经和他谈论过从肉体上消灭赫鲁晓夫。当然这已经是纯属臆造了。

我认为，既然一个人身居高位，他就不该随意地谈论那些因为他所在的位置才能知晓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会经历很多的谈话……我想，高的地位要求一个人能够对很多事情保持沉默。向社会散布耸人听闻的消息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不希望一些没有根据的传言作为事实被历史所接受。

如果要评价谢米恰斯内在克格勃那一时期的工作，那就不能不承认，尽管他有不少的缺点，但是他对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还是做了不少的贡献。

请读者不要在我对一些人的评论中寻找矛盾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的品格都是复杂的，都是矛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同一种现象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而且很多事物都要重新评价。会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的时候，尽管他

的内心深处并不同意,但是他明白对抗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表示他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虚伪的家伙。但是当他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的时候,他还会采取果断的行动,尽管这样做会冒很大的风险。

---

---

## 安德罗波夫

1967年5月，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此时尤里·安德罗波夫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

我是在上班的路上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翻开报纸，第一版上就有关于他任命的消息，最后一版上刊登着免除谢米恰斯内职务的消息。

我不能说这个消息让我高兴，因为我对安德罗波夫并不了解，我没有和他接触过。

此时克格勃内部的状况很复杂，也很紧张。这种情况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工作的问题和国内的局势，遗憾的是，这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我当时明显地感觉到，争权夺利的倾向十分危险。来自党的系统的干部是为主的一派，他们大多是1951年阿巴库莫夫被逮捕之后来到安全机关并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的。他们认为自己在安全机关已经工作了十五年左右，已经是业务能力很高的契卡人员，应该担任更高的领导工作。他们对于新来的人员，主要是从共青团系统来的人员不满意。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为年轻人打开了通向侦察和反间谍部门的领导岗位的大门。从党的系统来的“老头子”们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力。谢米恰斯内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取决于这种情况。

那些职业的国家安全人员的日子不好过。虽然他们承担了



整个机关的主要工作,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不信任。新的主席会怎么样呢?安德罗波夫到来之后,从党的系统来的那班人首先跃跃欲试,表示对新领导的忠诚,争取新领导对他们的信任。而实际上他们追逐的都是个人的私利。

当时的克格勃系统中有三个主要业务部门:侦察、反间谍和军事反间谍。反间谍部门的领导刚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该部门的一名特工人员诺欣科被派往瑞士工作,结果一去不归。在安德罗波夫到来之前,反间谍部门在经验丰富、受人尊敬的班尼科夫局长的领导下干得很好。这个总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是最主要的部门,它的工作目标明确,反间谍的工作得到了加强,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战术基础。当时在总局的领导之中,除了一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工作自觉而认真。新领导的到来首先要求结束那些陈旧过时的工作方法,加强分析性的工作,制定出一套新的反间谍系统的组织原则。并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拥护新的制度,不过还是有一些积极分子。

在共同的努力下,一个新的局组建起来了,局长由经验丰富的费多谢耶夫担任。这个局的人员很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一个地挑选的。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组织分析局,一个在高级克格勃学校里成立专门的教研室的设想逐渐成熟:教研室的任務就是培养情报分析人员,尽管我还说不清,我们的工作能否得到普遍的支持。大多数业务干部和领导干部都把分析工作看做次要的,他们更看重直觉和经验——尽管每个人的直觉和经验各有不同。

在很多的国家机关里,克格勃也包括在内,都形成了很坏的习惯:任何事情都要向领导汇报。而分析工作则需要一定的时

间对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这样一来无疑就妨碍了最快的汇报和决策。

很快我被调到第5局工作，我不得不与和自己研究的成果惜别。但是我一进入新部门，马上就开始组织信息分析机构，而且这一次没有受到同事们的质疑，因为他们也明白，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目前我们国内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因为西方的特工机构已经把这一点当做自己的赌注。必须时刻把反间谍机构得到的关于敌人的阴谋及其在我们国家的活动情况的情报与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比较：谁也不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需要向领导报告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其中不仅有敌人严格保密的，还有在公开的宣传活动中所包含的。

安德罗波夫到任之后，反间谍工作明显地加强了，提出了关于解放巴尼科夫的问题，也谈到了撤换其他工作人员的问题。我感觉到我的头上也阴云密布。有人说我是谢米恰斯内的人，还有人说我是以前的领导线上的人。这种信息也传到了安德罗波夫的耳中。一天电话铃响了——安德罗波夫叫我去见他。

我看了看表：22点整。这一天的工作很紧张——处理克里米亚鞑鞑人的问题。心中闪过了一个念头：“最好把这次召见推到明天！”

安德罗波夫很平静。他请我坐下，询问了我工作与生活的情况，还问我最近机关里有什么事情，了解我对国家安全系统的发展前景的看法，还有对国家的总体形势的评价。

我们谈了很久，很客观。我谈到了西方国家对我们压力的增强，而我们并不是总能给与足够强有力的回击，对此我感到忧虑。

安德罗波夫突然提出，让我出任新组建的反思想破坏局的第一副局长。

“从各方面看来，我不适合担任反间谍总局的工作，”我说，“看来，我必须同意您的建议，否则我就得走人……”

安德罗波夫请我谈谈对于组建新的机构的看法。我担心，会不会重蹈以前的覆辙，新局会不会成为原先的那个秘密政治处的翻版，而秘密政治处所做的事情是对付国内政治上的反对派，而这项活动在最近十几年来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安德罗波夫说道：

不是的，新组建的局不是秘密政治处的翻版，说道，这个局是基于目前局势而建立的。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立场坚定，有决心巩固苏维埃国家，而我们的思想战线上的敌人竭尽全力破坏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法，看到国内的形势，了解人们的情绪，这很重要。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渠道：既要利用合法的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出版的信息，也要利用我们的特工机构。除了那些表面文章，还有秘密的手段，而我们的机关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例如，今天我们处理克里米亚鞑鞑人的问题。你看到了一方面的问题。而那些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并不了解所有的秘密因素，他们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学会了解并认识内部的深层的过程非常重要。我认为，新组建的局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的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新组建的

局应该抵制从国外来的思想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肃反队员的工作方法在这里是很重要的。

我想：“肃反队员的工作方法”？他指的是什么呢？”显然这里指的是建立特殊的政治反间谍局。安德罗波夫并没有隐瞒，组建这一个局的想法受到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启发，而他本人当时正是苏联驻匈牙利的大使，他作为匈牙利事件的目击者，在布达佩斯亲身经历了这个事件。很多人对于肃反队员的工作方法很反感，原因是他们把肃反队员看成了“政治密探”。

这就是那个晚上进行的谈话，这场谈话我无法忘记。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那就是不能采取鸵鸟政策。要么是我们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国家和政权，要么是用空话来搪塞。

国家安全机关的基本功能就是保卫国家的宪法制度——不是保护那些掌权的人，而是保护国家的根基。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在其他国家里是如何保护的。我不知道在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卡片箱里储存着多少人名，我也不知道在他们的反间谍机关里有多少特工人员，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任何国家的特工机关都会对国内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并且要对威胁国家制度的情况发出警告。

很多西方国家都会对某些居民群体进行经常的监控，例如外国的侨民。比如在法国，当一些高层人物来访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些“不可靠分子”送到科西嘉岛上去。

很难设想，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派人卧底，它又是如何了解美国共产党的情况呢？

那么这些事情由谁来做呢？当然是反间谍机关。这是所有国家都公开存在的政治机关。就是政治性的，因为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对形势进行政治监督。因此“政治密探”这

样的说法,是对国家极其需要的一项工作的歪曲,就是把合法的行为与不合法的行为之间画上等号。

我只是框架式地解释了安德罗波夫对于一个新局的任务的思考,不过当时我明白,他对国家安全系统的改组已经进行了深刻而认真的思考。当我明确了他的计划的主要含义之后,我断定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工作。稍作思考之后,我答应了。

安德罗波夫对我谈到了他对该局领导的任用意见。不久之后,原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党委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卡德舍夫来到我们这里担任局长,而我就成了第一副局长。至于其他的副局长,我提出了两个候选人,安德罗波夫也提出了一个。我没有表态。他再次重复了这个人的名字。我还是没有作声。

“看来,”他说道,“你不同意我的建议,要么就是不愿意对这个候选人进行讨论?”

“就是反对。”

“你对于即将和你一起工作的人有什么看法,总之,你到底有会有什么看法呢?”

“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sup>①</sup>,如果您在半年之后召见我,我会说出我的观点,不过今天我不能给他做鉴定。现在有很多人找您,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也有人想表现自己,贬低自己的同志。因此暂时我还不想给他做结论。半年之后,您会看到很多,那时您也会形成自己的意见,会得到更多的信息。到时候我会告诉您我对几位同事的看法。”

安德罗波夫笑了笑,也不知道是赞成还是讥讽,但是他接受

---

<sup>①</sup> 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和父称。俄语中这样称呼表示尊敬。

了我的条件。确实在半年之后他打来了电话：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让我猜一猜。”

“你过来，我们聊聊。”

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用了很长的时间给我讲述关于组建新局的想法，他强调说这里的工作将是很有趣的，他让我起草一份新局的“规章”，当时把这个局称为第五局。

“那么，我们就算谈定了”，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

我抱着巨大的希望开始工作。为了更好地理解安德罗波夫的生活立场和主要原则——也就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应该作出某些让步。

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个看法是，似乎我们国家错误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另一种意见则是我们背离了列宁的道路。历届党的领导人——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都是披着列宁的外衣，口头上喊着忠于列宁思想的口号，在实际行动上则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越来越远。

我在这里不想对这两种看法进行辩论，不过我想引用一个文件——1921年列宁起草的党的九大的决议。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

9. 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实现更加广泛的批评，这包括对地方机关，也包括对于中央机关。《通报》委托中央委员会对在全体会议上扩大党内批评的方法作出指示。组建出版机构对党的错误开展更加系统广泛的批评，开展一般的党内批评（辩论专栏等等），为此在《党中央通报》中建立专门的辩论专栏。希望在省党委通报中也开辟这样的辩论专栏。

……决不允许对在各种问题以及党的决议上持有不同看法的同志进行打击。

列宁特别强调对党进行最广泛批评的必要性，号召在各种出版物和会议上指出党的错误。

在列宁死后发生了什么呢？列宁的学说变成了教条，更不用说批评各种错误了。“党的任何决议——都是伟大的列宁预言的里程碑！”不幸的是，对于这种概念上的偷换，没有人敢于拆穿。即使是大多数那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反对的也只是党的政策中的个别偏差，而不是列宁的道路，他们只是证明被歪曲的部分的错误之处。

下面引用另外几段俄共(布)九大决议：

16. 必须责成每一个负有责任的党员毫无例外地完成党的工作(党的工作,而不是业务工作),这首先是在无产者、农民和红军的基层,为此每一个负责的党员,不论职务的高低,都必须成为工厂、农村或者是红军的基层支部的一员。他们必须出席党的会议,报告自己的工作……对于参加义务劳动的时间,不仅应看做一种直接的业务成果,更重要的,应该把它看做是在每一个党员在必须尽到党的义务的基础上,为巩固党内团结所作的努力。在有适当的理由的情况下,只有党的区委员会才有权决定免除党的负责干部的某项义务。

于是规定了党的主要任务——那就是党的思想、宣传和解释工作。在列宁的很多文件中多次强调了这一思想,而且在开始的时候也在行动中得以贯彻。但是很快列宁的原则就被篡改了,党一头扎进业务工作中去,而忘记了它最主要的、唯一的职能。我们所走的是另一条路,这根本就不是列宁的道路……

17. 担任负责工作的工作人员——党员没有权利  
获得作为奖金和加班费的个人工资。

这些列宁学说的狡诈的“信徒们”，公然抹杀了列宁的遗嘱，厚颜无耻地对他的遗嘱加以谩骂！

斯大林之后又是如何呢？赫鲁晓夫来到各个企业、各地区的时候，受到了高层次的接待，接受贵重的礼品和昂贵的“纪念品”！在全国范围内兴建桑拿、“垂钓、狩猎屋和海滨小楼”——他们这样称呼“国家别墅”！

为了逢迎上级，这些的官吏们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在自然保护区里举行极少数人参加的“皇家狩猎”，周围布置大批可靠的警卫。

而后这些人登上讲台，大言不惭地宣称，说什么他们正引导着国家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这种虚伪的表现一直持续到改革之前。遗憾的是断而不绝，旧的结束了，新的又开始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修建的已经不是楼舍，而是成片的宫殿。

除了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之外，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奉行了这样的原则。我认为，他们两个是为数极少的、希望把国家引向列宁道路的苏联的领导人。

请相信，我写这些的目的不是泄私愤，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诽谤。我拥有确凿的信息，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分析，我确信：党的领导在决定我们生活的根本问题上，仅仅在口头上坚持了列宁的道路，他们引导着国家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不，用社会主义的原则组织生活并不是错误——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数十年来，国家的这条大船上逐渐长满了贪污腐败和利欲熏心的毒瘤。这些毒瘤是我们通向进步道路上的障碍。安德罗波夫曾经企图从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清除这些毒瘤。他



曾经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提出务必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他的文章的主旨并不是要拒绝社会主义道路。

腐败、虚伪，公然的阿谀奉承在高官阶层中产生，这种腐败之火，燃遍了各个阶层。出现了一场真正的竞赛：看谁善于对最高领导阿谀逢迎。在格鲁吉亚，勃列日涅夫收到了极其贵重的礼物（据说是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接着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便奉献更加贵重的礼物。

而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们收到的礼物的价值就相对低一些。乌兹别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拉什多夫在“家里”接待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的时候，送给基里连科的妻子和女儿两件用十分珍贵的卡拉库尔裘皮缝制的皮大衣。高官中还有一些古董的爱好者。

我不能说大多数党的干部都这样做。其中也有不少清廉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道德原则是最高的。然而遗憾的是，恶劣的风气已经使这些党棍们获得了恶名，所以我特别为党、为了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感到心痛，因为他们并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他们诚实地为祖国服务。

各种迹象表明，腐败之类的社会的恶习在全国各地盛行，在个别的地方已经形成风气。现在我不想说在边远的地区正在发生什么，不过中央已经作出表率。我们在调查这类案件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在最高领导层中的确有人起到这种作用，其中包括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

有一次我们查处了一起向国外盗卖圣像的案件：嫌疑人向国外走私大量的珍贵物品，案件涉及巨额资金。苏联内务部特别重案小组的一名侦查员受命处理这个案件——在车里雅宾斯

克的那一阶段。他仔细地研究了圣像，进行了记录，还把特别珍稀的那一部分挑选出来。

他的某些行为引起了怀疑，似乎他在某些方面与此案有牵连。决定冒险对他进行搜查。得到了检察官和内务部副部长舒米林的同意之后，我们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和住处，发现了被盗窃的圣像。原来一部分圣像是专门为晓洛科夫准备的，因为他已经确信，一旦事情败露，部长会出面保护他。

那么，晓洛科夫又如何呢？他沉默不语，似乎此事与他毫无瓜葛，他甚至对在奥加列夫大街6号的内务部大楼里进行的搜查也没有任何反应。

安德罗波夫把发生的事情向勃列日涅夫作了汇报，事情到此结束。

到处都在议论苏联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在某些加盟共和国里还有用金钱买党票的情形。我记得有一次，在巴库和盖达尔·阿利耶夫谈过话，三年前他被选为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应该说他打算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我问他在这方面是否已经有所作为，他回答说：“我能够担保的只有一点——阿塞拜疆的党中央机关不收取贿赂。”

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人一再地提出与经济领域犯罪现象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在全苏联的各种会议上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很多加盟共和国内都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在莫斯科也到处都有这样的现象。腐败现象的病菌侵蚀着政权，党在群众中失去威信。

自然，在整个克格勃机关里，也包括在我们五局也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个话题。腐败现象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很多心底里希望结束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在反对腐败的旗帜下联合

起来。要求授权克格勃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遗憾的是无人理睬。而且这个斗争也有很大的困难。尽管国家安全机关竭尽了全力，应该承认，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

莫斯科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界，设想创建一个反对腐败现象的社会委员会。一个非官方的独立组织，利用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可以在铲除中央与地方的腐败行为方面做很多事情。但是在高级领导当中，立即有人对这样的想法警觉起来：最好不要与知识分子们搞到一起，谁知道他们会走多远呢！

与安德罗波夫商量之后，我们立即就此问题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具体的建议。铲除腐败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广泛依靠各种力量。我们认为，党中央应该发表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除了指出腐败现象的严重危害之外，还应该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另外还应该建立起一个监督体制。安德罗波夫签署了这份文件。

像往常一样，建议被搁置了。这封信在党中央的各个部门之间辗转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效果的死文件。唉！每一次都是这样，一些好的建议经过党中央的中间环节，即使是最好的决定也会被践踏，一些最好的计划变成泡影。此外，这些“公仆们”担心，揭发腐败现象会涉及最高领导层。

关于高层领导贪污受贿的故事到处流传。到处都在谈论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在阿穆尔州漫游的故事，谈论她对贵重物品和礼物情有独钟。故事的深层还有自己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

今天有很多事情令我吃惊。揭发党政领导干部中腐败现象的运动，对于现政权取得胜利的作用不容小视。但是就是在“民

主派”执政期间，不少来历不明的百万富翁获得了生存的权利。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靠合法的手段获取了巨额资本。很多人的产业是靠改革之前所进行的地下经营取得的。

黑恶势力的犯罪活动成了 20 世纪末的现实，这种活动蔓延到所有的国家和每一个大洲。在一定的时期之前，苏联还是没有受到这场灾难的硕果仅存的绿洲之一，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限制了黑恶势力的产生。不过也没有最终制止住这场灾难。

“掌握影子经济的人们”往往会把掌握政权的人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鲁吉亚克格勃主席伊瑙里说过这样一件事：

“我是出国人员审核小组的成员之一，一份到欧洲进行旅游的名单交到我的手中。在这个名单中我看到了区委书记的名字。他从哪儿搞到这么多的钱呢？我仔细查看了名单，哦，其中还有区消费协会主席，一个不可救药的流氓的名字。于是我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我想他一定会控告我，但是并没有。接着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区委书记也退出了。这样一来就清楚了，原来他的旅行费用是从这儿来的。”

安德罗波夫不能容忍各种腐败现象的表现。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件事。

安德罗波夫是 5 月份到任的。前一年 12 月份刚刚纪念过国家安全机构成立 50 周年。副主席茨维贡深谙巴结领导之道，便给新上任的主席家里送去一箱白兰地。茨维贡到中央工作之前是阿塞拜疆克格勃的主席，从那里得到白兰地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安德罗波夫的夫人塔季雅娜接待了送礼物的人。

“请转告谢苗·库兹米奇<sup>①</sup>”，她说道，“安德罗波夫不可能收下这些白兰地。你把箱子搬回去吧。”

这件事情被宣扬出去了，从此那些打算给安德罗波夫送礼的人再也不上门了。大家都知道，在克格勃的中心俱乐部里有两个房间，那里放着安德罗波夫在各种节日收到的礼物，有国家领导人之间交换的礼物和外国友人的赠品。所有的这些贵重的物品都陈列在柜子里，作为我们的陈列馆的展品。其中的一些东西会遵照安德罗波夫的指示送给幼儿园或者其他的慈善机构。至于安德罗波夫，他不曾把任何一件礼物据为己有。

当然我也不认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而且从不接受任何礼物。比如说过生日的时候。要看是什么样的礼物。有一次我送给一张斯维里多夫音乐会的唱片。他高兴地收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经常听这张唱片。

\* \* \*

50年代末，很多城市由于种种原因爆发了动乱。多数情况下都会把矛头指向警察，不过也有冲击区党委和市党委的情形。

后来这样的动乱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参加的人数达到数千人。有时候也会动用部队来恢复秩序，这往往是安全机关提出的——对形势估计不足。

1967年，当安德罗波夫来到克格勃的时候，哈萨克的奇姆肯特发生了动乱，原因很多，而且有些重要的原因。克格勃了解了地方的情况，也向党中央做了汇报，安德罗波夫亲自告诫中央：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不作必要的解释工作，事件的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但是回答总是一个：“不要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

<sup>①</sup> 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的名字和父称。

中央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1967年，在鲁布佐夫斯克发生了一桩案件。一名被警察拘禁的当地的汽车司机死了。他的死很可能是偶然的：因为在大街上也有可能会死人。但是有一个消息流传开来：警察打死的。几乎全城都出来了。五局的一位上校楚帕克立刻前往鲁布佐夫斯克，数万人聚集在中心广场，有人在那里讲演，火上浇油。楚帕克挤进人群的中心，通过麦克风喊话，说是从莫斯科来的，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把工作证也抛进了人群。

有人想听他的讲话，也有很多人在叫喊。人群在激动之中。突然有一个人跳上台子，把楚帕克的证件高举到头上喊道：

“他没有骗人，这确实是他的证件！他是安德罗波夫派来的！”

他郑重地把证件交还给楚帕克。

此后，聚集的群众选出几名代表，把大家的要求写下来，楚帕克答应把这些意见汇报给莫斯科。广场上集聚的人群安静下来，慢慢地散去了。

人们不禁要问：“解决这样的冲突难道是克格勃的责任吗？”大概不是，但是人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人员，而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怕担责任，制止了激愤的人群。应该说，当发生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寻求克格勃代表的保护。我并不想说国家安全机关就没有问题，但是在近十几年来，人们开始相信我们。

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安德罗波夫在任的时期，在处理动乱时，只有一次动用了军队，而且那一次也没有死一个人。

克格勃在处理这种事件的表现是审慎而坚决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件事情来说明：70年代初期，莫斯科发生了几次示威游行，他们打出来的主要口号是：“宗教信仰自由！”（天主教的一

个派别——浸礼宗的要求)，“给犹太人出境的自由!”和“不许斯大林主义重演!”

每次处理这样的事件的时候都采取了这样的措施：采取软化措施，重新研究浸礼教派登记的条件，放宽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条件，还有就是尽量安抚群众，说明任何人都不允许重返斯大林时代。

安德罗波夫建议在这样种情况下采取谨慎而有弹性的政策。但是当时还是有不少人主张采取强硬的镇压措施。例如，有人建议把挑拨并组织群众大会的人员流放到外地。

为了研究这件事，安德罗波夫召开了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晓洛科夫、克格勃莫斯科总局局长利亚林、克格勃的两名副主席奇涅夫、茨维贡，还有我。

利亚林代表莫斯科政府发言。他转达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的意见，提出把挑拨群众游行的人员流放到外地的问题。这一建议被否定，认为这样的行政措施是违法的。利亚林坚决支持内务部长晓洛科夫“清理首都”的建议：为此由克格勃、内务部和检察院的代表共同组建一个指挥部。

“这又是三人小组?”我小心地问道。

鲁坚科支持我的意见，开始与内务部长晓洛科夫争论起来。而对方坚持自己的意见。奇涅夫和茨维贡沉默不语，在椅子上辗转反侧。

此时我又要求发言，想论证这样的做法直接违反法律。

“你有什么建议?”安德罗波夫问我。

“如果利亚林有这些人犯罪的证据，那就依法对他们进行审判。只有法庭才能确定责罚的尺度，”我回答。

但是利亚林和晓洛科夫并不认输。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后，

意见还没有统一起来。安德罗波夫宣布闭会，建议大家都好好想一想。

晓洛科夫在走廊里遇到了我，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我说——话语中含有一种嘲弄的成分：

“你真行，你就是应该这样坚持自己的观点！”

茨维贡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同样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自己的赞许。

我明白他们的嘲笑。格里申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首都的安定和秩序，这位“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最好不要拦路。

安德罗波夫打来了电话，因此我非常满意。

“你提的问题很正确”，他说，“我们不应该流放任何人！”

我很清楚，在涉及采取镇压手段的争论中，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某些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清晰地看出，一些官迷心窍的人希望在这样的斗争中火中取栗。

客观地说，我们的分歧是这样的：格里申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要清除莫斯科的一切污泥浊水，而“自由派”安德罗波夫表现出了自己的不坚决。内务部长晓洛科夫显然站在格里申一边。可以设想，勃列日涅夫的“亲密战友们”将会送上一份怎样的报告！

还有一件事情。那是在1971年，我在苏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发言。防空部队政治部主任戈鲁舍沃伊打断了我，他说有人批评党正在返回斯大林主义，而克格勃没有对这些批评党的政策的人采取措施。显然他所说的“措施”，指的是镇压手段，而不是宣传和解释。我反驳道：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方法，刚好证明我们回到了斯大林时代。格里申对我的发言不会满意，但是他



没有说话。

某些正统派人士早就想对国家安全机关进行打击了！因此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对于肃反工作人员的不信任情绪，他们不断地“揭露”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过去年代里所做的坏事。

然而安德罗波夫并不怕引火烧身，他每一次都会坚决地寻找制止冲突的途径，尽量不让自己人采取冒险的行动，尽量不采用极端的手段。

我完全支持安德罗波夫的看法，而且尽我所能在工作中支持他。

斯大林去世之后，当人们提到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的时候，往往会谈起因为说笑话、作打油诗或者不负责任的闲谈而遭到逮捕的事例。我可以证实：在五局的工作中，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曾经采取镇压措施，那也一定是对待那些严重违法的事例。然而法律的不完善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尤其是在俄联邦刑法的 58—10 和第 70 条中，只提到一种颠覆政权的形式——进行反苏宣传。

对这种犯罪行为只有单一的解释。属于这种犯罪行为的有：组织反对国家的地下团体，以破坏宪法制度，制造、散发反苏传单或其他印刷品，建立非公开的印刷厂——一句话，就是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过这些法律条款中所包含的负面的政治影响。到了改革时期，在全苏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中，还提出了新的俄联邦法典第 7 条，为的是把这种罪行具体化。结果呢？代表大会仅仅把这一条所涉及的行为进行了限制，补充了“只有那些公开号召推翻宪法体制的人才应受到制裁”。与会的代表认为，在今天的状况下，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大会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对宪法的法律保护。

很有代表性的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那些国家在修改自己的法律的时候，都在法律中加入了与全苏代表大会所否决的相近似的条款。有趣的是，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还是原先各加盟共和国选出的那些苏联人民代表，他们原先一直反对上述方案。

我和安德罗波夫一道工作的那几年里，曾经做过一些本不属于克格勃范围的事情，不过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干的那些工作对社会是有益的。

70年代中期，总有很多上访者聚集在政府机关外面，这些形形色色的上访公民提出的要求总也得不到答复。无论是党中央、部长会议，还是总工会的接待站都不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都把他们拒之门外，甚至不愿意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愿望。

记得有一位带了四个孩子的妇女（另外两个留在了家里），她从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到莫斯科来了几次了。最后她威胁要在红场上自焚。原来这位来自扎波罗热工厂的女工家里住的是一间11平方米的房子，一直不给她房子。地方政府推说要房子的人很多，都在排长队。

我打电话到扎波罗热克格勃分局，请他们了解一下。过了一段时间给了回话说，该工厂是有这样一名女工，她和丈夫工作干得都很好。地方政府老早就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是没有办法，城市的住房很紧张。

我问道：

“你们城市里有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多么？”

“大概只有一户……”

我请他把我打电话的事情转告州委第一书记。不久之后，从那里传来了消息：“好了，那个家庭分到了一处四居室的住宅。”

为什么要把一个人挤对到这个地步？大部分“上访专业户”的情况都大同小异。挑拨是非的坏人往往利用官吏们的渎职行为，把很多人变成了他们的猎物，而他们本人的背后是西方的记者。

路透社的记者找到了一部分上访者，炮制了一份所谓的“成立独立工会的声明”并公布于众。这些人和工会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西方出版物中，他们便是一个反对苏联的人权组织的代表。怎么办？而且我们的领导人也不断地打来电话，催问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解决的办法终于找到了：把所有的上访者请到了克格勃总部。这是一百多名受尽折磨、已经接近绝望的人。其中还有人拉扯着孩子。谈话进行得很困难，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但是最后还是开始了对话。我们五局的同志和新闻口打交道最多，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而且掌握了一定的方法。

我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希望中央能够指示地方政权为这些人解决问题。这一次我们的建议被采纳了，一周之后我们作了总结：所有一百余名上访者中，只有五六个人还不满意。

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很兴奋，于是我们制定出第二份名单。不过这次引起了党中央的不满：怎么，克格勃要在群众面前作出一副慈善家的样子！切尔年科和博戈柳博夫领导的部门不断打电话给更高层的领导，说什么克格勃不务正业，同样内容的信出现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办公桌上。

此后我们已经不再写这种信了。我们希望能够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此事过了很久，在一个报纸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文中谈到了克格勃的接待站的工作情况。“为什么人们要到克

格勃的接待站去呢？”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问道，“党中央不是也有接待站吗？”不错，是有的，那么为什么人们却要到克格勃那边去，而且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的反应，说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理解，才能解决那些伤脑筋的问题。

我是怀着自豪的心情写这一段的，尽管我知道，为普通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并不足以弥补克格勃以前进行的大逮捕、对人民权利的侵犯以及给人们带来的屈辱而犯下的罪行。但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我还是要勇敢地说，近年来克格勃的工作已经不是这样的了。

不过还是让我们再回到“萧条的年代”吧。

群众对于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们不满，批评我们的一些制度，嘲笑总书记得到的无数的奖赏，甚至不少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的机关干部也对于腐败现象感到愤怒。在党中央和其他中央机关里也在谈论这样的话题。人们在讨论勃列日涅夫所写的书籍的时候说了多少挖苦讽刺的话语！不过我对这几本书倒没有什么反感。况且也没有必要把这些书籍看成一种基本信念的问答手册。此外，安德罗波夫也没有参加克格勃机关组织的对这些图书的讨论大会——他不想参加这种明显的虚伪表演。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些书，问题比这要严重得多。很多人都明白我们的困难所在，但是找不到走出困境并继续前进的办法。柯西金所提出的那些经济改革方案，很快就被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们“活生生地扼杀”，这些经济方案的命运使得很多人对于任何建议都望而却步。

在那样的年代里，一些新的想法想要突破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艰难地冲破顽固的抱残守缺的意识。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当时国内出现了一种地下产业：复制并销售国外的音像制品，当时被称为音像生意。

为了制止这种犯罪行为，克格勃提出，必须创建本国的音像生产。当时已经很清楚，音像生产势在必行。当然，这样的生产是很复杂而且需要很大的投入，但是这又是必须的。

苏共中央组建了一个小组，组长由书记处书记齐米亚宁担任。小组开了几次会，大家都表示坚决的反对。“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海关和边防应该尽到责任——在边境扣住那些录像带”。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其中也包括大家都尊敬的、聪明的电信部长沙姆申，文化部副部长波波夫也持这样的意见。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宾坚决支持他们的意见。只有外交部副部长科尔尼延科支持我们的建议，而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叶尔马什有保留地支持。齐米亚宁没有表态，不过也没有坚持实施这份建议。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书记的第二天，齐米亚宁又召开了小组会议，这一次费了好大的力气通过了一项决议：把音像技术的问题提交苏联部长会议。

然而这样的问题要想在部长会议上获得解决也并非易事。我不想赘述我们的管理部门的因循守旧。因为这只是无数这样的事例中的一个。没有一个人想干事情，就让一切事情随波逐流。一句话——停滞不前。

我想，安德罗波夫之所以要决定组建五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对国内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分析研究并找出其中的原因。

安德罗波夫对于五局十分关注，他把这个新组建的局当做自己的孩子。他原本是想组建一个新的机构，能够对一些事件

进行预测并及时应对——他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然而我们新组建的局并不是总能得到党中央的支持。

安德罗波夫始终要求我们的工作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要依靠社会舆论的支持。

应该说他待人处事是很谨慎的，善于对待世界观不同的人，也不回避与自己的政敌对话，和政治观点不同的人保持接触。他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他认为，只要他们不搞破坏活动，他们的存在也是合法的。

在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期间，他没有歇过一个休息日，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每个星期天他都会到机关来，满负荷地工作，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体。

他的工作并不轻松！一些勃列日涅夫的亲信担任了克格勃的副主席，比如说茨维贡和齐涅夫，他们是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和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担任总书记时的同事。他们背着安德罗波夫给勃列日涅夫打小报告（当然带有倾向性），这就使得总书记对安德罗波夫不放心。勃列日涅夫把小报告当做真话，从而当茨维贡和齐涅夫与安德罗波夫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总书记往往会支持茨维贡和齐涅夫。安德罗波夫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但是他经常忙于国家大事而顾不上这些。

安德罗波夫刚到安全机关的时候才 50 岁。在我看来，他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当他见到那些本该捍卫共产主义理想，而实际上却在反其道而行之的人，他会感到无比痛心。他是新社会的真正建设者。一些媒体嘲笑他学历不高，我对这样的嘲笑感到愤怒：安德罗波夫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无时不在扩充自己的知识，他博览群书，爱好文学和音乐，自己还写诗。他爱好广泛，经常亲自参与办案。尽管他所学的不是这个专业，

然而他喜爱我们的工作，还提出过很多有益的建议。他认真地对待捍卫公民权利的问题，为此还曾计划成立专门的分局。

安德罗波夫从不批评自己的前任领导人。我从未听他说过谢米恰斯内或谢列平的坏话，当然他不可能没有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对于他来说，今天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他不止一次地向勃列日涅夫陈述一个观点，那就是一定要捍卫并利用赫鲁晓夫时代的成就。“今天有今天的衡量尺度，有当代的水平”，他说，“那就让我们坚持今天的尺度。对过去评头论足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更应该看到现在和未来。”

安德罗波夫不仅在克格勃内部有很高的威信。当他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的时候，尽管他曾担任过克格勃主席，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人们感觉到国家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应该说，直到今天，人民群众仍然对他怀有好感。

---

---

## 东欧各国

在工作中我经常有机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安全机关合作,应该指出,这些合作都是建立在平等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因为这种合作,我们才有可能采取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行动。此外,共同的工作和情报的交换,使我们能够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发生在这些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很多事件。

有一件事情尤其使我不能忘怀。保加利亚的国家安全机关发现了一名西方间谍机关的特工阿森·格奥尔基耶夫。他在保加利亚的地位很高,有一段时间他担任了保加利亚驻联合国常任副代表。

我们帮助保加利亚的同行获得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格奥尔基耶夫犯有叛国罪——特别是我们发现了秘密通信工具和密码本。

格奥尔基耶夫案件再次证明,在与特务分子进行斗争的时候,应该使用更加有组织的、目标更加明确的方法,要求安全机关有更好的定位。

五局成立以后与友好国家的相应机关建立了联系,因为他们也明显感到,为了进行反特斗争,为了捍卫国家的制度,同样需要反间谍工作。西方的间谍机关不仅从事特务活动,他们也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因为他们就需要了解我们的薄弱之处。



五局的工作人员要比克格勃的其他部门更早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不仅实际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弱点，而且也了解那些与我们的敌人进行合作的潜在的势力。

我还要多次提起这个话题，但是我现在想谈一谈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合作。我与他们保持联系，经常进行双边或多边的会晤，交换情报，但是在合作中从不对他们施加压力。

1959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及195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已经成为过去，柏林墙暂时还存在，不过70年代的波兰危机则是两年之后的事情。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裂痕。苏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和朝鲜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关系，阿尔巴尼亚已经处于全面的封锁，罗马尼亚的齐埃塞斯库也明确地站在对立的立场，这些年来，与南斯拉夫关系的裂痕一直没有得到修复。

我们每一个人对形势都有自己的忧虑，不过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谈论。大家都明白，裂痕在加大，而且发生在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的事情，对于他们本国的人民来说，总会留下一定的痕迹。

非常明显的是：建设我们认为非常神圣的、坚信不疑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有新的方法，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些事情有专门的科研机关正在做，但是问题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立足于这些科学的探索。科学成了不需要的东西，克格勃得到的关于东欧国家的情报也是一样。

我曾不止一次到过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民主德国，也到过古巴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有我很多的朋友，我与各国的党中央、安全机关的领导人都进行过会晤，但是与我国驻

外的大使却从未会面(苏联驻捷克大使洛马金除外)。这并不是因为我并不想和他们见面,只是我们的外交官们并不需要对事件的客观评价。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明白,苏联的经济援助不会继续下去,于是他们各显其能开始铺设连接西方的桥梁,而且往往是瞒着苏共中央在进行。虽然此时他们还不断地重复着友谊的誓言,而他们的行动却已经引起我们的警惕。

尽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与东欧各国安全机关的合作还在继续。我们不断交换情报,直到所有的共同行动都已经中断的时候还是如此。应该承认,我们相互之间是忠诚的,没有隐瞒实情。发生在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秘密行动和克格勃的诡计,问题在于各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之间的分歧。

有一次,捷克内务部的反间谍局局长,已故的沃利米尔·莫利纳尔说道:“您刚才谈到了各国公民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如果党的领导人自己来破坏这个制度,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言行不一,嘴里说的是一套,而执行的路线又是一套,那又怎么办呢?我说的不是杜布切克,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是寻找对于未来的答案。”

他是1974年在哈瓦那公开说这番话的,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出席)和社会主义各国驻古巴大使出席了那次代表大会。

对他的话可能有什么样的回答呢?当时我们还在等待着自己的“明星时刻”。但是沃利米尔·莫利纳尔的声明使我们陷入深思。首先是,为什么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词汇越来越多地与一些案件相联系。尽管不断高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尽

管我们的领袖们不断声称社会主义建设卓有成效地进行，而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为了证实这一点，只需看一看莫斯科的城郊电气火车，车上挤满了到莫斯科采购食品的乘客。很难相信明天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变得更好。

现在已经逐渐清晰，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对当权者提出各种要求，一场社会爆炸即将发生。各国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清楚自己国家所处的严重状况，他们对我们也不隐瞒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尽管在每一个国家里发生的危机各有特点，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社会主义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吸引力。

但是人民对于“光明的未来”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那时候有谁能够想到，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计划已经在高层领导中酝酿成熟，只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按他们的计划进行，结果导致了国家的分裂。我曾经多次亲耳听到戈尔巴乔夫在一些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他总是引用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歌词：“只要有自己的祖国，就不会有忧虑和不安……”

令人担心的、日渐严重的危机的预兆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显现出来。稍后一些，我们也开始对于自己伟大的祖国感到担心。

1957年，我第一次感到阿尔巴尼亚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站在阿尔巴尼亚一边。突然赫鲁晓夫出访了南斯拉夫，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谅解，结果把阿尔巴尼亚晾到了一边，实质上我们背叛了这个英雄的小国。当然我们需要巩固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然而一定要让阿尔巴尼亚人加入涉及这个问题的谈判，或许还应该包括保加利亚，尽管保加利亚是我们忠实的盟友，但是他们与南

斯拉夫的关系也一直不好。

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加深了自己的疑虑,对苏联也越来越不信任,而亲西方的势力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往往也会与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中心进行合作。我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早在60年代初期,我已经感觉到他们那里的情况很严重。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一个国家中都形成了一股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另一方面,领导人虽然完全了解这些情况,表面上却故作镇静,装出社会主义制度坚如磐石、与苏联的友谊牢不可破的样子。

现在很难解释,人们对于这样的谎言感觉如何——他们对严峻的形势和面临的灾难了如指掌,他们的内心有着完全相反的判断。既然不愿意设想社会主义会彻底垮掉,那就该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就应该鼓励那些现实的观点和创新的思想,就该停止掩耳盗铃,不要再蒙骗那些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群众。

有一次我到布达佩斯出差,几个朋友请我到一家典型的匈牙利小餐馆吃饭。过了一会儿,内务部长本吉和助手也一起来到餐厅。本吉部长为人正直、诚恳而率直,因此我很尊敬他,我们的交情也很好。他的到来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过了一会儿,部长请我们到位于盖莱特山上的另一家餐厅。我们在那里坐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开始告别。突然本吉问我:“今天是几号?”我感到很难为情:怎么能够忘记,10月23日——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纪念日!“你看,在这样的日子里,内务部长不带警卫就随便到餐厅里来,这说明我们国内的局势很稳定。”无法不相信他的话,尽管本吉很清楚:稳定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甚至在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也并非一切都好。匈牙利已经

明显地倒向西方,而且正在暗地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谈判。同时人民对于持续的通货膨胀感到不满,他们已经能够看到国家机器正在腐朽。

1981年我去民主德国的时候,民德国家全部副部长米吉格跟我谈到了青年的状况,我对这次谈话的印象很复杂。他说:他们那里的青年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阶层(大约有8万人),这些人没有固定的住所,在全国各处流荡;他们在秋季流向南方,到了春季又流向北方。在德国,我也听到其他人讲述过这种情况。青年人对于当局的这种无言的抗议的确令人担忧,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我回到莫斯科之后,向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谈及了此事,我没有隐瞒我的看法:此中有一种潜在的爆发力。他同意我的看法,要委派相关的部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应该说,这种流浪群体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担忧,不过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的表现又是不同的:我们这里没有这样明显的公民流动现象。

民主德国的官方媒体一直报道说德国青年是一个怀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团结一致的团队。来自民德的各种青年团体都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看来,他们的病症长久以来处于潜伏的状态。

我并不想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我只想,对于任何一种负面的现象都需要一种回应,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当权的那些人不仅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也不想寻找这类的办法。

1980年12月,我应波兰内务部长米列夫斯基的邀请来到华沙,参加对于波兰团结工会活动的研讨——团结工会一直在苏联寻求支持者。我们的会谈在内务部进行,经过几轮会谈之

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任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卡尼亚接见了我和我们驻波兰的代表维塔利·帕夫洛夫。这次长时间的谈话很活跃，也很坦诚。尽管团结工会已经叩响了通往国家政权的大门，由卡尼亚领导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走向崩溃，但是卡尼亚表现得还相当自信。谈话的一些细节并不重要，但是他说的最后几句结束语却把我惊呆了。

“您什么时候回莫斯科？”卡尼亚问道。

“明天。”

“您急什么呢？在这儿停留两天，我们去打猎。”我当然是谢绝了。

当我们离开了卡尼亚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对米列夫斯基和帕夫洛夫说，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建议感到惊奇。从目前情况看来，团结工会必然会掌权，我对此已经确信无疑。

我的担心得到了证实，1984年我再次来到波兰参加波兰国家安全机关成立40周年的纪念活动。纪念活动隆重而奢华，国家元首雅鲁泽尔斯基接见了社会主义各国（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团长。

他详细介绍了国内的情况，介绍了团结工会的活动，还有国家领导人为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但是我和朋友们短暂的会面却给我留下完全不同的印象。

庆祝活动的闭幕式是在华沙大剧院里举行的。我和雅鲁泽尔斯基坐在同一个包厢里，后来又在后台临时举行的宴会上相见。这一天晚上是他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喝了半瓶白兰地。我注意到雅鲁泽尔斯基在大剧院里有些拘谨，而在宴会上则完全相反——无拘无束。不过我却感觉到他内心的某种紧张情绪。他对国内的形势了如指掌，但是故作镇静，似乎波兰政权的危机一

定会得到克服。而且我的很多波兰朋友都说,似乎团结工会已经没有任何危险,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他们相信雅鲁泽尔斯基的威望就是稳如泰山的政权的保障。

此刻波兰的政权已经受到团结工会的威胁,团结工会在天主教会和西方特务机关的支持下不断发展,渐渐成了现实的威胁力量。

然而,当对时局产生清醒的认识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了。假如留意一下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史,那就应该发现,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现解冻,看见了希望的曙光:在1982年安德罗波夫成了有威望的新的苏联领导人。

1983年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家安全机关的代表在索菲亚举行多边的会晤,会上主要讨论了对付西方间谍机关活动的共同行动机制。我们称之为反对敌人进行思想破坏的斗争,的确是反对破坏的斗争——换句话说,那就是对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破坏政权体系的隐蔽的斗争,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

我们没有掩盖自己国家中的复杂的形势,坦诚地讲述了国内出现的所有负面的现象。保加利亚人批判了人为造就的对日夫科夫的个人崇拜,谈到了日夫科夫的老婆的行为对党的威信的重大损害,还谈到了对土耳其民族进行的强制“保加利亚化”。波兰人挣扎着鼓足了勇气。

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这样非凡的人物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又给所有人带来了希望。

还记得,有一次我和保加利亚的内务部长季米特尔·斯托亚诺夫两人单独在一起,他对我说:“博布科夫同志,安德罗波夫怎么了?听说他病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我自己也不清

楚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怎么了。于是我便如实告知。斯托亚诺夫陷入沉思。一般来说他都相信我的话，但是这一次他似乎觉得我在回避他的问题。“安德罗波夫平安无事，我们很高兴”，部长说，“希望他能够快一些回来。”

此刻我第一次深深地感觉到，这个损失对于我们大家意味着什么。

1986年我参加了在保加利亚城市瓦尔纳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上的气氛完全不同。斯托亚诺夫请我在保加利亚内务部领导座谈会上发言。

座谈会在保加利亚党中央的一所豪华的疗养院里举行，出席的有三十人左右。原定的座谈会实际上变成了咨询会，与会人员主要关心我们的改革的实质和最终目标。我尽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那时候我对未来还充满信心，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告诉他们说，改革不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

说实话，我的好朋友们对我说：“菲利浦，我们相信你，你所说的就是你所想的。但是我们很难听明白你说的话。最好不要出现什么灾难。”

我尽我所能来安慰他们，而且我是凭良心做的。今天他们如何理解我那天所说的话呢？他们是否清楚，我们大家都成了领导人的政治伎俩的牺牲品呢？

我最后一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是在1988年，我承认，当我离开布拉格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在那些日子里，布拉格每天都发生群众集会，而且显而易见，没有人能够阻止现政权的倒台。

我和新任命的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长、副部长见了面，他们



对局势感到担忧,但是还是满怀信心地谈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寄希望于新的部长会议主席阿达梅克,但是同时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心:他们看到了苏联领导人对捷共中央领导的真实态度。

于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平行的两种运动:一种运动在聚集力量、团结一致,准备对政权实施冲击,而另一种运动只能眼看着政权不可避免地垮台。

现实就是这样。他们的政权已经声名狼藉,已经失掉了与人民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全部的号召听起来就很奇怪。他在对顿巴斯矿工讲话的时候说:“你们从下面,我们从上面对他们(对州党委)施加压力。”

国家安全机关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密切注意形势发展,防止发生对抗,收集情况,把自己的结论上报中央,而党中央对此并不重视。不然的话,又如何解释苏共中央对波罗的海形势的麻木不仁呢?如果对这些加盟共和国的形势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那里的一些阶层正在就 1939 年签订的《从苏联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制造事端!

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浮出水面,但是无法理解当时把这个条约隐藏起来的必然逻辑,为了什么呢?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条约——那是一份很沉重的协议,那是在面临战争的情况下签订的。这个条约也起到过正面的作用:这就使我们与德国的边界离得更远了一些。除此之外,这份协议还推迟了这场战争,当时苏联遭到全面的封锁,又受到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威胁。根据这份协议,立陶宛的威廉区和该区内的城市维尔纽斯和克莱佩达返还了立陶宛。这并不是掠夺别人的国土,这一地区是被别人非法占领,现在无非是归还原主。这份协议保护了

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使他们免受德国人的欺凌，拯救了数十万波兰犹太居民的生命——他们在希特勒刚刚开始进犯苏联的时候就迁移到了苏联的腹地。当然还不止这些。

在战后这些年当中，我们昔日的“可靠”盟友英国和美国利用波罗的海各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若不是这样，那里人民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是我们的昔日盟友把波罗的海各国变成分裂苏联的一个平台。

当年对“条约”的绝对保密，在今天产生了严重的后果。1939年的条约在60年代就应该予以解密，应该进行讨论。我经常问自己：安德罗波夫是否知道这份文件保存在党中央？我敢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相信，既然安德罗波夫很了解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却不知道适时地公开这份文件的真正意义。

另外，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条约本身。问题在于，在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到保全苏联的措施。苏联的解体始于波罗的海各国。从表面上看，我们的领导人好像很关心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国分裂主义情绪的增长。其实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班子事先已经决定让三国脱离苏联。那里的健康的力量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波罗的海分裂的危险，但是我们却置他们的命运于不顾，表面上对他们表示支持，形式上听取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在党的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的领导人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只不过苏联领导人的罪过更为深重——因为苏联给东欧各国作出了榜样——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直是跟着我们前进的。

---

---

## 保守秘密和怕担责任

我也品尝到了背叛带来的苦果。1964年反间谍总局的一位副科长尤里·诺欣科到日内瓦出差一去不归。

这曾经是一位典型的“黄金青年”的代表。诺欣科的父亲是苏联船舶工业部的部长，他的骨灰葬在红场的克里姆林宫墙下，即使是一个不敢期望受到显赫的亲属庇护的普通军官，也不会作出诺欣科那样的事情。他善于交际，从不炫耀自己的地位，但是有些自由散漫。一群同龄伙伴聚集在他的身边，其中有的人拼命接近他，只是为了得到某些好处。诺欣科并不虚荣，他曾经帮助过很多人，但是“父亲的影子”还是影响到他的仕途。我和他关系一般——并没有相互利用之类的关系——但是他很看重这一点。

1963年底，诺欣科到日内瓦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他所在的部门归我管。出国的前一天，他到我这里来征求意见，他跟我抱怨说，他的女儿得了很严重的疾病，他想在日内瓦为女儿找到好的药剂（后来负责调查这一案件的人把关于药剂的话当做追究我们的工作责任的把柄，似乎他们到国外出差是为了私人目的）。

总之。我们和诺欣科是作为好同事告别的。

那么，为什么诺欣科一去不归呢？无疑跟他关系密切的人们会知道详情。直到今天，我还确信他一定是身陷困境，很可能

是有人预先为他设置圈套，而他自己又没有坚持住。当然，也不排除他事先已经安排妥当，只不过我的内心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猜测。我知道他很爱她的女儿，他对女儿的疾病放心不下。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抛弃女儿和家庭。他可能是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我手里有这方面的证据。

诺欣科与反间谍局局长戈里巴诺夫关系非常好。戈里巴诺夫本打算过两天去日内瓦和诺欣科会合。假如诺欣科事先已经有叛逃的计划，那么西方间谍机构很容易为戈里巴诺夫设置陷阱，苏联反间谍局的局长就会轻而易举地落入他们的手中。而且他们是不会放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诺欣科在戈里巴诺夫到达的前两天逃跑了，这样一来就发人深思了：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

无论如何这也是西方间谍机构的成功。背叛行为已经完成，而且对我们的工作立刻就产生了影响：诺欣科供出了与我们合作的一些人的姓名，揭示了我们的某些工作方法。

我们对于这样的背叛行为深感沉痛。对这桩案件的调查开始了。戈里巴诺夫被撤职，很多人受到牵连。似乎大家都是罪有应得……尽管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这么多人替一个人承担罪责呢？不过我当时真的以为，这是我们应得的处分。往往这样的罪责是严酷的，会毁掉人的一生。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安全机构，在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如此。

如果在一个有四万人的工厂里有一个工人受伤，那么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负责技术安全的工程师，此外还有工长和车间主任。厂长也难逃其责。

\* \* \*

事实上，在我们这里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人

们害怕自己承担责任，都想尽快找到一个替罪羊，而不是对事件的本质进行分析研究。没有人对事情发生的原因和条件感兴趣，一个人的命运无关紧要，而往往是由无辜的人承担罪责。有时候领导也会用这种办法来对付自己不喜欢的人。

我记起了这样一件可笑的事。事情发生在一艘载有 350 人的远洋客轮上。船上的乘客主要是海员。在那个年代女乘客占很小的比例。

船上有一名 45 岁的独身女洗碗工谢拉菲玛——她的长相并不漂亮。平时的业余时间她都是一个人度过的。

班轮抵达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港的时候，宣布这一天是开放日。这一天非常热闹，很多当地居民来到轮船上参观。然而到了晚上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谢拉菲玛不见了。

开始的时候海员们还在开玩笑——说她是一名外国间谍，带走了秘密情报。大多数人认为她上了岸，只不过是迷了路。她会回来的，有什么人会需要她呢……但是一直到第二天夜里，谢拉菲玛也没有回来。这一下子大家都真的紧张起来了。而且轮船的靠岸时间已经过了。船长报了警。一连几天大家都沉默了，后来得到了消息，说明天早晨将会有人把谢拉菲玛送回船上。她真的回来了。她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一个上了岁数的男人挽着她的胳膊。那位男士说，从昨天开始，谢拉菲玛已经是他的妻子了。

原来这位老人在战争时期当过德国的警察，他害怕受惩罚，便和德军一起撤退了。命运把他抛到澳大利亚。他在当地置了房产，经营畜牧业，只是没有结婚——这在澳大利亚是一个难题，那里的男人比女人多很多。他在开放日来到班轮，其实就是想为自己找一位妻子。他说服了谢拉菲玛。

一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件生活琐事,并不涉及特务活动和政治。但是谢拉菲玛的“罪行”使得很多人受到了很重的惩罚,其中也包括那名经验丰富、多次立功的船长。难道说他能够预料到这样的事情吗?但是他要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这种惩罚制度在很多单位里造成了紧张的气氛,产生了相互的猜忌、不信任和恐惧。领导惧怕承担责任,就采取谨小慎微的办法,与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往往会受到处罚。应当承认,这对安全机关的损害也是很大的。

记得我在担任伊万诺沃州选区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时候,我到过当地的一所国际学校,那是专门为外国共产党人子女开设的。这所学校在国外也很著名,在这里学习的有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反法西斯的共产党人的孩子。他们来到苏联,找到了自己的庇护所和栖身之地。我和校长进行了交谈,我问道,这些孩子是否看见过伏尔加河,他们是否到过伏尔加流域的美丽城市——高尔基和列宁的故乡,是否去过光荣的斯大林格勒。我很扫兴地听到,伏尔加河流域是外国人禁止去的地方。这是什么样的外国人呀!这只不过是些10—15岁的孩子呀!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由于这种很难理解的秘密,外来的人们往往会迁怒到一些老实人身上。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件事。

原来苏联客运输轮船公司每年要赔一千多万卢布,而当科学博士佩图霍夫担任了公司领导并负责轮船公司的商业运作之后,船队开始获得50万左右的外汇利润。但是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佩切内伊在检查黑海航运的时候得出结论说,黑海海运的外汇损失是佩图霍夫造成的。佩图霍夫在此之前是船队客运局局长。根据监察委的指示,苏联财政部和外贸部到该单位进行核查,结果证明:损失与佩图霍夫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佩切内伊没有服输。由于他的坚持，一连几年对轮船公司进行检查，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对佩图霍夫的指控没有证据。与此同时，在克格勃的协助下，还对佩图霍夫作出一个不公正的结论：“禁止佩图霍夫到国外出差。”

在监察委召开的审查这一案件的会议上，苏联海运部部长古任科请求监察委员会在做决定的时候考虑佩图霍夫的工作成绩。但是监察委主任粗暴地打断了部长的发言，根本不让他把话说完。

“您跟我们说什么呢？佩图霍夫……佩图霍夫……这是一个有数万海员的单位，而不是您的佩图霍夫。坐下吧。”

部长坐下了。结果佩图霍夫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从这个事例可以说明，谨小慎微、报复和恐惧使得领导人采取最粗暴的破坏人权的措施，只要你不走运——你永远逃不脱厄运。

整个悲剧就在于这样的工作方法非常普遍。由于我们的工作人员害怕负责任，他们经常会拒绝一些干实事的、没有任何劣迹的人的出国签证，尽管他们出国可能为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样的一种制度，有时即使是拥有某些权力的人也无力打破，这样的制度和官吏们的为非作歹一样，给整个社会都带来麻烦，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保守秘密无疑是必要的，各国安全机关都关心这件事。但是如果所谓的“国家秘密”给国家带来直接的损害，如果为了这样的原因产生不情愿发生的冲突，那就应该好好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会以“保守秘密”为借口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众所周知，诸如谁能够接触秘密，能否被批准出国这样事情，是由克格勃决定的——这被称为特审。这项审查往往会引

起人们的不满，往往会授人以苏联“破坏人权”的话柄。同时往往也会损害人的尊严，于是受伤害的人会产生与领导的对立情绪。

我不知道特审程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我看来，这项制度影响最大的时候，是从战后研制原子弹开始的。自然，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必须经过特审。国家秘密，这是很神圣的事情。

问题在于，国家秘密的范围被扩大了，无限地扩大了。于是特审程序也被相应地扩大了，接触秘密工作变得十分复杂。保守国家机密的机构变得臃肿不堪，最后逾越了所有的界限。接受检查的不仅是生产军工产品的人，甚至还包括军工企业食堂的服务员和附近村里的居民——他们都知道工厂的产品是制造炮弹的火药，或者是制造坦克的螺栓，或者是用于潜艇的电缆。当然你不会羡慕那些以半手工方式生产火箭的组件的工人。

参与机密性工作的人会得到一些好处——得到保密津贴。所以很多人都愿意进入这样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有特殊“邮政信箱”的企业。这些单位很特殊，它们没有普通的单位名称。例如，奔萨市的通信器材工厂被称为“第 115 信箱”，总要有一个对外通信的地址呀。

于是，一个人失去从事保密性质的工作的机会，肯定会在物质上有一定的损失。于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会利用这一点，“特审”为告密、夹嫌报复和造谣诬陷广开门路。一些“能人”轻易就可以写匿名信，但是好人要想洗清不白之冤，不但要有足够的勇气，做起来也是比登天还难。并非所有的官吏都把匿名信扔进垃圾箱。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在调查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奥德罗德尼克的时候，涉及一名莫斯科某高等学校的女教师，尽管并没有



发现她有任何过失,最后还是禁止她出国担任一个外国代表团的翻译。总之她蒙受了不白之冤,最后她写了一封信给克格勃,请求不要牵扯到他的儿子。“儿子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于是便建议反间谍局的领导马尔凯洛夫将军认真处理这个请求。

他接待了这位妇女,批准了她的请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找到了我们,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原来我们的工作人员违反了命令,他对负责安排她的儿子的部门说,这位年轻人的母亲并非没有问题。当然这位工作人员的做法欠妥,不过他已经习惯于听小报告,他认为,应该按照条例办事,但是在这样的事情中警惕性永远不是多余的。

在处理出境问题中,经常会滥用禁令。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一次我回到故乡顿涅茨克。当地国家安全机关骄傲地为我展示了用于收集和分析情报的最新的的技术装备。设备的确很好,但是他们用来收集什么呢?例如,用计算机统计公民与国外通信的数量。我请他们检查一下,在名录中有没有一位著名医生的姓名。可喜的是名单中没有他,但是名单中有医生的妻子。她是如何担上了涉外罪名呢?原来她坐在林阴道上等待丈夫,旁边坐了一位加拿大游客。她静静地坐着,没有说话,后来丈夫来了,他们一起走了。这就足够给她的名字前面做一个记号:和外国人联系。这样的事情就能够影响到一个人能否做什么事情,影响到他们是否有权利出国,上帝才晓得!

像这样的“联系”,谁知道还有多少!反间谍机关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在白白浪费精力。

70年代末,这个有害的制度终于被废止了。但是这样的结

果来之不易！需要克服的障碍不仅仅来自克格勃，而且来自党中央。那些有出国审批权的人们，拼命抱住这样的制度不放，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小组有出国的审批权，而党中央所依赖的材料来自克格勃，于是一些工作人员把责任推到克格勃，似乎最终的审批权就在那里。我们坚持的是，我们只提供那些接触国家机密的人员的信息，这一点肯定引起了那些怕担责任的官员的不满——从此以后他们就无法再拿克格勃当挡箭牌了。

一般来说，被拒绝接触机密，或被禁止出国的每个人都是很无奈的。我认为，这种情况往往成为人们在国外滞留不归的原因。而每一起出国滞留不归的事件都使得审批人员越加紧张，总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苏共中央出境审批委员会的莫罗佐夫是一个善良而可爱的人。回忆起我们当时的合作还是非常高兴的，我们与那些“禁止出境”的努力相对抗，我们自己作出决定，自己来承担责任。

不过还是会有不少令人扫兴的事情。一位著名的天才钢琴家的出国问题久久不能得到解决。理由是有的。但是拒绝他出国就引起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些不愿负责任的官员甚至限制他在国内举行演奏会。莫斯科不许他举行音乐会，各加盟共和国首府也禁止他去，即便是有人邀请也不行。钢琴家只能在一些往往没有演奏条件的小城市演出，当然这就引起了他的不满乃至暴怒。这位天才的钢琴家受到了很大的屈辱。

我和莫罗佐夫决定解开这个症结，而且成功了，钢琴家被批准出国巡回演出。他非常感谢我们，他保证不会连累我们，但是最后还是留在国外没有回国。我们很痛苦，因为他欺骗了我们，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钢琴家。现在这位演员在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厅里成功地演出，各国的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他的成

就。同时那些冷战的爱好者们也不断利用他的名字进行反对苏联的宣传活动。

如果什么人被涉外反间谍机关秘密举报，他的处境会非常困难。比如说，驻外使馆的某工作人员对同事不满，他就可以写一封告密信件，举报这个人与可疑分子有联系，与此同时，被举报的人就受到怀疑。假如这位工作人员上了黑名单，无疑他就会被召回。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受到的怀疑既得不到确认，也不能被否认，就这样不清不白地遗留下来，一切都是在绝密之中。这个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他到底触犯了哪条刑律。

在 80 年代末，情况逐渐好转了，但是那些曾经被禁止出境的人们的境遇并没有好转。总的出发点就是：尽可能保守国家机密。但是一旦好事超越了极限，走到了可笑的程度，就只能使一些人的命运受到摧残。

这些惨痛的教训使得我们深思，开始考虑反间谍机关的改组工作。很难说，我们经历了几番考虑，只是有一点，那就是克格勃的机构必须面对法律，必须尊重人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曾经设想大大缩小国内反间谍机关的工作范围，它的主要任务是弄清国外间谍组织派往境内的间谍，监控外国人在苏联境内的活动。至于苏联人，首先是进行预防——采取预警性的措施，制止少数公民的违法行为。

但是转向预防性措施并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但是却受到领导的申斥，说我们对违法分子的“危险性的认识不足”。

另外，以前我们也曾采取过预防性措施。在 1957 年，我们了解到有人打算建立一个地下组织，他们的纲领中写进了推翻现存政权的内容。这份纲领是莫斯科一个科学机构的某工作人

员拟定的。我们决定采取措施让他悬崖勒马。我们和他进行了谈话，这个人理解了我们的意图。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情来的时候，对我们还是很感谢的。

我们得到了当时担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罗夫的指示。他严厉地要求我们与“软弱”进行斗争。要求我们重新研究对该案的决定，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顶住上级的压力，坚持住自己的立场。我们没有错。与此同时，我们也保护了负责这个“案子”的同事库利科夫上校，他没有因此受到处分。

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如果回溯到 60 年代，那时的情况就更严重了。

有一次，一位远洋航行的船长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同事的注意，他不仅说一些关于国家领导人的笑话。而且还在公众面前宣称，一旦有机会他就会留在西方。有人向我们举报，说他曾经和西方特工机构的代表在某一个港口会面。我们想制止这位船长迈出轻率脚步，便决定和他谈话。

那位船长并不否认自己的行为，可以感觉到他对我们很坦诚，我们发现他并没有真的打算背叛祖国。他感谢我们找他谈话，并向我们作了保证。这位经验丰富的船长后来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得到了荣誉，并受到了人们的爱戴。而我们的同志则因为和他的谈话受到申斥：“万一他在和你谈话之后叛逃了呢？”

当海港的领导作出决定，禁止这位船长出海，我不得不出面进行了干预。这是我应同事的要求出面的，最后取消对这位船长的禁令。

我们制止了这位船长的轻率之举，而且还支持他继续率船出海。直到数年以后，当我听说一些高层领导人对我们同事采

取的行动十分震怒的时候，我感到非常诧异。他们还批评我干预此案——因为这位船长曾经嘲讽过勃列日涅夫！

还有这样的一件事：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下，一位大学生打算成立一个反对苏维埃的小组，于是开始搜罗同伙。我们的侦察员得知了这一消息，便向我作了汇报。我建议和他进行谈话。于是他就这样做了。数年后我得知，那位青年已经大学毕业，成了一名出色的专家，现在他正请求到克格勃来工作。

怎么办？必须向克格勃的干部局汇报，把他在大学时代的事情说明。但是那样一来他就进不了克格勃了。我也不隐瞒，当时有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干什么要管这样的事！”但是最后另一种想法还是占了上风：“如果有一次对他表现出不信任，那么就很可能毁掉他的一生。”

我重新研究了那份年代久远的材料——材料的保存期已经过了。决定稍稍地等一等，然后便销毁了档案。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位能干的同事。

很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对我们的决定感到后悔。当然，这样的事情总是有一定的冒险成分，但是既然已经决定，就应该坚决把事情做到底。

在这里我们应该对五局的一位上校叶莲娜·科杰利采娃说几句好话。她待人诚挚、善解人意，她总能够找到最恰当的办法来拯救一个人的命运。

未曾接触过我们的工作的人们总会这样想：预防性的措施，那不过是一般性的谈话，谈话双方只是在进行一场口水战，其实并非如此。我局的某处正在调查一起涉及恐怖活动的犯罪团伙的案件。他们不仅口头上议论恐怖活动，而且已经准备实施。

团伙的领导人之一是苏军的一名退伍团长——野战军的军官，他当然对武器十分精通。

简单地讲，在我们的眼前正在准备一场犯罪活动。我们还是决定进行劝阻，而且最好不要使这位前军官受到伤害。当时我正好到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去办事，那位退伍军官就住在那个地方。我决定即刻找他谈话，事先甚至没来得及好好想一想，这样做能不能起到好的作用。

那名退伍军官（我们就叫他费多托夫吧）住在沃伦采沃—亚历山大罗夫村。

我住在五山旅店，清晨和当地克格勃的一名副局长波波夫一起去找费多托夫。当地警察局已经预先通知了他。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天气很好。莫斯科还是那种寒冷而且泥泞的天气，这里的早春简直就是天堂。进入沃伦采沃—亚历山大罗夫村之后，波波夫建议我们先到咖啡馆里喝一杯茶，我没有同意，这不是喝茶的时候——我心里在盘算着谈话的各种方案。

这场谈话进行得的确不容易，因为这是同一名恐怖分子谈论他的团伙所准备的活动。后来我才明白，做到平心静气也是很不容易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谈不拢。费多托夫根本不相信我 是来解救他免于灾难的，所以他非常警惕。我也不知道是哪句话打动了 他，最后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请求我们不要逼迫他 供出同案犯。他请我们相信，他的那个团伙一定会解散，活动也一定会终止。

最后达成协议，他在笔录上签字，文件送交当地克格勃。

当我们结束谈话并准备告别的时候，费多托夫突然说：

“手枪怎么处理呢？因为我要给厄尔布鲁斯山区的一个公

司的工人送工资，他们给了我一支马克罗夫手枪。枪就在我的身上。”

费多托夫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放到桌子上。波波夫的脸都吓白了，而我表现出很镇静的样子，看了一眼手枪，说道：

“最主要的事情我们已经谈妥了，这已经是次要的了。没收枪支就势必会声张出去，人们很可能对我们产生误解。你就把枪收起来，放心地干自己的工作吧。”

费多托夫一下子垂下了头，把枪装进口袋，哭了。

后来他承认，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这支手枪一直都让他心神不定，曾经闪过过使用手枪的念头……

在这一次，我们的粗心倒是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过后来我和波波夫都坚信，进行说服劝阻的工作并不一定是绝对安全的。

在返回五山镇的途中我们走进了那间咖啡馆。现在，当紧张时刻已经成为过去，可以吃点东西，还可以喝两杯。

我们都看见，这样的预防性工作很有好处：可以预防社会遭遇犯罪活动的危险，同时使得一些人不至于迈出轻率的一步，从而免于灭顶之灾。看来预防性的工作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方法，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动用镇压的手段，而且犯法的行为可以预先得到制止。

不可否认的是，预防性的措施也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有一次莫斯科某高校的一名学生被请到克格勃接待处谈话，这个学生的姓好像是克雷萨诺夫。托普特金处长和他谈话，并且很快就说服了他。他当时表示，说自己过于轻率，并对处长表示诚挚的感谢，保证抛弃原先的想法。而两天之后，他已经到了瑞士——我们是通过国外广播得到这一消息的。当然他一个人不可能到达斯德哥尔摩——国外的间谍机构帮助了他。但是这是

哪一个组织？又和什么人进行联络呢？

一些教训使我们明白，我们的行动应该更加周密。仅仅通过一两次谈话无法断定一个人是否诚心诚意地悔过，是否已经真的迷途知返。

尽管这一切很复杂，但是有一点是正确无误的，那就是对待潜在的犯罪活动，绝不能和其他的机构一样，动辄就采取镇压的措施——这是一条不应走的道路。

与此同时，决定和一个人进行公开的谈话，这就意味着承担很大的责任。有的人接受善良的劝告；也有的人佯装已经明白，把谈话看做一种警告，实际上转入更加隐蔽的行动；也有另一种人，只是把谈话看做准备逃跑的信号。

实践证明，这样的预防性措施收到的效果是正面的。但是那些担心负责任的官员们照样坚持原先的做法，他们不愿意为此冒险。“如果他逃跑呢？”“如果发生爆炸呢？”而且对于这样的质问也很难反驳，他们还会使用其他的论据来为自己的镇压政策进行辩护。“你们是想比罗马神甫更加神圣么？”他们对我们说。“你看看吧，其他国家对我们共产党人采取的是怎样的镇压手段：60年代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而遭到审判，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不同政见。而因为同样的原因，以尤金·丹尼斯为首的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送上审判席。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的命运又如何呢？只要想一想卢蒙巴和马丁·路德·金的被害，就能知道，西方世界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不会停止。美国政府禁止恰普林返回居住了大半生的祖国，还不是为了同样的原因吗？”

不管怎样我都认为，其他国家的违法的行为不能作为苏联的违法行动的托词。他们反驳我们说：“你们认为应该遵守法



律,那么你们就这样干吧。根据我们的法律(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法律),所有反对自己国家的人都会被绳之以法。这就是国家安全机关的主要职责,我们没有责任对那些敌对分子进行重新教育。”

从形式上讲这都是对的,克格勃是执法部门,而不是教育部门,不过我们还是会尽一切可能,采取预防性的措施。

---

---

## 卢比扬卡的中情局特工

冷战也和其他的战争一样，有失败和成功，有失算和胜算，这一切有时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各个国家的特工机构都要承受敌人的打击，苏联的克格勃也不例外。在所有的打击中，自己的同事的背叛可能是最难以接受的。你曾经与他并肩战斗、你可能每天都在电梯里看见他，你和他可能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见面，可能在一起处理共同的事物。

舍伊莫夫少校在克格勃总部工作，按照他的工作性质，无论在什么时间都不准外出。他应该整天在机关里，有时候甚至要工作到深夜。他的办公室不准随便进入：并不是随便什么人敲门他都把门打开，如果他要出去吃饭，或者是上级召见，必须把带有密码的门锁好，然后再拉一下门把手，确定没有问题。

舍伊莫夫曾经在波兰工作过，也曾经在几个非洲国家工作。在返回莫斯科之前，他从没有违反过规定。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他的职业是机要员。

有一天，舍伊莫夫没有来上班，大家都认为他病了，因为都知道这个人非常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忠于职守。

第二天他还没有来，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接听。同事们着急了，来到他的住宅。家里没有人。邻居们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在房管处的人员的帮助下打开了门锁。没有人。尽管房间里算不上十分整齐，可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原地。

我们来到舍伊莫夫的父母家里。他们也一无所知。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感觉到不安，他们发现两位老人的举止有些奇特。他们本该着急才对：儿子、儿媳和可爱的外孙失踪了——既不在家里，也不在工作单位。但是舍伊莫夫的父母亲仅仅是惊奇地耸耸肩，他们说，莫名其妙，他们能到哪里去呢。

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很快确定，舍伊莫夫和他的家人已经不在莫斯科，甚至不在国内。他们自己显然是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的。把三口人全部送出去，显然要得到他们本人的同意。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但是说他会背叛——我们一直不敢相信。

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一个更大的打击在等待着我们。

在一般情况下，为外国间谍机关工作的特工人员在离开驻在国返回祖国以后，要有一段时间，有时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与特务机关联系，因为他可能会被监视。只有在得到“主人”的信号之后，他才有权开始工作。舍伊莫夫接到了国外的信号——他接到了信件。当然收件人和地址不是他本人的，内容也是采用密写的方式。已经毫无疑问，舍伊莫夫已经不是第一天为敌人服务了。

这次失败是惨重的，因为舍伊莫夫是一名机要员。敌人借助他的帮助可以得到我们的密码，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外工作的特工人员传递的信息，都会被敌人截获、破译。不知道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多久。

可以设想我们的感受！首先这是可怕的羞辱，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无助和无能为力感到极度愤怒。

舍伊莫夫和妻子、女儿就这样被送出去了。是怎样做的？反间谍机关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是呀，也没有认真想，很难承

认自己的失败！

要知道，对于每一个可能与国外特务机关的任何联系信号都会进行认真的检查，但是这是自己的同事！对于舍伊莫夫案件的所有证据都很难接受，设想出各种各样的辩解，甚至舍伊莫夫所在部门的领导人也尽力隐瞒某些细节，肯定无法得出应有的结论。

正如我已经写的那样，我们发生的很多倒霉的事情，都是因为不愿对某些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些现象要么阻碍着国家的发展，要么会导致破坏性的后果。克格勃也没有能够避免这样的毛病。有谁知道呢，如果克格勃能够从舍伊莫夫的事件中得出必要的教训，就不会出现另一起类似事件——“解放苏联的斗士”戈尔吉耶夫斯基在我们眼皮底下出逃了。

各国特工机关之间的相互渗透，这是一种自然的事情，我们会打进西方的特务机关，而他们也会打进我们内部。至于外国特务机关对我们国家安全机关的渗透，无论是我们的间谍机关，还是反间谍机关，对此都估计不足。尽管相互渗透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但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竟然会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已经打入了苏联的克格勃机关，就坐在你身边的办公室里和你一道工作。当我们派人打入西方特工机关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西方的特工人员也能够打进我们的内部。安全机关觉得已经了解一些防范的措施，于是就高枕无忧了。克格勃的各级机构，都不愿意认真考虑这样的问题。

如果发生我们的人员在西方滞留不归的案件，我们一定会要进行缜密的调查，责任者要受到处罚。大概正是对于处分的惧怕心理，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行动也会十分拘谨，不会放开手脚查找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当然，能打入我们内部的人也是为数

很少的。

在我们的克格勃工作人员中，也曾发现了几名为外国特务机关服务的人员，诸如波利修克、莫托林、瓦列尼克和尤任——这些案件都作为特殊案件处理的。但是这些案件都发生在侦查局里。而反间谍局一直很平静。突然，就像晴空霹雳：我们的少校警官——竟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莫斯科克格勃分局的一名副科长沃伦采夫在给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传送情报的时候当场被逮捕了，这名美国人在莫斯科工作，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沃伦采夫被捕后，检察官责成我作为克格勃的领导人之一与他谈话。

他向我讲述了沦落的经过。他说并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策反，以前他与美国中情局也没有任何联系。是他自己主动投奔敌方的。作为一名有经验的侦察员，他知道如何逃避监控并与美方接头。沃伦采夫向美国驻苏联大使馆雇员的汽车里投了一封信，信中说愿意为对方效劳。没有回答。沃伦采夫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从个人的经历中知道，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抓住投向他的诱饵。过了一段时间他向使馆的汽车里投放了第二封信。在进行了第三次尝试后，美国人才开始回应。他们开始确认这个人对他们可能有用处，他当然不会空手而来，于是答应为他的服务支付三万美元的酬劳——这就是背叛的筹码。

美国驻莫斯科办事机构的每一个人我们都熟悉，我们也了解对我们不感兴趣的“纯粹的”外交官。而对于每一个间谍的行动我们都密切监控，掌握他们每个人的企图。他们的每一次接头，每一个行动路线都逃不脱我们的视线，为此我们并不需要持续的跟踪和专门的监控——我们熟悉每一个“同行”的面孔。无论他们更换汽车，还是从出租车换乘公共汽车或地铁，一

切都不会改变。美国的特工都有很高的专业水平。他们无疑感觉到了我们的监视，他们能感觉到我们的关照，他们很清楚，我们不会放弃对他们的关照，于是这一次他们想出了一场有趣的游戏。

“纯粹的”外交官约翰与一个名叫布朗的间谍长得很像。布朗戴上了一个特制的橡胶假面具，扮演外交官约翰。他相信我们对约翰并不感兴趣，因此不会有人跟踪他。即使在很近的距离，也很难辨别这副假面具，更何况人坐在汽车里了——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车子开出使馆。

但是我们很快便识破了敌人的把戏。于是，我们就把所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的特务都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而美国的间谍为自己的发明而骄傲，他们认为已经成功地耍弄了我们。

我们的反间谍机关出版一份新闻简报，主要内容是介绍与西方间谍机构进行斗争的策略和具体的方式方法。简报中就介绍过这种方法。沃伦采夫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过这种刊物。这位美国间谍在与沃伦采夫接头的时候被捕，这一次他没有戴假面具，他贴上了假胡子。

沃伦采夫向敌人提供机密情报，出卖了与安全机关合作的同志，供出了我们反间谍机关在跟踪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莫斯科的特工人员时的方法。

沃伦采夫一五一十地交了自己的背叛活动，他的坦诚令我吃惊。我竟然感觉到这个人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他不像是一个有明确方向的敌人。他只不过想多挣到一些钱，他像一条可怜虫，诉说他如何被领导欺负。他的确是遭到了欺负——当时发现他挪用公款。钱的数目并不大，他遭到了羞辱，受到了

降职处分。于是他决定报复,开始为美国人干事。

和沃伦采夫一起工作的同志也发现很多奇怪的现象,他们见到沃伦采夫出手很大方,很愿意借钱给别人,可是不久之前他自己还陷入债务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沃伦采夫令人厌恶,为了唤起别人的同情,他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人们不忍看到这个年轻人被利欲熏心的样子。

是呀,这是我们在“冷战”中的又一次失败。我们没有勇气向人民坦白我们的失误,从而我们也就失掉了对别人的错误评头论足的权利。美国特务终于告破,为我们的反间谍机关赢得了荣誉。当时我们的反间谍机关的领导人是阿纳托利·基列耶夫和列昂尼德·尼基坚科,他们都是忠于职守的素质很高的专家。

我们的侦察局的领导人克留奇科夫也应得到自己的荣誉,他没有护短,没有隐瞒在自己的部下当中有敌人潜伏的特务。他对揭露敌人的全部过程进行了认真分析。

---

---

## 识破假象

很久以来，就不断有人在谈论，或者撰写克格勃的故事，述说克格勃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穷凶极恶的角色，还有无数的违法犯罪的行为——似乎这都是克格勃机构的罪责。在关于克格勃活动的故事中，有时候会讲述出离奇的细节，还会指出很多“见证人”，他们在所有的罪恶现象和事实中亲眼目击了克格勃的黑手。

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些事实，从荒谬的杜撰中提出真相。我举出几件事情，从中就可以看到人们的一些传言并不公正，而那些“见证人”的幻想离开事实有多大的距离。

在某些人的眼中，所有的事情都会存在政治背景，于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到了他们的嘴里，就会变得与事实相差千里，令人们难以想象的是，如此荒谬的消息是如何产生的。

谢苗·茨维贡进入国家的高层领导之中，是借助他与勃列日涅夫昔日的关系。从特殊意义上讲，他也算是一位非凡的人物。战争时期他没上过前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之前他已经从军事反间谍部门被抽调到后方，来到奥伦堡州（当时的契卡洛夫州）。在以后的一些年里他在莫斯科工作，然后又到了摩尔达维亚，在那里结识了勃列日涅夫。在职业的肃反人员中茨维贡的名声并不太好。

我还记得，他到阿塞拜疆担任克格勃主席是谢米恰斯内推



荐的。茨维贡骄傲地对我说：“他把自己的共和国交给我了！”（茨维贡来克格勃之前，谢米恰斯内担任阿塞拜疆党中央的第二书记）。在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期间，茨维贡担任了第二副主席，此时的谢米恰斯内成了他最凶恶的敌人。

茨维贡在克格勃工作期间出版了几本书，其中有描写游击队生活的剧本，在剧本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英雄。于是他的名字进入了所有的苏联百科全书。

若不是茨维贡被媒体连篇累牍地吹捧为为正义而斗争的光荣战士，我也不会在这里写到他。关于他的死也弥漫着神话色彩。

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茨维贡自杀，原因是与苏斯洛夫的争吵，因为苏斯洛夫不同意他对于反对贪污腐败的观点。但是茨维贡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茨维贡很清楚他与苏斯洛夫的力量无法抗衡，于是作为一个坚持原则的人，茨维贡以自杀了断了自己。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版本，遗憾的是与事实相去甚远。茨维贡并不是一个有性格、有原则的人，也不可能与领导争论。恰恰相反，他一贯都是避开锋芒，从来不会进行辩论。茨维贡自杀的原因在于：他患了重病，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根本没有工作，是恶性肿瘤吞噬了这位能人。他长期与疾病抗争，最后已经无能为力，决定自愿地放弃生命。

至于谈到为什么勃列日涅夫没有在他的悼词上签字——这纯粹是一个故事。勃列日涅夫对茨维贡的死感到震惊，最终还是没有为这位自杀者的悼词签字。

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临终前写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这封信社会上流传着很多说法。众所周知，法捷耶夫临

终前写的那封信现在已经公开发表。围绕着这桩自杀案件，出现了多少相互矛盾的“证据”和漫无边际的猜测。于是报刊上就出现了无数的曾经目击这位杰出作家之死的诸多细节的“见证人”的文章。

我是第一批抵达现场的人员之一。法捷耶夫的一封书信的打字稿放在写字台上。法捷耶夫本人安卧在病榻上，上衣整齐地叠放在椅子上。从各方面看来，他在事先已经经过思考并且做好了准备。前来参与调查的还有克格勃刑侦局局长马利亚科夫将军，还有该局的副局长科兹列夫上校，也是一名有经验的侦察员。

按照一般的程序写出了一份报告。马利亚科夫想看看这封信，但是科兹列夫阻止了他：

“还需要吗，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这封信可是写给党中央的呀，”我支持他。

大家都是见证：这封信在没有送交收信人手中之前，任何人都没有读过。就让那些所谓的“见证人”任意遐想吧。这封信到了党中央，曾经阅读过的人应该是苏尔科夫、肖洛霍夫、西蒙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此外我想应该还有费定。事情是苏尔科夫告诉我的，他想要把信的内容告诉我，但是我没有同意：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sup>①</sup>，您已经在党中央作过保证，法捷耶夫的信的内容不外传。如果您现在告诉我，您就是没守信用。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一直以为，不应该知道的消息决不打听。”

这次谈话是在沃洛夫大街的苏联作家协会苏尔科夫的办公

<sup>①</sup>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是苏尔科夫的名字和父称。

室进行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站起身来，走到柜子旁，取了一瓶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他打开瓶盖，满上了两杯，他说：“你给老头子上了一课！”接着建议干杯。

这件事似乎没有必要重提，但是有时候通过小事可以认识真理。

我读过一位作家描写他访问安德罗波夫办公室的情形。他写道，他浑身颤抖着走进曾经属于捷尔任斯基的办公室。但是现在安德罗波夫办公的那座楼，捷尔任斯基根本没有在那里工作过！

全是杜撰出来的情节，当然，这并不重要，也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是让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贻笑大方。但是一个虚假消息的存在，如果认真地说，可能产生一些令人不安的传闻，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意识。

还有人说克格勃利用精神病院来隔离“坏分子”。这样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苏联国内外。还会举出一系列受害者的姓名。这种谣言之墙已经建筑了许多年，已经非常地坚固，如果你要决心把它拆毁，最终只能引火烧身。但是我又不能对此置若罔闻——因为沉默等于认同这个已经贻害无穷的谣言。

在我看来，按照很久以来形成的惯例，对于那些犯有特别危险的罪行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必须接受法医的鉴定。没有法医的鉴定结论，法庭是无权任意处置的。

俄罗斯联邦法典第70条的内容，就涉及特别危险的犯罪，根据这一条法律，所有进入司法程序的人都要接受法医的鉴定。被认定患病的人，根据法庭的裁决，可以被免除刑事责任，依据同一法庭的裁决，送入内务部所辖的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治疗。

克格勃无权干涉这些医学的结论，而且我认为，这些医学结

论是从不带有任何倾向性的。医生为什么要作虚假的鉴定呢？更何况苏联精神病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举世闻名的阿·斯涅热夫斯基院士，他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我还记得，文学报最早发表了一些关于刑事案件的报道，文中说到一些病人被判处负有刑事责任。我真的很想向舆论界证明，那些自诩为法律卫士的人，几乎全是精神病患者。

根据苏联法典第70条的规定，当时的确有几个犯人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记者就是抓住了这些精神病患者！要证明这些人确实有病，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正如报纸所说的，似乎他们都是精神病的患者。你瞧，接踵而来就是真正的巫婆狂欢晚会：某某人是反对社会制度的——不幸的病人！

报纸上几则轻率的报道，在西方引发了一场推翻苏联的运动。

报界开始造势。一下子出来了数千人，就像记者们说的那样，他们本来是健康的人，可是被国家安全机关强行关进了精神病院。我一直认为把一个人的疾病拿来在报纸上讨论是无益的，所以今天我也不想说出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那些人的姓名。

有一件尽人皆知的事情很有代表性。

格里高连科少将是当时很多媒体关注的中心——很多苏联媒体都报道他，他在西方也受到保护。他几乎成了护法运动的标志。

格里高连科少将是某军事科学院的教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他开始批评政治局，否定党的领导。他的讲话受到了严肃的批判，他本人也被调到哈巴罗夫斯克某部

队任职。

苏共二十大决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收缴他的著作和照片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对于格里高连科少将这样的事件又该如何处理呢？看上去他只不过以极端的方式反对个人崇拜，流放到哈巴罗夫斯克——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格里高连科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伤害，但是他还在继续“揭发”，他说自己受到了“责骂”。他动员自己的儿子印制诋毁国家制度的传单，两个人一起出去散发。

因为违法活动，军事反间谍机构追究了他的刑事责任，但是医学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他患有精神疾病。

格里高连科被免于制裁，但是法庭并没有恢复他的少将军衔和相应的退休待遇。这就加剧了这位格里高连科少将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对抗。

格里高连科被开除军籍之后，开始从事反社会的活动。在这期间我和他曾经接触过。我希望事态不要再继续发展。

我作为五局的局长找到了负责部队反间谍部门的克格勃副主席齐涅夫：应该恢复格里高连科的少将军衔，并发给他相应的退休金。但是齐涅夫不同意我的意见，把责任推给了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坚持撤销格里高连科军衔的人就是奇涅夫本人，是不是奇涅夫没能正确地把这个问题提给马利诺夫斯基呢。他“揭发了一个敌人”，而现在需要纠正自己的过失。这可不是奇涅夫的性格：一般来说他是一个很坚决的人，而在某些时候却又是个胆小鬼。

还有一件事情，那是在70年代末，或者是80年代初，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国际精神病研讨会。事情就是围绕着这次会议

发生的：“苏联利用精神病学打击不同政见者！”斯涅热夫斯基院士是一位不问政治的学者，是一位诚实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某些与会人员要求到医院探访。一些激烈分子认为苏联政府不会同意，于是便火上加油。但是突然，要求被批准了。而要求到医院的人数也随之减少了。

不过还是有人要求探访格里高连科，当时他正在莫斯科郊外的“白柱子”接受治疗。当谈话者们来到格里高连科面前的时候，格里高连科正坐在一台关闭的电视机前，观看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新闻节目。随后摄影记者把这这一场面发表在《施特恩》杂志上。

格里高连科事件并非绝无仅有的事例。在报纸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人的姓名，作为破坏医学伦理的见证，说什么这些健康的人，被克格勃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而当他们来到了西方，他们在那里同样被送进精神病院。这种“无辜受罪的病人”不仅在法国、英国、以色列的医院可以遇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不乏其例。那些发起所谓的“精神病院”运动的人，当然不会把自己的难言之隐告诉读者。他们认为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因为在他们这里，不会因为诽谤别人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令人遗憾的是，精神病院的传说至今还在到处流传。

不止一次地听说：克格勃从事政治密探活动，他们不仅窃听私人电话，而且窃听到苏共中央和其他高级的政府机关的通话。奇怪的是说这话的人中还有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还有政府的首脑。批驳这样的奇谈怪论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最近竟然出现了来自安全机构的见证者。

监听电话是所有的安全机关都采取的手段，但是这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做，而得到这种批准

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还是想说明一下实际情况。首先,在我们国家不存在任何大范围的监听电话的情况;第二,根据直接指挥克格勃的党政机关的决定,禁止对苏联的各级党政领导人、对被选举的共青团和工会的干部、人民代表进行电话监听,任何人不得违反上述命令。我这样写不是为了辩白,只是为了澄清事实。

---

---

## 知识分子和公开性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与广大群众进行交流，于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经常在公众场合讲话。我们在各种集会上讲述我们安全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务。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广大群众了解安全机关的工作。

1956年12月我作了第一次公开讲演。我还记得我激动地走进全苏国立电影学院的大门。那一年因为匈牙利事件而引发了许多的动乱，同胞们关注的中心，集中于苏共二十大上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大清洗”。

会上出现了激烈的辩论。我还记得一名女大学生拉莉萨·舍皮季科，她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导演。她傲慢而尖锐地挖苦我，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恼怒。和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们的会面持续了四个小时，分手的时候已经很友好了。后来又参加了无数次的这类集会。有一次，我在作家协会礼堂讲话之后，著名的作家列夫·卡西利走到我身边，他说：“您很坦诚地谈到了我们的生活，给我的感觉是朋友之间的促膝谈心。可是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禁止谈论的话题。”

我们谈了很多：我们认为，不论是在执政的领导人中间，还是在作家中间，都不应该存在虚伪和两面派的表现；对于那些给社会带来害处的荒诞的流言飞语，我们都应该严肃地对待。我



他们还谈到了对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冲突的反应，谈到了反对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斗争，还有贪污腐化等等。当然也谈到了西方特务机关的挑衅——当时正是冷战时期。

知识协会不止一次地邀请我在科技馆演讲，我也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报刊总编讲话，还有两次在苏联科学院发表讲话。但是我最喜欢面对大学生。在我的记忆之中，最有趣的是和莫斯科大学、鲍曼理工大学、音乐学院、大剧院附属学校、外国语学院以及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们的会面。

每当参加这类的集会，我总是尽量和听众沟通，无论是愉快的还是苦涩的集会，我从来没有回避过尖锐的问题。

对我本人来说，这些演讲就是一种激励，同时也是一种检验：人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我们的工作。我当年在堪察加半岛的一个区俱乐部演讲的时候，当地梯利奇卡村的一名渔妇曾经对我说：“你们在莫斯科要睁大双眼，好像那里的人对我们的生活一点儿也不了解。”时至今日，她的声音仍然在我的耳边回响。

亲爱的，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生活。

但是正如塔拉斯·布利巴曾经对果戈理说的：“一种力量克服了另一种力量。”我们的力量被僵化和虚荣给腐蚀掉了。

\* \* \*

党的二十二大上通过了一个长期发展纲要。这个纲要从一开始就是不现实的，以致最后造成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当最终得知纲要规定的目标无法实现的时候，党的威信就完全被破坏了：人民不喜欢说大话的人。

长期以来，人们得到的教育是来自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发出

的消息。在那些年里，所有的大众传媒对任何一个现象都是一个观点：不是共同赞扬，就是一起咒骂。

这种状况无疑只能给我们在思想战线上的敌人增添了新的口实，因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看到了真理，但是我们的口径一致的宣传机器则会令人感到疑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对官方的信息抱着怀疑的态度，要么就根本不相信。

党中央的领导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他们往往要干涉知识分子的创作过程，干涉文学和艺术的创作问题，其实他们对这些问题往往一无所知。

例如，在60年代经常会有人指责，说俄罗斯作家们的作品在国内被禁止出版，因此他们不得不栖身国外。当然西方的特工机关和移民中心往往会利用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失算上面赢得自己的政治资本。

每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禁止都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但是为了公正我必须指出，确实有人真正为我们文化痛心，由于遭到禁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不仅一部分知识分子明白这一点，党中央的文化和宣传部门和一些其他的部门同样明白，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党的领导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样一来，一大批俄罗斯文学作品不能与读者见面，很多生活在境外的天才的俄罗斯人的代表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当中包括弗拉季米尔·纳波科夫、鲍里斯·扎伊采夫和叶夫盖尼·扎米亚金等等。

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的报告中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国家安全机关无权处理这一类问题。我们很清楚，早晚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被禁止的书

籍越多,知识分子的反应就会越尖锐,总有一天会有人会因此而以身试法,到那时候,没有我们的介入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最好还是事先采取预防性的措施,尽管这不属于我们管辖的范围。我们认真研究了“被遗忘的”作家的书目之后得出结论:所谓这些作品会腐蚀读者,纯属无稽之谈,这些作品对于祖国的文化应该有杰出的贡献。

我们给苏共中央发出了一封工作函,信中论述了出版一系列海外俄罗斯作家作品的必要性,其中还包括一些被禁止的作家,例如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奥西普·曼德利什塔姆、布鲁诺·亚欣斯基、帕维尔·瓦西里耶夫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

党中央中第一个看到这封信件的是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杰米切夫。显然我们的信使得他很不高兴。虽然苏共中央机关对这封信持批评的态度,但是还是认真对待。文化部门的干部和我们一样,很理解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过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一些遭禁的书籍终于出版了。只是尼古拉·古米列夫的书籍还没有解禁,至于为什么,至今我也没搞清楚。想出版他的作品的不只是我们。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一书记马尔可夫也为了此事到处奔走,《诗歌年鉴》的主编拉莉萨·瓦西里耶夫娜几乎敲破了所有机关的大门,恳求批准出版古米列夫的诗歌集,不过最终还是一筹莫展,古米列夫的诗歌直到苏斯洛夫去世后才得见天日。

我在这里还要说一件事,苏共中央的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往与他们的领导人的意见不同,他们感觉到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应该放宽原先的标准。他们与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因此十分困难。主管某领域的领导人的话,对于该部门来说就是圣旨。

相同的境遇把我们与一些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于是我们共同起草一些决定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原则上我们很融洽。当然也不是尽善尽美。

我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70年代末莫斯科在青年创作人员的工作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问题不在政治方面，而在于生活方面——关于他们的物质保证、投入创作力量的可能性、必要的创作特点的保证，最后还有住房问题。这一切影响到青年创作人员的情绪，从而对政府产生了不满。

克格勃认为应该用专函把这一切向党中央进行汇报。党中央的文化处长沙乌罗很赞成我们的信。

苏共中央领导的反应受到了广泛的拥护。党中央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在党中央的决议中反映了我们提到的问题。这就使得刚刚走上创作之路的青年人所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后来沙乌罗说道：“是苏斯洛夫同意了你们的信件的观点。谢谢你们，换了我们，很难如此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本身就在这个机关呀”

当然我们做起来要容易些，因为信件不仅仅是以克格勃的名义，还有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的署名。

电影工作者发生的问题也不少。1961年早春，我从列宁格勒返回。我到那里是为了拍摄纪录片《面对历史的法庭》。电影的主角之一就是舒尔金。这位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国家杜马议员，他曾经是苏维埃制度的最坚决的反对者。时代虽然改变了，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变化。这部纪录片我很喜欢，舒尔金几乎是片中的主角。我喜欢这部片子也很偶然：我了解这位海外俄侨的代表人物的一段故事，这件事与克格勃有直接的

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1925年的冬季，舒尔金以外国公民的身份悄悄地回到苏联，他的名字是爱德华·施密特。舒尔金在当年曾经是志愿军团的奠基者之一，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的倡议者，他曾经积极参与了邓尼金和弗朗哥军队的活动。到了国外他很快地就成了白色运动的中心人物，持续不断地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

舒尔金很清楚，如果他在苏联境内被逮捕，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但是这一次他并不是毫无理智的冒险，对此次俄罗斯之行进行准备的不是他一个人，很多可靠的、有经验的战友帮助了他。

他进入“已经腐朽了的俄罗斯”的目的何在呢？大概是“看看祖国”这样的自然愿望。多年来，舒尔金在各种不同的讲台上发表演说，讲述布尔什维克手中的俄罗斯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不堪入目。当然他的讲演材料也是他的同谋者们准备的。但是使用别人的语言来评判一切是一回事，而自己亲眼看见——是另一回事。

他的此行是很完美的。舒尔金在苏联的期间没有一刻的休息，他到过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故乡基辅，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了什么地方，舒尔金带着全新的印象回去了。

可以设想一下，他认为自己胜利了，他是围绕着肃反队员的手指头转了一圈。让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姓名、民族和国籍都是在苏联克格勃大楼里炮制出来的，甚至这一次旅行本身、准备和实现也是肃反队员们安排的。

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最后还让舒尔金离开了国境？似乎是

应该把他作为苏维埃的敌人抓起来，逮捕并依法进行严厉的审讯。但是肃反队员们的行动是有其长远目标的：他们所了解的舒尔金不仅是一个反苏的侨领。我们要说，在本世纪初期，在国家杜马里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了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讨论，而且也在出版物中，特别是在舒尔金主编的《基辅人》报上进行讨论。舒尔金并不是犹太人的朋友和保护者，此外他还出版过反犹太的作品。1913年巴利斯被指控为了某个仪式而杀害了一个名叫安德列·尤申斯基的男孩，但是在巴利斯的案件中，舒尔金和他的《基辅人》报站在原则的立场上，坚持证明这是一场诬陷。在另外一个涉及原军事部长苏哈姆利诺夫的案件中，他同样采取了原则的立场。苏哈姆利诺夫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可以想见，舒尔金很清楚自己的表现可能会引起沙皇的不满。还可以举出不少的例子来证明，舒尔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秉公而断。

我相信，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正是立足于舒尔金的这些品格，他们希望舒尔金亲眼看到自己的祖国的时候，一定会停止他的无稽之谈。

当然这是一次冒险。假如舒尔金回去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苏联呢？的确，这是冒险，但是也不是毫无根据。肃反工作人员们掌握了很多的事实，证明即使是对新俄罗斯最凶恶的攻击，也是一个人可怕的迷失的结果。

我们的考虑是正确的。舒尔金返回之后，有人请他简单地说一下感受，他说道：“简单？好呀。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没有了祖国。现在我有。”

很快出版了一部名为《三个首都》的作品。里面有这样的句

子：“现在我明白了：俄罗斯站起来了……我期待着看见垂死的俄罗斯人民，但是我看见的无疑是他们的重生……我想我在前往一个垂死的国度，而我看到的是觉醒了的强有力的民族……”

当然他的作品并不是苏维埃制度的颂歌，他在一些篇章中猛烈地攻击列宁。其实这样的人物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新人。不过舒尔金开始怀疑自己原先的立场。1961年他在《致俄罗斯侨民》一书中写道：“即便有人问我：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对人们是有益的吗？”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共产党人现在，也就是20世纪后半叶所做的一切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他们所带领的两亿两千万人民所必须的。除此之外，他拯救了全人类，捍卫了全世界的和平。”

舒尔金在1966年摄制的一部电影《面对历史的法庭》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和你们说说列宁。我现在已经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因此我认为，我在《三个首都》一书中的说法不仅是侮辱性的，而且是不值一提得……我认为我有义务作为见证人，列宁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神圣的人，一个神圣的人。所以他的遗体才被保存的列宁墓中。”

不能说舒尔金在生命完结之前又获得了重生，然而也不应该忘记，他对苏维埃制度的看法的根本改变也不是自然产生的。我确信，这个重大改变，就开始于国家安全机关为他安排的秘密的苏联之行。

电影《面对历史的法庭》的导演是艾尔姆列尔和瓦因什托克。我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看到的材料是很有意思的。银幕上的舒尔金很不错，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很自然。他并不迎合自己的谈话对象。这是与环境的契合，而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的人。无论是他的工作，还是他的热情，都看不出他这一把年纪，

他的犀利的语言不减当年。遗憾的是他的论敌显得很苍白。

我在莫斯科见到了舒尔金，那是在瓦因什托克导演的家里。他家住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街。主人很热情，亲自下厨招待我们。他的烹调手艺很不错。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电影。我不愿意触动舒尔金的过去，战后他曾经被关进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而且他本人也不愿意提起这一段经历。席间舒尔金很幽默地回忆起拍摄电影的情形，他对于自己的“演技”颇感骄傲。

“难道说是国家杜马教会了我演戏？”他好像是对自己提出了问题，然后便放声大笑起来。

接下来又辛辣地嘲笑扮演他的对手的历史学家：这个倒霉鬼太认真了，无论如何我也变不成虔诚的共产党员。

“我所以同意参加电影的拍摄，就是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我并不是为了宣传”，舒尔金最后说道。

我趁机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年来他是如何评价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意味深长地慢慢说道，当然，俄罗斯最好不是走这条路，但是看来，也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每个人对这件事情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舒尔金补充说，“但是十分可喜的是，当时俄罗斯并没有分裂。”

此刻我不禁回忆起他的这句话。即便是舒尔金这样痛恨社会主义制度人，也会对俄罗斯不曾瓦解、不曾分裂成一些小国而感到安慰。很想知道，他对今天的情况作何感想……

电影的结尾部分是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的地方拍摄的。舒尔金得知后很受触动。

电影《面对历史的法庭》没有在电影院里公映，只在一些俱乐部放映。这也难怪！弗拉基米尔州委第一书记波诺马廖夫就



曾经上书苏共中央，坚决反对在苏联的银幕上放映革命的敌人的电影。

瓦因什托克早已经去世，他给世人留下了几部很好的影片，我个人认为，其中特别优秀的一部是反映苏联侦查机关工作的电影《死季》。他的另一部纪录片《喀布尔公使馆》是在阿富汗的最后一位国王的赞助下拍摄的。影片反映了20年代苏联与阿富汗的友好关系。有谁能够料到，这样的关系会导致今天的结果呢。

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人在传言，说克格勃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无孔不入的，甚至在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情中也能够看到他们。的确，不少因为各种原因而流落他乡的天才人物，在我们的帮助下走上了返回祖国之路。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不要干预呢？当然不是。于是我们管了一些不属于自己权限范围的“闲事”，为的是避免一些公开反对苏维埃制度的行为，也是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不满情绪。

于是我决定约见著名的作家和记者梅德维杰夫。本来建议他参与国家历史的编写，可是此事未能成功，一些护法的官吏们把他开除出党，梅德维杰夫丢掉了工作，于是他出走了，去挣一口“自由的面包”了。西方的报刊上开始出现他的文章，他的一些书籍在西方出版。他不仅变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一面旗帜（尽管他一直坚信社会主义），而且成了那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们的一个榜样。克格勃人员在与他谈话和接触中都格外小心，以免触犯法律，也许正因为如此，遗憾的是，这种小心翼翼的接触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由于梅德维杰夫说过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们的一些坏话，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开始有人攻击克格勃犯了自由化的错误。还有人在勃列日涅夫耳边进言说：“你

看，您的那位安德罗波夫。他不但不捍卫国家领导人的荣誉，反而放任梅德维杰夫这样的人说您的坏话。”

梅德维杰夫开始在西方出版《政治日记》杂志。我不记得是哪一家出版社，但是这是一家反共的出版社。我决定和作者谈一谈。约见的地点在中立地区，我也没有隐瞒自己的克格勃领导人的身份，而且参加谈话的另外一个同事也有公开的官方身份。我并没有和他讨论他的文章的内容，我只是提议他不要与反共的出版社合作。他回答说：

“与我合作的是共产党的出版社，具体的就是《团结报》。”

“我说的不是这个……”

这是一次很长的谈话，在我看来也是很有趣的谈话。我发现了谈话对象的弱点和力量所在，我了解到他的正确之处和迷失的地方。对我来说，了解这一切是很有好处的。这次会面的结果令我高兴：梅德维杰夫中止了与共产党无关的出版社的合作。他的《政治日记》也不再出版了。梅德维杰夫现在只与共产党的出版机构发生联系，明显地倒向“社会主义范畴内的多元论观点”。后来雅科夫列夫肯定地说，这是背离共产主义方向的漂浮。但是时间证明，梅德维杰夫并不是漂浮，他只是从原则上不同意苏联所采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

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梅德维杰夫开始与西方的共产党合作，现在的一些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对他的攻击，只是来自另外的渠道。

我们坚持认为，做人的工作并利用他们在思想工作上的潜力，这是很有必要的。党中央对这样的要求已经予以注意，这从另外的例子可以看出。

70年代初，我们获得了一个情报，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卡尔

平斯基想建立一些地下图书馆来传播禁书。我跟卡尔平斯基很熟悉,也知道他对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持非传统的观点。我欣赏他的博学和深明事理,还有他的思想的自由和对政治事件的宽阔视野。我们曾经多次在共青团中央见面,每次见面都为我们提供开拓思维的土壤。当卡尔平斯基被调到真理报后,他和著名的记者布尔拉茨基一起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党在文艺领域的工作。这引起了党中央的震怒。从此卡尔平斯基被排除在积极的社会活动和记者活动之外,他自己也变成了持不同政见者。

他的观点也许与我相同,也许不与我相同,这都没有任何意义。至于说他要创建什么组织,这倒使我们感到不安。我不希望这位进步出版社的思想问题编辑卡尔平斯基真的变成持不同政见者。

我思考再三,决定邀请卡尔平斯基过来,进行一次客观的谈话。

他希望我能够对他的活动进行政治上的评价,但是我,说实在话,却极力避开这个话题,只想和他谈党中央——我们两人都知道党中央对他没有好的印象。但是他是一名苏共党员,于是我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扮演官方的角色,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防止他误入歧途。卡尔平斯基理解了我的用意。

正如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在《首都》杂志中所写的那样,卡尔平斯基对我的唯一不满之处,就是我没有请他喝茶。我真后悔,我不记得了,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尽管我一般不会这样做。

我向安德罗波夫汇报过这件事。我记得他从桌子后边站起来,长时间地在办公室内踱着步,他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在紧张地思索。后来他停下来,紧紧地盯住我。

“很不好，不该让卡尔平斯基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就证明我们家里的事情做得不好。就不知道党中央是否能理解他……”

安德罗波夫委托我把此次谈话向叶·佳热利尼科夫汇报。他很了解卡尔平斯基，有可能对他施加影响。佳热利尼科夫也同意我们的意见。

但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卡尔平斯基不能理解。于是卡尔平斯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我再举一个克格勃干预个人命运的事例。

1988年《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篇文章《我不能按原则办事》，雅科夫列夫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表示强烈的反对。他认为安德烈耶娃在号召返回斯大林时代。《苏维埃俄罗斯报》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现在并不想重提安德烈耶娃的事情，我要说一说她的丈夫克鲁申。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好人。他开始散发批评改革的传单。我来到列宁格勒，和当时的克格勃分局局长普里鲁科夫一起找他谈话。谈话的内容就是传单不应该搞。克鲁申表示同意，尽管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的很多想法还是正确的。

当时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警告克鲁申，让他不要采取触犯法律的行动。

知识分子不满的原因很多。不过在“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现在有一种很普遍的意见，似乎克格勃，具体来说就是五局，所造成的环境使得从事创作活动的作家、演员、画家和雕塑家无法承受，认为我们已经把有天才的艺术人才都排挤到了国外。似乎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出国是因为缺乏创作的自由。

大概很多人还记得当年围绕着《梅特罗波利文摘》掀起的轩然大波。那是一群莫斯科作家的杰作。

在此之前，他们当中的一些作家以合作或单独写作的方式撰写了一些关于莫斯科契卡的书籍，并在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支持下出版。

美国的出版商普罗菲尔对这部文摘感兴趣。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以第一书记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莫斯科作家协会反对出版这部文摘。他召开了书记处的扩大会议，会上有 15 个人支持他的意见，其中有一些是很有名的作家。他们的意见是这个文摘的文学性不强，出版这样的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一些与会者认为文摘中有一些反苏的成分，要求对这些作家严肃处理。所有的发言都在《莫斯科文学家》的刊物上发表出来。

苏联作家协会主席马尔可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关于对部分作家进行制裁的要求很可能导致作家协会的分裂，因为很少有谁知道文摘的内容和历史渊源。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部好书，而克格勃禁止出版，另一部分人明白，这是一部分反苏人员在以某种方式来表现自己。一时之间，一场围绕着《梅特罗波利文摘》的辩论闹得沸沸扬扬。

在作协书记处会议之前，克格勃已经决定同意这部书的出版。我们很清楚，被收进文摘的文章并非是什么高水平的作者，其中有一些也不是原创作品。尽管该书谈不上什么爱国主义的著作，但是也没有什么十分严重的问题，读者在阅读当中自己会分辨是非。我们并不准备干涉这件事情，只是希望大家都能看到，这些人所说的“克格勃禁止文摘的出版”，纯属无稽之谈。

我还记得马尔可夫、库兹涅佐夫两个人在圆柱大厅和我进

行的两个小时的谈话。那可是平时召开党的会议的地方。我们希望不要激起众怒，还是出版这个集子。我们认为这样的问题最好按照作家的方式解决。此外，很多人早已了解《梅特罗波利文摘》，也了解围绕着这次出版的政治风波。

但是莫斯科作家协会理事会的秘书处已经决定：封杀《梅特罗波利文摘》。从此这本文摘在苏联就没有面世。

为什么库兹涅佐夫竟敢公然对抗马尔可夫和克格勃的领导呢？原来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有这样的要求。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在作家协会秘书处会议上说了这样的话：“若不是克格勃的反对，这个集子我们已经出版了！”而不明真相的广大读者肯定会认为：就是因为克格勃反对，这个集子才只能在国外出版。

令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两年之后，当库兹涅佐夫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梅特罗波利文摘》的时候，他强调说，他们苏联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秘书处并不同意制裁的措施。像这样背离原则的现象，直至今日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屡见不鲜的。

有人对于《梅特罗波利文摘》和《文学莫斯科文摘》的命运进行了对比。后者的两卷本在1956年出版，后来遭禁。《文学莫斯科文摘》也不是国家的出版社出的。《文学莫斯科文摘》的出版并无私利，编辑们甚至拒绝收取报酬。但是，《文学莫斯科文摘》不符合某些国家领导人的口味。什么“独立出版物”？一定要在文摘中找出罪证。而且终于找到了——亚历山大·亚申的中篇小说。

坦率地说，亚申的小说里并没有任何令人震惊的新内容。他写到了一系列熟视无睹的负面现象。但是他是巨大的艺术力量来揭示这些现象的，这就使得人们再也不能漠然处之。这

些负面现象中所涉及的人物最先感到不安，他们已经不能在沉默。这样一来大众传媒就把致命的批判矛头一下子对准了作者本人。其中一些媒体甚至指责他有意识地对苏联的形势进行诽谤，说他是反苏分子。批判的矛头还不仅指向了作者。往往还会有这样的问题：“编辑人员怎么会出版这样的东西呢？很可能此事并非出于偶然？”

文摘本来是要变成年鉴，但是这样一来就被扼杀了，后来只出版了个别的期次。

艾马奴伊尔·卡扎凯维奇这个人我很熟悉，我见过他很多次。我见过他为文摘认真地编辑田德里亚科夫的中篇小说《创造奇迹》。他很关心苏联文学的命运，关注如何保持苏联文学在精神上的纯洁。他和他的同事们就是这样来对待他们的新的孩子——文学莫斯科。

我与卡扎凯维奇的结识是因为一部两卷集的克格勃回忆录。我想请他参加这项工作。卡扎凯维奇支持这个想法，还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建议，遗憾的是这本回忆录出版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并不是说我们根本就不曾插手文学事业。但是，诸如梅特罗波利文摘这种情况也是绝无仅有的。

有一次在莫斯科传出了一个消息，似乎在希特勒生日那天，一群新法西斯分子在普希金纪念碑下举行了集会。据目击者证实，集会者的胳膊上带着有法西斯标志的袖章云云。

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既没有聚会，也没有袖标——全都是人们的杜撰。但是不久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找到克格勃的新闻组，要求就涉及科委的一篇文章进行咨询。他们送来了清样，这是一位著名诗人写的一首长诗的开头部分。新闻组的同

事们纯属好奇阅读了这篇文章。其中有几行文字，作者自称是“目击者”，亲眼见到了新法西斯分子在普希金广场上的示威活动。

关于新法西斯分子示威活动的传闻是一回事，而一个知名诗人把这当做一个事实来写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位作者此刻正在哈萨克斯坦，我打电话过去和他谈了这件事。原来他也是相信了这个传闻。他说：“全莫斯科都在谈论这件事情。”最后他把这段文字删除了。当杂志出版时，我阅读了他的诗篇。这篇诗歌没有因为删除了一段虚假的文字而逊色。我认为这样的干预是有益的。

很多人至今确信，似乎是五局禁止某些文学艺术作品的出版。这是没有根据的谎言。在我担任五局局长的那一段时间内，只有一次，那是电影《垂死挣扎》遭到禁演，因为那部电影有反对革命的倾向。事实总归是事实。我再说一遍，这是唯一的一次。

的确发生过很多干涉文学艺术作品的情况，不过那是其他部门干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都被扣倒了克格勃的头上。

例如，有两名作家的命运是很典型的。起初两个人很相似，后来分道扬镳了。

文化部部长杰米切夫曾经出席莫斯科作家的一次党的会议，共产党员斯韦尔斯基在会上发言。作为一名作家，斯韦尔斯基并不出名，很少有读者知道他。他曾经是一名作战勇敢的空军飞行员，他为人正直善良，但是有些幼稚。他的发言主旨是目前国家反犹太主义势力猖狂，而反击斗争却很不力。他的发言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有些情绪化。

会议休息期间同行们来到他的身旁跟他握手，称赞他的勇



敢，并且赞许地拍他的肩膀。其中有一个人情绪特别激昂，我不愿意提他的姓名，我在这里用字母表中的最后一个字母“Я”来表示<sup>①</sup>。他总是喜欢显示自己，但是一遇到麻烦，就会躲在别人的身后，把别人推出来做挡箭牌。现在这个人隐瞒自己的观点，粗暴地践踏我们的过去，甚至践踏那些对于每一个诚实的人都最神圣和珍贵的东西。

与会的很多人都愤怒了：“怎么？我们苏联存在反犹太主义？这纯属诽谤！斯韦尔斯基是在杰米切夫面前羞辱我们！”

我不记得党委会作出了怎样的决议，不过斯韦尔斯基被开除了党籍。此后在党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斯韦尔斯基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他提出的问题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是过于言重了。

州委第一书记格鲁济诺夫听过他的发言之后说道：

“我们现在不作决议。我们不必着急，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更正刚才所说的话，你书面写好送过来。”

但是还有一些人进行挑拨，其中也包括那位“Я”。“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英勇的飞行员，你怎么能退却呢？你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支持你，千万不要投降！”他一连几天为斯韦尔斯基打气，最后也真的起到了作用：斯韦尔斯基向州党委交出了一份比原先发言更加激烈的书面声明。结果他被开除了党籍。我认为这个决议是不正确的。这个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这不过是在党内的会上发言，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是他的权利。可以同意他的意见，也可以不同意，但是为什么要开除他呢？不过那是另一个时代。

<sup>①</sup> 俄文字母 Я 不仅是字母表中最后一个，而且它的意义是“我”。

即便没有这件事情，斯韦尔斯基的作品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出版。他被开除党籍之后，作品就更不用出版了。而那些挑拨是非的人们，包括那位“Я”在内，此时便躲进角落。斯韦尔斯基明白了，他不会得到任何支持，于是便出国了。后来他怎样了——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个人的悲剧中，谁是罪魁祸首呢？当然是克格勃，是克格勃把他挤对到国外去了。那位“Я”和他的朋友们就是这样说的。把他们绳之以法？

我时常想起另外一些作家的命运，起先他们与斯韦尔斯基也很相似。在一次作家的党员会议上，一位已经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米哈伊尔·罗欣发言，他说苏联应该走捷克的道路——他认为其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喧哗，当时我们的军队刚刚进入捷克不久。

表现得最气愤的是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当然他很熟悉罗欣的作品，但是他还是说：

“我不认识这位青年人，也不知道他指给我们的是一条什么道路。”

他建议开除罗欣的党籍。而负责处理罗欣事件的党委会作出了挑战性的决定：给罗欣记过。这一决定引起了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克区委第一书记格鲁济诺夫的严重不满：“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开除他。就让他去走他喜欢的道路吧。”

罗欣的周围没有那种挑拨是非的人。即便是有，也未必能够对他产生影响：他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他善于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行为。在召开党委会的前一天，负责向会议报告罗欣的个人情况的委员对他说：

“我并不是想做你的工作，只是想和你交换一下意见。我可

以确切地告诉你：如果你还坚持上次会议上的做法，你肯定会被开除。如果你能认识到你说了傻话，那么我就是你的同伙，请相信，是一个可靠的同伙。”

在党的会议上罗欣并没有表示悔过。他只是说他对捷克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此时一位党委委员接过话头说道：

“当然，罗欣原本应该开除出党，不过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做。他出生于一个革命的家庭，上大学的时候担任过共青团的团委书记。主要的还不在于他一时激动说过些什么，重要的是他都写了些什么。我手里就有一本刚刚出版的他的小说。尽管其中也写到了不少负面的现象，但是他不是站在幸灾乐祸的立场上，而是为此感到痛心。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们认为不应该扼杀一个天才。”

区党委同意了基层党委的意见。众所周知，罗欣已经是一名很好的剧作家。多年来他的剧作一直在各地的剧场上演。我不知道，假若这位天才的作家的命运不是这样，那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这两件事情与克格勃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尽管诸如“Я”和他的朋友们已经编造出一些消息，竭尽全力地散布说：“这是克格勃的牺牲品（指的是斯韦尔斯基），也是克格勃的失败（指的是罗欣）。”关于五局的故事就是这样编造和散布的。

我应该指出，党组织和社会团体一般都不会关注那些不正常的状态，而这些地方恰恰是他们应该干预的。不过即便是进行干预，他们也会采取极端的措施，而这样做只能带来害处。在斯韦尔斯基的事件、《梅特罗波利文摘》和很多其他情况下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们竟然会采取意想不到的可耻的行动。有一件事情我不能不说出来。关于这件事情，当年曾经有很多人谈论过，也写过不少的文章，不过我在这里只写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一个星期天，五局的值班员别捷耶夫打来电话，他通报的消息令我一时不知所措：在别利亚耶沃区举办的一个现代派画展，让人用推土机给推平了。我问他采取了什么措施。

“派了一些人去抢救展品。”

我震惊了，只是说了一句：

“一定要关注那些画家！”

我还记得另一次在马涅日展厅举办的画展，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画展被砸了。这个事件已经被多次详尽地报道过，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一直到深夜，五局的人员还在和画展的工作人员一道收拾狼藉不堪的展品——这些画被认为没有资格在苏维埃观众面前展出。我还记得从地上收拾起一幅吉尔吉斯姑娘的漂亮肖像。毫不掩饰地说，当时画展被砸的恐怖场景在我的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

这不是吗，又出了新情况，画展被推土机推了……有多少展品能得到挽救呢！

最可怕的不是赫鲁晓夫不懂得绘画艺术，他对文学也一窍不通。作为国家的元首不一定要通晓文化艺术——当然希望他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在马涅日展厅发生的悲剧是一个国家元首对文化艺术领域的粗暴干涉，虽然他并不了解这个领域，但是他却装做一位高级专家那样评头品足。他竟然敢责备那些专家，还要煞有介事地说什么：这是人民需要的，而那不是人民需要的；这是人民喜欢的，而那是人民所不喜欢的，云云。

别利亚耶沃的事件很快就水落石出了。用推土机铲平画展，是切廖姆什金区党委下达的指令，党委第一书记是恰普林。这场暴行被制止了，但是很多展品遭到毁坏。

这种横行霸道的行为的根源何在？在60、70年代，美术界

各个流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场的画家遭到了来自左右两侧的攻击。我不打算对各种流派的优缺点进行评论,我本人对于好的艺术作品非常喜欢,不论它是属于哪一个流派。我喜欢参观各个流派的美术展览。

我记得与一些美术大师的会见和谈话。他们找到我,向我吐露自己内心的隐秘,或者向我展示自己的作品的内涵。不过我也不避讳,我更喜欢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更贴近我的内心,使我感动,似乎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触。

当然克格勃不会充当各个美术流派之间竞争的仲裁。但是有的时候情况会迫使我们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在这方面西方也会抓住一切微小的机会煽风点火,对先锋派的代表们与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一些现代派的美术作品,往往是一些比较差的,都被他们成批的或单独地收购。再为他们制造出一股“热潮”。当然这就会很快地引起反应:现代派美展遭到禁止,于是引发了现代派艺术家们的抗议。

双方都不愿意妥协。现代派画家们在街头或其他场所举行示威,先锋派画家们在会上讲演,宣称政府扼杀他们的艺术,阻碍属于未来的新的艺术流派的发展。一些画家表现得很激烈,希望成为维权斗争的受害者,借此在社会上赢得一定的声望。

别利亚耶沃的画展就是这样。画展本身并没有面临任何危险,只不过是那些参展者向政府提出挑衅。而对方也很快地应战了——匆忙之中对这些新生派画家使用了推土机。若不是赫鲁晓夫在马涅日展厅捣毁了画展,一个区党委的书记也未必敢作出这等荒唐的决定。

不难想象,这一下子在全世界的媒体上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而我们可以坦诚地说,真的是无言以对——这是史无前

例的事件。

但是对于我们对敌人来说，他们的活动空间却十分广大，他们占领了这个平台，从这里发动起新的、精心策划的进攻。他们不惜花重金资助我们的画家出国，一下子便收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第一，掀起新一轮宣传战；苏联人不允许天才的画家们进行创作活动；第二，在这里有一个打算：被资助的画家们来到西方就会加倍地感谢赞助人，更加积极地投入冷战之中。

他们取胜了。来到国外的画家们积极地在莫斯科和巴黎举办先锋派的画展。他们期望着我们禁止举办这类的画展，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开展新一轮思想上的冷战。

并不是所有的参展者都了解其中的内幕。其中很多人把自己的画作拿到画展上来，对自己能够参加国际画展感到骄傲。

我们不禁要问，对这样的事情应该如何应对呢？批准举办展览？或者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关闭展览，驱散观众？要不然就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揭穿画展的幕后指使者，戳穿他们的政治目的？

于是在《莫斯科画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以翔实可信的材料介绍了西方导演的剧本，并且向画家们发出号召，请他们每个人都好好地想一下，他们参加这样的画展，到底是服务于社会，还是在加深一道相互隔绝的鸿沟。

结果画展没有举办，因为其中的政治挑衅的意义已经被大家看清。你看，不用推土机也可以把事情处理好。

不久之后，克格勃和莫斯科的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谈妥，在小格鲁津大街的一栋房子里和国民经济展览馆的一个展厅里举办先锋派画展。这样一来，各个画派的画家都获得了进行艺术探索的可能，尽管某些政治派别的政治家们偶尔还会利用这一

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创新派的画家就这样应运而生的。

应该说在那次推土机事件之前,我和所谓的先锋派画家们就有了广泛的联系。我对他们感兴趣,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有才干的画家,还因为他们是西方某些人物关注的中心,在西方把他们当做苏联的反对派。苏共中央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既定的路线,恰恰相反,中央对于造型艺术领域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两面性。在苏联举办了费尔南德·莱热<sup>①</sup>、毕加索等人的画展,然而康定斯基、法尔克、马列维奇<sup>②</sup>等画家的作品则销声匿迹了。所有想在艺术上使用新语言的人都遭到遏制。我不禁要问,这与克格勃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所有人的目光都盯上了我们,全社会都认为,一切禁令都源于这里。因为克格勃要应对各级机关的咨询,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先锋派的画室,同每一位画家交谈,每一次都要倾听他们的陈述,我应该确信他们都想要为整个俄罗斯服务。

新生派的画家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只是追求新颖,追求在艺术中的自我表现。我对于各个艺术流派的优缺点不加以评说,我有自己的任务——保障国家的安全,绝不允许把苏联公民作为西方的“志愿者”来利用。

当然,追求现代主义的人也是形形色色的:有的人怀有真诚的艺术信仰,有的人则恰恰相反,有真正的天才,也有彻头彻尾的蠢材。生活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我不知道,那些在

---

<sup>①</sup> 费尔南德·莱热(1881—1955)法国画家。把先锋派画风与通俗信念和对乐观的幻想融合为一体。

<sup>②</sup> 康定斯基 Кандинский,俄国画家,抽象派艺术的奠基人。Фалька 法尔克,苏联画家,红方块王子画会成员。Малевич К. С. 马列维奇,苏联画家,至上主义抽象艺术创始人。

异国他乡寻求庇护，而今天又想利用自己的过去在俄罗斯获得支持的人，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请你们走上克里米亚大桥，来到中央画家之家，看看那些在雨雪中被毁坏的画作——它们的作者昨天还是广大群众的偶像。

我不是说那些现代派的画家们手里没有有价值的作品，他们的很多创作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艺术中的一切迟早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会流芳百世。

\*                     \*                     \*

我没有赶上那个成千上万的人惨遭逮捕的时代，那时候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被关进集中营和监狱。在那时候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不仅是国家的领导人，国家安全机关的负责人也曾经作出过不少遭到社会谴责的决定。我也不想逃避自己的责任。萨哈罗夫院士事件就是其中一个——院士被从莫斯科遣送到下诺夫哥罗德市（当时称为高尔基市）。当权者拒绝倾听这位科学巨匠的话语，不愿意和他进行平等的争论，更不要说和解了。而且重要的是没有人愿意了解他的观点的精髓。一部分人只是挥挥手说“他不是我们的人”，另一些人害怕和他接近，第三类人被禁止与科学家对话。据我所知，著名的科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克尔德什和巴索夫都曾经争取得到批准与萨哈罗夫进行公开的书面辩论，以便明辨双方的立场。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家泽利多维奇<sup>①</sup>也曾上书苏共中央，为萨哈罗夫辩护。但

---

<sup>①</sup> 克尔德什(Балдыш М. В. 1911— )苏联数学家、力学家。历任苏科学院院长。巴索夫(Басов Н. Г. 1922— )苏联物理学家，量子电子学奠基人。苏科院院士。1964年获诺贝尔奖。泽利多维奇(Зельдович Я. Б. 1914— )苏联理论物理学家现代燃烧、爆炸、冲击波理论奠基人。有核物理、天体物理、基本粒子现代相对论宇宙学说等方面的著述。



是这一切都毫无结果！

然而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不会生活在真空之中。我不想谈论对萨哈罗夫的围困，就让每个人自己去评价自己的行为。有一些人是真的关心萨哈罗夫，但是也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挑拨了科学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从政府这方面，包括克格勃方面，都没有为了缓和局势作出努力。恰恰相反，最初是隔离萨哈罗夫，后来便是直接地把他推到对立面。从事这样的活动的是我们在冷战中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他们所需要的不是萨哈罗夫本人，而是他的名字。当时人们往往会把萨哈罗夫的命运与美国原子弹的发明者奥本海默的命运相比较。真的不想作这样的比较，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任何人都不曾企图利用奥本海默的名字来赚取政治资本。美国的当权者只是做了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奥本海默因为拒绝研制氢弹而遭到流放。还有消息说萨哈罗夫担心受到奥本海默相同的待遇，从而并没有步其后尘。

这是谎言——美国造出氢弹的时间比苏联晚得多，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作为萨哈罗夫的榜样。另外问题也不在这里。萨哈罗夫当然知道美国一直在准备与苏联进行一场核战争，我想，苏联氢弹的研制成功对于美国政策的改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迫使美国放弃了消灭苏联的想法。他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无法保证自己的城市不被袭击。”

时至今日，萨哈罗夫的著作还是有重大意义的。不过，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前，很多像萨哈罗夫这样的科学家的命运，并不是取决于克格勃，这个问题是由更高的领导层决定的。确实，克格勃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对待萨哈罗夫的问题上，从70年代开始，克格勃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但是覆水难收，对于这样的事情只能是重新予以评价。

---

---

## 民族问题

民族关系问题之所以严重，在于民族问题需要随时予以注意，而且需要客观地看待事情的真相。从五局组建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的工作人员便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遗憾的是，对于民族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真地正确对待。在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很少有谁愿意对这个问题负责，更有甚者，他们甚至对于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日益尖锐的民族关系问题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即便是最严重的、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会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苏维埃国家在这个重要方面曾经失去了政治方向，用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这一口号取代了明确的、审时度势的政策。我们为自己国家所遵循的国际主义原则倍感骄傲。这的确值得骄傲。在战前，有一位黑人，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位黑人生活在苏联，格里高里·阿列克谢耶夫的电影《马戏场》的主题便是对苏联的国际主义的讴歌和对于美国种族歧视政策的揭露。在战前的那些年代，作为对于希特勒镇压犹太人的罪行的反应，我们国家不仅发表了一系列的外交声明，而且还拍摄了一些影片，诸如《马慕洛克教授》、《奥本海默一家》等。全国的中小學生都学过哈萨克诗人江布尔和达吉斯坦诗人苏列伊曼·斯塔利斯基的诗句，都知道鲁斯塔维里的伟大诗篇，苏联的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纪念乌克兰的伟大诗人舍甫琴科。

但是这只能引起一段苦涩的回忆,因为战后只有在宴会的祝酒词和大会的贺词中才会听到对民族友谊的颂扬。与此同时,民族问题却得不到解决,这不仅会使局势恶化,而且往往会成为引起冲突的原因。毋庸讳言,那些本来就希望破坏苏维埃制度的人们,就会巧妙地利用民族问题。西方的特工机关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60年代末,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关系问题日趋尖锐,与此同时还有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问题、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问题和土耳其—梅斯赫金人问题。要求返回以色列的犹太人也成了复杂的问题。国家领导人对这些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也就引起了一些民族团体的不满,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在一些民族中制造各种事端。国家领导人只是一味地把问题压下去,尽量不要让问题浮现到表面上来。他们尽量保持沉默,把民族的矛盾隐藏起来,并不关心将来如何解决。

我还记得,在提交苏共中央讨论的“安德罗波夫计划”中,民族问题占据了核心地位。

在漫长的岁月中,苏联各地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冲突,假如中央能够及时、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本来是能够解决的。但是他们除了高呼“牢不可破的民族友谊”的口号之外,并没有采取哪怕是微小的行动。结果民族间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了真正的国内战争。

今天一些民族问题的“博学之士”往往以一种嘲弄的口吻谈论“苏联人民”这个概念,似乎这是布尔什维克臆造出来的词汇。

布尔什维克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根本没有消灭各民族的文化、语言和传统的意思,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强调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在这里不禁想起著名

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话,他说过,俄国很像美利坚合众国,是由很多的民族组成的统一机体。

既然生活在美国的西班牙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可以称为美国公民或美国人,那么生活在苏联的各民族的人们为什么不可以称为苏联人民,称为苏联公民呢?

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的思考。我在此想讲述几个具体的事件。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民族问题集中的地区,因此我就从这里说起。有一种意见认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是从改革开始的,从而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改革本身。其实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根源在于亚美尼亚复杂的历史,发生在亚美尼亚与邻国的关系之中。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只是这种关系的长长的链条中的一环,只不过在所有的复杂矛盾之中,这里的问题表现得最尖锐而已。

如果要回顾 20 世纪的那一段民族关系史,必须从十月革命之后的最初年代开始。当时苏联遵循了以民族为主体的建国原则。

在 20 年代,新国家南部边界的形成受到了土耳其的影响。很多问题受到了土耳其的立场的影响: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了外高加索居民的定居问题,促使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流血冲突得到解决;而生活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的生活似乎受到了不断的威胁——因为在 1923 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居住在那里的亚美尼亚人并入了阿塞拜疆的版图。

当然,和解归和解,而在这个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伤痛的一面。亚美尼亚的民族党——达什纳克党人从未忘记“不公正的边界”,于是他们为了伟大的亚美尼亚进行斗争,这个党的很多

流亡国外的领导人一直反对苏维埃亚美尼亚的建立，敌视居住在国外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亚美尼亚人，他们号召亚美尼亚人联合在伟大的亚美尼亚土地上——包括目前已经划归土耳其管辖的西亚美尼亚在内。达什纳克党人一再提起发生在1915年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和血腥杀戮，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亚美尼亚人渗血的伤口，他们不时地用恶毒的宣传往这个伤口上撒盐。

达什纳克党人千方百计地挑拨亚美尼亚人对于土耳其人的仇恨，点燃他们的民族情绪。而与此同时，苏维埃亚美尼亚国内正在寻求合作——共和国的居民在努力建立和土耳其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1928年—1929年之间，曾经到过亚美尼亚的著名作家别雷<sup>①</sup>对这件事情是这样描写的：

“1921年在埃里温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流亡者们返回城市。首先回来的是亚美尼亚人，接着回来的是不久前的‘恶棍们’——土耳其人、鞑靼人。那些曾遭受他们欺诈的农民们愉快地接受了他们，分给他们土地并帮助他们耕作。人们往往是以结果来评判一项政策的好坏：看来当地政府的政策是好的——人们对我讲述了政策带来的成果。”

尽管如此，还是遗留下一些问题。1946年苏联面临着与土耳其的冲突。当时在外高加索集结了大批的部队，采取了外交措施。很快就出现了流言：说什么就要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西亚美尼亚的土地并归还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人为了推动苏联作出这样的决定，希望推动苏联和往日的盟友走到一起——不

---

<sup>①</sup> 别雷（Белый Андрей 1880—1934）苏俄作家，笔名布加耶夫，象征派主要作家之一。

然的话,美国和英国无疑都会插手这场冲突。但是所幸的是苏联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亚美尼亚的土地问题,仍然是达什纳克党领导人手中的一张王牌。达什纳克党人明白,除非与土耳其人发生冲突,西亚美尼亚土地回归问题无法解决,于是他们设想在苏维埃亚美尼亚领土上实现大亚美尼亚的梦想。随着流亡西方的亚美尼亚人的不断回归,亚美尼亚的人口不断增加,于是当地居民的意愿与达什纳克党人的想法便不谋而合了。

亚美尼亚国内的生活条件无疑对于流亡国外的人们具有吸引力: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免费的舒适住房。当时不仅在埃里温出现了很多新小区,而且出现了一座座新的城市。

从世界各地返回苏联的第一批亚美尼亚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积极地融入了苏维埃亚美尼亚的生活。这是一些工人、技师,也就是普通的劳动者。而随后归来的人们中包括了商人之类的有着不同信仰和道德标准的人们。从此小资产阶级的达什纳克党的影响就不断地增强,他们依靠民族主义情绪激烈的小团体,不断进行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捍卫自己的思想,甚至不惜采取恐怖主义手段。

1973年莫斯科发生了三起爆炸案:在十月大街25号,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商店和五一地铁站附近。结果死亡29人。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

这样可怕的行动的作案动机何在?罪犯并不在乎所杀害的对象是什么人。如果是政治谋杀,往往要针对具体的对象。也不像是仇杀和抢劫。

罪犯消失了,也没有人对这次恐怖行动负责,这就意味着,爆炸的目的并不在于吸引社会的关注。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罪犯决定以残暴无情地消灭无辜的和平居民的方式向国家挑

衅。由此可见，这次凶杀还是属于政治性的。

认真的调查工作开始了。根据爆炸碎片复原了装爆炸装置的容器(是一只烤鹅锅<sup>①</sup>)，接下来复原了安放在地铁站的爆炸装置。

爆炸发生在冬季。为了收集全部的碎片，不得不踏着积雪搜寻了好几天。最后把全部小碎片收集起来，复原了装爆炸装置的背包。

寻找到了发生爆炸时留在车厢里的乘客，让他们坐到原来的位置。他们描绘出悲剧发生前下车的旅客的模样。

考虑到爆炸发生在三个地点，调查工作就有这样的设想：原先计划的爆炸点可能会更多。这个推断被证实了。调查工作花费了多少力气，侦查员们想出了多少办法——我在此就不多说了。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发现了同样的爆炸装置，所幸的是没有被引爆。

目击者在库尔斯克火车站看见有人携带装有爆炸物的背包，我们根据群众的举报开始寻找。罪犯有两名，一名身穿蓝色运动服，最重要的是：两个都是亚美尼亚人。的确，几乎在每一座城市都能遇到亚美尼亚人，不过调查工作还是从亚美尼亚开始。

侦查员们在埃里温机场检查了每一架从莫斯科飞来的飞机，检查每一列从莫斯科开来的火车。搜查工作在其他地方也同时进行。

从第一列莫斯科开来的火车里走出了两个人，各方面的特

---

<sup>①</sup> гусятница 这是一种俄罗斯常见的长圆形的厚壁锅，便于把整只的家禽或鱼放进去进行烧烤。

征都与在库尔斯克车站看到的犯罪嫌疑人相象。他们被捕了（斯捷帕尼昂和巴格达萨梁）。其中一个人是秘密的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领导人是扎季克扬。从他家的顶棚中搜查到了爆炸物的容器——与地铁站爆炸的一模一样的“烤鸭锅”。向被捕的嫌疑人展示了用碎片复原的爆炸物，还有其他物证。他们没法抵赖。是什么原因把他们推上了这种灭绝人性的活动呢？

原来这三个人都是一个秘密的民族主义党派的成员，他们的宗旨是反对苏维埃制度，当然也反对莫斯科。他们发誓报复俄罗斯人，至于哪个人并不重要：无论是妇女、老人或儿童，只要是俄罗斯人就杀。

这样的事件本来可以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注意，警钟已经敲响，应该设法寻找并消除发生这种可以导致民族分裂的事件的根源。而实际上，这桩案件除了刑侦部门和法院之外，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亚美尼亚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则向本国人民隐瞒了这次血腥事件的真相。根据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指示，所有亚美尼亚文的报纸都不准报道这个事件。一部法院审判扎季克扬及其同伙的纪录片也不准公开放映，观看的范围限制在党的高级干部之中，普通党员是不准看的。共和国的领导为此举辩解的借口是：以免在俄罗斯人的眼中损坏亚美尼亚人的声誉。

不久之后，消息报发表了萨哈罗夫院士的讲话，文中对逮捕亚美尼亚人表示抗议。他不相信三个罪犯会来到莫斯科实施犯罪。应该看到杰米尔昌的暴怒：萨哈罗夫怎么敢说出罪犯的名字，是谁批准出版社印刷这样的材料？

事件已经发生，然而没有人愿意从中得出政治结论，而与恐怖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克格勃的工作范围。既然是契卡，就应该



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既然已经发生，就让克格勃自己去解决。没有人愿意探究问题的本质，没有人愿意去理解这个问题——只有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无论是中央的领导，还是地方的负责人，都不愿意承认事件到此并没有结束。甚至过了数年之后，当亚美尼亚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已经很严重，而达什纳克党人越来越活跃地在国内传播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地方领导也没有予以应有的反击，显然这也不是偶然的。

亚美尼亚民族特殊论，是亚美尼亚人从小被灌输的思想。例如，在中学7年級的课本里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哪些国家的首都设有亚美尼亚的学校，接着就回答：在苏联的首都没有这样的学校，而在一些其他国家的首都有这样的学校。学校的课本中在介绍《青年近卫军》这部小说的时候，只提到书中一个主人公的名字，那就是亚美尼亚人若拉。而其他成员的名字，甚至青年近卫军的领导人，都只字未提。对于杰出的苏联音乐家、美术家和科学文化活动家，在亚美尼亚的课本中也只出现亚美尼亚人的名字。显而易见，达什纳克党人的宣传是有肥沃的土壤的。

我在亚美尼亚的时候曾经和杰米尔昌进行过谈话。我们谈了很久，也很艰难，最后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固执地强调：“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可怕的事情！”我在临离开亚美尼亚的时候再次见到了他，向他介绍了关于达什纳克党人在共和国领土上猖獗活动的情况。杰米尔昌的反应有些异样。在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的例会上，他号召党员与达什纳克党人的影响进行斗争，然而也仅仅止步于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教，当然还有费了很大劲才得以在报纸发表的几篇文章。领导人的无所作为，对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居民则是一种

灾难。

国内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改革,能够感觉到一场变革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开始抬头。亚美尼亚组建了一个“卡拉巴赫”委员会。委员会在埃里温的中心广场上召开了百万人的群众大会,要求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合并到亚美尼亚。

两个外高加索的加盟共和国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在埃里温举行反对阿塞拜疆的群众聚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激起了极端主义的情绪;在巴库也爆发了群众活动:准备保卫阿塞拜疆的利益。这就犹如是一堆干柴,只需一根火柴,就会燃起熊熊烈火,而这根火柴就是在苏姆盖特发生的一起事件。

阿塞拜疆的大部分城市都得到有效控制,群众没有上街,而唯一例外的是苏姆盖特;市委大楼外聚集起五千多名群众,一些从亚美尼亚的卡方地区跑过来的阿塞拜疆人出现在广场上,他们说,阿塞拜疆人在自己的居住区受到的亚美尼亚人的欺负,广场上的情绪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亚美尼亚的电视台的一些节目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当时在亚美尼亚的电视台播放了卡普季基扬<sup>①</sup>的长诗,诗中描写了在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情形。接着从埃里温传来了消息,说苏军最高军事检察官卡图谢夫发表声明,谈到阿塞拜疆有两个人死亡,据他调查,其中没有亚美尼亚人。卡图谢夫是一个聪明、坚定、纪律性很强的人,他不可能在埃里温广场的激愤的人群面前发表这样的声明。

而在阿塞拜疆,卡图谢夫的声明是这样被解释的:既然在阿

---

<sup>①</sup> 卡普季基扬·西利维亚(Калутикан Сильвия 1919 —)亚美尼亚人,曾是亚美尼亚的功勋文化活动的家,诗作颇丰。

斯克兰地区死亡的人中没有亚美尼亚人，那就说明死亡者就是阿塞拜疆人。这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极度愤怒的人群冲向了苏姆盖特的亚美尼亚人居住区。

在这样的冲突中很难找到罪犯：是谁煽动了这场冲突，是谁进行了挑拨，又是谁迈出了回应的一步——是亚美尼亚人还是阿塞拜疆人，现在已经很难断定。但是高呼民族友谊的口号的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的领导人，并没有积极推动两国家的人民相互接触，寻求相互接近的途径，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一个民族的妄自尊大对于睦邻关系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也是民族冲突的根源之一。卡拉巴赫问题就是这样。我觉得某些受人尊敬的名人甚至没有想过，他们的公开演说和著作中的名句竟然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阿甘别吉扬院士在巴黎的报刊上了解了一些情况，他在和亚美尼亚社区的居民见面时声称，纳戈尔诺—卡拉巴的问题即将得到解决，而且目前归属阿塞拜疆的那一部分领土很快就会回归亚美尼亚。当时阿甘别吉扬院士和戈尔巴乔夫交往很深，在国外的人们会以为，他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观点。自然他的讲话很快就传遍了国外的亚美尼亚移民群体，并且传到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从这个时候起，对于阿塞拜疆人来说，阿甘别吉扬就成了点燃卡拉巴赫干柴的那一根火柴。

记者兼作家巴拉扬也“很卖力”。他在美国的时候，走遍了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区，他同样暗示戈尔巴乔夫曾同意纳戈尔诺—卡拉赫回归亚美尼亚。

另外一位积极分子就是米高扬的儿子——谢尔盖，他也来到亚美尼亚，到处谈论这一话题。

自然，阿塞拜疆在听到这一系列的演说之后，终于感到似乎问题已经能够解决，于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委员会便宣布自治州脱离阿塞拜疆。

到了这个时候，苏共中央政治局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作出了一个决定：两国边境暂时保留原状，在改革的过程中将作出最后的解决。这意味着什么呢？又有谁能够解释呢？只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

然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进一步激化了。巴库开始发生动乱，苏共中央向阿塞拜疆派出了以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为首的代表团。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杰米切夫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巴库人对于中央的决定感到满意，于是我们从巴库来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这里的人们还不知道中央的决定，还以为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亚美尼亚一方。在进城的时候，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欢迎的人群穿着节日盛装，高举着红旗，标语上写着民族友谊团结，感谢中央公正解决卡拉巴赫争端等。虽然是春寒料峭的二月，城市的街道上阳光明媚，暖风习习。少先队员们挥动着小旗。一个真正的节日。

我们心里当然不好受，因为我们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并不是他们企盼的消息。这件事本身也表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愚弄，他们在精神上的压力有多大。整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都被牵扯到这桩事件中来了。说实话，这是一桩恶毒的挑拨。

卡拉巴赫问题越来越严重，它给两个民族的人民都带来了伤害，使得他们之间更加仇视和对立。

亚美尼亚不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共和国的各级党组织，包

括中央在内,在收到中央决定的时候提出了意见:要求在最近的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亚美尼亚党组织提出一个“第三条款”,这实际上把亚美尼亚的共产党员和卡拉巴赫委员会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联合起来了。他们都要求立即归还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我们中央代表团向全体党员说明,边境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民族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但是我们认为,必须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居民获得正常生活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的一切条件。与会的党政干部同意这样的意见。于是奠定了一个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危机的基础。最简单的逻辑证明:取得党政干部的一致意见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代表了整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居民的意见,而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些意见。亚美尼亚的领导人也应该支持这种意见。

令我们吃惊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照这样的进程发展。亚美尼亚党中央没有贯彻全体干部的决定,他们拖延了几天之后才公布了这个消息。这样一来,改变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的运动就越演越烈了。

引起争论的还是这样的问题:到底是谁最初挑动了这件事,什么人,有什么样的表现,谁是罪魁祸首——是阿塞拜疆还是亚美尼亚。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最先遭到杀害的是阿塞拜疆人:1988年2月22日,在阿斯科兰地区曾有两个人遭到杀害:一名在葡萄园干活的农民,还有一名被亚美尼亚射手认为可疑的男孩。

所幸的是,阿塞拜疆的居民和领导人都很理智,他们没有宣扬这件事情。我曾经到过出事现场,亲眼看到了要求报仇的愤怒的人群。

一位英勇的妇女制止了人群的过激行为。那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阿巴索娃，她把一块头巾抛到人群面前，要求男人们保持理智。根据当地的风俗，女人的头巾是神圣无比的，不能从头巾上迈过。然后我们和阿巴索娃一起来到阿格达姆的群众大会会场，大会最后通过了一项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闹事。可以设想，如果杀人的事件被传扬出去，阿塞拜疆要闹出多大的乱子呀！

连续几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形势都很紧张，本来人们会逐渐平静下来，但是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女诗人卡普季基扬和巴拉扬在莫斯科受到了雅科夫列夫的接见，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接见了他们。

为什么要接见他们——谁也说不清。可能是国家领导人想利用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来解开这个死结？那么为什么只在莫斯科接见了亚美尼亚人呢？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明显地想表明自己的倾向性吗？或许在那几天也曾经接见过阿塞拜疆人，只不过是媒体没有报道？难道说像戈尔巴乔夫这样有经验的政治家，还不明白这样的问题么？

国家领导人的做法引起了阿塞拜疆人的困惑，他们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亚美尼亚人胜利了，而且卡普季基扬和巴拉扬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明确地表示，在卡拉巴赫的冲突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站在亚美尼亚一边。如果一定要说中央是故意这样做——我没有这样的根据，但是这种“短视”的政策加剧了冲突，而且戈尔巴乔夫要承担直接的罪责。说真话，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戈尔巴乔夫曾经号召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服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决定的本意明显地被改变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事后，当戈尔巴乔夫谈到阿塞拜疆事件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他说，应该早一点派军队进入苏姆盖特。但是武力并不能使阿塞拜疆人平静下来，巴库的数百万群众是不会同意军队进入的。当时那里还没有发生群众集会，而在埃里温的中心广场几乎每天都发生数以百万人的集会，但是并没有人打算在那里动用武力。

如果军队真的进入了阿塞拜疆，必定会引起事件的激化，而且将是更加严重的流血事件。因此根本不是早晚的问题，国家的领导人在处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问题的时候没有采取应有的立场，他们采取了双重标准。起先他们隐瞒了事实真相，从而加剧了冲突。领导人左右摇摆的立场使得悲剧越演越烈。

经过了可怕的苏姆盖特之夜以后，我和一位苏姆盖特联合工厂的一位聪明勇敢的亚美尼亚女工谈过话。对她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她的儿媳妇被糟蹋，她的儿子也受了伤。

“您怎么想，埃里温那边的知识分子们会想到我们亚美尼亚人吗？”她说道，“他们想到的是土地，而卡拉巴赫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三个月之后我见到了前来莫斯科的亚美尼亚前部长会议副主席基罗科相。他已经退休了。基罗科相一直在解释，为什么在解决卡拉巴赫问题时要偏袒亚美尼亚，他提出的一个主要论据是：

“我们非常需要土地。”

“为什么？”

“因为亚美尼亚人离开国家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土地。”

“他们到哪里去了？”

“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到西伯利亚，到俄罗斯中部。”

“这有什么不好？”

“民族流失。为了防止亚美尼亚人迁居到苏联的其他地方，就需要土地。”

这和苏姆盖特的那位妇女的谈话完全一致！也就是说，需要土地。问题就在于合并亚美尼亚的土地。你看，达什纳克党的宣传是如何地深入人心。而这就是系在两个民族颈上的绳结，由此产生了对于1915年民族冲突的回忆。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刚刚开始，马上就有人指责我们说，克格勃没有重视这场冲突，从而没有及时向苏共中央汇报。

当时我正在巴库，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打电话过来，他通过电话和我谈到了这个问题。我提醒他说，我们已经多次汇报过这一地区的危急形势。

切布里科夫带上我们工作日志的复印件到中央汇报工作，说明我们已经两次汇报过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问题，我们已经预示到了他们之间即将爆发的冲突。切布里科夫还提起了我曾与几名中央书记谈到过这个问题，其中也包括利加乔夫。

应该承认，利加乔夫马上采取了措施，向亚美尼亚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发出了警报：外高加索地区正在酝酿着一场民族间的冲突——应该采取紧急措施。

问题被提交到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进行讨论。但是工作组提出的所有结论和建议都被否决。会议认为问题根本没有那样严重。谁也不愿意公开承认存在着民族间的冲突，不愿意承认在几个民族地区正酝酿着一场社会动荡。由于他们对社会上动荡的消息充耳不闻，极力抹煞，从而也就不可能认真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苏共中央关闭了揭示真相的一切途径。例如，苏共二十三



大作出项决定：编写一部苏联国家地区通史，特别是外高加索的通史。这样一部有科学根据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历史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有助于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但是大会的决定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这件事情应该由米涅茨院士负责，他以历史界的权威自诩，只要稍不顺从他的意思，他便给人家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正是这个人把编纂这部重要书籍的工作给搅乱了。最后编出来的不是一部科学的历史，而是一本带有严重的民族主义的色彩的亚美尼亚民族史教科书。

卡拉巴赫的危机引发了两个共和国之间的流血冲突，国际社会都想介入这场危机，熄灭这场战火，然而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将如何结束这一切，还不得而知。

\*             \*             \*

在日趋严重的许多民族问题中，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问题也很突出。我不想从头叙述鞑靼民族从克里米亚迁出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写过文章和书籍。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那些不考虑后代的人们，才会在把一个民族从其祖居地迁出，而且认定他们不再返回，而且也不会再提出返回祖居地的要求。

除了居住在苏联的德国人之外，所有受到迫害的民族，包括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在内，他们在被强制迁出之后，最后还是返回了自己的原籍。

但是鞑靼人没有得到返回克里米亚的权利。那些曾经在克里米亚打过游击的人们反对鞑靼人返回，但是主要原因是在于，此前赫鲁晓夫已经把以鞑靼人为主体的克里米亚作为俄联邦的礼物赠送给乌克兰了。1954年之前，克里米亚一直属于俄联邦管辖。如无此举，鞑靼人老早就住在克里米亚了，而且克里米亚

也不一定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动荡局势。

大家都还记得，克里米亚的土著居民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移居到那里的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犹太人，还有希腊人。

这些居民并没有实行任何民族或国家的自治，那里只是区域自治，称为克里米亚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但是克里米亚的区域自治与鞑靼人要求返回克里米亚半岛，返回自己有史以来的家园的权利并不矛盾。政府通过对鞑靼人的歧视性的决定，导致鞑靼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一决定并不涉及其他已经获得民族自治的民族。这就使得本来已经感到备受侮辱的民族情绪火上浇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自发的运动就逐渐走向了极端。实际上，并没有充足的理由禁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只是说，似乎半岛上没有足够的土地，而实际上和很多地方一样，当时半岛有很多空闲的房屋留给从西方返回的移民：但是并没有什么人自愿移居到半岛上来。传言在克里米亚很难找到工作，而克里米亚的报刊上充斥着招工的广告。地方国营农场偷偷地招聘鞑靼人来做工，因为他们感到人手奇缺。这里的实际情况是遮掩不住的。

鞑靼人被禁止进入克里米亚，甚至不许他们来这里旅游疗养。这里的学校也不准招收他们。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些媒体公然声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民族。曾经打算关闭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的克里米亚鞑靼文的书刊和报纸。说什么不存在这样的文字。

这些事情都是那些决定国家大事的重要人物做出来的。我还记得在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那里召开过一次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会议，卡皮托诺夫很清楚，问题的关键在于乌克兰。与会

者们无法掩饰对鞑靼人的同情,但是又不愿公开得罪乌克兰的代表。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支持鞑靼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证据:中学时期的集邮爱好提示了我。我记起了一套名为“苏联民族”的邮票,其中有一张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于是关闭鞑靼文报纸的决定被取消了。

其实,从1967年我们这个部门刚刚成立的时候起,我就开始接触鞑靼人问题。有几百名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来到莫斯科,请求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同意他们返回克里米亚的家園。在此之前,返乡运动包含了两个组织和两个流派:一派比较极端,另一派则比较温和。自然和温和派谈话比较容易一些。我们提出了一项通过有组织的招工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计划。

中央派安德罗波夫和返乡运动的代表进行接触,他同意我们提出的计划,决定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鞑靼人的代表。但是参加接见的另一位领导人,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坚持另一条路线:不答应鞑靼人代表的任何具体要求。我们得知此事时已经很晚了。

接见的的事情已经定了下来,但是当天激进派决定举行群众大会进行示威,这样的大会很可能干扰克里姆林宫的会见。要设法阻止群众集会的举行,而且要设法把解决问题的方案通知鞑靼人的代表,以避免事态的恶化。

我决定与克格勃莫斯科局的副局长沃伦采夫上校一起前往鞑靼人领导人的住处。当然作为不速之客并不十分恰当,不过他们还是接待了我们。我们在那里一直坐到了天亮,双方谈了很长的时间,最终统一了意见。对方明白,我们在谈话中有些闪烁其词,但是他们还是相信我们的诚意,相信我们提出的建议是明智的。我们确信,我们所达成的共识将在明天的正式会议上

被通过。临别时他们甚至还邀请我们到克里米亚做客。

然而，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的经历却令人感到沉重、屈辱和痛苦：我们所期待的所有的理智的决定都没有出现。会上只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空话，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不敢正视昨夜进行谈判的那些人的眼睛。安德罗波夫也为了这次失误而懊恼不堪。

以前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境遇。经过缜密的思考，提出具体的合理建议，确信这样的建议不可能不被接受。但是最后还是遭受到那些不明事理的人们的反对。这些人有的来自党中央和地方机关，其中也不乏一些御用的学者专家。

我不知道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命运是否让苏共中央不安，但是我们无法坐视不管。不能就这样让问题悬而不决！乌克兰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最终同意以招工的形式每年接受两三百个鞑靼人家庭。这就使问题得到一定的缓和。人们到克里米亚去，他们知道就业和住房都会得到保障。克里米亚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人很欢迎鞑靼人的到来。

当地的国家安全人员也尽力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形势。高校招收了第一批鞑靼人研究生，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迎来了第一批旅游者。学者们开始关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历史，地方博物馆里的展品也渐渐丰富起来。在阿鲁普卡，为传奇式的飞行员阿赫迈德·汗·苏尔丹建造了一个纪念碑。不过此时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又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很多鞑靼人被强行从克里米亚赶走，他们被赶上渡轮，运过了刻赤海峡。经过检查，确有其事。这是乌克兰当局自作主张的做法。

局势又紧张起来。克里米亚鞑靼人完全丧失了对当局的信任。极端分子的领导人胜利了，他们毫不隐讳地寻求美国使馆

的帮助。而美国使馆则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在国外传媒上掀起了新一轮的反苏浪潮。这就是为冷战火上浇油了。假如当时的领导人能够采纳我们的建议,让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逐步通过招工的方式回归故土,此时那里至少已经居住着 1500 个鞑靼人家庭,而且他们都是相信政府、远离极端分子的守法居民。

地方克格勃机构与政府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们千方百计地帮助鞑靼人:监督高校的招生,严密注视驱赶鞑靼人的行为,批准他们进入克里米亚旅游,对地方博物馆给与援助。社会舆论对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正义要求给予了支持,媒体也维护他们的利益。尽管如此,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 \* \*

苏联境内的德意志人的境遇也不好。他们的祖先从西欧移居过来,在新的土地上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于是在萨拉托夫州出现了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共和国,共和国的居民一直集中居住在这片地方。在苏联的南部,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北高加索也有小片的德意志人的居民区。

卫国战争开始以后,德意志人被迁移到西伯利亚东部和哈萨克斯坦。为什么战后他们的权利没有得到恢复——谁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人们由于民族归属问题受到折磨——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反对苏联的战争。这些德国人和其他苏联人一样在后方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支援前线竭尽全力。

战后,除了伏尔加流域的德意志人之外,其他德意志人都回到了原先生活的地方,而伏尔加河流域的自治共和国一直都没有恢复。

看来,恢复权利的问题只涉及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和

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德意志人战后组成了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自己的同胞失去了原先的身份。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在青年人中引起不满，甚至是愤怒。一些人产生了离开苏联的念头。不过他们的要求没有获准。只有极少数德意志人费尽周折返回了东德。

西方的特工机构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在西德组建起了一些机构，支持有移民倾向的苏联的德国侨民返回祖国，他们发出邀请，许以高薪。而我们采取的是鸵鸟政策，对所存在的问题充耳不闻，佯装不知。

事情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例如，有近百万的德意志人居住在哈萨克斯坦，他们都是从伏尔加河流域被强制迁移过来的。当局极力在国内外媒体面前缄口不谈这个事实。在哈萨克斯坦的百科全书中，根本就不提德意志人在当地的存在。然而百科全书中有这样的条目：在阿克莫林斯克有德文出版友谊报，还有一家德国人的剧场。怪哉！

德意志人开始失去耐心，为法西斯分子承担战争罪责的日子没法子过下去。于是他们提出消除战争后果，恢复公民权利。很明显：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并导致严重的后果。

传来了消息：西德总理阿登纳即将访问莫斯科。苏共中央有些着慌，他们明白，生活在苏联的德意志人肯定会向阿登纳告状。于是当即作出了一个决定：从众多申请回国的德意志人中批准了三百个家庭。后来，一旦有从两个德国前来访问的高级人物，便批准一批德意志人回国。这些德意志人为了获得签证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而且从数千人当中选择出一部分的工作也是很困难的。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并没有真正解决伤脑筋的问题，相反使得问题变得愈加复杂。而党政机关中没有人愿意出面来彻底解决问题，便把这份“荣誉”推给了克格勃。国家安全机关中的各个部门也是相互推诿，最后任务落到了新组建的五局头上——其实这也并不是五局的职责范围。

我们对问题进行了研究，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恢复自治区的建议，对于那些要求出国与亲人团聚的德国人，如果他们不涉及国家秘密，就批准他们回德国。如果当时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就不会一直拖到今天，致使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虽然建立自治区的问题被搁置，但是德国侨民离境问题得到了解决。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怎么？人们从社会主义国家出走！从保密单位所在的地区出国（保密单位无处不在）！”同僚们的指责声不绝于耳。但是德国人离境的过程并没有被制止。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减压的过程。

自治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开始的时候还很顺利，似乎一切都进行得很理智。准备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自治州，主要是垦荒时期留下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建立新的自治州呢？不然的话就会影响到作为粮食主要产区的切利诺边疆区。

这项决定是1976年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切利诺格勒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举行了抗议活动。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和政府支持他们——尽管是他们自己亲自参与了自治区的筹建工作。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而且没有人出面解决。

解决的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在伏尔加河流域恢复德意志人

的自治。萨拉托夫州的领导人也愿意这样做，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闲置土地。已经有数千名德意志人返回到那里。但是苏共中央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决定，而是用另一种方法：与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吵了起来：如果德意志人离开那里，那里将缺乏劳动力。问题就这样遗留下来：一个渗血的伤口一直留到今天。

五局的困难在于，很多高级领导人都对现存的问题作壁上观。自然地方当局的领导们也就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可以不负责任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库纳耶夫发生了冲突。他甩给我一句话：“是德意志人自己不愿意实行自治，而你们偏要把自治强加给他们！”

当时我提醒他说，从广义上讲，切利诺格勒的大学生们也不反对德意志人自治，他们只是反对在哈萨克斯坦建立这样的自治州。

我这样写出来是因为懊恼和心疼——因为我看到的是正在形成一种爆炸性的势力，而这股势力可以导致国家产生非常严重的振荡，西方的间谍机关会利用我们每一个很小的失误，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他们取得冷战的胜利。在苏联很难找到哪一个加盟共和国里没有会导致民族间冲突的民族问题。这就要求党认真对待。不过并没有人愿意认真地管这样的事情，他们生活在某种无法理解的理想和谐的梦境之中。大家都愿意看到绝对团结一致、各个民族和种族和谐统一的情景。他们把这样的梦境当成了现实，却把亟待解决的问题束之高阁。

\* \* \*

土耳其—麦斯赫基人是生活在格鲁吉和土耳其边界的一个



人数很少的民族。这个民族的问题至今还很复杂。他们也是格鲁吉亚人，只不过他们与主流格鲁吉亚人的信仰不同，他们在很早以前就改信了伊斯兰教。二战以前他们总共有二万多人，居住在偏远山区，主要从事畜牧和果树种植。直至今日，当你途经格鲁吉亚的时候，你还会在博尔若米和阿哈尔齐赫以南的地区看见他们活动的遗迹，你能够设想出不久之前漫山遍野的美丽果园。后来这里的居民离去了，土地逐渐荒芜了。伟大的文学家肖塔·鲁斯塔韦利就诞生在这里——他不仅是格鲁吉亚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的骄傲。

麦斯赫基人是战争年代里被迁离此地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格鲁吉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请求莫斯科批准把两三百个家庭迁移到东部缺乏劳动力的地区。正当准备批件的时候，贝利亚提出（根据文件判断）另一个解决途径：把麦斯赫基人迁出格鲁吉亚。开始为此煞费苦心地找寻根据。其中有一条：麦斯赫基人主要居住在靠近土耳其的边境地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土匪、外国间谍及其他不可靠分子。然而当地的边防部队坚决否认这种说法。斯塔汉诺夫中将直接声称，边防部队不掌握这方面的资料，恰恰相反，麦斯赫基人常常帮助边防军。

此后寻找把麦斯赫基人外迁的根据的活动停止下来，一项没有任何根据、纯属个人意志的决定被通过了。八千多人被从故乡的土地上赶走，被安置在中亚的一些地区。这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人正在前线作战。

这次民族的迁移不是别的原因，那正是对信仰不同的同胞的仇恨之举。

事实上，麦斯赫基人所受到的待遇与其他受迫害的民族还是有区别的。他们的男人们继续留在部队里战斗，并没有被召

回，而战争结束以后，胸前佩戴着各种勋章和奖章的麦斯赫基男人，已经不能返回自己的家乡，他们的亲人已经在遥远的流放地了。斯大林死后，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巴尔卡尔人的权利都得到恢复，他们都返回了自己的故乡，麦斯赫基人也要求返回格鲁吉亚，似乎不应该有什么障碍：那里的土地已经荒芜，也没有人要求建立自治政府，格鲁吉亚也需要劳动力——麦斯赫基人一向以勤劳著称。

格鲁吉亚的集体农庄和其他企业的领导人都愿意接受他们，有几十个家庭已经来到了格鲁吉亚西部，在私人的种植园里找到了工作。其他家庭也想这样做，并没有想到会面临什么倒霉的事情。

阿布哈兹的克格勃主席加鲁斯托夫打电话到五局说，有一百五十多个家庭正沿着第一批回归的人员的路线从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州返回家乡。他们事先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批准，在哈萨克斯坦卖掉了牲畜和家产，已经踏上回乡之路。

在这个消息没有到达第比利斯之前，一切都按部就班。可是第比利斯发出了指示：不准麦斯赫基人进入格鲁吉亚，所有的人一律遣返。接受麦斯赫基人的农场主要受到处罚。

于是，麦斯赫基人在警察的押解下乘坐火车又返回了哈萨克斯坦。

那是一月份。在这个月份里，即使在格鲁吉亚南方还是很冷的。人们被押送到没有防寒设施的车厢上，第二次被赶出了故乡。他们得不到食品和饮用水。

阿布哈兹的克格勃主席加鲁斯托夫只要求一件事：保护被遣返人员不要遭受第比利斯当局的迫害，因为他认为必须制止这样的胡作非为，至少也要让这些不幸的人们吃饱肚子。

在阿布哈兹的首都苏呼米，一群克格勃工作人员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把食品和饮用水交给列车上的麦斯赫基人。我们支持加鲁斯托夫。到了俄联邦边境，格鲁吉亚的警察离开了列车，麦斯赫基人受到了克格勃的保护。到了索契，车厢开始供暖，我们的人员在每一个车站等候，列车像接力棒一样被传递下来，向麦斯赫基人提供食品和饮用水。安德罗波夫得知这一切，但是除了食品和水之外，他也没有其他办法：谁也不愿和格鲁吉亚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穆扎瓦纳泽发生冲突。而穆扎瓦纳泽在勃列日涅夫的庇护下一意孤行。

有一次我和穆扎瓦纳泽谈到这件事。那是在晚饭的席间，还有其他几位同志出席。穆扎瓦纳泽兴高采烈地讲述葡萄采摘节和自己的婚礼。第二天他将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参加庆典。

这是普通的席间谈话。但是我利用这个机会谈起了麦斯赫基人的命运，我说道，应该让他们返回格鲁吉亚。穆扎瓦纳泽开始激烈地反驳，为什么这一步是不能走的——他的下属们也随声附和。莫斯科来的人都沉默不语。

“首先，”穆扎瓦纳泽说道，“麦斯赫基人的土地已经被别人占用了，第二，他们离边境很近，很多麦斯赫基人从事特务活动，因此边防部队反对他们返回。”

我说，这个消息是不准确的。我提起了边防部队将军马特洛索夫的声明。我提醒他们说，有几百名麦斯赫基人进入相邻的阿塞拜疆，在边疆地区生活得很好，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我们的谈话陷入了僵局，我不再说话。同桌进餐的莫斯科人事后对我说，我没有必要谈这件事。大家都见到了穆扎瓦纳泽的反应。他们害怕会引起什么不良后果。

不久穆扎瓦纳泽被谢瓦尔德纳泽取代，但是情况并没有得

到任何好转。谢瓦尔德纳泽同样支持那些谎言，推说边防部队反对麦斯赫基人返回故乡。

但是在克格勃的坚持下，最后格鲁吉亚官方同意每年接纳几百户居民返乡——作为招工对象。但是在格鲁吉亚的东部地区，就是麦斯赫基人原先的居住区，返乡工作进展非常缓慢，也非常艰难。

大家都记得一部电影《土地，你的儿子》，那是契赫伊泽导演的作品，这是一部尖锐而勇敢的电影。它讲述的是贝利亚在格鲁吉亚所做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情，其中也包括强迫人们离开自己的土地。那些熟知共和国历史的人一看就明白，电影的拍摄地点就是麦斯赫基人原先居住的地方，尽管电影中并没有提到此事。到底是把什么人强制迁出——电影对此缄口不谈。

麦斯赫基人的问题至今仍然无人问津。返回格鲁吉亚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们在护照上更改了民族，变成了格鲁吉亚人。

麦斯赫基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后终于引发了一场骚动，引起了全社会的不安。这件事首先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爆发。

费尔干纳盆地的冲突由来已久。居住在这里的数万名麦斯赫基人抢占了这里的土地——土地不足是很早就出现的问题。由于人口的增加，当然其中有麦斯赫基人，也有乌兹别克人，这个问题就越发尖锐。这里主要种植棉花，棉田已经种到房屋跟前，挤占了全部的菜园和果园。任何建筑施工都无法进行。这里的城乡住房十分拥挤。几乎各家的屋顶都连在一起，从屋顶上就能够四通八达。

当地原住民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认为麦斯赫基人占有了

最好的田地，不然的话，乌兹别克人会生活得更宽敞一些。

应该承认，这里的麦斯赫基人比乌兹别克人生活得更富裕——他们天生就勤劳，而且善于经商。

商界中存在着一些黑恶势力，他们盘踞着一定的领域，而一些负责商业的官吏和黑社会勾结起来胡作非为，这种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间的矛盾。

有一名麦斯赫基人，很久以来他都是一个巨大的犯罪团伙的头领，他死之后，爆发了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这个基础上爆发了麦斯赫基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这场殴斗进行了三天。

然而冲突的诱因还继续存在。这里的敌对情绪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于是引起了麦斯赫基人成批出走。这件事同时也引起了俄罗斯人、德国人和朝鲜族居民对乌兹别克人的警惕。

在乌兹别克人中有一个类似于波罗的海国家民族阵线的组织，被称作“比尔利克”。他公开的口号是号召人们支持改革，捍卫人权，拥护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改革。不过在这些口号的掩护下，他们实质上主张纳粹主义。

在前面提到的那一场殴斗发生之后没过几天，比尔利克在马尔吉兰组织起来的一个团伙开始捣毁麦斯赫基人的住宅。动乱波及费尔干纳，只有在纳曼干和安集延制止了这次动乱。

地方政府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动乱之中警察袖手旁观。由于在第比利斯的行动，军队和内务部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此后他们一直采取中立的态度。这肯定会引起一部分群众的责难。然而没有办法。一位军官对我说：“我是可以采取措施的，但是明天的报纸会说些什么呢？”

这样的担忧也并非没有任何根据。内务部队在好罕市对暴

力分子进行了反击，于是就招致了严厉的批评。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惩治警察。

权力机构的手脚就这样被捆住了，而他们的消极立场又导致了其他机构的无所作为。

我曾经作为莫斯科的工作组成员来到了悲剧发生的现场。小组的组长是雷日科夫。我们走遍了打砸抢的现场，一片恐怖的景象：被烧掉的房屋废墟、费尔干纳的几条街化为灰烬，马尔吉兰和其他城市有人被活活烧死。后来我们决定访问一处军队的演练场，这里是他们的难民营地——尽管他们极力阻止。经过交换意见，我们最后达成一致：如果不访问营地，我们从莫斯科来这里就没有任何意义。

清晨我们来到演兵场，那里有数千名难民，没有任何遮掩，直接暴晒在太阳底下。他们没有食品和饮用水。难民中还有些伤员、孕妇、老人和婴儿。人们从住处出来的时候只穿着随身的衣裳：有的穿长衫，有的穿短衣。他们一下子失掉了一切：牛羊、衣裳、安定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对人们、社会和政府的信任。不幸的难民只有一个要求：让他们返回故乡格鲁吉亚。

我不能不介绍一下雷日科夫——他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出自己的勇气和对人们的关爱。很明显，他对发生的一切感到痛心，他在努力想办法解救他们。

麦斯赫基人对我们很好。妇女们拉着雷日科夫的手，把他领进自家的房门。当地的风俗是：如果女人们把客人领进家门，那么这位客人一定要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军队也不能慢待。其他人都跟随其后。

我们和麦斯赫基人的领导人组建的委员会进行长时间的对话。耳边听着痛苦的指责和要求返回家园的正义要求，心里很

不好受：“这种到处被驱赶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被从家园驱赶出来了！”

没有人能够最终决定麦斯赫基人返回家乡的问题。为了解救他们，雷日科夫和莫斯科的工作组把他们被送到了俄罗斯的土地上。我们劝解他们。我确信，雷日科夫希望有朝一日获得格鲁吉亚当局的理解。

\* \* \*

我想起了70年代初期的波罗的海国家，当时从爱沙尼亚传来了发生冲突的消息。

那里并没有任何公开的讲演和群众大会。只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谈论苏联于1940年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国，并且千方百计地压制地方的文化和传统。其他的居民照样平静地生活。

但是在爱沙尼亚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中不断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有一家芬兰的电视台向爱沙尼亚播放节目。节目中经常散布反对俄罗斯的情绪。我不必说到底谁是罪魁祸首，但是紧张气氛已经越来越明显。爱沙尼亚的领导人鼓励这样的情绪，新上任的党的领导无视群众的命运。

苏联克格勃决定认真研究当地的形势，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聘请了苏科院的一些学者和社会学专家，其中包括一些爱沙尼亚人。经过调查分析，发现了很多问题，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问题在于在不同民族的居民团体之间有彼此独立的倾向。这种现象从幼儿园时起就开始了，幼儿园就分成爱沙尼亚的和俄罗斯族的，学校也是这样区分的。甚至一些机关和单位也分为说俄语的和说爱沙尼亚语的。因此产生了一些复杂的情况。在塔尔图、塔林和派尔努等地开始发生民族冲突，主要是在青年

人中间。

我曾经有机会见到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伊万·凯宾。他出身于一个俄罗斯化的爱沙尼亚家庭,但是他希望人们承认他是一个地道的爱沙尼亚人。他有保留地接受了我们工作小组的处理意见。

我承认,当我见到凯宾之前,我还见到了另一位爱沙尼亚党的领导人卡罗塔姆。在50年代,斯大林曾经指责他和他的战友奉行民族主义的政策,并因此受到了打击。卡罗塔姆作为一位老资格的党的工作者没有遭受迫害。他对爱沙尼亚的局势和凯宾所奉行的政策非常担忧。凯宾一方面在莫斯科派来的工作组面前毕恭毕敬,另一方面又在背后讨好那些民族主义者。

在我和凯宾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几乎没有开口,只是偶尔嘴里嘟囔几句,最后只是说了几句关于民族友谊的套话。我们并不是在谈民族之间的友谊,我们所涉及的是那些破坏民族团结的人,具体来说就是凯宾,以及他所奉行的政策。

安德罗波夫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决定给苏共中央写一份报告,建议召开政治局和政府的会议研究爱沙尼亚的局势问题,会议请爱沙尼亚的党政领导人参加。中央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至于要爱沙尼亚的领导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为什么?难道说凯宾同志不能对局势作出判断吗?难道说他在爱沙尼亚没有足够的威信吗?再者说,难道值得让政治局另搞一套计划吗?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和在雅加达修建体育场,这样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民族友谊,而爱沙尼亚内部的民族摩擦,就让当地的党组织去解决,至多也是委托克格勃去处理。

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传达到了爱沙尼亚,让当地的党政领导酌情采取措施来处理。这就无异于把绵羊交给了狼,或者说



的客气一点——听之任之。

在塔林那边尽量把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支应过去。但是局势日趋严重。当传来安德烈耶娃被任命为教育部长的消息的时候，爱沙尼亚高校的学生走上了街头——安德烈耶娃是爱沙尼亚人，她嫁给了俄罗斯人，所以她使用俄罗斯的姓氏。

事情仅限于大学生们的演讲吗？问题显然没有那么简单。那些挑拨爱沙尼亚脱离苏联的人们并不是公开活动的。这一点在苏共第19次代表的准备过程中和大会进行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

在此以前，爱沙尼亚党的领导人是瓦伊科·维亚利亚斯，这是由凯宾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领袖。不久前在塔林市召开过一个戏剧家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中第一次公开要求爱沙尼亚脱离苏联。为此还通过了一个行动纲领。莫斯科的代表、名噪一时的“揭露派”作家阿法纳西耶娃·尤丽雅参加了这次戏剧家代表大会，这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戏剧家代表大会的决议，正中爱沙尼亚民族阵线领导人的下怀。我对此不必更详细的分析，我要说的是，他们当时尽量施放烟幕，试图隐藏其真正的目的——把爱沙尼亚从苏联分离出去。“忠实的共产党员”，爱沙尼亚党的领导人瓦伊科·维亚利亚斯扮演起安抚社会舆论的角色。他是不久之前才从苏联驻尼加拉瓜大使的岗位上抽调回来的。于是这位浑身带着尼加拉瓜火药味的、经过战火洗礼的布尔什维克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苏共党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这位不曾背叛，也没有能力背叛自己的父亲的维亚利亚斯，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指向共产主义的罗盘。他讲述了在尼加拉瓜的经历和尼加拉瓜人民的英勇斗争，他还挖苦叶利钦，似乎叶利钦对尼加拉瓜人民不够尊重，对

尼加拉瓜人民的革命感情以及他本人在尼加拉瓜的经历不够尊重。维亚利亚斯说到了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忠贞不贰,说到了爱沙尼亚的唯一发展道路就是与俄罗斯在一起。然后他似乎不经意地说道,相关的建议他已经提交给主席团。

而在他的建议中写的是什么呢?那里明确无误地罗列出爱沙尼亚脱离苏联的途径,这里的内容与维亚利亚斯在讲台上的发言完全不同。即使到了那一刻,也没有任何人对于即将面临的分裂说出片言只语。他们照例保持了沉默,小心谨慎地避开了锋芒。

\* \* \*

乌克兰的局势也日趋恶化。尤其是基辅市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在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经常议论削减乌克兰学校的话题。他们担心说乌克兰语的人日益减少,很多人对乌克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的命运感到担忧。在60年代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人,大声疾呼,反对莫斯科有意排斥乌克兰语言和历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出版诸如文尼琴科和格鲁舍夫斯基等乌克兰作家的作品。

实际上,大多数乌克兰的大中学生都在使用俄语教学的学校里学习。大家都明白,能够掌握俄语的毕业生,在乌克兰以外的地区有更多的机会受到高等教育,因此大多数居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俄罗斯的学校中接受教育。而在俄罗斯学校里取消乌克兰语课程的做法起到了很坏的影响。

60年代末期出版的一本久巴·伊万的著作《国际主义和俄罗斯化》,这本书成了引发非俄罗斯化教育运动的纲领。当时没有人会想到,伊万·德拉奇和丽娜·克斯坚科等诗人的善良意

图，竟然会引发了一场鼓励乌克兰文化教育、反对排斥民族传统的运动，从而导致乌克兰发生了一场悲剧。

有一些人老早就希望乌克兰脱离苏联，他们自然不会置这样的过程于不顾。在美国、加拿大、西德等国家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骤然活跃起来。他们积极与国内建立联系，派遣人员，在有意与他们合作的人群中建立桥头堡。

国家安全局的人员能够坐视不管吗？当然，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并不是克格勃分内之事。但是克格勃必须搞清，哪些人是真正想弘扬乌克兰的文化，而哪些人是借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乌克兰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那些极力主张独立发展和捍卫本民族习俗的激进分子大力煽动民族情绪。这一点立即在乌克兰的领导人的立场中反映出来。有一次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舍尔斯特来到喀尔巴阡山军分区参加一个党的会议，就因为开会的通知是使用俄文书写的，便大肆责骂部队的指挥官。

“我们的军队属于全苏联，”指挥员反驳说。

不会忘记著名电影导演多甫任科的遗孀、女演员索恩采娃对我说的话，由于莫斯科与基辅之间关系很微妙，她丈夫工作很困难。基辅电影制片厂禁止他拍摄俄语的片子《朔尔斯》<sup>①</sup>，而莫斯科则不允许放映纪录片《为苏维埃乌克兰而战》，多甫任科在该影片中热情地歌颂了一位乌克兰的民族英雄。

“在莫斯科我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基辅——我又成了莫斯科分子”，多甫任科无奈地说。

应该说，乌克兰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不同的。

---

<sup>①</sup> 《朔尔斯》是一部讲述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军官尼古拉·朔尔斯的革命历史影片。

一部分人持强硬的立场:对于各种企图维护民族文化的表现,对民族感情的流露,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在亚历山大·多甫任科问题出现之后,奥列斯·冈察尔、谢尔盖·普拉钦达、季米特罗·帕甫雷奇科、鲍里斯·奥雷尼克等人都受到怀疑。对于乌克兰诗人索秀拉<sup>①</sup>的遗产问题也很谨慎。另一些人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和民族主义分子打得火热,鼓励那些以爱国主义和发展民族文化为招牌来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人。

克格勃采取措施打击由国外的民族主义分子支持的非法组织。多年来我们不断获得国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心的活动信息。我们和乌克兰的同事们一起行动,防止国外的民族主义组织对国内的渗透活动。企图在乌克兰建立地下组织和挑动民族间仇恨的企图被粉碎。

我们打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内部的情报人员提供了详细的情报。我们一直在进行着预防性的工作,只是到了60年代末才采取了镇压的手段,而且也往往带有预防的性质。那些被逮捕的人员很快被释放,一些调查活动也尽可能局限于提示性范围之内。基辅和莫斯科的检察机关也同意这样做。

遗憾的是这些决定并没有得到党的政治工作部门应有的支持。乌克兰的官方宣传机构和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一样,否认民族主义问题的存在。在纪念苏联成立60周年的报告中,安德罗波夫最先谨慎地提到了这一点。

---

<sup>①</sup> 索秀拉·弗·尼(Сочюра В. 1897/1898—1965)乌克兰诗人,他以浪漫主义的风格歌颂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战争年代的爱国主义的抒情诗人。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乌克兰克格勃大楼里遇到了伊万·德拉奇和丽娜·克斯坚科两位诗人，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其它一些乌克兰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国家安全机关的礼堂面对公安人员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然后乌克兰克格勃副主席舒利任科和五局的领导人卡拉什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当时我在基辅出差，所以也参加了这次谈话。

谈话进行得很坦诚。伊万·德拉奇和他的朋友们得到了乌克兰领导人的理解。

但是镇压还是没能幸免。我想应该对此负责的不仅是克格勃机关和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怂恿人们从事反对国家活动的人也难逃其咎。他们盼望着国家出面镇压，以便制造紧张气氛，破坏安定的局面。我想，广大的乌克兰人民最终还是能看清很多民运分子的真实嘴脸的。

不过我还是应该说，克格勃在进行镇压的同时，并没有停止说服教育的工作。

我在写这部著作的同时想到，读者很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我在为克格勃辩解，在为他们开脱罪责？不，我的目的并不在此，我只是想证明，在冷战的条件下工作起来是很复杂的，很多决定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做出来的。我们的工作不仅针对持不同政见者……一位今天在基辅市最繁华的克列夏季克大街上乞讨的女教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

\* \* \*

70年代中期，我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他刚刚从莫斯科回到第比利斯，他激动地向我介绍格鲁吉亚的新宪法。在关于格鲁吉亚官方语言一章中，承认俄语与格鲁吉亚语的同等地位。

“现在的宪法中是如何规定的？”我问道。

“关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改变，”谢瓦尔德纳泽回答。

“这样说来，在新宪法中没有必要写进这一点？”我表示迟疑，“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

“我们应该强调自己是一个国家，”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就此问题与苏斯洛夫进行了沟通，他赞成我们的想法。”

但是当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在讨论通过这部宪法的时候，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在宪法中取消俄语的官方语言的地位——只保留一种官方语言：格鲁吉亚语。谢瓦尔德纳泽在大会上同意了学生的要求。而且关于俄语的条款也被删除了。于是格鲁吉亚语变成了唯一的官方语言。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对待权力机关的决定：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而党的第一书记一个人就可以予以否决。

这一举动在亚美尼亚引起了连锁反应。亚美尼亚也通过了一部宪法。他们也仿照格鲁吉亚的办法，承认亚美尼亚语言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

这一切造成一种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民族感情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的情绪。各国政府对于各种民族主义的表现都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这是国家安全机关的事情，应该让他们进行分析。没有人关心各种民族主义的表现的根源何在。没有人愿意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大家都在说：“我们那里不存在民族问题。”

\* \* \*

当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民族间冲突的程度，人们往往又会掩饰那些看似细微，然而就是引发严重事态的那些事实。例如，在塔什干进行的一场足球赛。地方足球队输给了莫斯科球队，于是一群当地的青年人冲进了球场，高喊着：“打那些莫斯科人！”

事件发生后的好几天里，莫斯科足球队的队员们不敢乘坐城市公交车辆，当地的青年们把他们从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里赶出去。看来这件事情应该被曝光，要采取措施，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但是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什多夫不愿意这样做。对于乌兹别克斯坦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这里不可能有什么民族主义分子。拉什多夫不仅不采取措施，反而千方百计地对莫斯科隐瞒这件事情。

表面上看，似乎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机关之间有着某种关系？其实也真的有直接的关系。例如，西方的媒体把乌兹别克的腐败现象解释为俄罗斯人对乌兹别克人民的压迫。广播中说：“根本不存着什么腐败现象，有的只是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追求，要最终地奴役自己的殖民地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蔑视乌兹别克人，而乌兹别克人在棉田里、在工厂里做苦工来养活俄罗斯人。俄罗斯把棉花卖到国外赚取黄金，而这些黄金本该属于乌兹别克。总之，乌兹别克与腐败现象进行的斗争——就是莫斯科对于民族力量的镇压，而这些民族力量就是乌兹别克民族意识的体现。”

关于民族间冲突问题的根源，我仅仅是从政治观点的角度来说，我并没有说明克格勃所使用的方法。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我们为之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而且工作之中还需要很丰富的专业知识。

在伊塞克湖畔有一个名叫乔尔彭阿特的小村子，那是吉尔吉斯部长会议的别墅村。1981年，有一名吉尔吉斯人在别墅村的一条街道上被杀死，警察支队又遭到了枪击。数小时后，部长会议主席和他的司机在别墅的卧室内被杀害。

苏联克格勃、检察机关和地方公检法机关都介入了调查工

作。被杀死的部长会议主席的遗孀没有提供多少情况：她的丈夫在小楼的二层卧室内睡觉，她在隔壁的房间内。杀手穿窗进入楼房，显然住在一楼的司机发现了他。于是罪犯杀死了司机，并顺利地抵达了二楼，把部长会议主席打死在床上。妻子听到枪声，跑进了丈夫的卧室，看见了凶手。凶手不慌不忙地从原路跑出来。妻子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警察分队来到现场的时候，凶手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侦察员所能得到的全部信息。

调查工作开始了。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杀死当地居民和杀害部长会议主席使用的是同一种枪支，是伊热夫斯克工厂生产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小口径卡宾枪。

开始根据部长会议主席的遗孀提供的凶手体征来调查枪支的拥有者。调查工作从几个方面齐头并进。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来确定凶手留下的痕迹。

重新检查了物品和指纹……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没有任何结果。国家派来的侦察员也无能为力。遗憾的是，凶手留下的信息太少了。古比雪夫州的一则报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恰巴耶夫斯克市，在电气列车上发现了一具自杀者的尸体。死者身边发现了一本书。这是在吉尔吉斯大量出版的书籍：《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代表纪念册》。书中有关于代表的资料。

开始对这名死者进行调查。经过辨认，死者是乔尔彭阿特的村民，名叫斯马金。尽管部长会议主席的遗孀并没有确认该人与她在夜间看到的凶手相像，我们还是继续进行调查，对嫌疑人从乔尔彭阿特离开的全程进行了追踪。

斯马金从乔尔彭阿特出发，乘汽车到达伏龙芝。然后找到了和他一同去莫斯科的人。经过调查，了解到他在前往莫斯科



的途中,特别是在车站的表现。我们甚至找到了斯马金购买车票的目击者,售票员也辨认出了该人。我们了解到了他离开莫斯科所乘坐的火车班次和车厢。确定他是从色兹兰下了火车,然后乘坐市郊电气火车抵达古比雪夫,最后来到恰巴耶夫斯克。

看来这就是那个在乔尔彭阿特村杀死部长会议主席之后逃离现场的人。我们想尽量多地了解他的身世。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他的很多照片,都是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支枪在一起拍照的。我们还找到了斯马金的叔叔,那支枪就是叔叔赠给斯马金的。我们还找了那支枪射击的弹壳和射入树干的几发子弹。检查证明,这些子弹和弹壳与杀死部长会议主席的那支枪完全相符。

记得我来到了嫌疑犯的父亲家中,这里已经被搜查过好几次。不过还是进行了最后一次搜查。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这样一段话:“我要杀吉尔吉斯人,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调查他的杀人动机。

与此同时,另一名侦查员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穿越的窗户时留下的指痕,我们对指痕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当时在苏联还是刚刚开始进行所谓的指痕生物学鉴定,以此来判定留下指痕的人的身份。对指痕的研究最后证实:犯罪嫌疑人的血液成分和其他的指标与该人完全相符。

最后只剩下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枪支没有下落。但是这是很重要的。当时决定使用另一条线索。

周围的人们对嫌疑人的父亲并不十分清楚。他是一个退休职工,私下里出售自己的劳动果实——水果和蔬菜等等。他还从事另一个职业:经营一种制毒的原材料罂粟杆子。我们找到

了他的产品——鸦片，尽管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作为调查的证据。经过重新审问，他终于交代了枪支藏匿的地方。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了那只卡宾枪。看来事情似乎可以告一段落，然而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局势：俄罗斯人杀害吉尔吉斯人。

很多人都希望把这样的事情的原因解释为民族主义。好在有一些政治上很清醒的人员介入了这项工作，不然的话就可能发生其他的麻烦。

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很清楚，涉及民族关系的问题是很麻烦的，需要格外小心谨慎，要考虑居民的所有要求和需要，所有的细微的因素。

1986年我因事来到萨哈林。在我所有的印象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朝鲜人在当地居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很多朝鲜人在韩国都有亲戚，然而由于朝鲜领导人坚决反对苏联的朝鲜侨民前往韩国和日本，他们与自己的亲戚都没有往来。然而事情有时也会有例外，因为苏联领导感觉到这样的限制也是不公正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萨哈林的朝鲜居民。在大多数居住在萨哈林的朝鲜居民中，并没有某种类似中心之类的组织来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沟通本民族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很多萨哈林州的朝鲜居民都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种沦落他乡的感觉。

我们与萨哈林州的领导人谈论到这个问题，我们都认为，必须逐渐地改变对待朝鲜居民的政策，建立起促进朝鲜侨民文化、艺术发展的因素，并帮助他们与境外的亲属建立联系。

回到莫斯科之后，我们得到消息，当地领导已经同意为萨哈林居民办理到韩国和日本的出境手续。地方当局制定出多项吸引朝鲜居民参加社区生活的计划。

萨哈林州克格勃的领导人谢利赫寄给我一本诗集《赋予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访问南萨哈林数月后当地朝鲜族诗人出版的。我非常高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已经初见成果。遗憾的是，这竟然是最后的成果。国家的领导人忙于自己的改革，无暇顾及民族问题：戈尔巴乔夫视察萨哈林州之后，曾经通过了一项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的支援远东的计划。然而事过之后竟然无人问津。众所周知的是：语言与行动——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

## 难忘的 1986 年 12 月

我在一份报纸中读到了这样一则大事记：“1988 年，巴库。这是在 1986 年阿拉木图事件之后第一次动用军队来对付和平游行群众，游行打出的标语是要求哈萨克斯坦独立。”

对于这次事件是这样解释的：

1986 年——阿拉木图市勃列日涅夫广场（现名共和国广场）群众集会。原因是一些青年人不同意党中央书记的更替：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书记库纳耶夫被免职，而他的职位由莫斯科政治局“推荐”的“外乡人”科尔宾来接替。12 月 18 日出动了武装力量来驱散集会人群，导致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第一次流血事件。

科尔宾原来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担任党的第一书记，他自诩是一个精力充沛、有经验的领导人，他在执行禁酒令的领导工作中表现特别出色。在一年之中他在列宁的故乡扫清了酗酒的现象，请原谅——在列宁的故乡完全没有人饮用酒精饮料，于是“上级”发现了这个人才。然而在实施“禁酒令”中取得的成绩还在其次，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科尔宾实际上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为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做了很多的好事。

把他作为哈萨克斯塔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他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工作之前，还曾作为谢瓦尔德纳泽的亲密战友担任过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每当提起谢

瓦尔德纳泽的时候，科尔宾总是赞不绝口，称颂他的智慧和洞察力。无论谈论什么问题，他都会提起自己的崇拜偶像。科尔宾还有幸学会了格鲁吉亚语，在前往阿拉木图赴任之前，他已经在学习哈萨克语了。

科尔宾在调任格鲁吉亚之前的，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担任州委第二书记。

我第一次见到科尔宾是在1986年12月。12月16日我得到了他取代库纳耶夫的消息，当时我心中就有某种不祥的预感。因此当第二天清晨听到阿拉木图的学生在党中央大楼前举行抗议活动的消息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吃惊。他们高喊：“不要科尔宾！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书记必须是哈萨克人！”也许他们是对的，假若……事情是这样，有好几个人都盯着哈萨克斯坦党中央领导人的职位，而第一个人就是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巴耶夫，还有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书记扎喀什·卡马利特杰诺夫。

我很了解扎喀什。因为他在担任党的领导人之前，有好几年都在担任哈萨克斯坦的克格勃主席，那是库纳耶夫任命的。他曾经在哈萨克斯坦党中央负责思想工作，对于他重返党中央工作这件事，很多人都认为是库纳耶夫的主意，是准备让他接任卡马利特杰诺夫的第一书记。

应该说，卡马利特杰诺夫为人很谨慎，他对库纳耶夫很忠诚，也尽量讨得莫斯科的欢心。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了获得莫斯科的支持，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想表现得更加俄罗斯，甚至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他的某些言论不可能不触犯哈萨克人的民族感情。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知识分子发生了争吵，甚至连德高望重的苏尔西梅诺夫也和他吵起来了。

当卡马利特杰诺夫在克格勃工作期间，我便和他不止一次

地谈过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帮助他纠正错误,以免在本民族人民面前丧失威信。然而他被那些民族主义分子的阿谀奉承的鼓噪冲昏了头脑。

纳扎尔巴耶夫是另一类人物。与卡马利特杰诺夫不同,他是一名有学问的经济学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生产组织者。他能在地上站稳脚跟,感觉到脚下坚实的土地。作为取代库纳耶夫这位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位置的人选,纳扎尔巴耶夫是成熟的。我想莫斯科也会支持他。我是在 1986 年在莫斯科与他相识的。我很久以来对他就有好感,我想他对我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一切必须经过时间的验证。

我得到关于学生动乱的消息之后,立即就打电话给共和国克格勃主席维克多·米罗什尼克。他告诉我说,昨天夜里哈萨克斯坦首都的几所大学的宿舍确实发生了学生集会,抗议科尔宾当选。第二天清晨学生们走上街头。局势很严峻,很可能会变成大规模的群众骚动。尽管学生的数量不多,但是他们能量很大——他们已经喊出了打砸抢的口号。然而米罗什尼克认为事件并不严重。经过和苏联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交换意见,我们得出结论,不必采取紧急措施。

当日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召开了老战士和劳动英模大会,我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幕之后约一个小时,苏共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把我叫了出来,和他的助手一起讨论了阿拉木图的局势。拉祖莫夫斯基建议与切布里科夫联系。于是我拨通了电话。在电话中得知,戈尔巴乔夫命令我们立即飞往阿拉木图,因为那里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从切布里科夫的语气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表现来看,国家领导人对于克格勃很不满意,责怪我们事先对事件的发展没有作出预测。我们在飞往阿拉木图的途

中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讨论。我们小组的负责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一再询问我，为什么克格勃会忽略大学生的举动。我答应到了阿拉木图之后一定要查清楚。

我们到达机场时，骚乱已经结束，我们看到了动乱的后果。

哈萨克斯坦的首都，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的所在地、市中心的勃列日涅夫广场，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广场和相邻的街道上有几辆被烧毁的汽车，到处是碎玻璃、被遗弃的木棒和铁棍——显然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殴斗。刚刚走进党中央的大楼，就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科尔宾、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领导人余怒未消。从科尔宾的片言之中可以了解到，他们把刚刚发生的事件主要归罪于克格勃主席米罗什尼克身上。他们认为这次示威性的行动就是库纳耶夫的亲信组织的，而米罗什尼克对于这些人没有予以必要的关注，甚至还怀疑米罗什尼克故意对科尔宾隐瞒了大学生们准备进行示威的实情。

所有的人都在声讨库纳耶夫，因为他拒绝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与会者支持科尔宾当选。但是我们立即就发现：在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委员会中，对于科尔宾当选以及当前发生的事件的意见并不一致。最气愤的是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马利特杰诺夫。他们显然对于从莫斯科调来的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的表现不满意，尤其是对那些原先曾许诺对他们支持的那些人。

他们一致认为这次行动是库纳耶夫及其追随者们组织的，对此没有不同的看法。索洛缅采夫要求揪出动乱的组织者，他相信这次行动是有预谋的，绝非自发的事件。既然是阴谋，就应该有一个策划和指挥的司令部。他们还想起了一些传闻，似乎此前库纳耶夫的妻子从莫斯科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就曾经扬言对于库纳耶夫被解职将要采取行动。

但是事件是完全按照一种自然的模式发展的。库纳耶夫被解职的消息一经传来，在阿拉木图几所高校的大学生中立即引起了骚动。库纳耶夫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的确为哈萨克斯坦做了不少的事情。尽管有人想要追究他的腐败罪名，但是在这方面并没有查出什么证据：他不是苦行僧，然而他的大公无私引起了不少人的忌恨。而且在他身边的一些人与一些可疑的事情有染。他们利用青年人的感情容易冲动，挑起事端。高校中一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教师，也起了一些作用。

12月16日上午，学生们开始向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汇集。所有的标语口号都是让科尔宾下台，要求选举一名哈萨克人来取代他的位置。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人名。共和国的几位领导人在集会上讲话，企图劝说大家离开广场，但是没有起到作用。

局面逐渐失控，一些支持大学生的演讲者上台讲演，而一些极端分子则号召冲击党中央大楼。

为了阻止事态进一步的恶化，内务部的部队被派到了广场，一些边防军的学员负责保卫党中央大楼。战士们手里并没有枪支。

劝说无效，相反却让那些挑拨者得到了借口。广场上集会的人群高喊着口号开始冲击党中央大楼，企图冲开士兵、警察和军校学员设置的警戒线。出现了动手现象。有人动用了土块、钢筋和石头，士兵们被迫使用了皮带和木棒。

一些坏分子乘机点燃了几辆汽车，砸碎了附近两家商店的橱窗。打砸抢分子越来越多。平息动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双方都出现了受伤的人员，一位地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被打死。事后我观看了电视录像，动乱人群的残暴令人震惊。事后的各



种报道中所说的伤亡数字是数百人。我应该是正式的见证人：当场死亡的人员有三个。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电视台人员、一名16岁的俄罗斯男孩被人刺死在离广场很远的一辆公共汽车里：他与售票员吵架，身边站着的一个把刀子刺进他的心脏。第三位是一个哈萨克人，在广场的斗殴中受伤，三天后死亡。

在我们来到阿拉木图以前，冲击党中央大楼的人们与大楼的保卫人员之间的冲突已经被制止，正在查找肇事者。

莫斯科来的工作组的首要任务就是平息事态，而这件事只有人民群众自己才能做到。因此我们要求群众卫队走上街头。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则主张依靠军队。当我看到了在一次会议上对军区司令员洛波夫施加压力的时候，我知道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

“不能使用军队”，我说道，“军队只能用来保卫一些目标，军队不能用来对付人民。”

我的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当地的民族冲突已经爆发，有人正在号召杀死不参加暴乱的俄罗斯人。

应该指出，同时存在另一种情况。不少人出来把阿拉木图的动乱定义为一场群众运动。我可以作为见证：参加那场动乱的不到一万人，主要波及勃列日涅夫广场和邻近的街区。而整个城市的绝大部分地区依然过着正常的生活，而哈萨克斯坦的其他城市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记得，只有在帕甫洛达尔发生了两千人的集会。

在我们到达阿拉木图的当天夜里，中央代表团参加了哈萨克斯坦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几次会议。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有人一直在说，似乎哈萨克斯坦的著名诗人苏尔西梅诺夫就是动乱的始作俑者，原因是当时群众要求

他在集会上讲话。当时我们询问苏尔西梅诺夫在什么地方，卡马利特杰诺夫回答说诗人已经走了，此刻不在阿拉木图。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苏尔西梅诺夫就在城里，并且想在大会上面对本城居民讲话，但是没有让他这样做。于是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真的愿意安定吗……他们把一切罪责推给库纳耶夫的拥护者并非偶然。

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次日清晨之前我决定到市里看一看，和那些参加保卫党中央大楼的战士们谈一下，看一看街上的情景，对事态做一个判断。苏联副总检察长巴热诺夫、内务部副部长叶利索夫与我同行。

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只有少数的一些人，其中主要是一些好奇者。我已经说过，广场上遗留了一些被砸烂的汽车、火烧的痕迹、一些石块、棍棒，还有一辆还在冒烟的消防车。街上很平静——只有极个别的几伙青年人还向站岗的士兵投石块。当天夜里并没有人员的伤亡。

视察之后我们返回党中央，和曾经参加保卫党中央大楼的士兵们攀谈起来。他们说，在群众大会上演讲的有地方局的领导人、党中央的书记和委员，还有一些文化名人。但是人群在骚动，没有人在听，只是一个劲地高喊：让科尔宾下台。要求库纳耶夫重新上台，还有人拥戴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马利特杰诺夫，总之就像平时的人群一样，喊着不同的声音。但是主要的声音是：让哈萨克人取代莫斯科派来的俄罗斯人。

显然这场冲突的实质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保卫党中央大楼的主要是俄罗斯的士兵，而冲击大楼的主要是哈萨克人。这样一来很可能增加民族之间的对立。因此我们反对部队介入，坚持要求派联防队员到街上维持治安，而联防队中要有哈萨克

人和俄罗斯人，组成一个统一的队伍来对付闹事的坏分子。这件事要尽快地进行，因为明天上午可能会有新的动乱发生。

果然不出所料，联防队伍根本就没有建立，而青年人重新走上街头，提出的还是同样的要求。无论怎样劝说都无法掌控局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局势不断恶化。

共和国领导人决定派军队进城。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鲁舍夫大将已经来到阿拉木图。很不愿意利用军队来对付平民。一天就要过去，这已经是12月17日，甚至已经是18日了——联防队员终于上街了，而联防队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这样一来进一步使局势恶化：俄罗斯人反对哈萨克人。不得不耍耍滑头。决定搞一次部队的训练表演，显示军队有能力制止混乱局面。决定这个问题的小组不在党中央大楼里，而是在广场上。我们决定公布部队演练的准确时间。

我们向苏共中央拉祖莫夫斯基进行了汇报，请求他出面与库纳耶夫会谈，希望库纳耶夫介入此事，利用自己的威信，号召阿拉木图的居民制止动乱。很快我们得到通知，似乎戈尔巴乔夫已经和库纳耶夫谈过。我们决定在18时进行军事行动。后来经过磋商，又向后拖延了一个小时。戈尔巴乔夫与库纳耶夫的谈话就是在这个时间。一小时过去了。我们决定再等待半小时。

令我吃惊的是，在这半小时的时间内，中心广场和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任何示威者出现。是谁下达了命令，制止了混乱。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直到今日，也未必有谁能够回答。

很显然，在国家领导人中有人与示威人员有着关联，于是中央广场上的所有活动都取消了。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据，也不好捕风捉影，但是这样的设想，并非空穴来风。好在一切都结束

了，没有发生流血事件，集会的人群和平地解散，城市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第二天，索洛缅采夫和科尔宾巡视了全市，走访了很多企业。我也参加了这些会见，到处的谈话都是一个调子：“应该保持共和国的安定局面，我们像亲兄弟一样地生活在这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冤仇，事情都是社会上的恶势力、犯罪分子和腐败势力、贪官污吏造成的。是他们害怕科尔宾的到来会改变局势，而靠库纳耶夫的掩护得到巨额财富的那些人，害怕追究自己的责任。”

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哈萨克人都是异口同声。我记得曾经和一位阿拉木图的居民谈过话。那人直截了当地说，这些集会都是那些为了保住自己钱袋的人组织的。这当然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挑拨了青年，青年人被那些穷凶极恶的极端分子推到前头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党员群众对阿拉木图发生的事件的反应很迟钝。很多人认为，应该动用武力镇压那些示威分子。

后来有人说什么“人们打出了要求哈萨克斯坦独立的旗号，这是民族觉醒的表现”。我作为一个目击者再次强调，根本就没有人提出关于哈萨克民族利益之类的要求。人们谈论的是住房问题、供应问题——一句话，是最基本的需求问题。至于在民族基础上的动荡，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产生。

后来就有流言产生了，说什么哈萨克斯坦的事件之后进行了大屠杀。这纯粹是一派胡言。在这次事件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中，克格勃只抓捕了一个人，他是一所高等学校的教师，这个人本来就因为散布挑拨性的言论而闻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系统上，只抓捕了这一人。当然还因为一名男孩和一名联防

队员萨维茨基遭到杀害而抓捕了一些犯罪分子。杀人犯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了其他刑罚。

我还记得苏共中央对于阿拉木图事件处理的评价。雅科夫列夫说:“哈萨克斯坦的事件,是从过去的枪口射出的一串子弹。”令人吃惊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串子弹,变成了今天的一面旗帜。后来,这一天被宣布为哈萨克斯坦的独立日。假设在那一天真的从枪口射出一串子弹,那就不一定会得到这样的荣誉。看来,历史将会对于1986年阿拉木图事件作出真正的评价。

只有一件事很清楚:当时在哈萨克斯坦所发生的事情,是苏共中央领导轻率行为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莫斯科突然决定,让一位俄罗斯人来担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的领导人。显然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班子对这位与勃列日涅夫过从甚密的库纳耶夫有所不满。总之,对科尔宾的任命是一个草率的决定,而这一决定在哈萨克斯坦的领导层中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经过这次事件之后,纳扎尔巴耶夫的情绪也一落千丈,因为他成了这次阴谋的牺牲品。而实际上,这些阴谋是卡马利特杰诺夫利用苏共中央对自己的支持而设计的。而在涉及国家领导人这样重要的事情中,阴谋手段总会导致同样的结果,那就是普通老百姓付出血的代价。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民族之间的冲突似乎是一个国家内居住的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之间深层矛盾的继续。而具体在哈萨克斯坦,这些冲突表现在哈萨克人与俄罗斯人之间,在哈萨克人与车臣人或者其他什么民族之间。而民族冲突的复杂和矛盾,并不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民族,一般来说,这是当权者采取一些轻率的决定的结果。

我还要重提“从过去的枪口射出的一串子弹”。对于发生在

哈萨克斯坦的事件作出这样的定义——仅仅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应该深入地探讨这里的原因：为什么过去会射击，当然这个日期指的就是哈萨克斯坦独立的那一天。哈萨克斯坦的现任当权者可能会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是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讲述在 1986 年 12 月发生的事情。

---

---

## 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腾飞和跌落

80年代后半叶，格鲁吉亚的政治局势日趋严重。反对派的活动是经过认真策划的，而且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支持。而下面的两个原因，更增加了这种支持的重要性：知识分子被他们使用的口号所吸引，而这些口号就是当年波罗的海国家，首先是爱沙尼亚的居民使用过的。

在支持格鲁吉亚反对派的人当中，有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阶层，还有谢瓦尔德纳泽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时期的一些亲信，其中包括电影导演奇赫伊泽、申格拉亚和巴克拉泽教授等等。他们公开声称格鲁吉亚是在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早就应该推翻格鲁吉亚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人的行列中还有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科斯塔瓦和钱图里亚等人。

当时这个圈子里最显赫的人物要算是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了，他的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父亲——格鲁吉亚古典文学家康斯坦丁·加姆萨胡尔季阿。兹维阿德获得了护法运动受难者的光环。他比其他的人的权力欲更加强烈，他甚至曾经参加过格鲁吉亚东正教的大主教的竞选。不择手段的虚荣贯穿了他的一生。有人说他曾经因持不同政见而锒铛入狱——这是无稽之谈！他是1979年被捕的，受到法庭的审判，此后他在莫斯科因为向美国特务投递情报而遭逮捕。在法庭上他对所

犯罪行供认不讳,并为此在电视上作了专门的声明。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被判处三年的流放。根据格鲁吉亚领导人的申请,他在高加索的牧场上度过了刑期。

刑满释放之后,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远离了政治舞台,直到80年代末才作为伊利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创始人之一重新出山。在钱图里亚民族民主党成立之前,这个协会是格鲁吉亚最主要的反对派力量。

反对派经常在大学生中组织各种集会,动员第比利斯和其他城市的群众上街。

当时组建的反对派组织中还有以申格拉亚、奇赫伊泽等文化名人为首的格鲁吉亚人民阵线,他们手中掌握有电视和青年新闻社等宣传工具。他们用改革的口号作为掩护,对苏维埃政权大举进攻——他们从对格鲁吉亚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开始,揭露沙俄的侵略政策,否认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在把格鲁吉亚从沙皇的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作用。1990年4月,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

在数周的时间内,第比利斯的部长会议大楼前的广场变成了一个大的讲演台:有时宣布绝食,要求政府下台;有时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表示对共产党人的“人民抗议”。当时在约谢利阿尼的领导下组建了战斗小组,随后又出现了其他的武装组织。

反对派准备夺权。地方当局当然看到了一切,他们明白,局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政治的?没有人知道怎么办,而且在紧急的情况下根本来不及。反对派只要求一件事——交出共和国的政权。

1990年4月之前,右翼力量(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



科斯塔瓦和钱图里亚等人)形成了反对派。人民阵线的组织者只是悄悄地支持他们,担心自己被指责为反对进步的力量。人民阵线在格鲁吉亚扮演着不太光彩的角色——他们千方百计地煽动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阻止建设性的工作。而中央采取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的立场:一方面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要求稳定共和国的局势,而另一方面,又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帕迪阿什维利,然后是古姆巴里泽)过分夸大了事件。

顺便说,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作风,他一方面为中央的无所作为进行辩解,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为平息局面采取任何措施。结果地方当局失去作用,面对严重的局面一筹莫展。

我并不是主张采取军事手段,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所谓的“过分夸大了事件”的说法为媒体划出了框框,于是广大群众得到的都是被歪曲的消息,看到了被扭曲的现象,只得相信传言。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说的话是“过程已经开始”,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是怎样的过程?向什么方向发展?而过程真的已经开始,只不过不是朝着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方向——而是朝着超级大国解体的方向。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能做些什么呢?发动群众,号召工人走上街头,来反击破坏者!本来第比利斯的劳动群众一定会无条件地走上了街头,就像鲁斯塔维、巴统等城市大企业的工人们一样,会给民族主义分子们迎头痛击。

但是莫斯科建议不要采取对抗的立场,不要熄灭“过程”,同时又命令准备好部队,不能允许对方夺取政府机关。戈尔巴乔夫所给的就是这样的命令,当时他正在英国访问,随时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以便了解事态的发展。所有发往格鲁吉亚的命令

都经过了他的批准。

戈尔巴乔夫从伦敦返回，很多人在伏努科沃机场对他详细地讲述了“秘密的夜晚”。我没有到场，但是克留奇科夫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说戈尔巴乔夫同意派军队进入第比利斯来维持秩序。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应该飞往第比利斯，就地进行领导。

据克留奇科夫说，他电话指示格鲁吉亚克格勃主席古姆巴里泽，要求他随时注意事态的发展，但是不要动用任何武装力量。我也打电话给古姆巴里泽，他确认已经得到了克留奇科夫的指示，随后他又告诉我说，根据格鲁吉亚第一书记帕迪阿什维利的请求，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推迟前往底比斯利。他保证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平息事态。我要求他报告市内的局势，他说：

“事情很糟糕。聚集的人群正在准备行动。口号是反对苏联。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动手，尽管此时已经有人在召唤冲击政府大楼了。”

并没有听到格鲁吉亚军队已经开始行动的消息。

早晨6点，古姆巴里泽的电话铃声唤醒了我和：

“我们这儿出事儿了。军队在清理广场，有12人死亡。”

我向克留奇科夫作了汇报，他又向拉祖莫夫斯基汇报，我接到命令：立即飞往第比利斯。

我已经是数次飞第比利斯了。而且每一次到来，这座城市、城市的居民和历史，总能使我感到高兴。“悲伤的格鲁吉亚的丘岗”总是以自己的无与伦比的特点召唤着我，而这片圣洁的土地上的人们，都有着诚实而美好的心灵，他们友好而守信。

当你飞经高加索山的主峰的上空，看到下面的厄尔布尔士

山和卡兹别克山，你会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这是一种庄严而肃穆的美。

然而经过这紧张的一夜之后，飞行已经不能赋予我欣赏自然美景的心情。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所发生的事件上了。我意识到自己所率领的小组的责任，但是并不清楚与格鲁吉亚的党政领导的立场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关于夜间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是从格鲁吉亚克格勃那里得知的，而格鲁吉亚的党政机关对此保持了沉默，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感觉到格鲁吉亚当局的态度。

这一切让我产生了警觉，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了：事情发生在众人的眼皮底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责任却全部推给安全机关。当然这样生活起来要轻松一些，而且这样处理事情已经是轻车熟路。没有哪个人愿意向上级汇报不愉快的事情。更况且一旦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说：“又是克格勃多管闲事。”

但是不介入也不行。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也是克格勃最先汇报给国家领导的。但是从被窝里惊动起来的戈尔巴乔夫，还是责备我们汇报不够及时。

第比利斯的事件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最先从莫斯科飞抵出事地点的还是克格勃的副主席。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接近这座城市，我明白第比利斯的骚动紧跟在卡拉巴赫的悲剧之后，看来前景不妙。

来到第比利斯之后，我了解到：直到4月8日晚上之前，城里的局势一直很紧张，几乎就要冲击政府大楼。在广场上进行的录音证实了这一点。

有人故意封锁了广场的出口，目的是造成拥挤。这不是军人干的，是组织暴乱青年人干的。当时死亡的人都是拥挤造

成的。

尽管有不少歪曲事实的议论，制造悲剧的元凶，那些把群众带领到广场进行非法集会、制造流血事件的首要分子还是被绳之以法。他们是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钱图里亚、采列捷利等一共六个人。事情已经调查清楚。

当天晚上，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飞临第比利斯。为什么傍晚时刻才到，至今还是一个谜。

当天夜里召开了格鲁吉亚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了很长时间，尽管事件的结果已经清楚，但是没有人提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不过最后大家还是承认要揭穿制造流血事件的元凶，以及那些挑动群众搞非法活动的分子。

“我们应该支持格鲁吉亚党中央的行动。不能冤屈帕迪阿什维利同志”，谢瓦尔德纳泽最后说道。

这是夜间发生的事情。但是到了第二天清晨，事情的说法就全变了。整个攻击的对象都集中到忠诚执行自己使命的部队领导人罗季奥诺夫将军身上，把他当成了替罪羊。政治局会议的大部分参加者把矛头指向军人，有人竟然公然造谣，说自己亲眼看见军人使用了工兵锹，向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动武。至于加姆萨胡尔季阿等人的罪责，已经没有人追究。一切责任都归结于莫斯科和帕迪阿什维利。

会后我对谢瓦尔德纳泽说，广场上死的人根本不是被铁锹打死的。医院里对尸体的检验也没有发现铁锹的痕迹。克格勃人员现场拍摄的录像也证明，这里与铁锹没有任何关系。

“难道还有这样的录像吗？”谢瓦尔德纳泽问道。

“当然。我们应该记录这样的事件，”我回答。

经过查看，确认关于部队使用铁锹打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录像看过之后就被封存起来了。接下来开始制造伪证。

很快，以加姆萨胡尔季阿为首的一伙的被捕人员便获释了，甚至还被允许参加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的竞选。不知为什么，甚至连以索波恰克为首的议会委员会也忘记了这次事件的参加者。

罗季奥诺夫将军是一位守纪律的军人，他不能说出总统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他无关，他没有得到及时的报告，他被蒙蔽了。

格鲁吉亚事件并不是唯一的事例。从那时起，戈尔巴乔夫开始使用另一句套话：“应该整顿秩序。行动吧，我支持你们。”

第比利斯事件为加姆萨胡尔季阿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土壤，格鲁吉亚人为了推翻他动用了武力，还流了血。

我对加姆萨胡尔季阿持反对的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我的看法，然而他是由格鲁吉亚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谁也没有权利推翻他。因为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

但是莫斯科的态度如何呢？与此相矛盾么？不，中央实际上支持政变，而谢瓦尔德纳泽已经瞄准了格鲁吉亚第一把手的位置了。

于是广场上的真正的杀人凶手被狡猾的妥协派政治家赦免了，而那些反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人们，至今还背着反对民主的罪名。

在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总统之前，格鲁吉亚就已经在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一个熟人来见最高苏维埃主席古姆巴里泽，

他说：

“据说格鲁吉亚上空发现了飞碟。”

“胡说！”

“对呀，可是这是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说的。”

“是他说的？那就是说真的有飞碟。”

我想再次强调，我们从没有把持不同政见者绳之以法，也没有对他们采取其他的处罚措施。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只有对待具体的违法行为才能使用。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就是一个例子。

第比利斯事件之前很久，格鲁吉亚克格勃主席伊璠里多次建议逮捕加姆萨胡尔季阿，因为他曾多次挑起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之间的争端，但是我们没有同意。

我在70年代曾到过格鲁吉亚，会见了谢瓦尔德纳泽。他向我提出了逮捕加姆萨胡尔季阿的问题。我没有同意，理由是格鲁吉亚的社会舆论并不了解：格鲁吉亚社会舆论对这个人的了解仅限于他是去世不久的格鲁吉亚文学家的儿子，而对于他的种种劣迹并不知情。最好让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去主持父亲的纪念馆，为父亲建立一座纪念碑，纪念这位把一生献给格鲁吉亚文学的伟人，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现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应该说，谢瓦尔德纳泽听取了我的建议。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介绍了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对他作出了适当的评价，同时也揭露了他作为典型的破坏者的品质。他的发言被电视和媒体转播。但是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并没有被逮捕。只有当在确认美国大使馆把他作为护法者予以支持之后，才对他实施了公开的逮捕。

但是谢瓦尔德纳泽又如何呢？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成了格鲁吉亚的第一把手。显然，他依靠自己在国外的朋友——西方的国家元首，他的期望是来自西方的源源不断的美元在一瞬间就会把格鲁吉亚变得和苏联时期一样的繁荣。但是此时的格鲁吉亚人民只能品尝谢瓦尔德纳泽政策带来的恶果。

---

---

## 移民问题

近年来苏联公民向欧洲、美国、加拿大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变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令人头痛的问题。媒体对于“人才流失”问题给俄罗斯科技文化带来的损失不断敲起警钟。国家安全机关对于这样的问题无疑也会异常关注,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经济的提升、政局的稳定。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重大问题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深入的分析,不可能成为本书的目标。但是我还是想就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讨论,因为这一点与我们安全机关的工作密不可分。这里我指的是作为移民潮开端的以色列移民问题。

苏联公民大批对外移民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当然原因很多。有几个案件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其中包括“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医生案件”,还有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事情还表现在对待犹太文化遗产的态度上:对犹太中心、学习犹太语言——首先是学习现代希伯莱语的可能性问题。

让我们回忆一下,犹太剧场是如何关闭的,又是如何停止现代希伯莱语的报刊出版、消减现代希伯莱语的文艺书籍的出版。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长久以来,限制犹太人进入外交部、内务部、克格勃和苏共中央等机关工作。对于犹太人返回自己的故乡的愿望,也不能不予考虑。

不过这并不是最主要的。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首先是二



战时期犹太人家庭的离散。这涉及成千上万的人，其中有来自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等国家的犹太人。大批的犹太人为了逃避德国法西斯的杀戮，在苏联定居下来，但是在欧洲还有大约相同数量的犹太人，其次是在以色列。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开始提出家庭团聚的问题。当时本来可以制定出正确的办法，让所有希望恢复家庭的人员离开苏联到一个新的国家，或者迁居到苏联来。这样是可以解决家庭团聚的问题的。而且当时还没有提出涉及到国家机密的人员问题。而到了70年代，这个问题成了很多希望离开苏联的人员的主要障碍。

第二个原因是西方的间谍机构的活动加剧了局势的恶化，他们利用人们对于出境的限制的不满，极力挑拨犹太人采取极端的行动。

且不说1970年轰动一时的普尔科沃机场的劫机事件。我只是想说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西方特工机关。这个问题后来转变成政治问题：关于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问题解决，变成了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影响到了贸易谈判的条件。美国特别积极地利用这种局面，把它变成了促进冷战的武器。

解决这一复杂困难的问题并不容易。一方面，西方政府对某些申请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感兴趣，于是他们对我们施加压力，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不断地直接的威胁我们：要么你们同意犹太人离境，要么我们取消你们在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捍卫国家秘密。这一条理由往往被我们的一些官吏们滥用——他们一方面尽量逃避自己的责任，又不愿意面对

现实生活，他们的原则是：只要手中有权，就能够压制一切。我和一些负责保守国家秘密的同事，往往会在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有时甚至是发生冲突。在那些年里，出国简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久以后，其他的民族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为什么犹太人可以，而我们却不行呢？”

当时五局负责这一工作，好在我们得到了内务部副部长舒米林的支持。他当时主管办理签证的部门。

当然起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安德罗波夫，他支持我们，坚定地支持犹太人家庭的团圆。他这样做也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政治局的很多同事都持相反的观点，而且在安全机关内部也有反对意见。克格勃负责军事反间谍和保守秘密的齐涅夫对我们的做法就很反感。

我很清楚，在政治局里反对安德罗波夫的主要是切尔年科——他们的主要论点还是“保守军事机密”。不过当时有什么人比安德罗波夫更加关注信息流失的问题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指责我们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

有一个事件尤其令人震惊。1974年我在基辅见到了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这是我们很尊敬的人。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很强，对问题有很深的洞察力，而且严于律己。我们的初次相见就使我们永志不忘——这个人的第一印象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其中也包括犹太人出国问题。他问我：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国？”

我惊奇地回答，我本人并不是赞成这种做法：其实主要的障碍就在这里——乌克兰。

通过谈话我了解到这位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观点。但是乌克兰

兰党中央机关持另一种意见。乌克兰党中央认为，我们为犹太人打开出境的大门，无异于为我们的敌人打开获得我们秘密情报的大门。官员们千方百计地阻挠理智的解决办法。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问题出在中间的环节，也就是说，不是出于中央，而是出于各个加盟共和国。各级官吏对于他们不同意的政策，会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来抵制，有时简直就是公开对抗。

有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与谢尔比茨基谈话之后不久，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给莫斯科报提交了一个建议，要求严格限制犹太的民族主义分子出境。我不必说是谁的主意。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曾出席与谢尔比茨基的谈话，他对那些“坚决”捍卫国家军事秘密，但是无视日趋严重的民族冲突危机的人们的意见言听计从。其实，极力破坏苏联政治稳定的那一股力量正是利用这些人。

1969年末，我们终于使得数千个家庭获得了出境的允许。问题已经离开了死点，直到1974年这个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然而不出我们所料，还是遇到了暗礁。出境人员的目的国是不同的，首先是美国，选择以色列的要比去美国的少得多。苏联公民的出境得到了美国特工机关的积极支持，他们打算利用这一点来破坏苏联的稳定。

他们以为我们失算了。但是没有这样的事。必须继续自己的战线，而不能屈服于压力。这压力首先来自美国，还有那些涉及国家机密的人员和掌握最新科学成果和先进技术的科学家。

不过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最终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开始对一些外宾以及赴苏参加各种会议的代表们的请求让步。美国的

议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案<sup>①</sup>，取消外贸中对苏联最惠国待遇，于是我们就一步一步地退让。特别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当我们的某些科学家被他们确认掌握某些秘密，这些专家就会遵照“特别批准”被放行。而且作出这种无原则行为的，正是那些指责我们对国家机密不负责任的人。有一件事情最让我难为情，协商过程变成了公开的交易：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布伦夫曼来到苏联——我们又要批准2—3个犹太家庭出国。其中的阿尔巴托夫院士要求去美国，还要批准另外一个人。从此人们开始产生了对克格勃的不信任，对保守国家机密的原则受到了怀疑。与此同时，使得各个级别的主观主义有了可能。

我曾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我们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想，在整体上，我们没有在“犹太人问题”上使我们的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

---

<sup>①</sup> 1974年生效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美国国会于1974年通过的这一法案规定，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要获得最惠国待遇，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同美国达成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互惠条款协定，并获得美国国会批准；二是必须满足自由移民的条件。依据这一法案，美国政府对有关国家的最惠国待遇每年进行一次审议。

---

---

## 宗教问题

如何正确对待宗教信仰问题，是十月革命之后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仅给某些人造成痛苦，而且影响到整个国家。

宗教是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它在国家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它的影响范围不局限于某一个人群，它对一个阶级乃至全民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不信教的那部分群众——尽管在俄罗斯这是少数。

让一切都毁于一旦是不可能的，但是十月革命之后就是这样做的。从首都到偏远的村镇，所有的教堂都被拆毁，所有的修道院被关闭，受到迫害的不仅是神职人员，甚至波及了普通的信徒。教堂的钟被当众打碎，十字架被毁掉，庙宇被玷污，变成了牲口棚或仓库。那些没有移作他用的教堂也逐渐破损荒废，尽管很多教众多次请求，这些荒废的教堂并没有归还给信徒。

这条“总路线”持续了数十年。不错，到了60年代有了某种进步。对待教堂的政策变得比较宽松，政府对于进行祈祷的场所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已经开放的教堂也更加宽松。但是这并没有最终解决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因此在冷战时期，宗教问题总会被西方当做把柄抓住，用来挑拨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

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领导人之后——尽管已经很晚了，

在国家安全机关中开始公开地议论禁止宗教信仰对国家的危害。我本人曾经在 1981 年的在全苏国家安全机关会议上讲话，我在此不避卖弄之嫌，引用其中。

我们应该对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郑重地提出，必须制定出关于宗教和信徒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机制。我们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执行着过时的政策。我们再也不能把信教的人当做二等的公民来对待。我国信教的人多达千百万。他们勤恳地劳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很多人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不应该把普通的信徒与国外派进来进行破坏活动的间谍等同看待，应该把目光放得宽一些。不应该把教堂与教会等同于间谍。我们这里作为宗教文化的庙宇和纪念性建筑已经被拆毁，而宗教以什么来回答我们？大部分神职人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但是在大的原则上还是支持我们的国家，尤其在战争的年代里。他们把这场战争看做保卫祖国的伟大战争，并没有与国家对抗，相反与国家友好相处。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宗教和信徒的态度。

当时我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建议。

有人指责我的发言“滑向宗教信仰的立场”。不过我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支持。但是和许多情况下一样，即使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党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也没有支持我。

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关闭了很多清真寺。到 60 年代之前，只剩下 26 座。我在见到乌兹别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拉什多夫的时候提出：恢复清真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几乎每个集体农庄都有一个毛拉，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毛拉

在集体农庄中几乎就是最高长官，他的生活由集体供应。而在全国到处都有地下的清真寺。但是乌兹别克党中央宣传部长拉希姆巴巴耶娃非常气愤，她表示一定要清除所有的清真寺。

当时我举出了另一个例证。“你们关闭清真寺，却不触动俄罗斯的庙宇，这就是说，你们不关闭东正教的教堂，因为如果你们关闭一座教堂，就会有人指责你们迫害俄罗斯人。但是乌兹别克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们早晚会指责你们对乌兹别克斯坦大搞俄罗斯化。应该认真地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但是并没有人打算解决这个问题。在60年代的时候就曾经提出要改变对耶和華教派的态度。

这一教派根据自己的教义不承认权力，拒绝领取国家的护照，拒绝服兵役。不允许青年人看电影和电视，不允许信徒加入工会组织。这样一来，教派的信徒们便脱离了国家的生活，隔绝于社会。耶和華教派处于地下的状态，长期以来都不报户口。

耶和華教派是乌克兰西部合并到苏联之后从华沙传到俄罗斯的。该教派在华沙属于合法宗教，而在我们这里便属于地下的教派。希望让该教派通过正式注册实现合法化，这并不是某种利他主义的行动，其出发点是必须给与该教派的信徒以公民权利，摘掉他们身上“社会弃儿”的标签。

苏共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伊里伊切夫反对给耶和華教派登记。他认为我们不该鼓励那些信徒，因为他们不同意彻底消除该教派。恰好他的看法与布鲁克林耶和華中心的立场相吻合。他们在得到我们这里的消息的时候，立即给耶和華教徒们发来指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在苏联登记。耶和華教派在苏联的合法化对这个中心不利，他们希望利用耶和華教徒不合法的地位挑拨离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宗教政策,就导致了各种冲突的发生。在乌克兰西部就是这样的。在那里合并派教徒<sup>①</sup>与东正教信仰进行公开的斗争。我们与谢尔比茨基就此问题进行过多次谈论。我们认为,在这里,合并教派的天主教堂被关闭,而东正教的教堂却安然无恙,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不能听之任之。应该把教堂归还给群众,正常地开放。东正教应该在乌克兰西部立足,同时东正教也应该与合并教派友好相处。但是这个计划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他们认为最好把教堂锁上。事情的最后结局是: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下,合并教派把东正教从乌克兰西部彻底赶出去。这样的结局原本是可以预料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提醒过乌克兰的领导。

总之,我们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下。如果出现负面的因素,责任都在于克格勃,当社会上平安无事,就开始大力宣传无神论,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的东正教。

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浸礼宗<sup>②</sup>从战后开始广泛传播。浸礼宗的社区主要在新建的城市出现:黑龙江上的共青城、安加尔斯克、纳霍特卡、新莫斯科斯克、布拉茨克、新卡霍夫卡等等。一批又一批的新城市处于浸礼宗的影响之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浸礼宗进行了公开的注册,建立了祈祷的处所。而在新建的城市中,禁止兴建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当时我们不能想象一

---

① 合并派教会,亦称东仪天主教,是从希腊正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和一些较小东方古老教会中分离出来而参加天主教会者。曾音译作攸尼亚特教会,但因被认为带有贬义,而未用作正式称谓。

② 浸礼宗,又名浸信会,英文为 Baptists' Church 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因反对婴儿受洗,主张只对理解受洗意义的信徒施洗,洗礼采用全身浸入水中,不用点水于额的方式,故名。



座新的城市要从教堂开始建起。而结果形成了反对东正教的局面。俄罗斯的东正教无法与那些非正式的,实际上是地下的教派的活动抗衡。这样一来便引起了东正教对当局的不满,此外一些流言飞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私下说,似乎官方更喜欢浸礼宗,而对于根本上为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国家服务的俄罗斯的东正教则不怎么友善。

还有一些问题也不能不考虑:那就是宗教内部的问题。卫国战争以后大批俄罗斯人定居在国外,并在那里兴建起一大批教堂,同时也出现了一批神职人员。他们在国外选出牧首,宣布自己是国外的俄罗斯东正教教派。

国外的教民并不承认莫斯科的牧首。这种对立状态持续了很多年。莫斯科的牧首希望与国外建立关系。然而至今毫无结果。

如果不改变这样的状态,那又会怎么样呢?在整个国家处于分裂的大背景下,一个宗教内部也会分裂。他们经受的考验还少么,现在又在信仰上出现了分裂。在这样的时刻,即国家与教会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国家的帮助下,教会开始医治自己的伤痕:返还了教堂,恢复了宗教的礼仪和节日。莫斯科的牧首与俄罗斯东正教在国内受到尊敬,帮助人民恢复精神上的财富。

国家政权应该看到俄罗斯的基石就存在于各种宗教的中心。俄罗斯国家和自己的人民一起经历了多少考验,保持了自己优良的传统。至于国外的宗教中心,他们虽然也是宣传人道主义的思想,但是并不能促进教民之间的团结,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俄罗斯人民服务的。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信仰自由的法律给俄罗斯的东正教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法律允许各种宗教团体进行登记注册,并

被赋予法人地位。但是与此同时，却破坏了俄罗斯东正教的统一性，破坏了它作为统一教派的历史地位。

东正教所遇到的困难，除了这部法律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宗教问题在俄罗斯国家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负责这个问题的高层领导人，往往并不了解宗教。

于是他们把宗教问题抛开，就像赶掉一只苍蝇。教会向国家提出的一些呼吁，他们往往并不予以回答，至多也是寻找借口予以拒绝。

于是又有一个问题：克格勃与此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讲述一些与克格勃的工作毫无关系的细节？

由于我们工作的不合理，给西方特工机关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们不会错失良机，只要不是特大的傻瓜，谁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他们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之外，还会派来一些以宗教身份作为掩护的间谍，离间教民与政府的关系，或者调唆他们进行破坏活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克格勃就要介入了。我们尽量深入了解宗教问题，以便预防一些不良的后果——至少在安德罗波夫作为克格勃领导期间我们是这样做的。这些工作本该由党和国家的机关进行，而且解决这样的问题也应该使用经过缜密考虑的政治方式，而绝非采取镇压的手段。

没有人知道我们曾多少次向党中央报告、提出建议、对最严重的情况提出我们的预测。对于全体苏联人民和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尽管长期以来他们的心头积累起对克格勃的怨恨。

---

---

## 苏联是怎样解体的

在地球上，不论是在那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侵略者致力于征服他人，扩大自己的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族为了使自己更加强有力，就会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但是，一个强大的、举世公认的超级大国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自愿地解体分裂，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的，

我们的国家的制度，尽管还存在着很多的缺点和不足，但是已经不止一次地被证明，它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国家改革的过程中，本来应该解除身上的重负，与过去告别，走上复兴之路，而绝不是消灭这个数十年来形成的制度，绝不是把一个大国肢解。

戈尔巴乔夫自命为一个改革的思想家，他像一个救世主取缔了出版的审查，主张全面的公开化，取消对国家的行政命令管理，发展经济和其他的福利。人民欢呼胜利，高兴地注视着新的领袖的灿烂笑容。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国家的基石顷刻间被拆毁，没有痛苦，也没有压力。我们本来有很多的力量。我们这个很富足的国家才华横溢的人民，原本可以承受这样的改革。

苏联各族人民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已经不止一次地展示了自己的强大、意志力和取之不尽的能量，展现了为了全民族的幸福而承受各种困难的决心。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

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苏联的各族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挺身保卫自己的祖国，这是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

新时期到来了，人们相信改革，相信了新的领导人，并且跟随他前进。但是有谁知道，改革的发明者根本就不是戈尔巴乔夫。

其实是安德罗波夫奠定改革的战略基础！遗憾的是给他的时间太短，他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

但是由谁开创了改革，这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位新的领导人，他准备推动社会生活的进步。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0年召开了第一届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与会的代表中有80%是共产党员，但是就是这次会议打垮了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其中的大多数早已经是“民主俄罗斯”的代表，尽管暂时还没有公开，他们实际上已经和共产党决裂了。

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沃罗特尼科夫作了关于俄罗斯主权地位的报告。本来苏联就是主权国家的联盟，在苏联宪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俄罗斯的主权地位。那么还要谈什么主权呢？

沃罗特尼科夫的报告给人双重的感觉：一方面强调一种安定，另一方面——不安。

各加盟共和国都要求扩大自身权利和有限的独立性，首先是经济方面的独立性，时代把这些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在他们的决议的旗帜下，是一种分裂主义的趋势。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成了马前卒，他们得到了充当“改革的工地主任”角色的莫斯科民族力量代表的支持。很快就清楚了：波罗的海三国要脱离苏联。

向代表们散发了大会的俄罗斯主权宣言草案。宣言草案中有两条原则令我吃惊,而且不仅是我一个人。宣言宣称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苏联的法律。这意味着什么?普天之下都没有这样的先例。例如,萨克森、图林根或者巴伐利亚会不会制定出高于联邦德国的法律呢?美国没有这样的情况,欧洲也没有这样的情况。不错,美国的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如果加盟共和国可以不遵守苏联的宪法,换句话说,不承认宪法,也不遵守宪法,那就是说,它也不承认苏联本身。宣言的另外一条也令我不安:规定新的法律从会上新选出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叶利钦上任时开始生效。这就意味着取消了俄联邦的宪法,也是对苏联宪法的最严重的违反。

我们走出了会场。应该做些什么!

在大厅里我遇到了科别茨上将(现在已经是上将)。还有另外一位将军走了过来。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都清楚,应该立即采取某种措施。现在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宣言就要付诸表决。在会上发言——至少要修改上述两个条款?情绪已经十分激动的大会未必能够支持我们。此刻一个人的意见使我们更加迟疑:

“刚才斯塔罗沃伊托娃娅的发言中明确地表示了要解散苏联,并没有人表示反对”。

仍然是那个问题:怎么办?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怎么能够熟视无睹呢!

我建议马上去见戈尔巴乔夫,好在他离这儿不远,他就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厅参加俄联邦共产党的创始大会。我的同志们都清楚这一步的责任,他们同意我的意见。

天上下着大雨。路途很短，而我们由于激动，竟没有注意到自己走在墙根下，屋檐的水流直接浇到我们的头上。

我们在大会堂里找到了克格勃九局的局长，负责政治局警卫任务的普列哈诺夫，请他把克留奇科夫找出来，以便在见到戈尔巴乔夫之前和他交换一下意见。普列哈诺夫去了不久，戈尔巴乔夫和普列哈诺夫一起走了出来。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疑虑，展示了宣言的草案。戈尔巴乔夫看了一遍，想了一下，说：

“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已经商量很久了。”

“但是实质上这是取消苏联的权力，”我们困惑地说道。

“不，这对于苏联没有威胁。如果你们不同意，可以离开会场。这样的表示是有好处的。”他像平时一样宽厚地笑了，而且很认真地补充道：“我看苏联当局没有任何理由对此不安。”

返回的途中我们谁也不说话。我的同行者们到底想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对我们的领导人的两面派立场感到震惊。一方面说没有任何危险，另一方面，又建议我们离开会场。只有一点是清楚的：让俄联邦的法律凌驾于苏联的法律之上，这是对苏联的威胁。难道说我们的苏联已经面临绝境？

我的脑海里充斥着不安的想法，但是还没有浮现出最主要的东西：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不知道，宣言的这些条款只是导致伟大国家解体的第一步。难道说这是他的希望？他可是这个国家的总统呀？那么说，他还不明白？不，他不会这样幼稚。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对于国家的解体，总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一点我可是从来没想到过。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小事，而是涉及一个国家的存亡，为了这个国家，我曾经三次流过血！

我们返回会场。宣言经过某些修改被通过了。“文件从被

通过之时起生效”这一条被取消，但是俄罗斯法律置于联盟法律之上这一条保留了下来。这就成了苏联解体的开端。所有这一切戈尔巴乔夫都非常清楚。他对我们说：“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也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的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如果给一个抽象的定义，在全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他的这种做法都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背叛。

与总统的谈话使我感到茫然。我发现，是戈尔巴乔夫令我失望——可是我曾经尊敬他，相信他。我和很多人一样，我曾经为他成为党中央总书记而感到十分高兴。他与以前的领导人不同，他精力充沛、坦诚、有魅力。他与安德罗波夫关系很好，这一点我也很喜欢。但是这一次，他让我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感到失望。看到戈尔巴乔夫的威望日趋衰落，我感到心疼。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91年3月22日的真理报上，文中倾吐了我的所有感受。“……这里有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指的是苏联的政权）。我们国家不论出现怎样的政权，如果这个政权不承认苏联宪法，它能否算作一个政权？没有人否认主权，但是需要最高权力的法律。没有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 \* \*

这是我第一次向读者介绍我曾经置身其中的国家安全系统，现在我的介绍即将结束了。我知道，他们会说：还有很多内容没有介绍，对于我已经介绍的事件，别人会有其他的观点，或者会暗示些什么。还会有人根本就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希望会有人理解本书的作者和作者的意图。把这一切写出来并不比亲身经历更容易。我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记忆，

而是通过了我的心灵。我不打算重新评说过去,重新评说所经历的事件和事实。曾经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我在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在战壕里领到了党证。但是生活在前进,社会、国家都在改变,今天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生活。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改变,后来我们称之为改革。

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应该说改革就是为了新的事业,为了重新塑造所有的一切和每一件事。但是我们何曾想到过,在这个革命的词汇后面,竟然是国家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被否定,在“返回到列宁时期”的口号下,却是另一种内涵?我们可曾想到,原来改革的领导人竟然是一个两面派?

现在一切都已经水落石出,你自然会问一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你都干了些什么?”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被提问的对象是苏联克格勃的一个领导人,是一名苏共中央委员。

那么能够做些什么呢?发出危险警报?我曾经有可能准备一份关于国内形势的正式信息,警告即将爆发的灾难,因为在克格勃内部无时不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我不能说自己向国家领导人隐瞒了重要的消息。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这些问题上有原则的立场。

我不止一次地在克格勃员工乃至部外的会议上讲话。我并不隐瞒自己对于党和国家存在的危机感,但是同时也感到自己能力的微薄:为没有能力制止这一过程。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不仅整个系统已经伤痕累累,而且还在不断受到有意识地毁坏。现在这已经不是秘密。

我所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言。尽管我也明白,我的发言不会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但是我心里可能会轻松一些。为什么没有发言?当时有这样的成规:如果克格勃的



主席发言,那么在克格勃的其他中央委员一般就不能再发言。在中央委员会,已经在一次形成了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就会永远延续下来:一个领域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人,等等。

党的纪律……我们的生活都由党的纪律决定。尽管已经看清楚,党已经失去了统一性,大家依然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分裂,因此总书记的话——就是法律。

如果我能够为自己党的中央全会上沉默找到某种借口的话,那么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在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发言。我当时是一名代表。当时国内的局势已经相当的严峻,因此应该可以,或者说要求我们打破常规。而且当时也是有话可说的。确实,那时候我们曾经为我们的领导所犯的非故意的过失作了解释。

党的二十七大回答了很多问题,确定了十月革命的作用,对于我们经历的斯大林时期作出了评价。似乎已经奠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从这里可以开始新的航程。

必须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铲除一切与之不适应的东西。这次党的会议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的人民也为之做好了准备。

实际上又怎么样呢?在政治上后退了一大步。我们浪费了很多的精力来否定过去、贬低自己的国家、践踏自己最可宝贵的东西,这是以后必须用鲜血来换取的。这一切是有意识地做的,是有预谋的。

我没有能够捍卫我们的国家在改革前赖以生存的一切。他被很多罪恶侵吞了,对此我不能不说。然而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机关和大众媒体都在进行无情“揭发”,不断地用各种方法重复那些历史上的罪恶,当然也有不少是肆意编造的。与此同时,很多群众生活急需解决的问题却被忘记到脑后。

在为数众多的“揭发”材料中有很多谎言，很多编造的假话。剧场和电影院都空无一人，人们直到深夜都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最高苏维埃的会议，这成了比剧场演出更有吸引力的节目。我们阅读报纸，所有的谈话都离不开政治话题。

提出了一个个的经济复苏的计划，很容易地通过了。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新的对抗的组织和运动、协会和党派，他们为了争夺政权，往往会使用非法的手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强调说，我们建设的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这是在欺骗傻瓜！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权的人们所宣传的政治。资本主义——这也是意识形态。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主要的政治家是雅科夫列夫。而掌管外交大权的是无与伦比的国际形势大师谢瓦尔德纳泽。

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是改革的主帅。至于他们是否预见到了前景，是否明白自己将把国家领向何方，是否想到了美国企图消灭苏联的计划，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巧合——对这些我不想评论。但是国家的新领导人们的所作所为，与数十年来美国特工机构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完全吻合的。

西方国家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够得到这样的礼物，从未期望过天上掉下来这样的馅饼。我们的敌人热烈鼓掌，极力颂扬我们的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路线——有时也称之为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路线”。为我们的总统冠以各种荣誉称号，宣布他为“荣誉公民”和“年度人物”。最后授予他诺贝尔奖金。西方世界能够这样对待我们的领导人，能够为曾经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讲话欢呼雀跃，竟然没有引起我们的人的任何警觉。

西方人争先恐后地称颂戈尔巴乔夫，称他为“戈尔比”，在我

们国内,即使是很清醒的人也已经头脑发昏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人对“戈尔巴乔夫路线”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当然我无法预知后来发生的别洛韦日丛林会晤<sup>①</sup>,我无法知晓我们伟大的国家被肢解的具体途径,但是国家命运已经危在旦夕是没有疑问的了。单凭叶利钦在代表大会上千方百计地争取把俄罗斯法律置于苏联法律之上,并在他上任时立即生效这一点,就可以明白谁将掌控俄罗斯的未来。他向戈尔巴乔夫证明了自己的优势。

在白俄罗斯的树林里埋葬了苏联。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首先向美国总统汇报,然后才通知了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默默地解除了自己的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的权力。

他就这样地交出了权力,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难道说戈尔巴乔夫就这样幼稚,他就不知道国家在发生政变吗?不,放弃所有的职务并不是因为幼稚。从改革的一开始,一切都已经是深思熟虑的。我们的领导人很清楚:如果一开始就公开自己的目标——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

那些图谋改革政变的人已经考虑到这一切。他们决定首先把共产党从政府和中央排挤出去,让他们在人民的眼中威信扫地。

这个主意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这是西方特工机构为了消灭我们的制度而制定的计划中的首要任务。他们甚至已经制定出具体实施途径和方法。他们的方法逐渐变成了改革的方

---

<sup>①</sup>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在著名的别洛韦日丛林中签订了成立独联体的文件,宣布苏联不再存在。

法。他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往共产党的头上泼脏水。

但是只要共产党还存在一天，对于新的掌权者就是一种威胁。现在有一种议论，似乎诚实的人应该加入共产党，因为没有党票在职务上就得不到提升。不错，的确有过这种现象。但是众所周知，在经济、科学和文化各个领域中，有多少重要的岗位是由非党人士来担任的。

另外，党的威望并不是由此来决定的。即便是在可怕的1937—1938年之后，党的威信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在卫国战争的各个战线上，军官和士兵们在冲锋之前提出入党的申请。他们不是去参加阅兵典礼，而是参加随时都会牺牲的战斗。难道这些人是为了升官而加入共产党的吗？不，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在战争中遭遇了巨大的牺牲，军队中共产党员的数量并没有减少，相反倒是增加了。在战争年代，千千万万劳动者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和劳动。

假如说有哪个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能够走上政坛的话，那么就可以从我们的当权者的行为中发现并理解某种逻辑。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数十年来掌握政权的人是在诅咒资本主义并宣扬社会主义的呀！

1919年一份日本报纸上写道：“实施对俄罗斯及其不发达的殖民地的监督”，这种幻想终于实现了。今天西方各国的总统们对我们提出条件：不执行我们的计划，我们就不给钱。今天西方的银行也提出：不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你们就拿不到钱。于是我们就乖乖地听命于他们，钱——是非常需要的。

为了不使这个已经破碎的大国重新联合起来，只有闪电般地承认每一个碎片，让他们成批地加入联合国——因为它们分

开以后生活是很困难的。现在为了对我们这些失去保护的弱小国家施加影响，为了掠夺我们的财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是的，我们变得弱小，每一个国家都已经感觉到，而且是失去了保护，因为我们的武装力量被分散了，被瓦解了，我们的武器被拆毁或变卖了。

西方的专家们深入了我们的工业、农业和财经的各个基础领域——也包括政治领域。我们的所有大门都对他们敞开。然而他们并不了解我们的生活，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的全部目标和任务就是：争夺对我们国家最富裕的领域的影响，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

日本也想起了昔日的野心：不给北方四岛，我们就不给钱。俄罗斯会不会最终把北方四岛交给日本——俄罗斯不是英国，英国可以倾全国的兵力去保护位于数千公里之外的领土马尔维纳斯。

我并不是说在 80 年代末可以保全我们的国家不被肢解，党不被分裂。但是这一过程是不是不可逆转的呢？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来回答。

很不情愿写这样的东西，但是今天这个分裂的过程进而威胁着俄联邦本身，俄罗斯对我们来说是最珍贵的，尽管在苏联解体之后，他已经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假设我所写的一切能够起到小小的警示作用，以免俄罗斯再经受新的灾难，我作为一名老兵，就会感到一丝的轻松：军装可以收进衣橱了。

---

---

## 与总统的最后一面

1991年1月9日,我最后一次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捷尔任斯基大街3号,第4层。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对面的儿童世界商店。在商店巨大的橱窗里面,可以看见人们从一层走到另一层,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个柜台。他们品评着商品,彼此商量着,比量着是否合身,最后交钱购买。生活正在那儿进行。但是我们的生命曾经贡献给这些人,我的责任是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安定。地球上的居民并不需要战争——不论是热战还是冷战,他们需要和平和建设,应该保证孩子们有一个和平的明天。

到了作出总结的时候了。就像国家的领导人所说的:没有冷战。那么为什么还没有安定呢?为什么国家没有欢乐呢?显然人们感觉到了,我们遭遇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的领导人。一个伟大国家暂时还存在,到分崩离析那一刻还有一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在抽搐,人民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站在窗前,回忆起半小时前与苏联总统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的一次谈话——这是我在担任苏联克格勃副主席期间最后一次与总统谈话。总统的办公桌上只有一张白纸。这是解除我职务的命令,从此我将进入国防部总视察员的行列。现在总统正在签署这份命令。

办公桌旁有三个人:戈尔巴乔夫、克留奇科夫,还有我。我感谢戈尔巴乔夫对我的信任,让我长时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我并不是经常希望政治局委员和政府要员们听我的声音，更经常的是把事实的真相隐藏起来。但是现在，我在离开这里的时候，不能不说出自己的担忧。我不能隐瞒，戈尔巴乔夫在群众中的威信已经明显地降低了，无论是民主派，还是共产党员，对他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应该做些什么，应该进一步明确自己在领导国家中所奉行的路线。中央的任何犹豫和迟疑都会导致大规模的流血。我谈到了很具体的事情。

戈尔巴乔夫听得很认真，似乎被我的坦诚所感动。

我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措施，好像只是说出了自己的忧虑。民族间的冲突已经非常清楚。波罗的海各国已经不承认中央。不久前在维尔纽斯发生了一个事件，而事件的内涵，我们这一代人大概很难理解。国内对于物价上涨、犯罪率上升和腐败现象感到不满。

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打断我的谈话。他倾听了我对第比利斯、巴库及其他热点城市发生的事件的看法。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戈尔巴乔夫转过身去对克留奇科夫说：

“我们让他跑了很多地方。”然后他又对我说，“你经历了不少艰难。真为难你了！”

然后戈尔巴乔夫对我表示感谢，他说：

“你所经历的是诚实的生活，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你。但是我们从没有后悔，”他又重复道，“不论派你去什么地方。”

大家都不说话了。沉默了片刻，他便沉思地说：

“儿孙们怪可怜的。”

我感到很震惊。他想到了未来，但是他的想法是否与我相同呢？看来他很清楚正在把国家带往什么地方。

谈话接近尾声，我们都站了起来。我走出办公室。头脑中是一团乱麻。在返回克格勃的路上我问克留奇科夫：

“你怎么理解他最后说的话？”

他耸耸肩，只说了一个词：

“令人震惊！”

我们来到他在楼上的办公室，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克留奇科夫请我进到房间休息，给我倒了一杯伏特加，说道：

“为了儿孙们，干杯！”

眨眼五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对于过去还会有很多的反思和评价，那是数十年的出色的劳动生涯。但是他的总结是：儿孙们太可怜了……



---

---

## 展望未来

要写一篇关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文章，却很难找到其他的词语。这是我的感受。于是我便和很多人一样，写出我们国家经历的苦难岁月。社会不可能从过去的震惊中清醒过来。人们也无法逃避关于明天的话题。但是关于明天的话题也并不轻松。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与俄罗斯的复兴连在一起。各个党派、联盟的纲领中对此都会大书而特书。他们期待摆脱国家危机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最终联合。

无人能够把这一思想发挥得尽善尽美，但也无人能够把它推翻。对于俄罗斯的未来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应该是合乎情理的。不难看出，俄罗斯这个概念的含义并不统一。其内容取决于提出复兴口号的是什么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为俄罗斯是由两个时期构成的，那就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

既然是这样，那么似乎复兴俄罗斯的主流将会朝向两个方向。而且两股潮流能否在某处汇合，也是令人怀疑的。而且问题不仅仅在于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还有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但是，不论是哪一个俄罗斯，今天都已经不复存在。

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危机，并不是国家的危机，也不是经济的危机。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的危机，被振荡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十月革命就是这样），还有领土的完

整。在原来苏联的领土上，形成了 15 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

对于其中的 14 个国家来说，复兴俄罗斯的思想未必就是指路明星。而对于俄罗斯，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保存下来的俄罗斯联邦，最首要的任务并不是复兴，而是要建设一个新国家。建设一个新国家，建设它的经济基础，这个思想可能帮助这个国家团结起各种力量并将在绝境逢生。团结起来进行建设，团结起来，以保障所留下的部分不至于再遭受破坏。

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前景，就必须有一个建设、发展新的俄罗斯国家的概念。复兴就是这一概念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要理解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概念，就必须明确过渡时期。在谈论到新国家的初始阶段，最好首先决定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方向。应该规定新国家的国体、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修改并完善现行俄联邦基本法律。

要制定建设新国家的构想和计划，就必须吸引全社会的有识之士，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提出一个“我们为新俄罗斯而奋斗！”的口号。

环境决定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这也是我们必须一定的条件下团结起来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新领土上进行建设，这是很重要的。原来国家的经济联系已经被切断，政权体系已经被破坏。此外我们的国家在建设的时候，还有一大批散居在国外的、但是有权利并打算在俄罗斯的领土上生活的居民。这些人有权利要求从故乡的土地上迁居到异乡的出生地。圣经中不是也讲过这样的大迁徙吗？

话又说回来。这种说法能否被接受？只能拭目以待。

如果能够尽量地把各种计划，首先是最主要的经济计划中

的内容结合起来,我们的希望就可能变成现实。

为了实现建设新国家的任务,必须尽可能地妥协。我们暂时只涉及经济领域。因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在依靠国内的原料和生产能力发展国内有控制的市场关系的过程中,在实现国家对基础经济行业进行调控的过程中,为了保障各种所有制的存在,不可能不寻求各种妥协。

必须鼓励服务于国内经济领域的国内商业、企业和金融结构,特别是向国内高科技投资的金融结构,这一点是没有怀疑的。

巩固信贷银行系统,对外商进行监督,吸引外资,发展国内的高新技术,把发展生产领域——而不是原料——放到优先地位,实施关税保护。

对生产者、国内的银行和企业,首先的纳税人,实行税收的优惠政策。

削减乃至禁止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进口,国家投资向农、牧、果、蔬基地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倾斜,这也是要坚决执行的。

这仅仅是一种想法。计划中应该涉及祖国的文化、卫生保健,还要吸引青年人投身到为实现“我们建设新俄罗斯!”的口号的行动中来。

大概我所写的实际上都是想法,只是一纸空文。它要求有人来阅读。

我们还是回到复兴俄罗斯的话题。对于多数人,俄罗斯就是过去的苏联,不仅保持了过去的俄罗斯帝国的疆域,而且还得到了扩张。我所以提到疆域,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取决于它在历史上形成的疆域的大小。

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恢复苏联,建设独联体,甚至

是欧亚联盟。这是很有吸引力的构想，只是……

今天。重建苏联的想法至少受到来自两大势力的阻力。

首先，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及其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内的同盟者。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做一个国家的掌权者，实在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甚至还不能相信这是真实的。无论多么奇怪，在他们的支持者中，还是有过去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脱离共产党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理解的是，他们竟然与昨天的敌人接近（我不敢相信，长期以来他们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后面隐藏的是民族主义思想）。他们通过民族主义者获得支持。叶利钦的所作所为，为原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浪潮起了推波助澜和加速的作用。叶利钦摆脱戈尔巴乔夫的严重步骤还令人记忆犹新。

不要说人民是否为独立的国家感到高兴，但是国家的领导人及其他势力是非常满意的。他们以瓦解一个强大国家的代价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至于如何分配所得到的馅饼，这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选择了这一条道路，以担任独立国家领导人的光荣为诱饵，用在白宫或其他豪华宾馆的接待来勾引，他们很容易就坚信自己的历史责任，坚信自己就是世界地图上还不存在的独立国家的化身。实质上，他们现在站在脱离俄罗斯的过程的风口浪尖上，还希望把俄罗斯当做自己经济来源的“奶牛”。

应该回忆一下，最初波罗的海三国是以经济独立和自主管理的要求来掩盖他们脱离苏联的企图的。在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国家形成的下一阶段，分裂主义者把俄罗斯对加盟共和国的掠夺作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他们想让人民相信，似乎俄联邦在从他们那里运出物资的同时，从未给过任何的补偿。

今天他们已经在唱另一个调子了。但是应该认真地听一听,从声音中听出假的音符。

比如说,围绕着“说俄语的居民”问题闹起了风波。掀起了一些纠纷。那些拥护独联体、欧亚联盟以及其他联合方式的人们,他们所谈到的俄罗斯的接近,不会涉及对俄联邦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压制。另外,应该澄清“俄语居民”这个概念。这个在群众大会上出现的词组并不能为作为一定的民族群体和国家的定义。为什么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要保护“说俄语的人”的权利,而不是俄联邦公民的权利?因为一个生活的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也可能是俄联邦的公民,生活的爱沙尼亚的爱沙尼亚人也是一样。

第二,美国不需要重新出现一个大国,他们反对独联体的巩固,更不要说是恢复苏联,从十月革命以来,破坏苏联一直是他们处心积虑实现的目标。

美国积极与独立后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鼓励他们疏远俄联邦,这些外交努力也说明了美国的立场。可以回忆一下美国国务卿贝克尔闪电般飞临这些国家的首都,急匆匆地承认这些国家,并被迫不及待地接纳他们为联合国成员国。美国破坏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友好相处的举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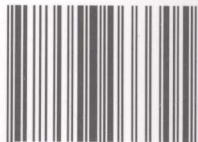
这些行动和外交手段发人深思,说明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加速苏联的解体,而且还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孤立俄联邦。与此同时,他们还从国际舞台上排挤俄联邦。事情是明摆着的,俄罗斯必须准备生活在被“新的防疫走廊”隔绝的孤立环境之中。他们将会从这个国家攫取原料、人才,必要时还会用我们的武装力量执行“维和”行动(担当警察)。

不管你愿不愿意,但是必须要活下去,而且从各方面来看,我们将没有可靠的盟友。这也是我们的建设所以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原因。我们有足够的原料和人才,有勤劳的人民,因此不能让他们陷入悲观主义和绝望之中。一个包含着美好和悲伤的过去的、新的俄罗斯将会出现。

所有希望有一个新的俄罗斯、有一个新国家的人,都会走到一起。但是我们应该襟怀坦荡,而不是一心只想着把我们俄罗斯固有的城市和居民点改名,尤其是改变成为有侮辱意义的名称。

用这样的方法来奠定一个新的、复兴的国家联盟的基础,也许就是苏联的基础。为了建设新的俄罗斯,值得我们团结起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ISBN 978-7-5060-3330-5



9 787506 033305 >

定价：26.00元